葉聖陶集

葉聖陶集

第七卷

融合集

老境集

剧本两种

江苏教育出版社



叶 圣 陶 集

第七卷

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25 插页9 字数249,6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平装3,000册，精装2,000册)

ISBN 7—5343—0553—5

I·29　　定价：平装 4.95元
　　　　　　　精装 6.95元

责任编辑　缪詠禾　常烽岚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在怀来花园乡为果树洒农药。



作者与老舍先生。

一九五七年一月摄于赴印度参加亚洲作家会议期间。



作者参观德阳四川化工厂，左边是叶至善、萨空了。
一九七八年六月一日摄。

多活几年，
多做些事。
一九八零年秋
叶圣陶

作者为《长寿》杂志题词。

目　录

融合集

老境集

剧本两种

编后记

融合集



纪念侯绍裘先生

绍裘先生去世二十三年了，到今天才在报纸上公开纪念他。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至今还不知道在哪一天哪一刻，也不知道被害的详情。也许比“四·一二”早一些时，他在全国各地的烈士里头最先成仁。最近看见重庆集中营的图片，看了那些尸体就想起绍裘先生。反动派是要杀尽革命的斗士的，二十三年来，屠杀从没有间断过。但是，革命的斗士站在人民一边，生根在人民中间，是杀不尽的。革命的斗士跟绝大多数人民结合在一起，解放事业就得到胜利。反动派却成了“岛寇”，眼看不久的将来就要被消灭了。

绍裘先生在交通大学上学的时候，因为参加革命组织，鼓动学生运动，被开除出来。后来在松江创办景贤女子中学，提倡妇女解放。同时由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他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努力宣扬三大政策。没有多久，国民党省党部从松江迁到上海办公，他就应上海大学的聘请，担任附中主任，同时又在上海设立景贤女子中学分校，竭力培养革命干部。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中，在一九二六年末和一九二七年初的上海三次起义中，他都积极参加。他把教育跟革命结合起来，办教育不是无所为而为，为的是革命。革命干部越多越好，培养干部当然要靠教育。这种思想，现

在近乎常识了，可是在二十多年前，恐怕只有真正忠于革命的人才了解。

我在景贤分校担任教员，开始跟绍裘先生相识。过从并不甚密，可是从目见耳闻的一些事，也足以知道他为人的大概。他担任的工作多，经常是忙，这儿那儿赶来赶去，坐下来把话说完，把事儿谈妥，又匆匆忙忙走了。跟他人讨论什么，和气，亲切，爽直，让他人感到一股热力。虽然如此，对于敌人可绝不宽容。有时为了维护革命立场，宁肯与人割断友情，不愿稍稍退让。自奉非常俭约，头发不常修，衣服也穿得随便，脏了破了都不在乎。公而忘私的精神给人一个印象：在某些方面，他跟恽代英先生很有相似之点。

大概就因为他对于敌人绝不宽容，反动派恨透了他，非把他杀了不可。在他们反叛革命的前夕，罪恶的阴谋布置就绪的时候，他就在南京失踪，牺牲了。

我了解绍裘先生并不多，不足以写叙他，表扬他。他的同志他的深交应该多多写些。不但对于绍裘先生，对于其他许多先烈也应该如此。要让当今的人和将来的人知道，人民的祖国是先烈的血和大众的汗灌溉而成的。知道得越深切，对祖国的爱越强固。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七日作

坚决起来保卫和平

杜鲁门跟他周围的一群战争贩子，按照预定步骤，指使南朝鲜的傀儡政权向三八线发动全面进攻，把战争引起来了。然后由美国出手，对朝鲜对东南亚实行武装侵略。

事前杜鲁门装作没事似的，在密苏里州过他的假期，朝鲜战争一发生，他就急急忙忙赶回华盛顿，发表他那荒谬的宣言。他操纵联合国制成非法的决议，就拿那个非法的决议作借口，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武装侵略朝鲜，同时又公然宣称派遣舰队阻止我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武力支援越南反动派保大政权。一切都照他的预定步骤做了，他很高兴，自以为做得很巧妙，一箭双雕，侵略了朝鲜，又侵略了中国跟整个东南亚。可是，这样的表现并不能证明美帝国主义势力强盛，反而把它的软弱无力暴露了出来。在殖民地人民一致要求解放，全世界人民一致要求和平的今天，是不容许战争贩子志得意满的。杜鲁门才高兴了几天，事实就教训了他：他的侵略计划跟侵略行动全盘失算了。美帝国主义者已经在担心一双"泥足"插进朝鲜，拔不出来。至于台湾，是咱们中国的领土，咱们迟早要解放它的。

不必讲什么大道理，最近十年的历史明明白白告诉咱们：侵略的结果必然是失败。法西斯头子跟战争贩子的结局怎么

样，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战犯东条英机等等都是好榜样。杜鲁门跟他周围的一群战争贩子难道能够变更历史发展的规律吗？只要咱们坚决起来保卫和平，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站在咱们一边，必然可以胜利地打破战争贩子们掀起三次大战的狂妄企图。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六日作

从西安到兰州

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两点四十分，火车从西安开，七点十多分到宝鸡。车程一百七十六公里。还没有快车，逢站都停。靠近西安和宝鸡的几站，乘客上下的多，车厢里坐得满满的。中间一段比较空，三个人的座位上有的只坐一个人。乘客里头农民居多。车上的广播室广播保藏红薯的方法，这是认定对象而又很适时的。

在咸阳和茂陵两站之间，北面耸起好些个大土堆，轮廓齐整。那是汉唐的陵墓，前些日子我们原想去看一看，可是没有去成。

南面远处是秦岭。始而终南山，既而太白山，还有好些个叫不出名儿的峰峦，一路上轮替送迎。那一天轻阴，梨树的红叶和留在枝头的红柿子都不怎么鲜明。秦岭的下半截让厚厚的白云封住。那白云的顶部那么齐平，好像用一支划线尺划过似的。韩昌黎的诗有"云横秦岭"的话，我们亲眼看见了，而且体会到那个"横"字下得实在贴切。露出在云上的峰峦或作淡青色，或作深青色，或只是那么浑然的一抹，或显出凹凸的纹理，看峰峦的远近高低而定。有些云上的峰峦又让白云截断，还有些简直没了顶。那些看得清凹凸的纹理的峰峦，山凹里有积雪。

从咸阳起，铁路始终跟渭河平行，渭河在铁路的南面。因为距离有远近，渭河有时看不见，有时看得见。渭河的水黄浊，看来跟黄河相仿。

就农事而言，铁路两旁的田野好像跟成都平原跟太湖流域都差不多。土色的黄是个显然不同之点，可是土质的肥沃恐怕不相上下。麦苗萌发了，这里那里一方方的嫩绿的绒毯。翠绿的葱绿的是各种蔬菜。林木时而稀时而密，跟方才提起的两个区域比起来，就只是绝对不见竹林，经常看见白杨树——茅盾先生所赞美的傲然挺立的白杨树。

出了宝鸡车站，人力车在新修的开阔的马路上慢慢地前进。两旁店铺灯光不太强，显得安静。马路旁的横路渐渐低下去，坡度不怎么大。心中突然发生一种感觉，仿佛到了四川省沿江的那些城市，虽是初到，很觉亲切。

十一月一日早晨上车站，九点四十分开车，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到兰州。车程五百零三公里：宝鸡到天水一百五十四公里，天水到兰州三百四十九公里。

在这条路上，最显著的是山崖迫近了，火车尽在丛山间跑。不但在丛山间跑，许多地方还得穿过山跑——这就是说在隧道里跑。隧道多极了，长的短的也不知道有几百个。一会儿电灯亮了，窗外一无所见，轮轨相激的声音特别响亮，仿佛蒙在坛子里似的。一会儿出了隧道，又看见窗外的天光山色。可是才抽得两三口烟，又钻进前一个隧道里了。这样的情形并非少见。最长的是天兰铁路的第四十一号隧道，在关内，数它是第一大隧道。

渭河也迫近了。靠着车窗往往可以低头看水流，或急或

缓，或窄或宽，沿河的冲积土上种着庄稼。河中有滩的地方，哗哗的水声也可以听见。渭河怎么样弯曲，铁路就跟着它弯曲。我们的车厢挂在后段，常常看见前面的机车和车厢拐弯，宛如夭矫的龙。

直到陇西，铁路才跟渭河分手，转向西北。陇西以东，铁路绝大部分在渭河北岸，少数几段移到南岸。这就得在渭河上架桥。可惜经过几座渭河大桥在夜间。后来借到《庆祝天兰铁路通车纪念画刊》来看，那几座大桥真配得上"雄姿"这个字眼。桥柱像罗马建筑的柱子那样，下面流着浩浩荡荡的渭河水，上面承着钢梁，简洁壮伟，显出现代工程的美。

不但渭河桥，铁路要跨过深谷也得架桥。那些桥往往是好几座钢塔架承着钢梁，另外一种壮观。至于中型的小型的桥梁，一眨眼间就开过的，说得笼统些，简直不知其数。

铁路既然在山间通过，就得把高低不平的山地凿成近乎水平的路堑，两旁削成斜壁，使土石不至于崩塌。好些斜壁还得加工，或者涂上水泥，或者砌上石片，筑成御土墙。有些地方筑个明洞来防御土石的崩塌。所谓明洞就是并不穿山而过的隧道，筑在山脚下，一壁贴着山，一壁显露在外，开些小弯洞，可以透光。

我们完全不懂铁路工程，照我们想，这条铁路有那么些个艰难的工程，该经过较长的年月才能完工，可是我们知道，从一九五〇年的五月到一九五二年的秋天，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天兰铁路就修成了，一九五二年的国庆前夕提前通车，同时又改善了陷于瘫痪状态的宝天铁路，使西北的大动脉畅通无阻。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万军工的功劳，这是

不止一个民族的两万多民工的功劳，当然，毛主席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号召和指示，是工程迅速完成的最重要的因素。请听一听当时的《筑路歌》吧——“树要人来栽，路要人来开，人民天兰路，人民修起来！”惟有人民自己作了主人，彼此团结起来，发挥力量和智慧，什么高山大河都可以征服，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来睦铁路通车了，成渝铁路通车了，天兰铁路通车了，我们听见这些个消息，那时候的感情跟从前听见什么铁路修成了完全不一样。这一回初次经过宝天铁路和天兰铁路，我们更深切地分享到十万军工民工的成功的喜悦。

为什么说以前的宝天铁路陷于瘫痪状态呢？原来国民党反动政府修筑宝天铁路，工程是很草率的，曲线的半径极小，路基极狭窄，旁壁陡直，隧道大多没有加工衬砌，很多应修桥涵的地方没有修，修了桥涵的，孔径又不大，不能畅泄流水，因而线路常被崩塌的土石阻断，路基常被受阻的流水冲毁。当时名义上虽说通了车，实际上通车的日子很少。一九四九年将要解放的时候，主要桥梁又让蒋匪军给破坏了，于是全线陷于瘫痪状态，只是那么一条烂铁路，简直行不来车。解放以后，一面动手修筑天兰铁路，一面施工恢复宝天铁路，施工期间还是维持通车。弯曲太厉害的线路改了，路基放宽了，旁壁削斜了，该修的御土墙修起来了，隧道加上了衬砌，又加筑了好些个明洞和桥涵，孔径太小的桥涵也改大了，又吸取了苏联的先进经验，做了大规模的排水工程，种了树，种了草，用来保持水土。于是宝天铁路有了新的生命，天兰铁路工程的供应运输有了可靠的保证。

据考古家的说法，这一带河谷两岸随着河谷的下降和黄

土的冲积，形成台地，史前人类和现在的居民就住在那些台地上。台地可以分做五级。第五级台地高出现在的河面二百到五百公尺，到现在还没发现人类居住过的遗迹。下一级是第四级，那里有史前人类的墓葬。再往下是第三级和第二级，高出现在的河面二十到五十公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就住在那里，彩陶文化的遗迹非常丰富。第一级是现在的居民居住的地方，高出河面五到二十公尺不等，我们想象那些使用石器陶器的史前人类，他们大概只能沿着河谷活动，走那大家不约而同走出来的道路，而且不可能走得太远。河这一岸的人跟河那一岸的人彼此可以望见身影，可是，恐怕始终不能够聚在一块儿说句话吧。他们的时代距离现在不到五千年，就算它五千年吧，就整个人类历史说，五千年是很短的一会儿。可是现在亮得发青的钢轨横躺在山岭间河谷上了。起初是大家不约而同走出来的道路。随后是有意铺设的道路，可是行走还得凭人力，或者利用畜力。最后才有铁路，铁路把道路机械化了。这五千年的进步多大啊！此外，公路也是机械化的道路，公路上可以开行汽车卡车。河里行了轮船，水路也机械化了。空中本来没有路，自从有了飞机，空中有路了，而且一开头就是机械化。各种机械化的道路掌握在人民手里，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更将飞速地提高，那还待说吗？

说得稍稍远点儿了，再来说些所见的景物吧。

一路上两旁的山大都作黄色，少树木，是成一鳞一鳞的梯田。可是宝鸡往西开头的几站间并不然。那里山上全是树木，同是绿色而浓淡深浅有差别。又搀杂着好些红叶，红叶又分鲜红和淡红。这就够好看的了。再说那些山。不懂地质

学的人只好借用画家的皴法来说。那些山的皴法显然不同，这一座是大斧劈皴，那一座是小斧劈皴，这一座是披麻皴，那一座是荷叶筋皴……几乎可以一一指点。皴法不同的好些座山重叠在周围，远处又衬托着两三峰，全然不用皴法，只是那么淡淡的一抹。忽然想起这不跟长江三峡相仿吗，我们坐在火车里就像坐在江船里一样，峰回路转，景象刻刻变换，让你目不暇接。我把这个意思告诉我的同伴。我说，没有走过三峡的，看了这里的景象也就可以知道个大概。一位同伴脱口而出说："这个得拍电影！"是的，语言文字的确难以描写，惟有彩色活动电影才胜任愉快。

虽说山崖迫近，也有不少地段山崖退得远一些儿。这就是所谓第一级台地吧，全都平铺着各种农作物，当然也有树木和村屋。不用想得太远，至少从周秦时代起，古先的农民就在这里翻垦每一块土，他们的汗滴在每一块土里。前一辈过去了，后一辈接上去，无休无歇，直到如今。我们如今看见的那些平田以及山上一鳞一鳞的梯田，哪一处不留着历代农民改造自然的"手泽"？仔细想来，实在是伟大的事业。最近大家认明了总路线，知道农业要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不再像以前那样光靠"一手一足之烈"，要大伙儿合起来搞，要逐步机械化。预想改造完成的时候，农村经过飞跃的改变，景象必然跟如今大不相同，那是更伟大的事业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车正靠站，站名梁家坪，距离兰州只有十多站了。连绵的黄色的山，山顶大多平圆。村落里的房屋用黄土修筑的多，偶然看见用砖瓦的。除了地里的农作物和一些树木，就只见浑然一片的黄。可是将近兰州的时候，景

象就不同了。显著的是树木多了，这里一丛，那里一丛，树叶还没有落，苍然成林，其中有拂着地面的垂柳。地里界划着发亮的小溪沟，沟水缓缓地流动。好些地里刚灌过，着潮的土色显得深些。那溪沟里的水是黄河水，用大水车引上来。兰州附近一带用水车引黄河水从明朝开始，据说是一位理学家段容思的儿子段续从西南方面学来的。现在有水车两百多架，每架可以灌五十亩到百把亩。

在兰州附近看见好些地里尽是小卵石或是黑色的小石片，平匀地铺在那里，像富春江的江底。我们不明白那是什么玩意儿，打听人家才知道那是兰州农作方面一种特殊的发明。原来兰州的土地干燥，又含着卤质，遇到旱天虽有沟水灌溉，还是嫌干燥，下过大雨卤质上升起来，都对农事不利。于是发明沙地的办法——把湿沙平匀地铺在地面，上面再铺一层小卵石或是小石片来保持它。在旱天，那沙地有减少蒸发保护幼苗的功用，大雨下过，雨水透过沙地渗到土里，卤质不至于升起来，因而水旱都可以不愁。这是很细致很烦劳的工夫，你想，田地多么大，沙和卵石石片就得铺多么大。可是农民为了生产，愿意下这个又细致又烦劳的工夫。据说铺一回沙可以支持三十年，过了三十年沙老了，必须去掉旧沙，换上新沙。

黄河又见面了，在铁路的北面。几个人在河岸边慢慢地走，各掮着个长方形的架子，比人身高，架子上是些胀鼓鼓的东西，看不太清楚。可是我们立刻想到那是羊皮筏。看，黄河上一个人蹲在羊皮筏上轻飘飘地浮过去了。羊皮筏闻名已久，现在才亲眼看见，心中涌起这一回非试它一下不可的想

头。

看图表，兰州海拔一千五百公尺。路上经过的寒水岔金家庄两站最高，都在两千公尺以上。从宝鸡到寒水岔是一路往上爬。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作

游 临 潼

那一天天气晴朗。上午九点过，我们出西安城往临潼。临潼是西安人游息的处所。逢到休假的日子，到那里去洗一个澡，爬一回山，眺望渭河和田野，精神舒快，回来做工作格外有劲儿。

经过浐河和灞河。浐河上跨着浐桥，灞河上跨着灞桥。灞河灞桥都有名。沛公入关，驻军灞上。唐朝人送出京东去的直送到灞桥，在那里设饯，折柳赠别，以灞桥为题材的送行诗也不知道有几多首。浐河比较小，灞河可宽大，虽然秋季水落，靠两边露出了沉沙，浩荡的气势还是很显然。桥是平铺的，一列的方桥墩，一个个的方桥洞，汽车、大车、行人都在桥上过。岸边有些柳树，并不是倒垂拂地的那一种，也许唐朝人所折的柳跟这个不同吧。

从灞桥柳树想起《紫钗记》传奇里的那出《折柳》。霍小玉就在这里送李益，情意缠绵，难舍难分，说灞桥"分明是一座销魂桥"。可是汤玉茗更改了《霍小玉传》的情节，让李益往河西参军，往河西怎么倒朝东走？这与其说是作者的小小疏忽，不如说他舍不得灞桥折柳的故事，定要拿来做他传奇的节目。反正像作画一样，花无正色鸟无名，只要取个意思就成，既是传奇里的动人场面，又何必核实方位，究东问西呢？

在右手边望见一座新建筑，矗起个又高又大的烟囱，形式简净明快，大玻璃窗一排上头又是一排。铁路的支线跟公路交叉，横过去直通到新建筑那里。那是西安第二发电厂，去年十一月间开的工，不到一年工夫，今年十月九日已经举行了庆祝落成发电的剪彩典礼。最新式的设计，最新式的机器，最先进的技术，机械化、自动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厂里现有的设备全部开动起来，发电量等于西安第一发电厂的两倍。在今后的两三年内，西安、咸阳地区的工业生产用电和城市居民用电这就可以充分供应了。

两旁地里的小道上三三两两有人在走动，都汇合到公路上来。老汉衔着旱烟管。老太太带着小孙女儿，手里拄着拐杖，可是脚步挺轻爽。壮年男子跑得热了，簇新的青布棉短褂搭在肩上。年轻妇女当然爱打扮，无论留发的剪发的都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有些个留发的还在发髻旁边插朵菊花。他们大都有说有笑的，瞧那神气好像赴什么宴会。

不但汇合到公路上来的行人越来越多，看，大车也不少呢。一辆大车往往挤着一二十人，偏着身子，挨着肩膀，有些人两条腿挂在车沿，那么一颠一荡地按着韵律前进。骡子拉着重载本来跑得慢，又因出身在乡间，跟汽车还有些生分，见我们的汽车赶过去，它索性停了步。于是赶车的老乡下来遮住骡子的视线，我们的汽车也开得挺慢，那么轻轻悄悄地蹑过去。

打听之后才知道斜口逢集，这些人大都是赶集来的。我们停车去看看。经过一条小道，从一排房子的后面抄过去就是斜口。铺子前面一些摊子已经摆得端端正正了——卖东西

的到得早。菜蔬，布匹，饮食，杂用零件，陈设跟一般市集差不多。需要东西的人这边看一看，那边挑些合用的什么，或者坐下来吃一碗泡馍，几乎可以说摩肩接踵，颇有一番热烘烘的景象。市梢头陈列着许多木柜子和门窗槅扇，全是木工的手制品。秋收差不多了，农民们添置个新柜子储藏家用东西，或者买些现成的门窗槅扇把房子刷新一下，这也是改善生活的要求，料想四年以前的市集该不会有这些东西吧。

十点半到临潼。并不进临潼县城，径到华清池。这一带树木比一路上繁茂，苍翠成林。仰望骊山不怎么高，可是有丘壑，有丘壑就有姿致，绿树红叶跟山石配合，俨然入画。从前唐明皇在这里修华清宫，周围起些公卿的邸宅，不致孤单寂寞，于是在华清池洗洗温泉澡，在长生殿跟杨玉环起个鹣鹣鲽鲽的恩爱誓。就享乐方面说，他可真是个老在行。

现在所谓华清池是个紧靠着骊山的花园布置。纯粹中国式，有假山、回廊、花栏、荷池、小桥，亭馆全用彩椽，当然，浴室也包括在里头。花栏里菊花、西番莲、美人蕉开得正有劲儿，还有些粉红的大型月季——这时候还开月季，可见地气之暖。荷池里只剩荷梗了，几只鸭悠然浮在池面。这池水是从温泉引过来的，因而想起“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句。

我们不急于洗澡，先去爬山。目的在看西安事变那时候蒋介石躲藏的处所。从华清池右边上山。土坡缓缓地屈曲地往上延伸。路不算窄，大概可以并行两辆汽车，是新修的。路旁边栽些槐树。将近半山腰才是比较陡的石级，登完石级就到捉蒋亭。亭子后面朝石壁。亭子里正面上方题一段文字，叙

述西安事变前后经过的大略情形。两三个老乡为游人指点蒋介石躲藏处，其说不一。一个说亭子后面那石壁稍微凹进去像个洞子，那夜晚蒋就像耗子似地躲在里头。一个说他还想往上逃，不知是光脚底跑破了还是挫伤了腰，再也跑不动，只好闪在右手边那块岩石的侧边。听起来总不离这一带石壁。为了掩饰蒋的丑，国民党反动派就在这里修个亭子，取名叫“正气亭”。正气，这是文天祥用来题他的诗歌的，反动派可窃取珍贵的珠花往癞子脑壳上插戴。单是这个冒用美名的罪名，他们就十恶不赦。不过反动派全惯于搞这一套，你看，帝国主义者不是总把他们那些个乌烟瘴气的国度叫作“自由世界”吗？解放以后，据实定名，亭子叫“捉蒋亭”，连同亭子里的那段文字，可以让游人知道个真情实况。

坐在捉蒋亭的台阶上休息。朝北望去，眼界宽阔极了。明蓝的晴空无边无际。渭河和它的支流界划着远处的平原，安安静静的。近处这里那里一丛丛的树林。地里差不多全种菜蔬，特别肥美，嫩绿浓绿都像起绒似的。通常说锦绣河山，这眼前的景物可真是一幅货真价实的锦绣。

下山吃过饭，在华清池旁边一家小茶馆前喝茶。帆布躺榻，矮矮的桌子，有成都茶馆的风味。茶馆老板是个爱说话的人，偶然问他几句，他就粘在那里舍不得走开。他指着半山腰的捉蒋亭，说当年捉住了蒋介石送西安，就在茶馆门前上的车——穿的单衫，一位弟兄好意，给他穿了件棉军衣。他说：“蒋介石这副形容去西安，来的时候可神气呢。一路上两旁布岗位，比电线杆子密得多，上刺刀的枪横在腰间，脸全朝外，他在汽车里只看他们的后脑勺。地里做活的全都让他

给赶回去。不问你的活放得下手放不下手。不用说，我们这些小铺子也非关门不可，你得做一天吃一天，那是你的事，他不管。”

摹仿了几声枪响之后，茶馆老板接着说：“我想，他们准是开会谈不拢，闹翻了。亏得他们闹翻，我这小铺子才得就开门。要是他住在这里过个冬，我怎办？……后来他还来过一趟，照样布岗位，照样赶地里做活的回去，叫铺子关门。他穿一件长袍子，抬起尖下巴朝山上望了一会儿，不知道他想些什么。不多久汽车就开走了……”

茶馆附近有两个水果摊子，带卖菜蔬。曾听说临潼石榴有名，我们就买石榴。摆摊子问要酸的还是甜的。我们说当然要甜的。可是一问价钱，酸的贵一倍。什么道理呢？茶馆老板又有话说了。他说酸石榴什么病都治，妇道人家尤其爱吃。大概病人胃口不好，什么都没味，吃些酸东西倒有爽利的感觉，那是真的。说什么病都治，未免夸张过分了。至于多数妇女爱吃酸是实情，恐怕是生理的关系，不大清楚。我们反正不生病，还是买了甜的，确然甜。

摊子上还有苹果和柿子。柿子分两种。一种是大型的，朱红色，各地常见。一种是小型的，大红色，近似苏州的“金钵盂”和杭州的“火柿儿”。这种小型的柿子在西安市上见过，没注意，这回可注意了，因为联想到苏州的金钵盂。我从小不爱吃那朱红色的大型柿，生一些的，涩味巴着舌头固然难受，熟透了的，那甜味也怪腻，没有鲜洁之感。我只爱吃金钵盂。自从离开了苏州，经常遇见那些大型的，我从来不想拿一个来尝尝，可以说跟柿子绝缘了。现在看见这近似金钵盂的小

型柿，不由得回忆起幼年的嗜好。捡一个熟透了的，轻轻地撕去表面那一层大红色的衣，露出朱红色的内皮，还是个柿子的形状，送到嘴里，甜得鲜洁，跟金钵盂一个样，而且没有硬核——金钵盂有硬核，或多或少。这种柿子是临潼的特产，名叫火柿，跟杭州相同。

临潼的菜蔬，白菜、花菜都好，韭黄尤其有名，在西安都吃过了。菜大都肥嫩，咀嚼起来没有骨子，很和润地咽下去。韭黄爽脆极了，咀嚼的时候起一种快感，汁水有些儿甜味，几乎没有那股臭气，吃过之后口齿间又绝不发腻。

茶馆的右手边就是公共浴池。温泉养成了临潼人勤洗澡的习惯，应该有公共浴池满足大众的需要。分男的和女的，都在屋子里，规定每天开闭的时间。我们去看男浴池。一股热气，比澡堂子里的大池子大。屋内光线不太强，可是看得清池水是清澈的。十来个近乎酱赤色的光身子泡在池水里，有几个只透出个脑袋。池沿上也有十来个人，正在擦呀抹的。

于是我们重入华清池。那一天不是星期日，等了大约一刻钟工夫就轮到我们洗澡了，据说星期日买了票等两三个钟头是常事。华清池内也有大池子，浴室分单人的、双人的，还有一间四个人的，美其名曰“贵妃池”。我和三位朋友挑了贵妃池。

池作长方形，周围全砌白瓷砖。一边一个台阶，没在水里，供洗澡的坐。不坐那台阶而坐在池底，水面齐脖子，四个人的手脚都可以自由舒展，不至于互相碰撞。水清极了，温度比福州的温泉和重庆的南温泉、北温泉似乎都高些（我只洗过这三处温泉），可是不嫌其烫。论洗澡是大池子好，你可

以舒臂伸腿，转动身躯，让热水轻轻地摩擦你周身的皮肤，同时你享受一种游泳似的快感。在澡盆子里洗差多了，你只能直僵僵地躺在里头让热水泡着，两边紧紧地挨着，不免有些压迫之感。这贵妃池虽然不及大池子宽广，也尽够自由活动了。我们足足洗了三十分钟，轻松舒快，身上好像剥去了一层壳似的。起来之后倒茶壶里的水尝尝。那是煮过的温泉水，清淡，没有什么矿质的气味。

澡洗过了，到夜还有两点来钟，我们去看秦始皇墓。起先车顺着公路开，后来转入田地间的小道。一路上多的是柿子树，柿子承着斜阳显得更鲜明。没有二十分钟工夫就到了秦始皇墓下。那是个极大的土堆，据说地盘有四百亩，原先还要大得多。大略有些像金字塔，缓缓地斜上去，除了土面的草而外，什么也没有。骊山默默地衬托在背面。这一面山上红叶特别多，山容比华清池那边望见的似乎更好看。从墓顶往下望，平原上红柿子宛如秋夜的星星，洋洋大观。听说春天是一片桃花和杏花。

秦始皇墓让古来所谓"发冢"的发掘过好多回了，按《高祖本纪》的记载，项羽是头一个。他们的目的无非在盗些宝物。往后在研究古代文物的整个计划之下，这座陵墓该来一回科学的发掘。前些日子在西安的《群众日报》上看见一位先生的文章，说这一带农家常常捡到古砖，又掘到过埋在地下的古时的排水管，发见过还看得清形制的建筑结构，等等。猜想起来，发掘该不会一无所获，或许竟大有所获，使历史家、考古家高兴得不得了，互相庆幸又得到了可贵的新资料。当然，这只是外行人的想头，未必有价值。——再说句外行话，要

是古代通行了火葬，不搞什么坟墓，现代的历史家、考古家至少要短少一大宗重要的凭借吧。

上了车，在小道上开行，忽听当的一声。以为小石子打在钢板上，没有事。可是回头一看，小道上画了很长的一条，是乌绿的机油。车底盛机油的部分破了。于是停车，司机仰着身子钻到车底下去检查。站起来的时候是两泡眼泪，一只手尽拍前额，几乎哭出声来。小道中间高两边低，车底当然接近些地面，车轮子滚过，小石子当然要蹦起来，完全没有理由怪到他，可是爱护公共财物的观念叫他满了眼泪。

大家说有什么哭的，想办法要紧。吉普车的那司机说机油漏光了，花生油什么的可以代替，油箱的窟窿呢，塞一把土，拿布裹一裹，拴一下，就成了。——听那司机说办法，我立刻想起在巫山下经历的事。那一年冬天从重庆东归，飞机、轮船全没份，我们六十多人雇了两条木船。一天黄昏时分歇碚石，拢岸了，一条木船触着江边的石头，船侧边一个窟窿，饭碗那么大。那时候的惊慌情状不必细说，幸而没有事，只濡湿了好些箱笼书籍。你知道管船的怎么修补那穿了窟窿的破船？一大碗饭，拿块不知从哪里撕下来的布一裹，往窟窿里一塞，再钉上块木板，第二天早晨就照常开船了。急救治疗就有那么一手。

两个司机作急救治疗去了，我们跟几个农民商量油的事情。农民们说村里各家去问问，大家凑一些，不过要六七斤怕凑不齐。一会儿村干部也来了，问明白之后说："总得想办法，保证你们今夜晚回西安。"

太阳落下去了，道旁场上有个四十来岁的农民在收晒在

那里的棉花，一大把一大把地往筐子里塞。我们跟他攀谈，不免问长问短，最后请他说说今昔的比较。他把手在筐子边上一按，似笑非笑地说："从前吗，搞出来的东西人家给拿走了，人还不得留在家里。现在搞出来的是自家的了，人也能安安心心地留在家里了。"

他这个话多么简括，说出了最主要的。在今年，他那"自家的"里头包括新盖的房子，新买的一头小牛——他那村子里有八家盖了新房子呢。真的事实，亲身的体会，什么道理都容易搞明白，搞得明白自然能够简括地扼要地说出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就是这个农民，今天在这里一大把一大把往筐子里塞棉花的，他一定会说："从前吗，一家人勤勤恳恳地搞，可是搞不怎么多，比工人老大哥差得远。现在大伙儿合起来搞，比从前好多了，我们跟得上工人老大哥了！"

凑来的油灌好，汽车开动，已经七点多了。月亮还没升起来，车窗外的景物都成了剪影。老远就望见西安第二发电厂烟囱高头极亮的红灯，那是航空的安全设备。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作

在西安看的戏

住西安不满二十天，倒看了八回戏，易俗社两回，香玉剧社两回，尚友社、西北歌舞剧团、郿鄠剧团、皮影戏各一回。西安人看戏的兴致似乎很高，除了我们看过的几处以外，还有好些剧团，听说处处满座，票不容易买。多数人能够哼两句秦腔或河南梆子，广播也常常播秦腔和河南梆子，喇叭底下聚集着低回不忍去的听众。

西安的戏院可以说属于旧形式。长方形，直里比横里长。长条椅一排排地正摆，挤得比较紧。两旁边栏干以外也容纳观众，那是偏着身子站着看的，票价特别便宜。房屋不怎么讲究，有几座用席顶棚。易俗社舞台沿的上方仿敦煌壁画画两个大型的飞天，回身凌空，彩带飘拂，比随便画些图案好看多了。用飞天作舞台的装饰，在别处还没见过。

听说一九五四年要修一座戏院，当然是新式的，设计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怎样让买便宜票的也有座位。

在易俗社看两回秦腔，一回是整本戏《游龟山》，一回是六个单出戏。戏都演得认真，排在前头的单出戏也没有从前戏院的习气，有气没力，敷敷衍衍，只顾陪着观众消磨时间。演员的地位和认识提高了固然有关系，另外的原因恐怕是观众老早到齐，一开场就坐得满满的，不像从前有些人那样直

到末了儿一两出上场的时候才来，表示他们除了头牌的名角而外不屑一顾。既然有那么些人要看，而且是真心诚意地要看，就是戏排在前头，又怎么能草草了事？

小时候听秦腔，现在光记得贾碧云的《阴阳河》和《红梅阁》。贾碧云是京剧角色，带唱秦腔，当时很有些声名。只觉得那声音高亢极了，刺耳的胡琴和梆子之外就只是那么咿咿呀呀的，越顿越高，越顿越高，完全听不清唱些什么。不知道什么缘故，现在听秦腔不觉得那么高亢了，胡琴和梆子也不刺耳，演员唱得好，口齿清楚，我可以听懂七八成，唱得差的，也有三四成。

没有戏单，挂在两旁的黑板上写着白粉字——戏名和演员名，因而很难记住谁扮演谁。我光记住了一位女演员的名字，孟遏云，因为近旁的观众都在轻声屏气地说这个名字，她的演唱特别引人注意，还有我左手边一位老太太带着叹息的调子说她今晚来看戏就为看这个孟遏云。

外行人不能说内行话，况且唱歌是声音的事情，用语言来描摹很难见效，往往描摹了一大堆，人家还是捉摸不到什么，我也不预备描摹了。我只觉得孟遏云的声音有天分又有训练，训练达到了极端纯熟的境界，能够自由操纵，从心所欲，随时随地恰当地表达出剧中人的感情，因而她的唱有风格，有自己的东西，虽然别人唱起来，唱词和曲谱也全都是那么样。听她一句一句唱下去，你心中再不起旁的杂念，光受她的唱的支配。她的风格含着种种味道，领略那味道是一种愉快、一种享受，你惟恐错过了一丝半毫的愉快和享受，哪还有工夫想旁的？她的声音那么一转，一转之后又像游丝一

样袅上去，你就默默点头，认为非那么一转袅上去不可。她把一个语音斩钉截铁地喷出来，才喷出来就划然煞住，你就咂咂嘴唇，认为惟有那样喷出来就煞住才恰到好处。这里所谓“认为”并非思惟活动，简直是不意识，不过耳朵里感觉顺适，心里感觉舒服罢了。我们看了好的书画、精美的雕刻，同样会感觉到那种顺适和舒服。凡是艺术作品，合乎规格，又不仅合乎规格，还有独自的风格、独自的味道的，都能叫人感觉到那种顺适和舒服。——我说了这么些话并没有传出孟遏云的唱的好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要领略好处怕只有用耳朵去听。我很想听听内行家的意见，不知道内行家对于孟遏云的唱怎么说。至于她的演技，我不再多说外行话了，总之，妥贴，老到，全身有戏，随时是戏。在《游龟山》里，她演江夏县的太太，又一回她演《探窑》里的王宝钏。《探窑》尤其酣畅淋漓。

常香玉的河南梆子，我看过她的《断桥》。她也有她的风格，能把感情充分地发挥。白娘娘的爱恋、怨恨、悲痛，听了她的唱似乎可以把实质给抓住。这回看了她的《花木兰》，印象当然也挺好。我的一位朋友发表他的“读后感”，他说《花木兰》的道白做工似乎过于京戏化了，减少了河南梆子的本色——某一剧种的某些本色应该保留还是改掉，该多保留还是少保留，是戏剧工作里值得讨究的题目。他又说花木兰胜利之后帐前独唱的时候如果有个舞蹈场面，戏也许更出色些。外行人不能下什么判断，愿意把朋友的意见记下来，供香玉剧社参考。

巧得很，在易俗社看了《拷红》，在香玉剧社也看了《拷

红》。易俗社的《拷红》，饰红娘的是一位男角——很抱歉，没有记住他的姓名，一出场就看得出他是个守着旧典型的。所谓旧典型就是传统的规范，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全有程式。可是他能不让程式拘住，把程式演活了，于是观众面前出现一个活泼伶俐随机应变的小红娘。我想，我国各种旧戏都有它的程式，凡是成功的演员都是把程式演活了的——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切当。香玉剧社的《拷红》，老夫人、莺莺、红娘、张生四个角色铢两悉称，彼此配合得挺紧凑，一个在那里唱呀说的，跟另外一个或几个息息相关。这一层不太容易做到。可是观众爱看的是整台的戏，不是一个角色演戏，另外一个或几个只在旁边坐一坐，站一站。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演员当然应当尽力做到这一层。

没有戏剧源流的知识，不知道秦腔和河南梆子的关系怎么样。推想起来，该是近房兄弟吧。不然，为什么西安人喜爱河南梆子那么强，只望香玉剧社老留在西安？再说，陕西跟河南接壤，一在关内，一在关外，地理上的关系也实在密切。据我想，这两种戏剧，还有其他几种地方戏，有个共通之点，就是唱句的音乐性很够味，可是听起来还是语言。音乐性够味，所以熟极的戏也愿意再去听一听，听那歌唱，听那演员的独自的风格——当然指有风格的而言。听起来还是语言，所以听歌唱同时领略戏的细微曲折，比较单就音乐方面听，感受更见深切。在我国各种戏剧里头，音乐性够味可是听起来几乎不成语言的，该数昆曲里的南曲了——北曲好一些。固然，曲词多用文言词藻，造句又属诗词一路，那是不容易一听就明白的一个原因。可是，更重要的原因在每唱一个字袅呀

袅呀地转折太多了，叫人家光听见一连串的工尺上四合。就是能唱的曲家，要是请他听一支生曲子，恐怕除了一连串的工尺上四合也领略不多吧。曲词明明是语言（诗词一路的语言），可是听起来只是一连串的工尺上四合，不成语言。在戏曲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今天，各种剧种都在那里发展呀改革的，情形热闹非凡，可是昆曲只有抱残守阙的份儿，道理也许就在这里。京戏旦角的某些唱段，我听起来也有一连串工尺上四合之感，就是说不知道说些什么，虽然觉得悦耳。我听秦腔和河南梆子就不然，一方面居然能欣赏唱的好处，另一方面又能听清它的语言，欣赏就包括戏剧的内容，不仅在音乐。凡有这个特征——音乐性够味，可是听起来还是语言——的歌剧，我想，前途都是光明的、乐观的。什么根据呢？根据就在我能够接受，非但能够接受，还能够欣赏，而我呢，至少可以代表一大部分并不内行可是喜欢看戏的观众。

看了西北歌舞剧团的《小二黑结婚》，我就想到一部分新歌剧似乎还没有前边所说的特征，唱词配了音乐，当然不像话剧那样，句句跟实际生活里的语言一致；而那音乐，不知道什么缘故，又不像秦腔和河南梆子那样，能使有天分的演员唱成独自的风格。于是，就语言方面听，不如话剧干脆、爽利、有实感，就音乐方面听，不如秦腔、河南梆子的耐人寻味，经得起咀嚼。有些新歌剧，我们看过一回，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就算了，再不想看第二回，原由恐怕在此。新歌剧正在成长的阶段，得从各方面努力，是不是该在争取我所说的特征上多注点儿意，希望戏剧界考虑。

现在谈皮影戏。我们看的全本《火焰驹》。皮影戏各个登

场人物的唱词道白大部分由一个人担任，只有少数几处由另外一个人搭配。唱的什么调我不知道，似乎属于“说唱”一路。

那皮人、皮道具的雕刻工细极了，饰色鲜艳极了，陈列在民间艺术品展览会里准可以列入上选。一切全用繁复的线条画成，只有人物的面部很简单，几笔勾出了生旦净丑，当然也有繁复的花脸。生的袍服，旦的衣裙……全有图案花纹。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也不厌其烦地尽量细雕，好像红木作里制成的精制品。小到一把扇子（要知道皮人只一尺来高，可以想象扇子多大了），并不剪成扇形就算，还要把它镂空，让扇面上有画。有几幅布景，那花从全用工笔，那假山有宋元人画山石的意味，又古茂，又艳丽。

没看过皮影戏的也许不大明白那是怎么回事，现在大略说几句。可以拿傀儡戏作比方，傀儡戏是傀儡演戏，皮影戏是皮人演戏，举止行动同样由藏在背后的人操纵。不过皮人不像傀儡那样成个立体的形象，那是皮雕成的，只是一片，而且是侧影的一片，不朝左就朝右。后面亮着灯光，活动的皮人的影子映在垂直张挂的白布上，观众在白布前面就可以看戏了。

我们看戏看傀儡戏都在台前看，看正面。舞台有深度，因面有远近。元帅升帐，他的位置距离我们远些，帐前两旁站着四将，距离我们近些。看皮影戏可不然。我们虽然坐在白布前面，实际上等于坐在舞台侧边，只能看个侧面。无所谓远近，侧形的皮人全在一个平面上活动——一个平面就是那垂直张挂的白布。

看皮影戏得在意想中“除外”一些形象。换句话说，有些影子你得当作没看见。要让皮人的身躯跟四肢活动，不能不用几根细木签支使它，细木签的影子不能不映在白布上。要是不在意想中当作没看见那些细木签的影子，就觉得场面上的人物牵牵挂挂的，很不顺眼。还有，皮人本来朝左，一会儿要它朝右，这只有一个办法，把它翻转来。翻转来当然很快，真可以说“一刹那”，在“一刹那”间，侧面的人形成了稀奇古怪的形象。那稀奇古怪的形象也得“除外”，当作没看见，意想中只当它朝左的人物慢慢地转过身来朝右边。还有，皮影必须贴着白布，轮廓和线条才显得清楚，色彩才显得鲜明。可是，皮人究竟拿在人的手里，总不免有些时候离开白布些儿，于是轮廓和线条朦胧了，色彩模糊了。那时候你最好闭一闭眼睛养养神，待皮人贴着了白布再看下去。

这些全是特质的条件的限制，既然要让“只是一片”的皮人演戏，就没法超越这些限制。我们只要想一想，所有登场的皮人全都由一个人的两只手操纵，居然可以演出整本的戏，摹仿真人的活动相当到家，也就不会有什么苛求了。

一个唱的，一个操纵皮人的，三四个奏音乐的，大概五六个人就可以搞一个皮影戏的班子。这样地简单，旁的戏班子无论如何赶不上。跟傀儡戏比起来似乎差不多，可是皮人比傀儡轻巧多了。在无戏可看的地区，皮影戏靠它的简单，四出流动，满足群众的需要。现在戏剧的供应已经比较普遍，今后更将普遍，僻远的农村也可以看到话剧、歌剧。我想，在换换口味的意义之下，那时候皮影戏还会是群众所喜见乐闻的。

一九五四年一月四日作

坐羊皮筏到雁滩

初次看见羊皮筏的照片在二十年前。凭这个东西可以在水上行动，像陆上坐车似的，虽然没有什么不相信，总觉得有些儿特别，有些儿异感。再说这个东西的构造也看不大清楚，胀鼓鼓的仿佛一笼馒头，说是羊皮，可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回到兰州，才亲眼看见羊皮筏，而且坐了羊皮筏过渡到雁滩——雁滩是黄河中的沙洲。

羊皮筏用的是整张的羊皮。我说整张，也许会引起误会，会叫人家想起做皮袄皮袍子的皮料那样的整张。因而必须赶紧说明，并不是那样展开的整张。打个比方，好比蛇脱下来的皮，蛇爬到别处去了，蜕下来的皮留着，虽然那么瘪瘪的，可还是蛇的形状——是那样保持着原状的整张。宰羊的人剥羊皮（不用说，羊毛先剃光了），让羊皮从肌肉骨胳上蜕下来，整张上只有四个窟窿。前肢在膝盖的部位切断，一边一个窟窿，脑袋去掉，脖子的部位一个大窟窿。两条后肢全去掉，臀部的一个窟窿更大。把三个窟窿拴紧，留下一个吹气（为方便起见，当然在前肢的两个里头留一个），吹足了气也把它拴紧。于是成了个长形的气囊，还看得出羊身体的形状。

四个或五六个气囊并排连成一排，看羊皮的大小而定。又把三排气囊直里连起来，就成个长方形的连结体。一个连结

体少则十二个气囊，多则十五六个。在这连结体上平铺一个长方形的木架，用绳子系着。木架的结构像个横写的“册”字——当然只是大略的比拟罢了，“册”字底下没有一画，可是那架子底下有一画，“册”字只有四直，可是那架子有十多直，两直之间的距离比人的脚短些，一只脚可以在两直上踏稳。这就齐全了，羊皮筏的装置尽在于此了。

不知道一个羊皮筏有多重。看来不会太重，因为筏工用一条扁担支着它，把它背在背上，一只手按住扁担的另一头，走起来挺轻松的。有人雇乘了，讲好价钱，筏工就把它放在河沿水面上，让乘客跨上去。

还有牛皮筏，我们没看见。听说牛皮筏是装重载的，支起篷帐，里面住人，顺流而下驶往宁夏。要是把牛皮筏比做运货大卡车，那末羊皮筏就是小汽车，坐这么几个人，在近处兜兜罢了。

我们听过朋友的解说，说羊皮筏非常稳当，绝对保险，虽然看起来有些异样，跟习惯的船只很少相同之点。我们跨上去，有些晃荡，可是不比西湖里的小划子晃荡得厉害。照惯例，乘客应当两只脚踏在两条横木上，身体蹲下来，着力在两条腿上。我腿力不济，没法蹲，只好一屁股坐下来，下面贴着木条和羊皮。我们四个人，加上筏工跟一个附载的挑面粉的，筏上共载六个人。

羊皮筏吃水极浅，所以能贴近沙滩，便于上下。羊皮筏有弹力，碰着滩石就弹开来，不至于撞破，就是撞破了一个气囊，还有其他十几个气囊在，影响并不大。羊皮筏的底跟面一般大小，就是在水势大风浪猛的时候，也不过跟着波浪

上落而已，无论如何打不翻。我们坐在羊皮筏上谈着这些个，觉得非常稳当的说法确然属实。还有一层，我们想，要是兰州一带羊肉的消费量不怎么大，恐怕也不会有什么羊皮筏吧。

筏工把扁担插入黄流，悠然划着——扁担的身分改变了，它又是桨，又是舵。雁滩横在前面，林木繁茂，金黄色的斜阳照着，一派气爽秋高的景象。对岸的山耸列在雁滩背后，沉默之中透着庄严。朝左望上游，朝右望下游，虽然秋季水落，还是有浩荡渺茫的气势。身下的羊皮筏太藐小了，不妨看作没有这个羊皮筏，于是我们觉得我们跟大自然更亲密了，我们浮在水面上，我们的呼吸跟黄河的流动、连山的沉默、青天的明朗息息相通。往年在四川乐山，渡江游凌云山、乌尤山，方当水涨，小划子在开阔之极的波面上晃荡，我也曾有过同样的感觉。

没有十分钟工夫就到了雁滩。从前没住人的时候，这河中的沙洲当然是雁栖息之所——雁滩原是个写实的名称。同时又富有诗意画意，古来取雁宿洲渚为题材的也不知道有几多诗篇画幅。现在滩上住着好些人家，都以种菜为业，又有公家的农场苗圃，雁大概不会下来栖息了吧。可是雁滩还是个挺耐人寻味的名称。

我们先往农场。果树上没有什么果子了，可是会客室桌子上陈列着两大盘苹果，色彩不一，又好看又大，几乎可以说耀人眼睛。招待我们的一位同志说场里苹果的品种很多，盘子里是四种。又说果子都藏在地窖里了，数量不多，还不能普遍供应。又说农场的任务之一是推广优良品种，兰州产瓜

果本来有名，再在选择品种上下工夫，前途更光明了。他一边说一边让我们尝苹果，尝了一种又尝一种，把四种尝遍。

最大型的一种叫“大元帅”——这名称大概就从大型而来，皮作红绿两色，红的地方鲜红，绿的地方翠绿，味甜，入口有松爽的感觉。另一种叫“印度”，皮纯青色，入口爽脆极了，鲜美极了。第三种叫“青香蕉”，跟“印度”一样作纯青色，稍稍淡些，带着香蕉的香味。第四种叫“玉霞”，皮作黄色——象半熟的香蕉那样的黄色，口味也挺不错。很难说四种里头哪一种更好，很难想起以往吃过的苹果也有这么好，一时间尝到这些个好品种，真可以说此游一乐。

尝着好苹果，同时想起幼年吃的苹果。那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中秋前后，苏州水果铺里苹果上市了，至多不过陈列这么五六十个，红绿色的表皮上大多印着黄锈的瘢痕，大的有铜元那么大。无所谓这种那种的分别，只知道这叫作天津苹果，老远地走海道来的。吃这种苹果也无须用刀子削皮。一般人都用大拇指的指甲从果柄的部分刮到结蒂的部分，好比在地球图上画经线，把整个苹果刮遍。于是表皮就可以撕下来。把撕了皮的苹果送到嘴边一口一口地啃，酥极了，宛如吃豆沙包子，舌头上辨得出细沙似的颗粒，咽下去有饱的感觉。我小时候以为苹果就该那么吃，苹果的味道就是那么不爽不利、粘舌腻喉的，老实说，我对苹果没有多大好感。后来在上海吃新鲜苹果，方才领略到苹果的爽脆和鲜美，好就好在这个爽脆和鲜美，小时候的认识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可是历年吃的新鲜苹果也不算少，仿佛全比不上这回在雁滩吃的。

在雁滩谈起瓜，没吃瓜，可是在别处吃了。兰州的瓜太好了，不能不连带说一说。我要说的叫绿瓤甜瓜，属于香瓜一类。香瓜一类跟西瓜一类的主要不同点，瓤和肉可以划然分开，不像西瓜那样肉连着瓤，没有显著的界限。咱们吃西瓜吃它的瓤，吃香瓜不吃瓤，吃它的肉。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不必细说。香瓜一类通常有黄金瓜、翠瓜，大略有些儿香味，不怎么甜，有的绝然不甜，上市的时候，咱们也爱尝一尝，应个景儿，可是总不能成为咱们的嗜好。离苏州三十六里有个乡镇叫角直（角音陆），我在那里住过好几年，那里出产一种苹果瓜，形状像苹果，小饭碗那么大，青皮绿肉，比一般黄金瓜甜些，苏州一带认为名贵的品种，实际上也不过如此。兰州的绿瓤甜瓜也大略像苹果，有儿童玩的小足球那么大，皮作白色，白里带黄，并不好看，切开来可好看了，嫩绿的肉好像上品的翡翠。咬一口那嫩绿的肉，水分多，味道甜而鲜，稍稍咀嚼几下，就那么和润地咽下去，仿佛没有什么质料似的。吃过一两块，只觉得甜美清凉直透心脾，真可以说无上的享受。这种瓜可以久藏，到春节的时候拿出来，是绝妙的岁朝清赏。

还得说一说哈密瓜。兰州市街在一个拐角处聚集着好些家回民开设的铺子，贩卖新疆的土产特产，哈密瓜就在那里买。哈密瓜也属于香瓜一类，形状像橄榄球，大小也相当。皮作暗绿色，粗糙，有细碎的并不深刻的裂纹。切开来，肉作淡黄色——也可以说淡红色，跟南瓜差不多。甜味似乎比绿瓤甜瓜厚些，不如绿瓤甜瓜的清，水分也比较少些。哈密瓜声名很大，在往时，绝大多数人仅闻其名，不知道究竟是怎么

样一件东西。往后交通日益发展，铁路网像蜘蛛网似地结起来，一方面产地讲究培植，提高产量，我想，哈密瓜和兰州的绿瓤甜瓜、“大元帅”之类必然会在各地水果铺里出现，家喻户晓，像广东香蕉、天台柑橘一个样。

说得远了，现在回到雁滩。我们吃过苹果，就出来随处看看。这里是苹果树，那里是梨树、桃树。白杨的苗木密密地插在那里，只看见平行的直干了。沙路旁边的槐树伸展着近乎羽状的叶片。垂柳倒挂下来，叶子一动不动，虽然到了深秋时节，仿佛还不预备雕零似的。四围寂然，只听见黄河流动的静静的声音。

这雁滩是兰州人游息的地方，尤其在夏天。工作人员逢到假日来这里消磨这么一天半天，好在四围全有树木，无论上午下午都可以遮荫，沙地上坐坐躺躺又是挺舒服的。放暑假的学生几乎把这里看作第二学校，大伙聚在一块儿，看一回书，做一回游戏，开一个什么会，比平时的学校生活还要愉快。兰州夏天本来不怎么热，这雁滩尤其凉爽。在这凉爽的境界里，看那庄严静穆的山峦、浩荡渺茫的黄河，看那山光水色随着朝晚阴晴而变化，简直是精神上洗一回澡，洗得更见清新，更见深湛。

好些个农民挑着满担的花菜往河边，搭乘羊皮筏。那花菜是才在地里割的，赶紧挑出去，下一天早晨兰州市上就有“还没断气”的新鲜花菜。

暮色压下来了，压着连山，压着林木，压着黄河，也压着我们的眉梢。于是我们又跨上羊皮筏。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日作

登 雁 塔

雁塔在西安城外东南面。那天上午十点，我们出西安南门往雁塔。远远望见好些正在兴修的建筑工程，木头构成的工作架跟林木相映衬。听说这些全是文教机关的房屋，西安南郊将来是个文化区。没打听究竟是哪些文教机关，单知道其中有个体育运动场，面积七百多亩，有田径赛场、各种球场、风雨操场、滑冰场、游泳池，可以容纳观众十万人以上——规模够大了。

在以往历史上，有没有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在全国范围内搞基本建设的？且不说工矿方面的基本建设，单说机关、学校、公共场所的兴修，修成之后将在那里办理人民的公务，培养少年、青年乃至成人，使他们具有堪以献身的精神体魄，像今天这样的情形在以往历史上有过没有？我不曾下工夫查考，可是我敢于断定不会有。我这个断定从以往社会的性质而来，那时候无非兴修些帝王的宫殿、公侯的第宅、贵介的别墅。或者地主富商修些房子自己住，租给人家收租钱，等于放高利贷，再就是勉强过得去的人家搭这么三间两间聊蔽风雨。除此而外，哪儿会有为了群众的利益招工动众，大规模地兴修房屋的？

这么想着，不觉雁塔早已在望。原地颇有高下，可是坡

度极平缓，车行不感颠簸。不多久就到了雁塔所在的慈恩寺门前。

进门一望，只觉景象跟一般寺院不大一样。殿宇亭台不怎么宏大，空地特别宽广，又有栽得很整齐的林木、蒙络荫翳的灌木丛、略有丘壑之势的小土丘，树荫之下立着好些个埋葬僧人的小石塔，形制古朴有致。这就成个园林的布置，佛殿只是整个园林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像杭州的灵隐寺那样，一进门只见回廊、大殿、经院、僧房，虽然并不逼仄，总叫人感觉不太舒畅。多数寺院都属于灵隐寺一派，而这个慈恩寺仿佛一座园林，我说它跟一般寺院不大一样就在此。这寺院当然不是唐朝的旧观，可是眼前的这个布置尽够叫人满意了，何况单提慈恩寺这个名字就叫人发生历史的感情。这是玄奘法师翻译佛经的场所，寺里的雁塔是玄奘法师所倡修，玄奘法师那样坚苦卓绝地西行求法，那样绝对认真地搞翻译工作，永远是中国人的骄傲，永远是中国人的一种典范，谁信佛法谁不信佛法并没关系。

台阶两旁立着好些题名碑，题名的是明清两朝乡试中举的人。唐朝有新进士雁塔题名的故事，后代人似乎非摹仿一下不可，可是京城不在西安，新进士不会在西安会集，于是轮到新举人。写篇记，刻块碑，把名字附上，也算表示了他们的显荣和雅兴。看那些记文，说法都差不多。本来就是那么一回事，题材那么枯窘，有什么新鲜的意思好说的？我们不耐一一细看，我们登雁塔要紧。

雁塔在慈恩寺的后院。不知道实测究竟有多高，相传是三百尺，耸然立在那里。塔作方形，共七层，一层比一层缩

进些，叫人起稳定之感。每层每面有个拱形的门框。最下一层的门框是进塔去的过道，东南西北四面都可以进去。从第二层起，四面门框全装栅栏，游人可以靠着栅栏眺望。我们从南面的拱门进去，走完过道，塔中心空无所有，只靠墙架着两架扶梯。扶梯作直角的曲折，几个曲折才到第二层。猜想所以架两架扶梯之故，一来是游人多的时候可以分散些，二来是最下一层地位宽，容得下两架扶梯，两架扶梯之外还大有回旋余地，你看，从第二层起就只一架扶梯了。

杜工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中有"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的句子，写的正是从最下一层往上爬的印象。那里过道比较深，进去的光线不多，骤然走进去尤其觉得昏暗。于是杜老想象这么昏暗的所在该是龙蛇的窟穴吧。到了第二层，光线从四面面来，就觉得豁然开朗，出了"幽"境——"枝撑"指塔内的木材构筑。

第二层齐扶梯的顶铺地板，以上五层都一样。有了这地板，才可以走到拱门那里，爱望哪一面就往哪一面，又可以歇歇脚，透透气，再往上爬。要是没有这地板，扶梯接扶梯一直往上，且不说没法从从容容地眺望一番，开开眼界，就是从下朝上、从上朝下望望，那么一个又高又空的塔中心，那么些曲折不尽的扶梯，就够叫人目眩心惊腿软的了——地板稳定了游人的情绪，无论在哪一层，仿佛在一间楼房里似的。

同伴说我力弱，不必爬到第七层，爬这么两三层就可以了。我也想，如果要勉强而行——而且是过分地勉强，那当然不必。可是我升高一层歇一会儿，四面望望，再升高一层，虽然呼吸不怎么平静，心跳越来越强，两条腿越来越重，总还

觉得支持得下，没有什么大不了，结果我居然爬上了第七层。可以说是勉强而行，然而不是过分地勉强。在某些场合——比游览重要得多的场合，只要意志坚强，有时候连过分地勉强也有所不避，勉强让意志给克服了，也无所谓勉强了。

在最高一层四望，因为天气浓阴，空中浮着云气，只觉一片混茫，正如杜老诗中所说的“俯视但一气”，南面既望不见终南山，朝西北望，贴近的西安城市也不太清楚。至于杜老所说的“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那根本是想象，并非他登塔当时的实景。我们未尝不可以作同样的想象，这么想象就好像我们自身扩大了，其大无外的宇宙也不见得怎么大似的。

一层一层下去当然比上来容易，可是每下一层也得歇一歇，免得头昏眼花。出了最下一层的拱门，我们坐在台阶上休息。坐不久又不免站起来看看，原来拱门内过道的石壁上全是刻字，起初挤在游人丛中急于登塔，竟不曾留意。刻的大多是诗篇，各体的诗，各体的书法，各个朝代的年号，还有各个风雅的题壁人的名字。这且不说，单说一点。后代的题壁人见壁上早已刻满，再没空地位，就把自己的文字刻在前代人的题壁上，你小字，我大字，你细笔画，我粗笔画，总之，抹杀你的，光有我的。这样强占豪夺的风雅，未免风雅过分了。

最下一层四面拱门的门楣上都有石刻画，我以为最值得细看。刻的是佛故事，人物和背景全用细线条阴刻。依我外行人的见解，细线条的画最见工夫，你必须在空白的幅面上找到最适当最美妙的每一条线条的位置，丝毫游移不得，你

的手腕又必须恰好地描出每一条线条，丝毫差错不得，太弱太强也不成。所以画家必须先在心目中创造完美的形象，又有得心应手的熟练技巧，才能够画成细线条的好作品。最近故宫博物院布置绘画馆，在第一陈列室的正中间挂一小幅敦煌发现的唐朝人的佛像图，全用细线条，我看了很中意。现在这门楣上的石刻画，可以说跟绘画馆的那一幅同一格调、同一造诣。雁塔经过几次重修，连层数也有所改动，建筑材料当然有所更换，可是一般相信底层没大动，门楣石该是唐朝的原物，石上的图画该是唐朝人的手笔。这就无怪乎跟敦煌保藏的唐画相类了。据梁思成先生《敦煌壁画中所见的古代建筑》那篇文章，西面门楣上的画以佛殿为背景，精确地画出柱、枋、斗拱、台基、椽檐、屋瓦以及两侧的回廊，是极可珍贵的建筑史料，可以窥见盛唐时代的建筑规模。

南面拱门两旁各陈列一块褚遂良写的碑。石壁凹陷进去，砌成龛形，碑立在里面，前面装栅栏，使游人可望而不可即。一块是唐太宗所撰的《大唐三藏圣教之序》，一块是唐高宗所撰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这块碑从左往右一行一行地写，有些特别，用意在跟前一块碑对称，成为“合欢式。”褚遂良的书法不用说，单说那碑石经历了一千四百年，文字还很完整，笔画还有锋棱，可见石质之坚致。西安好些古碑大都如此，大概用的“青石出自蓝田山”的青石吧。向来玩碑的无非揣摩书法，考证故实，注意到碑额、碑趺和碑旁的装饰雕刻是比较后起的事情。其实好些古碑的装饰雕刻尽有好作品，大可供研究雕刻艺术的人观摩。就是这两块褚碑，两边的蔓草图案工整而不板滞，已经很够味了。碑趺的天人舞乐的浮雕尤其

可爱。那是浮雕而超乎浮雕，有些部分竟是凌空的立体。雕刻不怎么工细，可是人物的姿态极其生动，舞带回环，仿佛在那里飘动似的。两碑雕的都是一个舞蹈的在中间，奏乐的分在两边（一块上是奏管乐，一块上是奏弦乐），两两对称，显出图案的意味。碑额雕的什么，可恨我的记忆力太差，记不起了，只好不说。

曲江池在慈恩寺东面不远。曲江池这个名字在唐朝人的诗里见得很多，其地既然近在眼前，我们应当去看看。

一路上陂陀起伏，车时而上行，时而下行——所谓黄土平原原不像操场、运动场那样平。在比较高的地点眺望，只见四面地势高起，环抱着一块低洼地，田亩而外就是树林，虽然时令在秋季，浓阴笼罩着茂密的林木，倒叫人发生阳春烟景的感觉。我们知道这就是所谓曲江池了。曲江原是个人工池，水是浐河的水，唐玄宗开元年间引过来的。到唐朝末年，大概是通道阻塞了，池就干了，变为田亩。

在盛唐时代，这曲江池四围尽是公侯第宅，楼台亭榭大多临水，花柳相映，水光明澈，繁华景象可以想见。曲江池又是当时长安人游乐处所，逢到三月上巳、九月重阳，游人尤其多，不论贫富贵贱，大家要来应个景儿。池中荡着彩船，堤上挤着车马，做生意的陈列着四方货品，走江湖的表演着各种杂技，吹弹歌唱，玩球竞马，凡是享受取乐的玩意儿，在这里集了个大成。又因当时河西走廊畅通，文化交流极盛，形形色色都搀杂着异域的情调和色彩，更见得这里来凑个热闹可喜可乐。——照我猜想，当时情形大概跟《彼得大帝》影片里的某些场面相仿，逢到节日良辰，皇帝、贵族还肯跟庶民混

在一块儿寻欢取乐，不摆出肃静回避、容我独享的臭架子。按封建时代说，这就很不错了。

至于现在，游了慈恩寺、登了雁塔的，多半要来曲江池走走，慈恩寺和曲江池自然联成个没有名称没有围墙的公园。这是个普通的星期日，而且天气阴沉，可是曲江池游人尽多。这边是一队少年先锋队在且行且唱，那边是一批工人在闲步眺望，机关里的男女干部，乡村里的小姑娘、老太太，结伴而来，兴致挺好，笑语嘻嘻哈哈的，脚步轻轻松松的。几年以来，大家已经养成习惯，工作的日子出劲工作，休假的日子认真玩乐。郊外既然有这么个好所在，谁不爱来走一走、乐一乐？一条马路正在修筑，从城里的解放路（东半边的南北干路）直通雁塔，城里人出来更方便了。一方面体育运动场也快完工。将来逢到四野花开的时节，春秋晴朗的日子，或者运动会举行的期间，城里人必将倾城空巷而出，乡里人也必闹闹挤挤地出来享受他们的一份儿。这样的盛况是可以预想的。既有这新时代的盛况，封建时代的盛况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留恋了。

曲江池附近有一道陷落五六丈的土沟，王宝钏的“寒窑”就在沟里。王宝钏原是“亡是公”“乌有先生”一流人物，她的“寒窑”当然在“无何有之乡”，可是偏有人要指实它，足见戏剧影响社会之深。舞台上既然演《别窑》和《探窑》，那“寒窑”怎能没有个实在地点？《宝莲灯》里有劈山救母的故事，就有人在华山上指明斧劈的处所（这是听人说的，并未亲见），理由也在此。我们走下土沟去看，原来是个小小的庙宇，中间供泥塑女像，上面挂“有求必应”的匾额，王宝钏成了神了。身

分虽然改变，实际还是一样——神不是也属于“亡是公”“乌有先生”一流吗？庙宇实在没有什么可看，倒是庙门前的两棵白杨值得赏玩，又高又挺拔，气概非凡。回到原上看，那两棵白杨的上截高过原面一丈左右。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作

在朝鲜慰问期间的早晨

“还有够叫人感动的呢，”他谈了在朝鲜慰问期间好些个激动心情的情景，舒了一口气，又这么说。

“每天清早醒来，准听见各种乐器的声音。我们团里那些搞音乐的起来特别早，他们赶清早的空闲时间温理各自的玩意儿。唢呐帝帝打打的，笛子嘘嘘禹禹的，小提琴咿咿呀呀的……既不是合奏，当然不协调，可是你要是单注意某一种乐器，就听得出那是毫不含糊的、丝丝入扣的演奏。

“不但一般搞音乐的团员，连名家也那样。我穿好衣服离床，总看见小提琴家马思聪把腮帮贴在琴面上，右手拨动琴弦，左手又灵活又稳重的按捺，在那里温理指法。瞧他那静心凝神的姿态，跟他在演奏会上完全一个样，仿佛除了音乐以外在他周围再没有旁的事物似的。

“一天早晨起来，正赶上程砚秋在那里温理昆曲《思凡》。您知道我是喜欢昆曲的，《思凡》尤其熟，通体背得出，这个机会当然不肯错过，就从‘昔日有个目莲僧’直听到‘却不道是快活煞了我’。他的唱毫不假借，把叹惋、反抗、企望、快乐的情绪全给表达出来。他为什么温理《思凡》呢？原来当天下午慰问大会上有他这个节目。

“搞歌唱的团员也有他们的早课。他们学唱朝鲜的歌儿，

学唱志愿军的歌儿，或者聚在一块儿合唱，或者挺立在深秋的冷空气里放开嗓子独唱。他们自己带去好些歌儿还嫌不满足，他们要唱朝鲜的歌儿给朝鲜人民跟朝鲜人民军听，唱志愿军的歌儿给志愿军听，他们要尽量唱得到家，让听的人感到分外亲切。

“方才说的是音乐方面。再说每天早晨走出屋子，整个场上尽是些人在那里活动，几乎可以说百戏杂陈。搞舞蹈的团员练习各种舞蹈，《荷花灯》《花鼓灯》《采茶扑蝶》《匈牙利瓶舞》……这里一组，那里一组。骑自行车的，三四个人搭着一辆车在场上绕圈儿，跳下来，追上去，扭身曲腰的在车架间翻来翻去。舞狮子的，两个人饰红狮子，两个人饰绿狮子，绣球引到哪儿，狮子冲到哪儿，一会儿狮子跳上高高的桌子，在桌子上打滚，摇脖子，理尾巴毛……这些个您都见过，也不用细说。总之，每个人跟正式表演的时候同样卖力。

“我要说的是叫我感动的有两点。一点是我们那些个团员都愿意把最好的技艺贡献给人家。虽然是听听看看的玩意儿，听过看过也就完事，可是听得好与不好，看得好与不好，跟人家的关系太大了。听得好，看得好，人家的精神得到滋养，可以增长活力。听得不好，看得不好，人家就像吃了腐败的东西，即使不害什么病，至少也得倒胃口。我们那些个团员面对着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非要把最好的技艺贡献给他们，让他们的精神得到滋养不可，他们那种艺术的良心跟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叫我淌了眼泪——告诉您，我对于通常所谓悲欢离合是决不淌眼泪的。

“二一点是他们那种刻苦练习的精神。这几位名家各有成

就，原因当然不止一个，可是其中必然有一个原因是刻苦练习。我在他们旁边曾经这么想，这个艺术家的心里恐怕永远不存'够了，可以应付一辈子了'的想头吧。再说咱们听一曲音乐，看一场表演，好像在那些艺术家是行所无事似的，换句话说，好象轻松得很，算不了一回事。不知道惟有经常不断的练习，才做得到行所无事。老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我亲眼看见的那些人就是实践这个'不离'的拳家、曲家。他们实践里头有许多甘苦。要是咱们光欣赏他们的技艺，不体会他们实践这个'不离'的甘苦，就多少会减低敬爱他们、感激他们的心情。您说对不对？"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四日作

荣宝斋的彩色木刻画

所谓彩色木刻画就是用木刻套印的方法印成的画幅，人物，花鸟，山水……差不多跟中国画画家笔下的真迹一模一样。我家里挂一幅新罗山人的花鸟画，一块石头前伸出一枝海棠，三个红胸鸟停在枝上，上下照应，瞧那神气正在那里使劲地叫。朋友们见了，有的说这一幅画得好，有的不言语，只是默默地观赏，也许还在那里想怎么我也收藏起名家的作品来了。等我说明这是彩色木刻画，荣宝斋的出品，他们都不期然而然地吐出一声“啊！”——这“啊！”里头含着惊奇、不相信的意味。可见彩色木刻画简直可以“乱真”了。

在十六世纪，我国就有彩色木刻画，多半印在诗笺上。诗笺是二十多公分高的小幅，听名称就可以知道它的用处。文人作成诗，总爱写给朋友们看看（那时候还没有报和杂志，也就没有投稿发表这回事），或者那首诗是特地赠给谁的，更非写录不可。把精心结撰的诗篇写在印着彩色画的诗笺上拿出去，当然比写在白纸上漂亮得多。

诗笺也拿来写信。要是按实定名，写信的该叫信笺。信稿起得好，又是一手好字，写在印着彩色画的信笺上，可以使受信人在了解实务、领略深情以外多一分享受。

近年来我国送些出版物到国外去展览，其中有笺谱。也

许“笺谱”这个名称确实不容易翻，就翻成“画集”。“集”跟“谱”固然可以相通，都是“汇编”的意思。可是“笺”是诗笺和信笺，表示一定的用途，只因笺上有画就管它叫“画”，不免引起误会。为了解除误会，我特地在这里提一下。

诗笺、信笺上印彩色画，彩色画有各种各样的画法，印起来有容易有难。譬如一幅花卉，花朵、叶子、枝条全用墨色线条勾勒，花朵着红色，叶子着绿色，枝条着棕色，只要按色分刻四块板子——墨色、红色、绿色、棕色各一块——套印就成，那比较容易。花鸟画还有所谓没骨法，不用线条勾勒，只用彩色渍染，譬如画一张荷叶，绿色有浓有淡，有些地方用湿笔，绿色从着笔处稍微溢出，有些地方用枯笔，显出好些没着色的条纹，这要印出来就比较难。可是印造诗笺、信笺的摸索出一套方法，练成一套技术，也能够照样办到，总之，原画怎么样就印成怎么样。咱们现在看荣宝斋仿造的《十竹斋笺谱》，里头就有用这样的印法的。《十竹斋笺谱》的原本在崇祯十七年出版，还是十七世纪中段的东西呢。

我小时候喜欢从纸店里买些诗笺玩儿，都是线条画，套印不过两色。这个东西跟文人有缘，大概文人比较多的地方就有。一般人既然不作诗，写信又没有什么讲究，当然用不着这种画笺。北京地方印造这种画笺的最多，理由很容易了解，不用多说。据朋友告诉我，清朝末年有懿文斋、松古斋、秀文斋、宝文斋、宝晋斋、万宝斋、松华斋、荣禄堂、翰宝斋、翰雅斋、彝宝斋、清秘阁这么些家，出品都是单色的。还有一家松竹斋最出名，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庚子事变的时候倒闭了，后来改组成荣宝斋。现在荣宝斋经过改造，已经

是国营的企业。

荣宝斋印过翁同龢画的梅花屏四条，又仿造过诒王府的彩色角拱花笺，很有名，后来渐渐印笺谱，仿造的《十竹斋笺谱》是出色的成绩。最近多印册页、条幅，册页有《现代国画》、《敦煌壁画选》、沈石田的《卧游》画册……条幅有方才说的新罗山人的花鸟画，有齐白石先生、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全是木刻套印的。册页比诗笺大三四倍，条幅更大了，新罗山人的那一幅，高一公尺二十六公分，宽四十一公分半。可见荣宝斋的新的努力是使彩色木刻画向大幅发展。

我参观过荣宝斋的工场，现在据参观所得谈谈彩色木刻画的制作方法和技术。

得从板子说起，有了板子才可以印刷。刻板子先得描底稿。像方才说的花朵着红色、叶子着绿色、枝条着棕色的画，只要照原画分色勾描，原画有几色，描成几张底稿就成了。勾描用映写法，就是拿半透明的薄纸蒙在原画上，看准原画用细线条勾描。至于用彩色渍染的画，一个颜色里有浓淡，一个地方着好几色，或者还有湿笔、枯笔，那么分析板子就是大工夫。不明白画理没法下手，还得熟悉印刷的技术。设计的人从画理和印刷的技术着眼，认定哪儿的浓淡得分刻几块板子，哪儿的几色可以合用一块板子，哪儿的湿笔只要印刷的时候使些手法就成，然后分别勾描。勾描是极细致的工作，描得进一线出一线就走了样，张张底稿描得准确，位置不差分毫，印起来才套得准。一幅彩色不怎么繁复的画，至少也得分别描成六七张底稿。这还是就册页说。至于条幅，高度在一公尺以上，即使上方和下方有些部分彩色完全相同，可

是印刷条件有限制，不能够同时印刷，也得分别描成几张底稿。譬如一幅花卉，上方的、中部的、下方的一部分叶子都是淡绿色，彩色虽然相同，也得描成三张底稿，刻成三块板子，分三次印刷。像我说的新罗山人的那幅花鸟画，勾描下来分成四十九张底稿，刻成四十九块板子，印刷的次数还要多，因为有些板子要印两次或三次。看起来那么雅淡高洁的一幅画，不知道底细，谁也不会相信制作的手续是这么繁复的。

方才说拿薄纸蒙在原画上勾描，描出来自然跟原画一样大小。也可以改变原画的大小，让印成的画幅比原画小些或者大些。这要依靠照相。照相把原画缩小或者放大，然后依据照片勾描，原画放在旁边随时参考。印造彩色木刻画全部是手工，只有在这个场合才利用现代的机械。

分别描成底稿，随后的工作就是刻板子。底稿反贴在刨平的木板上，跟刻书一样，刻成的板子是反的。木板是杜梨木，木质坚实匀净。我国木刻向来用杜梨木和枣木，所以“梨枣”成了木刻的代称。

工人刻板子的时候，右手握着刀柄，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帮着推动刀尖，那么细磨细琢地刻划着。原画放在旁边随时参考。所谓参考主要在体会原画的笔意，只有传出原画的笔意才能刻得真不走样。柔和的线条要保持它的柔和，刚劲的线条要显出它的刚劲，无论什么形状的笔触要没有斧凿痕，全都像画笔落在纸上的那个样儿，这固然靠勾描的工夫到家，可是勾描得好而刻工差劲，那就前功尽弃。所以刻板子的人也得明白画理，他要辨得出笔触的意趣，能够领会什么是柔

和和刚劲，还得得心应手，实践跟认识一致，才能把板子刻得像样儿。鸟身上的羽毛，花心里的花蕊，一丝一缕都得细细地刻。还有那些枯笔，笔意若断若续，就得还它个若断若续。落笔的地方是极细的一丝丝，一丝丝之间是空白的一丝丝，这些丝丝全要照样刻出来，不容一丝有一些斧凿痕。我国善本书的书板向来称为精工的制作，现在谈的这个画板，比书板还要精工得多。

板子刻成以后，就是印刷了。先说说印刷的设备。这跟我国印木板书的设备一样。印刷桌的平面上挖一道比较宽的空隙，木板固定在空隙的左边，待印的一叠纸张固定在空隙的右边。往右边摊开的纸张翻到左边的木板上，印过以后让它从空隙那里垂下去，再翻第二张。固定木板，现在荣宝斋用的是外科中医用的膏药。这东西胶性很强，不致移动，可是用力挪移木板还是可以挪动，试印的时候校正位置挺方便——校正位置是一项重要工作，必须试得丝毫没有差错才能正式开印，不然就套不准。固定纸张的方法是拿一根木条把一叠纸的右边压住，木条两头拴紧，使它不能移动。一叠纸有它的厚度，压住的时候必须使每一张稍微错开点儿，这才从头一张纸到末了一张纸，板子都能印在全张纸的同一个位置上。

印刷不用油墨，用中国画画家用的颜料。换句话说，原画上用的什么颜料，印刷也用什么颜料。预先把颜料调好，水分多少，浓淡怎么样，都得对照原画。原画是早已干了的，必须估计到调好的颜料印在纸上干了以后怎么样，才可以不致差错。这全凭经验，经验里头包括眼睛的辨别力，调色的

技巧，还有对于纸张的性质的认识。

纸张用宣纸，因为中国画画家作画大都用宣纸，既然要印造得跟原画一模一样，用纸自然应该相同。再说，用毛笔画水彩画只有画在宣纸上最合适。道林纸、铜板纸上虽然不是绝对不能画，画出来至少会减少画的意趣。譬如一笔浓笔画在道林纸、铜板纸上，着笔的地方跟纸面空白的地方必然界限分明，像刀刻似的，这就减少了意趣。要是毛笔多蘸了些水，涂上去水就浮在纸面上，彩色着不上纸，那还成个画？像齐白石先生常画的浓淡墨搀和着的大荷叶，道林纸、铜板纸上简直没法画。宣纸比道林纸、铜板纸松，质地匀净滋润，能吸水，无论浓笔湿笔，涂上去全能适应。水彩、毛笔、宣纸是中国水彩画的物质条件，彩色木刻画既然是仿造中国水彩画，自然不能不采用宣纸。

印册页、条幅都用双层宣纸，双层是造纸的时候就粘起来的。用双层纸印，彩色更好更美观。有些旧画的纸张，颜色变了，不像新宣纸那么白，仿造这些旧画的时候，宣纸就得先染色，染成旧纸的颜色。

宣纸是安徽泾县出产的，在宣城集中外销，所以叫宣纸。历史很久了，唐朝时候就有这种纸，明清两代生产最发达。原料是檀木的皮。用途除供文人写字作画以外，还可以印木板书。抗日战争一开始，泾县的造纸户全部垮了台，直到解放时期没恢复。后来组织宣纸联营处，最近又由地方政府投资，联营处改为公私合营。造纸工人见宣纸还有相当的需要，都表示决心，保证今后数量够用，质量提高。他们的经验和技术足够实现他们的保证，质量达到明清产品的标准不成问

题，并且还可以耥过。今后中国画画家和彩色木刻画的印造家可以不愁没有好纸用了。

现在该谈印刷的方法了。印刷的时候，原画当然也得挂在旁边。工人用毛笔蘸了调好的颜料涂在板子上，然后翻过一张纸，左手把纸拉平，右手拿一个叫“耙子”的家伙（大略象擦黑板的刷子,底面用棕皮包平，稍微有些弹性)在纸背面贴着板子的部分砑印。这么说来好像印刷挺简单似的，其实不然。涂上颜料以后先得用一个细棕刷子（形状像咱们剃胡子时候拿来蘸肥皂的刷子，不过大得多，一大把细棕丝理得挺平的)刷过,使板面的颜料匀净,边缘上不致有溢出的颜料。如果是一块有一部分该印淡色的板子，譬如一张秋海棠叶，右边缘的绿色非常淡，那么把绿色颜料涂在板子上以后，就得擦掉右边缘的颜料，再用细棕刷子蘸了水轻轻刷过，然后印刷。这样，右边缘的颜料虽然擦掉，可是木板上还保留着绿色的水分，因面印出来刚好是极淡的绿色，又因为用刷子刷过，印出来的极淡的部分跟其他部分没有划然的界限。又如某一块板子在原画上是湿笔，涂在这块板子上的颜料就得有适当的水分，水分必须不多也不少，印出来才能跟原画一致。以上说的全是翻过纸来印刷以前的事儿。再说纸张蒙在板子上，拿耙子在纸背面砑印也大有分寸。哪块板子该实实在在地印，哪块板子只要轻轻一印，全靠对于挂在旁边的原画的体会。至子得心应手印得恰如其分，那就非有熟练技巧不可。

哪一色的板子先印，哪一色的板子后印,这里头有讲究。哪一色得等前一色干了以后印，哪一色得在前一色没干的时

候印，这里头也有讲究。这些讲究全跟画家作画的当时一样。遇到浓重的彩色，印一次不够，就再印一次，甚至印三次，这等于画家的画笔在纸面上浓涂。

印小幅是一个人的工作。印比较大的就得添一个人，帮着翻纸张，拉平纸张。印过一张还得看看有没有毛病，然后让它从印刷桌的空隙那里垂下去，工作当然不会怎么快。整个工场里静静的，跟现代印刷厂的气氛完全不同。咱们跑进现代印刷厂的车间，所有机器都在那里动，机器声似乎把全车间的空气给搅动了，因而视觉、听觉、触觉的器官全让动的感觉给占据了。在印刷彩色木刻画的工场里可没有这样的感觉。

还有一点该说一说。一幅画经过印刷，许多板子的边缘把纸面挤得洼下去，必然留下痕迹，这在原画上显然是没有的。可是不碍事，印成的画幅经过研平托裱，就没有什么了。

中国彩色画也可以用彩色铜板、彩色胶板精印，可是铜板印的、胶板印的总觉得像张照片（看铜板、胶板印的油画就不大有这个感觉）。这是没有办法的，纸是铜板纸，彩色是油墨，物质条件不同了，当然不能完全传出原画的意趣。彩色木刻画用的纸张、颜料跟原画完全相同，只是用木板代替了毛笔，在雕刻和印刷的技术上又尽量设法不失毛笔画的意趣，所以制成品简直可以“乱真”。一幅精工的彩色木刻画不但是上好的工艺品，而且是比原画毫无愧色的艺术品。

一九五四年三月三日作

宪法草案管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公布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草拟这个草案的初稿就经历了好几个月。初稿在三月二十三日提给起草委员会，经过八十一天的研究、讨论跟修改，这个草案才在六月十一日的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查并通过了这个草案，把它公布出来，今后将由全国人民广泛讨论。

且不说今后全国人民的广泛讨论，单说初稿的草拟，真是反覆考虑，不厌其详。初稿提给起草委员会以后，全国组织了各方面人士八千多人参加讨论，讨论中提出的修改意见共计五千九百多条。至于讨论的热烈跟认真，报上记载很多，听人传说的尤其多。

宪法草案《序言》的第三段里说："这个宪法巩固了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政治上、经济上的新胜利，并且反映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根本要求和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讲巩固，必须求其真个牢靠；讲反映，必须求其完全确切。要定下这么一个根本法，要它达到真个牢靠跟完全确切的地步，当然非郑重考虑，认真讨论不可。

要知道这个宪法怎么样巩固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政治上、经济上的新胜利，怎么样反映

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根本要求和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主要看第一章《总纲》。

第二章《国家机构》表明国家权力怎么样组织起来，表明这个权力怎么样行使。每个选民都跟国家权力脉络贯通，息息相关，这是民主，跟资本主义国家虚伪的"民主"根本不一样。国家权力是整个的，行使权力必须像脑子统摄四肢百体那样，这是集中，跟资本主义国家名为三权分立，实际上是一小撮人把人民的权力一古脑儿窃取了去根本不一样。合起来说，这就是民主集中制。惟有实行这个民主集中制，才能够适应国家的根本要求，实现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经过过渡时期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章是就国家整个的制度作规定，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就公民最基本的各方面作规定。公民有哪些权利，凭什么办法保证公民享受这些权利，都写得清楚明白。公民有哪些义务，惟有大家尽了这些义务才能够实现共同愿望，也可以一望而知。总起来说，公民充分的享权利、尽义务，国家权力就充分的强固，国家权力越强固，公民享权利、尽义务就越充分；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这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的条件。

第四章《国旗、国徽、首都》无须多说。

以上说的这些精神，共同纲领里早就包含着，由于五年以来的新胜利，才能够作若干具体的规定。所以宪法草案《序言》的第三段里说："这个宪法以一九四九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三日作

讨论为的实行

读斯大林一九三六年《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知道苏联的那个宪法草案经过“继续了五月之久的全民讨论”。

咱们的宪法草案在草拟初稿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斟酌再四，不厌求详，稿子改动了好多回。初稿提给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后，全国以将近三个月的时间组织了各方面人士八千多人参加讨论，讨论中提出的修改意见共计五千九百多条。现在草案经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又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布出来，今后将以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作普遍的讨论。就讨论的时间说，咱们不止五个月。就讨论的人数说，也很广大。

这么多的人以这么久的时间讨论共同遵循的根本法，这是个伟大的活动，值得大书特书的。

咱们讨论宪法草案不能不探究它的根源。

宪法不是爱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的。宪法不能不以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为根源。所以咱们必须探究它的根源。

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的英勇奋斗是根源。凡是天安门前面正在修建的那座纪念碑所纪念的人们，无量数的志士仁人跟革命群众，都是这个宪法草案的创议人。没有他们，不会有这个宪法草案。

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毛主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跟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来实行他的领导是根源。中国共产党跟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规定了这个宪法草案的主题思想。没有中国共产党跟毛主席的领导，不会有这个宪法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政治上、经济上的新胜利是根源。这些新胜利充实了这个宪法草案的具体内容，显示了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明确的道路。没有这些新胜利，不会有这个宪法草案。

推广开来说，苏联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理论跟革命实践是根源。没有这些根源，不会有这个宪法草案。

探究了这么些根源，咱们就会知道这个宪法草案是切合实际的，换句话说，就是在这个时期最适当的，并不是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咱们根据草案记录下来的已有的成就，遵循草案规定下来的前进的道路，就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咱们不但要讨论这个草案，不但要探究它的根源。

咱们讨论跟探究不是无所为而为，而是完全有所为的。所为的就是实行。咱们全国人民准备齐心同德实行这个宪法，所以要讨论，要探究，把它理解得明白透彻，没有一点儿含糊。

咱们全国人民讨论这个草案是个伟大的活动，将来咱们全国人民实行这个宪法是个尤其伟大的活动。

试想，世界上六亿人口已经确定了前进的道路，走向社

会主义，那岂止在咱们中国，对于世界和平跟人类进步又将发生多么伟大的影响！

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作

唯 有 努 力

我当选江苏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深切的感谢江苏省给我的信任。

我估量自己的才跟德，觉得不配受这个崇高的信任。可是江苏省既然给了我信任，我就得把不辜负这个崇高的信任认作今后主要的责任。说惭愧，说只怕当不好，都无济于事。非整饬自己不可，非提高自己不可。惟有努力整饬自己，努力提高自己，才能够当个名副其实的代表，才能够经得起原选举单位“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监督。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我想，讨论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该是一项主要的议程。我参加宪法草案的讨论已经四五回，深深感到讨论一回有一回的体会，宪法草案的内容跟形式一回比一回精当完密。这回讨论之后就要通过了，我一定跟许多代表同志认真讨论，再来提意见，凡是人家提出来的意见都给仔细考虑过，一点也不含糊，让宪法通过的时候达到更为精当完密的地步。我曾经说过，认真讨论不为旁的，为的是实行。咱们要一条条的按照宪法办事，要把宪法作为全国人民行动的准绳，自然得运用最精确的思维，凭最精确的语言把它固定下来。

八月二十三日，咱们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我再三研读过这篇宣言

的草案，我参加了通过这篇宣言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对于这篇宣言，我觉得只有引用宣言里头的两句话才能够又简要又充分的表达我的意思。哪两句话呢？一句是“这是我们中国六万万人民的共同意志”。又一句是“正义在我们方面，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在我们方面”。为了伟大祖国的完全统一，中国人民完全有解放台湾的权利，为了进一步维护亚洲跟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又完全有解放台湾的义务。宣言里头说的“正义在我们方面”，就是从这样的权利和义务的观念推究出来的。正义决不是什么深奥难知的东西，谁只要无所蔽，不存私见的，他们完全清楚中国人民站在正义的立场上，不折不扣，颠扑不破，所以宣言里头说“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在我们方面”。咱们六万万人民向全世界表示坚持正义的共同意志，意志就是力量，这里头蕴蓄着咱们六万万人民的力量。“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又鼓舞咱们的力量，加强咱们的力量。所以咱们能够斩钉截铁的、坚定不移的说出开宗明义的这句话：“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我想，全体代表对于这个问题该会再来一个表示。全体代表的总数不过一千几百人，可是站在他们后面的是全体的选民，所以他们的表示是六万万人民共同意志的又一回的表示。我盼望有这么一个表示，在表示的时候，大家以虔敬的勇敢的心情代表全国人民向五星红旗宣誓，照宣誓里头说的各尽各的力量，争取各个方面的胜利，直到台湾彻底解放，蒋介石卖国集团彻底消灭。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作

融合起来了

从开国到现在是五周年。这五周年间，咱们中国社会好像一直在跑步，跑步的进程相当于多少年的缓步前进，恐怕很难作准确的估计。这个人说，咱们大家在这五周年间都有不少进步。要不是全国大陆解放，要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恐怕五年的光阴一眨眼过去，咱们大家依然故我，无论思想跟认识，无论态度跟作风，也许一辈子还是五年前那个老样儿。这五年对于中国社会，对于咱们大家，简直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珍奇，现在要静心回顾一下，表达那种深切的感受，真有穷于语言之感。

分别了好久的老朋友会了面，手握得紧紧地，一个说，“您精神挺旺盛呀！”一个说，“我觉得您轻了十年年纪！”这种经常听见的对话决非寻常客套，这里头包含着无限的激动跟无上的喜悦。说出来的话虽然那么简单，可是够了，彼此心领神会了——所以精神旺盛，所以轻了十年年纪，全由于那史无前例的珍奇。

要是说得具体些，彼此心领神会的，大概有如下的内容。社会、国家有了确定的路向，而且是脚踏实地的、绝端正确的路向，因而咱们大家也有了确定的路向，只要脚踏实地往前走就是。这就产生一种非常安定的心情，该做些什么，该

怎么样做，全都清清楚楚，永远可以跟“踌躇”“徬徨”之类的词儿绝缘。在那确定的路向里头，个人跟社会、国家的关系也显得挺明白。社会、国家的利益是个人最大最可靠的利益，所以个人的利益不能够跟社会、国家的利益冲突，个人的最主要的事情是争取社会、国家的利益。谁理会了这一层，谁就能够“去蔽”“去私”，虽然由于历史的影响跟旧来的习染，“蔽”跟“私”未必能够“去”得一干二净，但是多少“去”一部分，往后还将继续“去”，那是肯定的。

不安定的心情多么折磨人啊！前途茫茫，莫知所从，于是形容憔悴，搔首踟蹰。“蔽”跟“私”多么腐蚀人啊！心心念念脱不出个人的小圈子，绞尽脑汁光为个人的利益打算，于是丧失了作为真正的人的意义。现在咱们大家怀着非常安定的心情，逐步地在这里“去蔽”“去私”，咱们成了不受折磨、免于腐蚀的自由人，怎能不精神旺盛，年纪轻了十年？历史家不妨研究一下，在过去，咱们中国人民有没有一个时期像这五年来那样不受折磨、免于腐蚀的。我没有研究过，可是我敢断定说没有。惟其没有，所以这五年是史无前例的珍奇。

史无前例的珍奇从哪儿来？由于咱们中国社会开了史无前例的局面，由于咱们中国人民占了史无前例的地位，如毛主席指出的，咱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民站起来了，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大事当了家作了主，一切的表现就迥然不同，从前办不到的，现在可办得到了。这是咱们眼见为真的事实，也是跟咱们中国同一类型的社会、国家里的人民共同经验的事实。这好像有些难以理解，为什么从前办不到的现在可办得到了？其实不难理解。人民当了家作了主，就有了

共同的路向跟共同的目标，虽然大家干的是各行各业，想的是各情各理，可是像百川归海那样，路向都朝东，目标都是大海。路向同，目标同，无限量的力量就融合成一股伟大的力量，千千万万颗心就融合成一颗伟大的心。这是从古以来不曾融合过的，现在可出现了全新的事儿，融合起来了；那么，一切的表现相应地出现全新的样儿，跟从前迥然不同，岂不是必然之理。

从扑灭苍蝇到抗美援朝，从商量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到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就事情的大小轻重说，相差多么远。可是咱们以同样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这些事情，因为咱们知道这些事情全都是大家的事情，全都跟咱们共同的路向、共同的目标有关系，非把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心投进去不可。

我说从什么到什么，这是只提两头的说法，中间包括着许多事情。现在不说其他事情，光就提明的四件事情来看看，全国人民共同扑灭苍蝇的结果，苍蝇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孑遗”的种类，将会有完全被消灭的一天。抗美援朝的胜利不用多说，只消说这么一句就够了：这个胜利永远铭刻在中朝人民的心头，永远铭刻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心头，也永远鞭打着美国侵略集团的神经。至于互助合作的好处，农民跟其他行业的人一样，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组织起来已经成为普遍的信念，互助组仿佛还不够味，最好一上手就来个合作社。最后看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全国人民提出的意见多到一百多万条，什么地方要加，该怎样加，什么地方要改，该怎么改，什么地方还得斟酌考虑，该就什么

方面與附考虑，都给详细提出，真是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肯含糊，为的宪法是根本大法，是全国人民各方面生活的准绳。请想一想，这四件事情得到这样的成绩，假如在从前的朝代，办得到吗？从前绝对办不到，现在可办得到，最主要的理由只有一条，就是人民站起来了，一股伟大的力量、一颗伟大的心融合起来了。

逢到庆祝的节日，国庆节呀，劳动节呀，会集在天安门前的有几十万人。那几十万人的眼神跟脸色，那几十万人的步调跟欢呼，使人发生一种直觉——这就亲眼看见了这股伟大的力量，这就亲眼看见了这颗伟大的心。在另外的情形之下，咱们也发生同样的直觉。咱们读报刊书籍，或者到各处去走走，知道各种人物在各种方面活动。姓张的劳动模范创造了机械操作的先进经验，姓王的劳动模范获得了作物栽培的丰产经验，姓赵的小学教师提高了所任功课的教学效率，姓李的合作社售货员发明了便利顾客的服务方法……咱们或是遇见他们本人，或是看见印在报刊上的他们的相片，咱们知道他们的成绩价值多大，也知道他们怎么样取得这些成绩。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咱们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样儿，可是知道他们的成绩了不起。比如今年遭到历来少有的大水患，咱们读报刊，就知道某处地方防水抢险有多少人，另外一处地方又有多少人，他们的努力也许记得很简略，可是咱们凭经验凭想象来补充，就可以断定他们干了英雄的事业。知名识姓的也好，不知道姓甚名谁的也好，他们天各一方，业各一行，可同样是当家作主的老同行，同样为共同的目标而贡献他们的心血跟体力。咱们这么想的时候，

他们在咱们的意念里头会集在一块儿了，像咱们在天安门前看见的队伍一样。于是咱们发生一种直觉——这就亲眼看见了这股伟大的力量，这就亲眼看见了这颗伟大的心。

我此刻独个儿坐在这里写这篇小文章，不读报刊也不开收音机，似乎跟外界完全隔绝。可是不然，我能够料知各方面的生活的情形。我知道许多勘探队分布各地，正在专心致志地勘探地下的资源。我知道兰新铁路、宝成铁路的修建工人正在使劲挥汗，争取早些日子完工，让火车早些日子在铁路上飞跑。我知道长江大桥的修建工人也不差劲，正在驱遣钢铁水泥，让它化为江面的长虹。我知道许多房屋正在全国各地修建起来。我知道全国各地的物产正在各种运输线上交流。我知道许多技术革新者正在绞脑汁，找窍门，追求生产效率的提高。我知道许多科学家正在努力钻研，理论方面跟实际应用方面，都要求迎头赶上。我知道各级学校的学生正在认真学习……这样说下去是说不完的，就此打住吧。总之，尽管记者、通讯员、著作家脑筋锐敏，笔杆勤快，他们报道的、描写的各方面的生活总赶不上实际那么丰富。这各方面的生活的进展也就是伟大的力量、伟大的心的表现。

正因为一股伟大的力量已经融合起来，一颗伟大的心已经融合起来，谁都觉得精神抖擞，勇气百倍，能够把自己的一份工作搞好。咱们都有自豪感，可是决不骄傲自满。缺点经常有，努力还很不够，咱们知道得挺清楚，惟其知道得挺清楚，缺点可以去掉，努力可以加强。咱们所以自豪，就在于能够这样脚踏实地地走向咱们的目标。

正因为一股伟大的力量已经融合起来，一颗伟大的心已

经融合起来，咱们可以挺起胸膛说这样的话，就是写在咱们宪法序言的末了儿的："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

一九五四年九月六日作

我 打 上 个 圈

我接表决票在手。票的右方，用汉、蒙、藏、维吾尔四种文字标明“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表决票”。正中用同样四种文字写这么一句话：“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这四行文字的上方用线条界划成个空格，代表就在这个空格里表示意见，同意，打上个圈，不同意，打上个×。

我无须考虑，因为考虑很久了。自从三月间讨论宪法草案初稿开始，就觉得这是最切合当前实际的宪法，因而是我所同意的宪法。后来经过历次的讨论，根据各方意见所作的修改使宪法草案越来越完密，我的感觉又进了一步。我以为咱们的宪法非这个样儿不可，好比一首千锤百炼的诗，莫说更动不得一句，连一个字也更动不得，惟有这么些条文、这么些语句才能把咱们所要的宪法的内容固定下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听了刘少奇委员的报告。报告的每一段话透进咱们的心。过去的历史不该作这样分析吗？前进的方向不该作这样规定吗？咱们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才能自觉的创造历史；要自觉的创造历史，不该定下这样一个根本大法吗？该，该，该，除此而外，别无话说。

那还用得着什么考虑呢？我即使不当代表，早已在无形的表决票上打上个圈了。

可是我当了代表。代表是选举单位选出来的，选举单位的代表又是下一级的选举单位选出来的，这样往下推，就可以想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背后站着全国的选民。代表表示什么意见，必须根据选民的意志，不该单凭个人的意志，否则就是失职。我愿意做个尽责的代表，我可以代表广大的选民在表决票上打上个圈吗？

这似乎该考虑，可是实际上也无须考虑，因为我早就知道全国人民同意这个宪法，拥护这个宪法。报上的记载看得多了，相识的不相识的人的谈论听得多了，谁都表示热烈的拥护，并且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保证宪法的完全实施而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刘少奇委员在报告里说："在全国人民的讨论中，证明了我们的宪法草案是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的，是实事求是的。人民群众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说：'宪法草案把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作过的许多事情都写上了；把现在已经开始做、以后应当做又能够做的事情也写上了。''我们应当怎样走到社会主义，一条一条地都摆出来了。''宪法草案标志着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广大群众认为我们起草的宪法是'幸福生活的保证'，认为宪法草案的'每一条都代表着人民的利益'。这是人民群众对宪法草案所作的结论，显然，这种结论是正确的。"情形既然如此，不就是说全国人民都同意在表决票上打上个圈吗？

那还用得着什么考虑呢？全国人民既然同意在表决票上打上个圈，我就得遵从全国人民的意志在表决票上打上个圈。

我拿起毛笔，怀着庄严的虔敬的心情在空格里打上个圈，我默默的念着"自觉的创造历史"的语句……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一日作

游了三个湖

这回到南方去，游了三个湖。在南京，游玄武湖，到了无锡，当然要望望太湖，到了杭州，不用说，四天的盘桓离不了西湖。我跟这三个湖都不是初相识，跟西湖尤其熟，可是这回只是浮光掠影地看看，写不成名副其实的游记，只能随便谈一点儿。

首先要说的，玄武湖和西湖都疏浚了。西湖的疏浚工程，做的五年的计划，今年四月初开头，听说要争取三年完成，每天挖泥船轧轧轧地响着，连在链条上的兜儿一兜兜地把长远沉在湖底里的黑泥挖起来。玄武湖要疏浚，为的是恢复湖面的面积，湖面原先让淤泥和湖草占去太多了。湖面宽了，游人划船才觉得舒畅，望出去心里也开朗。又可以增多鱼产。湖水宽广，鱼自然长得多了。西湖要疏浚，主要为的是调节杭州城的气候。杭州城到夏天，热得相当厉害，西湖的水深了，多蓄一点儿热，岸上就可以少热一点儿。这些个都是顾到居民的利益。顾到居民的利益，在从前，哪儿有这回事？只有现在的政权，人民自己的政权，才当做头等重要的事儿，在不妨碍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前提之下，非尽可能来办不可。听说，玄武湖平均挖深半公尺以上，西湖准备平均挖深一公尺。

其次要说的，三个湖上都建立了疗养院——工人疗养院或者机关干部疗养院。玄武湖的翠洲有一所工人疗养院，太湖边上到底有几所疗养院，我也说不清。我只访问了太湖边中犊山的工人疗养院。在从前，卖力气淌汗水的工人哪有疗养的份儿？害了病还不是咬紧牙关带病做活，直到真个挣扎不了，跟工作、跟生命一齐分手？至于休养，那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儿，休养等于放下手里的活闲着，放下手里的活闲着，不是连吃不饱肚子的一口饭也没有着落了吗？只有现在这时代，人民当了家，知道珍爱创造种种财富的伙伴，才要他们疗养，而且在风景挺好、气候挺适宜的所在给他们建立疗养院。以前人有句诗道，"天下名山僧占多"。咱们可以套用这一句的意思说，目前虽然还没做到，往后一定会做到，凡是风景挺好、气候挺适宜的所在，疗养院全得占。僧占名山该不该，固然是个问题，疗养院占好所在，那可绝对地该。

又其次要说的，在这三个湖边上走走，到处都显得整洁。花草栽得整齐，树木经过修剪，大道小道全扫得干干净净，在最容易忽略的犄角里或者屋背后也没有一点儿垃圾。这不只是三个湖边这样，可以说哪儿都一样。北京的中山公园、北海公园不是这样吗？撇开园林、风景区不说，咱们所到的地方虽然不一定栽花草，种树木，不是也都干干净净，叫你剥个橘子吃也不好意思把橘皮随便往地上扔吗？就一方面看，整洁是普遍现象，不足为奇。就另一方面看，可就大大值得注意。做到那样整洁决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儿。固然，管事的人如栽花的，修树的，扫地的，他们的勤劳不能缺少，整洁

是他们的功绩。可是，保持他们的功绩，不让他们的功绩一会儿改了样，那就大家有份，凡是在那里、到那里的人都有份。你栽得整齐，我随便乱踩，不就改了样吗？你扫得干净，我嗑瓜子乱吐瓜子皮，不就改了样吗？必须大家不那么乱来，才能保持经常的整洁。解放以来属于移风易俗的事项很不少，我想，这该是其中的一项。回想过去时代，凡是游览地方、公共场所，往往一片凌乱，一团肮脏。那种情形永远过去了，咱们从“爱护公共财物”的公德出发，已经养成了到哪儿都保持整洁的习惯。

现在谈谈这回游览的印象。

出玄武门，走了一段堤岸，在岸左边上小划子。那是上午九点光景，一带城墙受着晴光，在湖面和蓝天之间划一道界限。我忽然想起四十多年前头一次游西湖，那时候杭州靠西湖的城墙还没拆，在西湖里朝东看，正像在玄武湖里朝西看一样，一带城墙分开湖和天。当初筑城墙当然为的防御，可是就靠城的湖来说，城墙好比园林里的回廊，起掩蔽的作用。回廊那一边的种种好景致，亭台楼馆，花坞假山，游人全看过了，从回廊的月洞门走出来，瞧见前面别有一番境界，禁不住喊一声“妙”，游兴益发旺盛起来。再就回廊这一边说，把这一边、那一边的景致合在一块儿看也许太繁复了，有一道回廊隔着，让一部分景致留在想象之中，才见得繁简适当，可以从容应接。这是园林里修回廊的妙用。湖边的城墙几乎跟回廊完全相仿。所以西湖边的城墙要是不拆，游人无论从湖上看东岸或是从城里出来看湖上，就会感觉另外一种味道，跟现在感觉的大不相同。我也不是说西湖边的城墙拆坏

了。湖滨一并排是第一公园至第六公园，公园东面隔着马路，一带相当齐整的市房，这看起来虽然繁复些儿，可是照构图的道理说，还成个整体，不致流于琐碎，因而并不伤美。再说，成个整体也就起回廊的作用。然而玄武湖边的城墙，要是有人主张把它拆了，我就不赞成。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那城墙的线条，那城墙的色泽，跟玄武湖的湖光、紫金山覆舟山的山色配合在一起，非常调和，看来挺舒服，换个样儿就不够味儿了。

这回望太湖，在无锡鼋头渚，又在鼋头渚附近的湖面上打了个转，坐的小汽轮。鼋头渚在太湖的北边，是突出湖面的一些岩石，布置着曲径蹬道，回廊荷池，丛林花圃，亭榭楼馆，还有两座小小的僧院。整个鼋头渚就是个园林，可是比一般园林自然得多，何况又有浩渺无际的太湖做它的前景。在沿湖的石上坐下，听湖波拍岸，挺单调，可是有韵律，仿佛觉得这就是所谓静趣。南望马迹山，只像山水画上用不太淡的墨水涂上的一抹。我小时候，苏州城里卖芋头的往往喊"马迹山芋艿"。抗日战争时期，马迹山是游击队的根据地。向来说太湖七十二峰，据说实际不止此数。多数山峰比马迹山更淡，像是画家蘸着淡墨水在纸面上带这么一笔而已。至于我从前到过的满山果园的东山，石势雄奇的西山，都在湖的南半部，全不见一丝影儿。太湖上渔民很多，可是湖面太宽阔了，渔船并不多见，只见鼋头渚的左前方停着五六只。风轻轻地吹动桅杆上的绳索，此外别无动静。大概这不是适宜打鱼的时候。太阳渐渐升高，照得湖面一片银亮。碧蓝的天空中飘着几朵若有若无的薄云。要是天气不好，风急浪涌，就会是一幅完全

不同的景色。从前人描写洞庭湖、鄱阳湖，往往就不同的气候、时令着笔，反映出外界现象跟主观情绪的关系。画家也一样，风雨晦明，云霞出没，都要研究那光和影的变化，凭画笔描绘下来，从这里头就表达出自己的情感。在太湖边作较长时期的流连，即使不写什么文章，不画什么画，精神上一定会得到若干无形的补益。可惜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能有两三个钟头的勾留。

刚看过太湖，再来看西湖，就有这么个感觉，西湖不免小了些儿，什么东西都挨得近了些儿。从这一边看那一边，岸滩，房屋，林木，全都清清楚楚，没有太湖那种开阔浩渺的感觉。除了湖东岸没有山，三面的山全像是直站到湖边，又没有衬托在背后的远山。于是来了个总的印象：西湖仿佛是盆景，换句话说，有点儿小摆设的味道。这不是给西湖下贬辞，只是直说这回的感觉罢了。而且盆景也不坏，只要布局得宜。再说，从稍微远一点儿的地点看全局，才觉得像个盆景，要是身在湖上或是湖边的某一个所在，咱们就成了盆景里的小泥人儿，也就没有像个盆景的感觉了。

湖上那些旧游之地都去看看，像学生温习旧课似的。最感觉舒坦的是苏堤。堤岸正在加宽，拿挖起来的泥壅一点儿在那儿，巩固沿岸的树根。树栽成四行，每边两行，是柳树、槐树、法国梧桐之类，中间一条宽阔的马路。妙在四行树接叶交柯，把苏堤笼成一条绿荫掩盖的巷子，掩盖而绝不叫人觉得气闷，外湖和里湖从错落有致的枝叶间望去，似乎时时在变换样儿。在这条绿荫的巷子里骑自行车该是一种愉快。散步当然也挺合适，不论是独个儿、少数儿个人还是成群结队。以

前好多回经过苏堤，似乎都不如这一回，这一回所以觉得好，就在乎树补齐了而且长大了。

灵隐也去了。四十多年前头一回到灵隐就觉得那里可爱，以后每到一回杭州总得去灵隐，一直保持着对那里的好感。一进山门就望见对面的飞来峰，走到峰下向右拐弯，通过春淙亭，佳境就在眼前展开。左边是飞来峰的侧面，不说那些就山石雕成的佛像，就连那山石的凹凸、俯仰、向背，也似乎全是名手雕出来的。石缝里长出些高高矮矮的树木、苍翠，茂密，姿态不一，又给山石添上点缀。沿峰脚是一道泉流，从西往东，水大时候急急忙忙，水小时候从从容容，泉声就有宏细疾徐的分别。道跟泉流平行。道左边先是壑雷亭，后是冷泉亭，在亭子里坐，抬头可以看飞来峰，低头可以看冷泉。道右边是灵隐寺的围墙，淡黄颜色。道上多的是大树，又大又高，说"参天"当然嫌夸张，可真做到了"荫天蔽日"。暑天到那里，不用说，顿觉清凉，就是旁的时候去，也会感觉"身在画图中"。自己跟周围的环境融和一气，挺心旷神怡的。灵隐的可爱，我以为就在这个地方。道上走走，亭子里坐坐，看看山石，听听泉声，够了，享受了灵隐了。寺里头去不去，那倒无关紧要。

这回在灵隐道上大树下走，又想起常常想起的那个意思。我想，无论什么地方，尤其在风景区，高大的树是宝贝。除了地理学、卫生学方面的好处而外，高大的树又是观赏的对象，引起人们的喜悦不比一丛牡丹、一池荷花差，有时还要胜过几分。树冠和枝干的姿态，这些姿态所表现的性格，往往很耐人寻味。辨出意味来的时候，咱们或者说它"如画"，或者

说它"入画"，这等于说它差不多是美术家的创作。高大的树不一定都"如画""入画"，可是可以修剪，从审美观点来斟酌。一般大树不比那些灌木和果树，经过人工修剪的不多，风吹断了枝，虫蛀坏了干，倒是常有的事，那是自然的修剪，未必合乎审美观点。我的意思，风景区的大树得请美术家鉴定，哪些不用修剪，哪些应该修剪。凡是应该修剪的，动手的时候要遵从美术家的指点，惟有美术家才能就树的本身看，就树跟环境的照应配合看，决定怎么样叫它"如画""入画"。我把这个意思写在这里，希望风景区的管理机关考虑，也希望美术家注意。我总觉得美术家为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要求，不但要在画幅上用功，还得扩大范围，对生活环境的布置安排也费一份心思，加入一份劳力，让环境跟画幅上的创作同样地美——这里说的修剪大树就是其中一个项目。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作

《六亿人民的意志》

这部纪录片记着我国一九五四年间的一件大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这件大事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表明全国人民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奋斗，总括的说，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的高度的新发展。记着这件大事的这部纪录片题名《六亿人民的意志》，又庄严，又扼要，把精神全显出来了。

影片开头表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以前全国的面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勤劳的耕作，勘察队的队员们勘察地下的宝藏，重工业的各种工人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各自尽他们的职责，轻工业的各种工人也同样的使劲努力。接下去就是宪法草案颁布，全民讨论宪法草案，各地欢送全国人民代表的镜头。这给观众一个鲜明的印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是以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全国人民热切期望为背景的。

于是咱们看到人民代表的确代表了人民事业的各方面，他们全是拿自己的力气和智慧贡献给人民的人。农业劳动模范、年轻的纺织女工、青年鉋工、火车司机、海军战士、志

愿军战士、邮递员、小学校长、科学家、中医、老画家……也说不尽许多。他们受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和各方面的人民的委托，来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决定国家大事。

毛主席的开幕词，咱们都读了不知多少遍了，不但读了不知多少遍，还深深的记住，经常拿来策励自己的工作。在这部影片里，咱们可以看见毛主席致词那个时候的形象，可以听见他亲切的声音。他那庄严沉着的姿态，果断有力的手势，恳切坚定的语调，都给咱们灌注一股力量，这灌注是直接的，所以这股力量比读文件的时候更强。咱们听到他亲口说的"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咱们的信心更坚强了，谁都会在心里默默的说，一定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和全国人民一道，达到毛主席所说的目的。

刘少奇委员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的时候，各地的工人、农民、市民、战士、少数民族都围着收音机收听，并且都详细讨论过宪法草案，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自然是极端开心的。从这些镜头，咱们亲眼看见全国人民政治觉悟提高的实际情形。

以下是各位代表讨论宪法草案的发言。发言的代表那么多，当然不能全数收在这部纪录片里。各位代表的发言，简短的有五分钟，长的有十几分钟，也不能全篇收录。影片的编辑裁剪的好处在于把每位代表的精警的语句收入，哪怕只有两三句话，却把宪法草案的重要意义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表示得很明确。这就加强了这部纪录片的思想性。举个例子，影片里张澜代表的发言就只有以下的语句："我完全同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刘少奇副主席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六十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宪政运动，我是亲身经历过的，就我自己的经验，过去反动统治者所谓宪政，从制宪的过程到'宪法'的内容都是骗人的，因而都是为人民所蔑视和反对的。"咱们听张澜代表亲口这么说，同时不就想到咱们自己制定的这个宪法太可珍贵了吗？

以下是各位代表投票的镜头。说明员用庄重恳切的声音说道："伟大的庄严的时刻！为了我们无限美好的将来，为了我们孩子们的幸福，为了全人类的进步事业，投下这庄严的一票。这是多少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的结果，这是多少人坚韧奋斗的结果，这是多少人日以继夜的忘我劳动的结果！"于是执行主席周恩来宣布投票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咱们和咱们的子子孙孙将永远记住这个日子——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

会场里一片欢呼鼓掌声。全国狂欢。苏联的《真理报》和全国进步报刊都记载着我国人民的这一伟大胜利，可见这一胜利不仅是属于我国的，也是属于全世界进步人类的。

接下去是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作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讨论周总理的报告。这中间插入代表们在休息时间和毛主席亲切的交谈，代表和代表握手谈心，友情洋溢。

然后是选举国家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场面。

毛主席以全票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时候，全场的热烈欢腾简直无法形容。谁都欢呼，谁都耸起身子想跳起来。全国人民对领袖怎样的敬爱，这就是个最生动最真切的形象。其他许多领导人员选出的时候，欢腾的情形也尽够叫

人感动。

于是毛主席致简短的闭幕词。代表们的声音像海涛一样，一阵接一阵的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回答是"祖国万岁"，"伟大的祖国万岁"，这是他的闭幕词的结句。

结束是国庆日天安门前游行的场面。游行队伍一队队的经过，说明员用下面的话结束全部影片的说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六万万人沿着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前进。"

是的，中国人民在奋勇前进。在影片开头的时候，说明员说"二十万个以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组织起来"，可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新华社的报导，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有四十多万个了。还有一点，距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才三个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又胜利闭幕，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见加强了。就这两件事看，可见我国各方面都在加速度的发展和进步，看罢这部纪录片，不能不为此而更感到兴奋。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作

景泰蓝的制作

一天下午，我们去参观北京市手工业公司实验工厂，粗略地看了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景泰蓝是多数人喜爱的手工艺品，现在把它的制作过程说一说。

景泰蓝拿红铜做胎，为的红铜富于延展性，容易把它打成预先设计的形式，要接合的地方又容易接合。一个圆盘子是一张红铜片打成的，把红铜片放在铁砧上尽打尽打，盘底就洼了下去。一个比较大的花瓶的胎分作几截，大概瓶口、瓶颈的部分一截，瓶腹鼓出的部分一截，瓶腹以下又是一截。每一截原来都是一张红铜片。把红铜片圈起来，两边重叠，用铁椎尽打，两边就接合起来了。要圆筒的哪一部分扩大，就打哪一部分，直到符合设计的意图为止。于是让三截接合起来，成为整个的花瓶。瓶底可以焊上去，也可以把瓶腹以下的一截打成盘子的形状，那就有了底，不用另外焊了。瓶底下面的座子，瓶口上的宽边，全是焊上去的。至于方形或是长方形的东西，象果盒、烟卷盒之类，盒身和盖子都用一张红铜片折成，只要把该接合的转角接合一下就是，也不用细说了。

制胎的工作其实就是铜器作的工作，各处城市大都有这种铜器作，重庆还有一条街叫打铜街。不过铜器作打成一件

器物就完事，在景泰蓝的作场里，这只是个开头，还有好多繁复的工作在后头呢。

第二步工作叫掐丝，就是拿扁铜丝（横断面是长方形的）粘在铜胎表面上。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工作。掐丝工人心里有谱，不用在铜胎上打稿，就能自由自在地粘成图画。譬如粘一棵柳树吧，干和枝的每条线条该多长，该怎么弯曲，他们能把铜丝恰如其分地剪好曲好，然后用钳子夹着，在极稠的白芨浆里蘸一下，粘到铜胎上去。柳树的每个枝子上长着好些叶子，每片叶子两笔，像一个左括号和一个右括号，那太细小了，可是他们也要细磨细琢地粘上去。他们简直是在刺绣，不过是绣在铜胎上而不是绣在缎子上，用的是铜丝而不是丝线、绒线。

他们能自由地在铜胎上粘成山水、花鸟、人物种种图画，当然也能按照美术家的设计图样工作。反正他们对于铜丝好像画家对于笔下的线条，可以随意驱遣，到处合适。美术家和掐丝工人的合作，使景泰蓝器物推陈出新，博得多方面人士的爱好。

粘在铜胎上的图画全是线条画，而且一般是繁笔，没有疏疏朗朗只用少数几笔的。这里头有道理可说。景泰蓝要涂上色料，铜丝粘在上面，涂色料就有了界限。譬如柳条上的每片叶子由两条铜丝构成，绿色料就可以填在两条铜丝中间，不至于溢出来。其次，景泰蓝内里是铜胎，表面是涂上的色料，铜胎和色料，膨胀率不相同。要是色料的面积占得宽，烧过以后冷却的时候就会裂。还有，一件器物的表面要经过几道打磨的手续，打磨的时候着力重，容易使色料剥落。现在

在表面粘上繁笔的铜丝图画，实际上就是把表面分成无数小块，小块面积小，无论热胀冷缩都比较细微，又比较禁得起外力，因而就不至于破裂、剥落。通常谈文艺有一句话，叫内容决定形式。咱们在这儿套用一下，是制作方法和物理决定了景泰蓝掐丝的形式。咱们看见有些景泰蓝上画的图案画，在图案画以外，或是红地，或是蓝地，只要占的面积相当宽，那里就嵌几条曲成图案形的铜丝。为什么一色中间还要嵌铜丝呢？无非使较宽的表面分成小块罢了。

粘满了铜丝的铜胎是一件值得惊奇的东西。且不说自在画怎么生动美妙，图案画怎么工整细致，单想想那么多密密麻麻的铜丝没有一条不是专心一志粘上去的，粘上去以前还得费尽心思把它曲成最适当的笔画，那是多么大的工夫！一个二尺半高的花瓶，掐丝就要花四五十个工。咱们的手工艺品往往费大工夫，刺绣，刻丝，象牙雕刻，全都在细密上显能耐。掐丝跟这些工作比起来，可以说不相上下，半斤八两。

刚才说铜丝是蘸了白芨浆粘在铜胎上的，白芨浆虽然稠，却经不住烧，用火一烧就成了灰，铜丝就全都落下来了，所以还得焊。先在粘满了铜丝的铜胎上喷水，然后拿银粉、铜粉、硼砂三种东西拌和，均匀地筛在上边，放到火里一烧，白芨成了灰，铜丝就牢牢地焊在铜胎上了。

随后就是放到稀硫酸里煮一下，再用清水洗。洗过以后，表面的氧化物和其他脏东西都去掉了，涂上的色料才可以紧贴着红铜，制成品才可以结实。

于是轮到涂色料的工作了，他们管这个工作叫点蓝。涂

上的色料有好些种，不只是一种蓝色料，为什么单叫点蓝呢？原来这种制作方法开头的时候多用蓝色料，当时叫点蓝，就此叫开了（我们苏州管银器上涂色料叫发蓝，大概是同样的理由）。这种制品从明朝景泰年间十五世纪中叶开始流行，因而总名叫景泰蓝。

用的色料就是制颜色玻璃的原料，跟涂在瓷器表面的釉料相类。我们在作场里看见的是一块块不整齐的硬片，从山东博山运来的。这里头基本质料是硼砂、硝石和碱，因所含的金属矿质不同，颜色也就各异。大概含铁的作褐色，含铀的作黄色，含铬的作绿色，含锌的作白色，含铜的作蓝色，含金含硒的作红色……

他们把那些硬片放在铁臼里捣碎研细，筛成细末应用。细末里头不免搀和着铁臼上磨下来的铁屑，他们利用吸铁石除掉它。要是吸得不干净，就会影响制成品的光彩。看来研磨色料的方法得讲求改良。

各种色料的细末都盛在碟子里，和着水，像画家的画桌上一样，五颜六色的碟子一大堆。点蓝工人用挖耳似的家伙舀着色料，填到铜丝界成的各种形式的小格子里。大概是熟极了的缘故，不用看什么图样，自然知道哪个格子里该填哪种色料。湿的色料填在格子里，比铜丝高一些。整个表面填满了，等它干燥以后，就拿去烧。一烧就低了下去，于是再填，原来红色的地方还是填红色料，原来绿色的地方还是填绿色料。要填到第三回，烧过以后，色料才跟铜丝差不多高低。

现在该说烧的工作了。涂色料的工作既然叫点蓝，不用说，烧的工作当然叫烧蓝。一个烧得挺旺的炉子，燃料用煤、

炉膛比较深，周围不至于碰着等着烧的铜胎。烧蓝工人把涂好色料的铜胎放在铁架子上，拿着铁架子的弯柄，小心地把它送到炉膛里去。只要几分钟工夫，提起铁架子来，就看见铜胎全体通红，红得发亮，像烧得正旺的煤。可是不大工夫红亮就退了，涂上的色料渐渐显出它的本色，红是红绿是绿的。

涂了三回烧了三回以后，就是打磨的工作了。先用金刚砂石水磨，目的在使成品的表面平整。所谓平整，一是铜丝跟涂上的色料一样高低，二是色料本身也不许有一点儿高高洼洼。磨过以后又烧一回，再用磨刀石水磨。最后用椴木炭水磨，目的在使成品的表面光润。椴木木质匀净，用它的炭来水磨，成品的表面不起丝毫纹路，越磨越显得鲜明光滑。旁的木炭都不成。

椴木炭磨过，看来晶莹灿烂，没有一点儿缺憾，成一件精制品了，可是全部工作还没完，还得镀金。金镀在全部铜丝上，方法用电镀。镀了金，铜丝就不会生锈了。

全部工作是手工，只有待打磨的成品套在转轮上，转轮由马达带动的皮带转动，算是借一点儿机械力。可是拿着蘸水的木炭、磨刀石挨着转动的成品，跟它磨擦，还得靠打磨工人的两只手。起瓜楞的花瓶就不能套在转轮上打磨，因为表面有高有低，洼下去的地方磨不着。那非纯用手工打磨不可。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作

河　清　可　俟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同意了邓子恢副总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自从有了历史记载，黄河水害的次数，大大小小的，数也数不清。现在说，要把它“根治”了，意思就是要根本治理黄河，使黄河不再为害。过去时候黄河固然不能说绝对没有水利，最显著的是经常说的“惟富一套”，可是利跟害比较起来，就觉得利太微小了，害太严重了。现在却要开发黄河的水利，而且是大规模地多方面地开发，要靠它灌溉，靠它发电，靠它通航，促进农业、工业、运输业的发展。再看，这是个综合规划，意思就是把两个方面合在一块儿考虑，黄河的害，要彻底地去掉它，黄河的利，要尽量地利用它，目的只有一个——使黄河在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和将来的共产主义建设时代发挥它在国民经济上的最大作用。单就报告的题目想想，就够叫人兴奋的了。毛主席说：“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这个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正是“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之一。

历来的治黄工作，且不说那些腐败的贪污的官吏，他们当

然做不好，就是一部分认真办事的人，他们努力修堤防汛，虽然很有些成绩，但他们的成绩也只在消极方面。就是说，他们的成绩只能使黄河少闹些乱子，减轻些灾害。治理一回之后，能够使下一回决堤改道来得比较迟些，那就算是更好的成绩。这也不能怪他们，更不应该瞧不起他们，至少他们那么有心，希望保持黄河的安全，是永远值得后人敬佩的。他们只能取得些消极的成绩，是科学技术的知识限制了他们，是社会政治的条件限制了他们。他们受到这些限制，虽然老是说本标兼治，结果却只能做到治标而谈不到治本，至于充分利用黄河，更是梦也想不到了。惟有现在这个时代，人民作了国家的主人的时代，才能积极治黄，才能就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两个方面综合考虑。

试想想，查勘、测量、地质调查、钻探、水文测验、经济调查，这些工作在整个流域里动手，然后定下现在这个规划，那需要多么深广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在这个规划里，在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工作方面，第一期计划里就有个巨大的规模，只要几十年的时间就能见大效。要做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农业方面必须有一大套的措施，增施肥料啦，作物轮换啦，修什么样的沟啦，筑什么样的埂啦，种草造林啦，封山育林啦……这些事情必须在农民组织起来之后才办得到，必须在农民政治觉悟提高，知道维护集体的利益，知道集体的利益正是自己的最大利益之后才办得到。而我们现在已经充分具备了这些条件，所以能够积极治黄。

再说，要是没有国家的大量投资，也还是不成。实施黄河综合规划的第一期工程，初步估计需要投资五十三亿二千

四百万元。这么大的投资是值得的。从什么方面看值得?可以增产粮食，值得；可以得到巨大的发电量和廉价的电力，用来发展生产，值得；可以发展航运，值得；可以节省往后每年的防汛费用，值得……总之，从国计民生看，无往而不值得。历史上决没有也决不会有这样的先例，唯有工人阶级领导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才能一方面号召严格的节约、尽可能积累资金，一方面对应该大量投资的事业大量投资，力求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的国家能够拿出这样大量的投资来积极治黄，更可以见到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更可以体会到宪法第六条规定的“矿藏、水流……都属于全民所有”的深刻意义。

这个综合规划实现以后，就将出现好些奇迹。这里的所谓“奇迹”只是一般的说法，严格说起来都是当然之理；只因现代科学技术掌握和利用了自然规律，才达到这些当然之理，从海口可以直航兰州，这不是奇迹吗？黄河向来是泥沙俱下的，不久的将来，黄土高原上的泥沙可以保持，冲下来的部分泥沙可以逐段拦住，下游的河水就可以基本上变清，这更是奇迹里的奇迹。古人说：“圣人出而黄河清”，这句话快要应验了。不过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这个“圣人”不是某一个人，是人民民主政权，是有组织有领导的人民。这样的政权和人民跟最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结合，才使历史上一向浑浊的黄河变清！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四日作

非学透不可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这次会议，一开头就听了李富春副总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在代表小组里，用绝大部分时间阅读和讨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这个计划真是经纬万端，考虑得那么周密，结构得那么适当，阐说的部分又那么深入浅出，使一般人只要肯动脑筋就能够领会。我们并不是响往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人，我们要实现的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脚踏实地社会主义。这个五年计划的目的，扼要一句话，就是为实现社会主义打下巩固的物质基础。以前我们学习，多少知道了一些有关打下物质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道理，例如应该优先发展重工业啦，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要保持适当的比例啦，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要保持适当的比例啦，建设计划要跟资金积累的程度相适应啦，等等。现在，这些道理在这个计划里具体化了。换句话说，就是这些道理在这个计划的投资分配方面，生产指标方面，各项工作的先后缓急互相配合方面，具体地表现出来了。这就使大家明白，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参照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应该这样编制，必须这样编制，这样编制才是理论跟实际结合。大家从这里受到最深刻最具体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受了这样的教育，必然会在思想方法上有所提高，必然会在各种工作上发生作用。因此，我首先对拟定和提出这个计划草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真诚的感激。我跟许多位代表同志一样，建议大会通过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通过以后，我们必须经常认真地学习。现在虽然有些领会，那只是初步，还差得远，像这样博大繁密的东西，要是仅仅涉猎一下，不能寝馈其中，决不会学透，但是我们非把它学透不可。

一个企业，一个工作机构，在整个计划里，都只担任或大或小或广或窄的一项任务。但是无论哪一项任务都跟整个计划联系在一块儿。用习用的比拟说法说，整个计划好比一台机器，各业各门好比齿轮和螺丝钉，要使机器运转不息，充分发挥它的效率，一个齿轮一个螺丝钉都松不得。我们把五年计划学的越透，就越能体会各种工作之间配合联系的关系确然像这个比拟说法那样。这种体会不仅表现在理解方面，口头说得出，笔下写得出，而且会贯彻在实践方面，因为那时候有一股自觉的精神管住我们，我们非加紧努力不可。既然知道本岗位工作做不好，不但本岗位受到坏影响，连其它一连串工作都要受到坏影响，谁还肯马虎随便地对待本岗位工作？既然知道一个单位甚至一个人的偶尔松懈绝非“小事情”，正像一个单位甚至一个人的偶尔浪费绝非“小事情”一样，就整体看来，都是极其有害的“大事情”，谁还肯把这种极其有害的“大事情”惹在身上？这种自觉的精神正是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必要保证之一。

这就是说，为了加紧努力，我们必须把五年计划学透。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发表

原无标题

黄 山 三 天

我游黄山只有三天，真用得上“窥豹一斑”那个成语。可是我还是要写这篇简略的游记，目的在劝人家去游。有心研究植物的可以去。我虽然说不清楚，可是知道植物种类一定很多。山高将近两千公尺，从下层到最高处该可以把植物分成几个主要的族类来研究。研究地质矿石的也可以去。谁要是喜欢爬山翻岭，锻炼体力和意志，那么黄山真是个理想的地方。那么多的山峰尽够你爬的，有几处相当险，需要你付出十二分的小心，满身的大汗。可是你也随时得到报酬，站在一个新的地点，先前见过的那些山峰又有新的姿态了。就说不为以上说的那些目的，光到那里去看看大自然，山啊，云啊，树木啊，流泉啊，也可以开开眼界，宽宽胸襟，未尝没有好处。

从杭州依杭徽公路到黄山大约三百公里。公共汽车可以到黄山南边脚下的汤口，小包车可以再上去一点儿，到温泉。温泉那里有旅馆。山上靠北边的狮子林那里也有旅馆。山上中部偏南的文殊院原来可以留宿，一九五二年烧毁了，现在就文殊院原址建筑旅馆，年内可以完工。住狮子林便于游黄山的北部和西部，住文殊院便于游中部，主要是天都峰和莲花峰。

上山下山的路上全都铺石级，宽的五六尺，窄的不到三尺。路在裸露的大石上通过，就凿石成级。大石面要是斜度大，凿成的石级就非常陡，旁边或者装一道石栏或者拦一条铁索。山泉时时渗出，石上潮湿，路旁边又往往是直下绝壁，这样的防备是必要的。

现在约略说一说我们所到的几处地方。写游记最难叫读者弄清楚位置和方向，前啊，后啊，左啊，右啊，说上一大堆，读者还是捉摸不定。我想把它说清楚，恐怕未必真能办到。我们所到的地点，温泉最南，狮子林最北，这两处几乎正直。我们走的东路，先到温泉东边的苦竹溪，在那里上山。一路取西北方向，好比是直角三角形的一条弦，经过九龙瀑、云谷寺，最后到狮子林住宿，那里的高度大约一千七百公尺。这段路据说是三十多里。第二天下了一天的雨，旅馆楼窗外一片白茫茫，什么都看不见。台阶前几棵松树，有时只显出朦胧的影子，有时也完全看不见。偶尔开门，雾气就卷进屋来。当然没法游览了，只好守在小楼上听雨。第三天放晴，我们登了狮子林背面的清凉台，又登了狮子林偏东南的始信峰，然后大体上向南走，到了光明顶。在这两三个钟点内，我们饱看了“云海”。有些游客在山上守了好几天，要看“云海”，终于没看成，怏怏而下。我们不存一定要看到的想头，却碰巧看到了。在光明顶南望天都峰和莲花峰，天都在东，莲花在西，两峰之间就是文殊院。从前有人说天都最高，有人说莲花最高，据说最近实测，光明顶最高。那里正在建筑房屋，准备测量气象的人员在那里经常工作。我们绕过莲花峰的西半边到文殊院，又绕过天都峰的西南脚，一路而下，回到温

泉。说绕过，可见这段路的方向时时改变，可是大体上还是向南。从狮子林曲折向南，回到温泉，据说也是三十多里。我们所到的只是黄山东半边靠南的部分，整个黄山究竟有多大，我没有参考什么图籍，说不上。

以下就前一节提到的分别记一点儿。

九龙瀑曲折而下，共九截，第二截最长。形式很有致，可惜瘦些。山泉大的时候，应该更可观。附带说一说人字瀑。人字瀑在温泉旅馆那儿。高处山泉流到大石壁的顶部，分为左右两道，沿着石壁的边缘泻下，约略象个人字。也嫌瘦，瘦了就减少了瀑布的意味。

云谷寺没有寺了，只留寺基。台阶前有一棵异萝松，说是树上长着两种不同形状的叶子。我们仔细察看，只见一枝上长着长圆形的小叶子，跟绝大部分的叶子不同。就绝大部分的叶子形状和翠绿色看来，那该是柏树，不知道为什么叫它松。年纪总有几百岁了。

清凉台和始信峰的顶部都是稍微向外突出的悬崖，下边是树木茂密的深壑。站脚处很窄，只能容七八个人，要不是有石栏杆，站在那儿不免要心慌。如果风力猛，恐怕也不容易站稳。文殊院前边的文殊台比较宽阔些，可是靠南突出的东西两块大石，顶部凿平，留着边缘作自然的栏杆，那地位更窄了，只能容两三个人。光明顶虽是黄山最高处，却比较开阔平坦，到那里就像在平地上走一样。

我们就在前边说的几处地方看“云海”。望出去全是云，大体上可以说铺平，可是分别开来看，这边荡漾着又细又缓的波纹，那边却涌起汹涌澎湃的浪头，千姿百态，尽够你作种

种想象。所有的山全没在云底下，只有几座高峰露顶，作暗绿色，暗到几乎黑，那自然可以想象作海上的小岛。

在光明顶看天都峰和莲花峰，因为是平视，看得最清楚。就岩石的纹理看，用中国画的术语就是就岩石的皴法看，这两个峰显然不同。天都峰几乎全都是垂直线条，所有线条排得相当密，引起我们一种高耸挺拔的感觉。莲花峰的岩石大略成莲花瓣的形状，一瓣瓣堆叠得相当整齐，就整个峰看，我们想象到一朵初开的莲花。莲花峰这个名称不知道是谁给取的，居然形容得那么切当。

前边说我们绕过莲花峰的西半边到文殊院，这条路很不容易走。道上要经过鳌鱼背。鳌鱼背是巨大的岩石，中部高起，坡度相当大。凿在岩石上的石级又陡又窄，右手边望下去是绝壁。下了鳌鱼背穿过鳌鱼洞，那是个天然的洞，从前人修山路就从洞里通过去。出了洞还得爬上百步云梯，又是很陡很险的石级。这才到达文殊院。

从文殊院绕过天都峰的西南脚，这条路也不容易走。极窄的路介在石壁之间，石壁渗水，石级潮湿，立脚不稳就会滑倒。有几处石壁倾斜，跟对面的石壁构成个不完整的山洞，几乎碰着我们的头顶，我们就非弓着身子走不可。

走完了这段路，我们抬头望爬上天都峰的路，陡极了，大部分有铁链条作栏杆。我们本来不准备上去，望望也够了。据说将要到峰顶的时候有一段路叫鲫鱼背，那是很窄的一段山脊，只容一个人过，两边都没依傍，地势又那么高，心脏不强健的人是决不敢过的。一阵雾气浮过，顶峰完全显露，我们望见了鲫鱼背，那里也有铁链条。我想，既然有铁链条，

大概我也能过去。

我们也没上莲花峰。听说登莲花峰顶要穿过几个洞，像穿过藕孔似的。山峰既然比做莲花，山洞自然联想到藕孔了。

现在说一说温泉。我到过的温泉不多，只有福州、重庆、临潼几处。那几处都有硫磺味。黄山的温泉却没有。就温度说，比那几处都高些，可也并不热得叫人不敢下去。池子是小石粒铺底，起沙滤作用，因而水经常澄清。坐在池子里的石块上，全身浸在水里，只露出个脑袋，伸伸胳膊，擦擦胸脯，温热的感觉遍布全身，舒畅极了。这个温泉的温度据说自然能调节，天热的时候凉些，天凉的时候热些。我想这或许是由于人的感觉，泉水的温度跟大气的温度相比，就见得凉些热些了。这个猜想对不对，不敢断定。

我们在狮子林宿两宵，都盖两条被。听雨那一天留心看寒暑表，清早是华氏六十度，后来升到六十二度。那一天是八月二十九日。三十一日回到杭州，西湖边是八十六度。黄山上半部每年三月底四月初还可能下雪，十一月间就让冰雪封了。最适宜上去游览的当然是夏季。

一九五五年九月五日作

青　年　们

——庆祝“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听了这个庄严响亮的提示，青年们长了十倍百倍的精力。

不说远古，单说有了历史记载以来，又聪明又精壮的青年不知道几多辈。

他们没赶上这个时代，虽然尽了力，有点儿成就，可说不上自觉地创造历史。

现在的青年跟他们完全不一样，明明白白的一个目标摆在前边——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光荣伟大的事业。

说值得骄傲吧，真也值得骄傲，然而光是骄傲绝对不济事，而且会坏事。

是建设的事情呢，不凭智慧，不使力气，什么东西也建设不起来。

惟有让智慧和力气汇合成滔滔滚滚的河流，让所有的河流汇合到大海，惟有大海那样的气魄才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这不是口头说说笔下写写的语句，这是青年们生活实践

的总根源。

青年们赶上这个时代，要自觉地创造历史，离开了这个总根源还有什么生活实践？

看看青年们怎样实践吧。

荒山旷野里，干勘探工作的青年们在那里考查地质，搜寻矿苗，风日雨雪全不顾，只愿做到不让货弃于地。

大川激流边，干水利工作的青年们在那里勘测崖岸，研究水文，风日雨雪全不顾，只愿做到驱遣水流，叫它唯命是听。

各种工厂里，各个工程部门里，青年工人们不但增长工作的数量，而且提高工作的质量，为了增长和提高，新的设计新的工作方法一五一十地创造出来，青年突击队一五一十地发展起来，几乎每天的报上都有记载。

青年农民们的劲头也挺大，办社，增产，改进耕作技术，交流先进经验，注意之点也集中在农业增产的数量和质量。

青年士兵们吸收现代的军事知识，熟习现代的各种武器，不仅如此，他们还钻研理论，学习科学，他们知道这些是另外一种武器，这种武器跟那种武器密切地配合，才能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世界和平。

青年教师们为了培养新生的一代，不吝惜自己的脑力和体力，新的教学经验不断地创造出来，切实适用的直观教具不断地制造出来，目的只有一个——使所教的东西化为学生们的血肉。

青年艺术工作者们深入生活，到工厂，到农村，到遥远的边疆，只求把握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真实地形象地反

映出来，凭这个来教育人民，鼓舞人民。

也说不尽这许多，就不再列举吧。

青年们像千百条河流一样，一齐朝东，归向大海，而且每一条波纹每一个浪头全是自觉的，有意义的，不是徒然的激荡。

请想一想，在以往的历史上，可曾有过这样的情景？

青年们深切知道自己干的一行跟别人干的许多行的关系，深切知道自己干的一行跟光荣伟大的事业的关系，头脑里从不闪出这么个影子——我已经够了。

无论是谁，无论干什么事情，都不能说“我已经够了”，何况是需要千千万万人共同干的光荣伟大的事业！

学习，学习，再学习！

“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当然继续学，努力学。

一边儿干，一边儿学，从干里头学，拿学到的融化在干里头。

成为专家，成为内行，掌握科学技术，这固然是必要的，可是青年们还知道情势的发展没有止境，掌握科学技术也没有止境，因此，成了专家和内行就算到了顶了，不需要再学了，绝对没有那回事。

惟其如此，青年们才能细针密线地搞好自己的工作，而自己的工作正是光荣伟大的事业的一个细胞，一条脉络。

惟其如此，青年们才能灵敏机警地察觉坏东西的捣乱和破坏，政治的嗅觉跟专业的嗅觉结合起来，坏东西就无所遁逃。

青年们努力社会主义建设。

青年们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庄严响亮的提示时时刻刻在青年们的头脑里涌现——"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一日作

就整体着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跟着大家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对于这个计划里各个项目的先后缓急和相辅相成，约略有些儿领会。当时曾经有个想头，还没写在旁的短文里，现在《文艺学习》要我写一篇短文，我就写这个，藉此庆祝今年的国庆。

总路线刚刚提出的时候，曾经有人这么说："好了，现在前途已经很明确，是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实现的一天，大门敞开，谁都可以进去，当然有我的份。"这种想法不仅糊涂透顶，而且带着剥削阶级的气息。你们种了庄稼我来吃，你们造了房屋我来住，谁都知道这是什么阶级的意识。现在说你们建设了社会主义让我从从容容踱进去，跟前边说的岂不是半斤八两？经过了批判，这样的话近来很少听见了。可是，很少听见是这种想法已经不在那些人的头脑里露头呢，还是仅仅是不挂在他们的嘴上，这里头大有分别。仅仅是不挂在他们的嘴上，那就是他们还在暗地里那么想，那就是他们还在等待别人建设了社会主义让他们从从容容踱进去，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容许的。建设社会主义是大家共同的事情，谁也不能偷一分半分的懒，一部分人偷懒就会减损大部分人努力的成果。而且，所谓不能偷懒不是谁发出来的强迫命令，而

是全体人民自觉的意愿。要是有人想要偷懒，甘心偷懒，那就是违反全体人民的意愿，也是违反他们自己应有的意愿，他们没有自觉地怀抱那种应有的意愿，错误地以违反自己应有的意愿为意愿。因此，咱们的任务，一方面在认定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大目标，尽心竭力做好本岗位的工作，就具体的切近的说，必须使第一个五年计划完全实现。另外一方面呢，咱们得努力作宣传鼓动的工作，只要看见一个人有点儿偷懒的模样，头脑里不存那种应有的意愿，就想尽办法给他劝导和帮助，直到他跟咱们一样为止。这两方面要同时兼顾，不可缺一。——我所说曾经有个想头，就是这个。

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在建设和发展重工业，跟这一项相应，按比例地发展其他经济部门。不仅经济部门而已，还包含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医药、卫生种种事业。建设社会主义不能不经纬万端，为的是各项事业息息相关，通常说"一环套一环"，短了这一环就会影响那一环。不妨举个比较小的例子来看看。譬如我们搞出版事业，目的在出版质量好的书，给需要这些书的人阅读，使他们有所提高。出版事业就是"一环套一环"的。选题要有计划，出版要有计划。什么样的书是必需出的，书稿归谁写，该怎么样写，怎么样审读修订，用多少时间完成这些工作……都得明确地规定。书稿完成了，用什么纸张什么规格印刷，归哪家印刷厂印刷，印数是多少，校对装订花多少时间，在哪一天送到新华书店……也得明确地规定。这里头必须跟纸厂、印刷厂的生产计划和新华书店的发行计划扣合，要是不然，就完成不了我们的出版计划，硬要完成我们的出版计划，势必搞乱它们的计划。这儿我说得

很简单，出版事业的实际情形还要复杂得多。就按我提到的这些项目说，哪一个是可以马虎的？不确定出什么样的书当然不行，不选定适当的作者也不行，不商定妥善的写法也不行……但是，随随便便地校对印装又何尝行？随随便便地发行又何尝行？总之，必须每个项目都丝丝入扣，才能按时按量出版内容和形式都好的书，满足读者的需要，任何一个项目差点儿劲，就做不好出版事业。五年计划跟出版事业，论规模的大小，论头绪的繁简，几乎都无法相比。光是一项勘探工作，里头一环套一环不知道有几多环。光是一项钢铁生产，里头一环套一环不知道有几多环。光是一项水土保持工作，里头一环套一环不知道有几多环。光是一项农业合作化，里头一环套一环不知道有几多环……而勘探工作，钢铁生产，水土保持工作，农业合作化……都只是五年计划里头一个较大的环。五年计划规模之大和头绪之繁如此。但是，咱们就客观方面说，必须实现这个五年计划，就主观方面说，又切望实现这个五年计划，那么，咱们还能懈怠一些儿，还肯懈怠一些儿，致使咱们触及的那一环松劲，影响到其他许许多多环，影响到整个五年计划吗？无论在哪个岗位上的人，不做好本岗位的工作，受损害的决不止本岗位的工作，从较小的环到较大的环，一环一环推演开来，最后必然会得到结论，受损害的是整个五年计划。工人、农民不把生产搞好，教师不把学生教好，文艺作者不把作品写好，科学研究人员不好好儿研究，机关工作人员不好好儿工作……哪一样不对整个五年计划的实现有直接间接的损害？体会到这一层，咱们就有了整体的观念，不但理智上非努力不可，而且产生一股力

量，那股力量引导着咱们，不容咱们放松自己。劳动模范，积极分子，青年突击队员，就都是有这样体会的人。咱们谁都应该成为劳动模范，积极分子，青年突击队员，咱们谁都可以成为劳动模范，积极分子，青年突击队员。

所谓不放松自己，当然指不断地学习钻研，在实际工作里锻炼自己，使自己越来越成为专家内行，使工作越来越有所提高而言。虽然成为专家内行，可是由于有整体的观念，决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顾自己的一方面，忽略其他的种种方面。惟有这样，才真叫做好本岗位的工作。也惟有这样，要是看见别人有点儿不带劲，就会像发见自己身上有什么毛病一样，非赶紧把它治好不可，才能真正做好宣传鼓动的工作。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作

荣宝斋的贡献

荣宝斋以前大都印画笺和笺谱，近几年来，向大幅发展、向工细的画发展。新中国的艺术差不多样样推陈出新，荣宝斋木版水印画，取的正是这个方向，而且成绩挺好，因而受人们的重视。不但国内的人，国际友人到北京来，凡是知道荣宝斋的，也总喜欢跑到琉璃厂，选购几幅。

我老是觉得，中国画固然可以用彩色铜版彩色凹版复制，可是铜版凹版随你印得怎么样精，看起来总像张照片，跟原画有距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纸是铜版纸，彩色是油墨，物质条件跟原画不一样，当然不能完全传出原画的意趣。用木刻套印的方法复制，所用纸张和色料都跟原画完全相同，只是让一块块的木版代替了画家手里的毛笔。刻木版走了样当然不行，印刷的时候随随便便设色也不行。只要在雕刻和印刷的技术上多下功夫，使它尽量不失毛笔画的意趣，那就木刻套印几乎跟毛笔作画一样，那就物质条件几乎跟原画全同，所以好的复制品简直可以“乱真”。

中国画画家近来意兴很高，只要看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展出的作品那么多，画各方面的新事物，画雄伟美丽的祖国河山，参观的人都欢喜赞叹。各地博物馆里陈列的那些古画和壁画也是挺吸引人的东西，内行不用说，就是外行也

要站在前面看老半天。无论看了现代的或是古代的作品，看得中意，人们就会想，这样的好画，要是能够挂在自己屋里，随时欣赏，多好呢。或者想，这样的好画，可惜不能跟远方的某几个朋友共同玩赏，谈谈我的领会。这些想头包含着一个要求——要求复制品。收藏家鉴赏家当然看不上复制品，一般艺术爱好者可不在乎，你说复制品没有精神，他说既然不失原作的形象，多少总能够领会些精神。为中国画印造复制品有种种方法，以木刻套印为最好——据我个人的看法。好的木刻套印简直可以"乱真"，一般艺术爱好者，如我，就认为大可满足要求了。

荣宝斋做的工作就在满足人们的这种要求。他们印现代画家的作品，也印古代的作品。最近试印周昉《簪花仕女图》成功了，那是极其工细的画，标志着他们的工作又前进了一步。他们还打算印《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不是大家都想摊在案头仔细玩赏的吗？

木版水印要印得好，前边说过，得在雕刻木版和印刷的技术上多下功夫。雕刻的人依据分别勾描的底稿刻木版，原画挂在旁边，原画线条的刚柔，笔趣的枯润，都要细心体会，凭手里的刀传达出来。印刷的人一套一套印彩色，也随时参看原画，哪儿该浓，哪儿该淡，哪儿在色料以外还得加适量的水分，都要辨得极真切，而且能够得心应手。这就是说，无论做雕刻的工作或是印刷的工作，非懂得画中国画的道理不可。要是不懂，原画挂在旁边也无从揣摩，下刀设色就没有准儿。荣宝斋利用老工人熟练的技术，又注意培养新工人，吸收的是二三十岁的男女青年，他们在工作里学习，还有业

涂学习。我曾经上他们的工作场参观过几回，看见雕刻的印刷的专心一志地在那里工作，不由得想，他们分工合作，复制古今画家的作品，就制成品看，何尝不可以说他们就是画家呢？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作

风景片《黄山》解说词

看！连绵不断的山脉，到处有悬崖绝壁，狭沟深谷，从山脚到山顶，植物的种类那么丰富，底下有副热带的植物，高头有寒带的植物。

峰峦的姿态，岩石的纹理，林木的映衬，全是绝妙的天然图画，美术家从这儿得到启发，一般人也可以提高审美的眼力。

这是我国著名的风景区——黄山。黄山在安徽省的东南部，歙县的西北。

天都峰，莲花峰是黄山主要的山峰，高出海面一千八百多公尺。

这叫始信峰。

这叫石笋岗。矗起的小峰像竹林里长出的新笋。

黄山，吸引着爱好大自然的人们，研究地质的，研究植物的，……

锻炼体格练习爬山的，从全国各地来到这儿。

这个山峰像传说里的鳌鱼，它的嘴张得那么大。

悬崖上的那块石头像只猴子，它静悄悄地守望着富饶的

田地。人们叫它"猴子望太平"，因为那片田地属于太平县。

山道那么陡峭，天都峰顶又让浮云遮没了，可是青年们个个精神百倍，看他们轻健的脚步。

这儿叫"鲫鱼背"。要上天都峰顶必须通过这个险峻的山脊。任何险峻的处所，阻挡不了勇敢的青年。

他们到了天都峰顶了。常言道"登高可以望远"。登得越高，望得越远，眼界越开阔。

这山谷多么深啊！深谷里长着茂盛的林木。

这儿叫百丈台，峭壁上泻下来的瀑布。

清清的溪水，流过岩床，流入深潭，再慢慢地往下流去。

他们又到了始信峰顶了。

这儿叫清凉台。下边是深谷，望出去，黄山北部和西部的山峰都在下边，所以是看云海看朝霞晚霞的好地方。

傍晚的阳光斜照岩壁，白云布满山谷。

美丽的晚霞。晚霞映衬，松林如画。

初出的太阳，慢慢地升到云海上，放出灿烂的光芒。

山顶上，山谷里，树林边，全都有朝雾在飘动。

黄山高处的松树特别引人注意，那平齐的树顶，那密集的松针，那平伸而稍为向下的树枝，构成苍劲古拙的美的形

象。

古松背后的山峰，像一朵含苞未放的莲花，叫莲花峰。

这棵松树伸出长长的枝干，好像要跟游客们握手似的，是有名的迎客松，据说它的寿命已经有一千多岁了。

这些苍翠的松树，給黄山增添了秀色，也给美术家提供了画材。

这是一所新修的休养所。休假的工人，远道的游客，在这里住下，可以得到安适的休息。

看！这就是黄山的云海。重重叠叠的峰峦，全都给白云掩没了，只露出几个尖尖的峰顶，像大海里的岛屿。

云海面上并不到处都一样，有几处起着又细又软的波纹。有几处涌着水花飞溅的浪头，这就像个真正的大海。

我国风景区很多，黄山是最著名的风景区之一。黄山的奇特的峰峦，苍翠的松树，洋洋大观的云海，都足以开拓人们的心胸和眼界。

凡是到那里去休养，去游览的，在跟大自然亲近一番之后，将会有更多的生气和活力，将会更好地工作和学习。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九日作

任瑞卿老先生

山东平度县马疃完全小学校长任瑞卿老先生，今年六十八岁。他担任教师四十七年，越来越有劲。他说：“我虽然年纪大了，还愿意跟年青的教师们并驾齐驱，绝不示弱。”

任老先生的父亲是卖火烧（一种烧饼）的，长兄织土布，二兄三兄给地主家帮工。全家没有一个识字的，受尽了不识字的苦，受尽了地主的气。任老先生十岁那一年，他父兄勉力供给他上私塾，让他在私塾里一连读了十年书。他成了知识分子，开始当私塾教师。从此他就以教育为终身事业。

但是在旧社会里，任老先生当教师尽管尽职，非但得不到支持和赞扬，而且常有失掉工作的危险。有一年，任老先生在孟格庄教学，国民党县教育科视导员到那里查学，见任老先生穿得破烂，又没有买东西招待，就很不高兴，到处找任老先生的岔子，但是一点儿也找不出来。最后他指着任老先生的功课表说：“这是谁给你排的？”任老先生说：“我自己排的。”视导员恼羞成怒，说：“你自己会排功课表吗？”任老先生觉得自己在教学上没有什么过错，功课表也没有排错，就跟他争理：“我为什么就不会排功课表！”视导员见任老先生对他一点也不让，气得满脸发青，抓住任老先生的胳膊，破口大骂：“老腐败，敢跟我顶嘴！快给我卷铺盖走！”后来幸亏有人从中调

停，才算了事。

直到遇到了共产党，任老先生才像成语所说的“如鱼得水”，才像一颗好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地里。那是一九四零年，共产党解放了任老先生的家乡，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共产党真心为人民办教育，尊重尽力教育事业的任老先生，这使任老先生增长了新的力量。一九四一年他光荣地入了党，成了个彻头彻尾的党员，他把教育事业跟革命事业联系起来，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群众，几乎完全忘了“小我”。

任老先生担任北黄同中心小学校长的时候，敌人经常下乡“扫荡”，环境很恶劣。任老先生一直坚持工作，组织学生参加儿童团，轮流站岗放哨，又跟民兵密切联系，一有情况就领着学生到山沟里上课，晚上带着寄宿生到山洞睡觉。这样的生活大概经历了三年光景，他没有回家睡过一宿安稳觉。

光是对在校的孩子进行教育，任老先生觉得是不够的，因为党告诉他，要重视对成人的教育，发动群众抗日救国。他就在村里办民校和妇女识字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群众明白了这些道理，在党的领导下，青壮年组织了游击小组，妇女也组织起来，给伤员送饭，洗衣服，抬担架。

在这个时期，任老先生协助党组织，把儿子、侄子、儿媳、女儿、侄孙、侄孙媳十五人培养成党员，还一连动员儿子、侄子、侄孙五人参军。一九四二年这一年间，这五个里的三个先后在反扫荡中牺牲了。就是铁石人也不能不心酸，可是，任老先生一边悲痛一边感到安慰，因为他们三个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没有辜负党的教育，没有给任老先生丢脸。

地主恶霸乘机打击他；在街上说风凉话："不是他整天讲只有抗日才能生存吗？再叫他去抗吧！"他听到这个话更痛恨敌人，更增强了斗争的意志。春节那天，他把鲁迅先生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写成门联，勉励自己。过了两个年头，任老先生又把刚满十八岁的小儿子送去参军了。

那时候，任老先生一边教书，一边掩护革命干部。当时谁家窝着干部，谁家就有被杀的危险。但是任老先生从来不胆怯，拚着身家性命保护了不少干部。有一回，敌人突然来了，查出了掩藏在任老先生家里的宋区长。宋区长是外地人，敌人再三威迫任老先生，要他说出这是谁；任老先生一口咬定是外地来买猪的，终于救了宋区长。

日寇投降以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任老先生那里的青壮年都去支援前线。任老先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领导高小学生给烈士、战士、民工的家属送粪耕地，发动妇女和老年人种庄稼。

一九四七年，任老先生担任窝洛中心小学校长。党要他帮助这个村的土地改革工作，他就跟群众一起斗了伪乡长和地主，破获了一个反动组织。

国民党反动派在一九四七年对解放区的烧杀抢劫，造成一九四八年的严重灾荒，任老先生的学校被迫停办。任老先生决不让自己的终身事业中断一天，他按照上级的指示，在高小学生较多的刘家庄办起了义务小学，不但不取报酬，还帮助群众渡过春荒。后来，任老先生的学生学他的样，在政府帮助下办了十所这样的义务小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老先生几十年来的理想——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了。他知道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往后有不知多少新的任务要完成，有不知多少新的困难要克服。他没有停止脚步，相反的，步子迈得更快了。

任老先生十分重视政治学习，经常半夜起来，赶九十里地到县里听报告，还带动同事们一块儿学。学习“总路线”以后，任老先生知道只有大家努力工作，社会主义才能提前完成，他的工作劲头就更大了。有一回，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为了照顾任老先生的健康，给他少排了两节课，他就很不高兴，硬要补上两节。一九五五年春天，任老先生的学校修建教室，抽调了一位三年级的老师掌管修建工作；政府准备给学校请一位代理教师，但是任老先生不肯，硬要自己兼，每天上六节课。日子一久，他的精力不济了，一天，他在上课的时候突然晕倒。学生们把他扶起，要他休息，他不肯，坚持把课讲完。后来文教科知道了，一定要派代理教师，任老先生怕影响教学质量，怕增加经费开支，还是不答应。大家没办法，只好劝他累了就坐着讲。

任老先生有四十七年的教学经验，但是从不自满，总是感到自己的知识水平跟不上教学的需要，直到现在还不断地刻苦钻研业务。

任老先生善于“身教”，以身作则。所谓“身教”大概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为要达到某一目的，临时勉强而行；一种是纯任自然，并不存心“作则”，可是收到的“作则”的效果更大。任老先生的“身教”该属于后一种。有两件小事可以叙一下。有一个时期，学校里没有炊事员，任老先生天没亮就起来，打

扫办公室，给同事们烧洗脸水。同事们知道了，都觉得非更加努力不可。有一回，城里派来一位女教师，嫌宿舍不好，给她换了一间，还嫌不好。后来她发现伙房的炕上有两卷铺盖，知道任老先生跟炊事员就睡在那里，她再也不提换房间的事了。打扫办公室，烧洗脸水，睡在伙房的炕上，难道是存心要激励同事们吗？当然未必。可是同事们从这些小事上受到的教育将会终身忘不了。

看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分布在各种工作岗位上，个个努力，各有成就，这是所有老师最大的欣慰。任老先生教学四十七年，学生那么多，因而能充分感到这种最大的欣慰。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里，他的每个学生好比一个不可缺少的螺丝钉；而他自己呢，并没有退休，还跟他们一样，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螺丝钉：任老先生想着这些，自然乐不可支。他说："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在我们伟大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到处有我亲手教养起来的孩子。他们有的是解放军的战士，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有的是教师和中学生。他们都在为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忘我地工作。我常常接到他们的来信，向我报告他们在各方面的进步和成绩。读了这些来信，就更增加了我的劲头。我在写回信的时候，就向他们表示我的决心。这样一来，我和他们的感情永远融洽在一起。他们对我是非常关心的，经常写信问候我，关心我的健康，把最珍爱的礼物捎给我。海军战士任曾忠从广东把南方的特产菠萝捎给我、志愿军指导员王希功把慰问团送给他的最珍重的礼物四盒香烟捎给我，郑甲善从泰安把泰山芽枣送给我。同时他们十分信赖我。海

军战士王云德从宁波来信说，他准备和一个初中毕业的女学生订婚，问我是否合适。有的来信说：'老师，你已经快七十岁的人啦！家乡同学来信说你的身体不很健康，走路都得拄拐棍了。我们在校跟你学习的时候，知道你的生活很朴素。老师，现在国家经济条件已经好转了，你可不要再像从前那样了，应该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我在回信的时候，总是说我的身体很健康，用不着挂念我。只要你们听毛主席的话，努力工作比什么都强。"这些话恳切极了，这里头透露出他那乐不可支的心情。

今年二月间，任老先生被选为山东省的优秀教师，出席省优秀教师代表大会，现在又被选为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代表。当代表，出席大会，固然是荣誉，但是尤其重要的还在于交流经验，相互补益。任老先生当然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许多好处。别人从任老先生那里呢？四十七年来一直守着小学教师的岗位，在异常艰苦的日子里坚持下来，在欣欣向荣的新社会里，"愿意跟年青的教师们并驾齐驱，绝不示弱"：这种精神就大可以钦佩，大可以学习。岂但教育界的同志而已，干任何工作的都需要这种精神。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作

优秀的青年演员张辉同志

今年举行全国话剧会演，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演员。江苏省话剧团的张辉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辉当话剧演员的时间并不长。一九四九年，他在上海剧专学习。没有毕业，就参加了苏南地方文艺工作团。直到一九五三年江苏省话剧团建立，他才专业化。几年来，他先后扮演了《异邦暗影》里的谢尔盖，《赵小兰》里的赵老爹，《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里的伊戈尔，《家》里的高觉慧，《考验》里的徐达民，还有最近参加全国话剧会演的剧目《浪潮》里的陆茂成。他的表演都获得了观众的好评。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青年人在艺术上能够较快地有成就，总是跟政治进取心联系着的，政治上的逐步成熟，加快了他们在艺术上的进步。这一点在张辉身上表现得很明显。他创造角色能够获得成功，不是因为他在表演艺术上成熟了，有了一套了，而是因为他首先从政治上认识了艺术事业的重大意义，充分认清了自己的责任，树立了勤奋严肃的劳动态度。

张辉出身在一个贫农家庭里，小时候读过一些书，长大了就种田。他父亲眼看光靠种田活不下去，就叫他到外面去闯闯。于是他到上海当学徒。在上海看电影，开始爱好艺术，觉

得当个电影明星了不起，他就带着朴实坚韧的性格闯进了上海剧专，想凭自己的努力，成个电影明星，好出人头地。他学习很勤奋，但是上了舞台只是个平平常常的演员。当时舞台上绝少出现农民，农民出身的张辉没法理解戏剧里的那些角色，他扮演《黄花》里的花花公子，就一点儿也"花"不起来。直到解放以后，劳动人民成了舞台上的主角，张辉那样的人才能够发挥创造角色的才能。他在松江地委文艺工作团的时候，扮演《好榜样》里积极替军属代耕的老农民，就因为能够理解这个角色，创造了一个比较成功的形象。

演出《好榜样》是张辉同志参加土地改革以后的事。张辉同志带着扬眉吐气的贫农感情参加这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工作做得很好。回来以后，赶上文艺工作团排演《江南农民大翻身》，他扮演一个受苦受难的老贫农。他怀着参加土地改革那样的积极心情，创造这个老贫农的形象。在美帝国主义者的炸弹夺去了这个老贫农心爱的小孙女的生命那一场戏里，他为了表现老人的悲伤和愤怒，从京剧里学习打滚的动作。开始打不好，学习可很费劲，练一回就是一身汗。但是他不停地练，终于学会了，表演像样了。接着，他就以同样的劳动态度创造了《好榜样》里的老农民。

演出了这些戏以后，张辉觉得自己很不错了，想当电影明星的思想又抬头了，想凭个人来安排自己的前途了，个人主义的火焰燃起来了。就为这一点，他对《好榜样》里的老农民忽然怀疑起来，认为现实生活里不会有这样进步的农民，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思想上空虚了，对角色不能理解了，演不下去了。幸好碰上"三反"，"三反"给了他很深的教育。他

认识到自己虽然是劳动人民出身，也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已经妨碍了自己对角色的理解。于是他深切地领会，要创造先进角色，必须使自己成为先进人物。

他向这个目标努力，逐步取得了成绩。直到扮演《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里的伊戈尔的时候，他的进步比较明显了。几年来在政治上的进步使他充分理解伊戈尔的美好理想，使他相信伊戈尔这种人物是真实的。但是伊戈尔是个热情奔放的人物，张辉同志却是拘谨的，待人接物都不免有些儿腼腆。为了接近这个角色，他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努力跟青年学生交朋友，观察他们，向他们学习，逐步逐步地使自己的性格开朗起来。同时他又碰到另外一个困难。从参加《江南农民大翻身》的演出开始，他一向扮演老年人，习惯了很多老年人的舞台动作，这回排演的时候，这些老动作常常不知不觉地露出来。人家都笑他，说他演不好，可是他不泄气，一股劲儿苦练。就在别人笑着和自己苦练中间，他改变过来了，把伊戈尔这个角色演好了。

从《好榜样》到《曙光照耀着莫斯科》，张辉同志在角色的创造上有显著的进步。演《好榜样》里的老农民的时候，还只凭生活里的感性知识，并不是明确地有意识地去创造角色，一个戏演得久了，就觉得钻不进去，反而表演得油滑了。到扮演伊戈尔的时候，他意识到这种弱点，力求形象的完整和统一，经常琢磨角色的内心，不断地改进表演的情感和动作。他不再仅仅把生活里的感性知识“自在”地搬到舞台上去了，思想上也不再感到空虚了。

可见张辉几年来是循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在前进。但是到目前为止，他的表演能力还不能把自己所理解的完全演出来，当然，理解也不能说完全透了。他的表演，不虚假，朴实，真切，然而往往是一直线的，不够丰富多采。他在《浪潮》里扮演陆茂成，就不免有这样的缺憾。看他过去走过的路，可以断言他在将来会有更大的成就。

一九五六年五月八日作

增产酒精的能手

——记苏国进同志用黑霉菌制曲

一九五二年底，苏国进同志在浙江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济南酒精厂工作，在制曲车间当技术员。

济南酒精厂是我国目前最大的酒精厂，总分厂每天的原料要用白薯干二十几万斤。用白薯干做酒精，先把白薯干煮烂，加上曲，使白薯的淀粉变成糖，然后加上酵母，使糖变成酒精。制曲就是使霉菌在蒸熟的麸皮上繁殖。霉菌含着很多糖化酵素，能使淀粉变成糖。每天的原料二十几万斤白薯干，就得用曲三万多斤。

济南酒精厂里最主要的生产车间有两个：一个是发酵车间，就是把淀粉变成糖再变成酒精的车间；一个是制曲车间。发酵车间已经机械化了，制曲车间呢，几乎全部还用手工操作。苏国进同志想，许多酒精厂都注意酵母，认为酵母是酒精产量多少的主要关键，可是制曲也同样重要。要是霉菌在麸皮上长得不好，就不能使原料里的淀粉全部变成糖；糖少了，酵母虽然好，酒精的产量也不能提高。霉菌在生产的过程中，各个阶段需要不同的温度和湿度，用人工来调节不是件容易的事。并且工人也太劳累，制曲室又热又湿，常常跑出跑进，很容易害感冒，年头多了，还会闹关节炎。要改变这

种情况，非使制曲车间也机械化不可。

苏国进同志想，制曲室应该有自动调节温度的设备，应该用喷雾机和通风机调节湿度。一木盘一木盘的曲时常要上下翻动，在上的木盘调下来，在下的木盘调上去，这太费人工，应该用自动传送带代替木盘。他在学校里并没学过机械化制曲，费了不少心思，才把机械的草图画出来。正在这时候，他学习了总路线，明白了国家首先发展重工业，对一般轻工业，要求充分发挥现有设备的潜力，提高产量，积累资金。领导上也屡次向他说明国家的政策。照他的设计，现有十二个制曲室要全部重建，要花很多钱，这怎么成呢？他就抛弃了这一套不切实际的想法，开始帮助工人改进操作方法和劳动组织。

济南酒精厂制曲的操作原先是这样的：麸皮蒸熟和杀菌以后，拌了种曲（做种的霉菌）在制曲室里装入木盘，十几个木盘一叠，放在那里，曲做好了，一叠一叠的木盘搬到楼上去，把曲倒出来，让它干燥。每一个制曲室里都有两批曲，一批是半成品，一批是新制品。苏国进同志想，霉菌在生长的初期和后期，需要的温度和湿度不同，两批放在一起不是个好办法。工人把一叠一叠的空木盘搬下楼来，又把成品搬上楼去，太劳累了。制曲室的门一会儿开一会儿关，温度和湿度也不容易保持。他就改进操作方法。一个制曲室里只放一批曲，同时开始做，同时做好。做好的曲就在制曲室里倒出盘来，装入麻袋搬上楼去。这样一来，不但温度和湿度可以随着霉菌的生长适当调节，而且不用把木盘搬下楼搬上楼了。木盘的数量既可以节省一半，工人的体力劳动也大为减轻。又

因不必像以前那样常常跑出跑进，害感冒的人也减少了。制出来的曲，质量却比以前好得多。

苏国进同志又在增产方面动脑筋。他想，要使酒精增产，必须充分利用白薯里的淀粉。要充分利用淀粉，就得制出更好的曲，使淀粉差不多全部变成糖。他开始在霉菌的品种方面想办法。一般酒精厂制曲都用黄霉菌，济南酒精厂也用黄霉菌。黄霉菌有许多种。苏国进同志找二十几种黄霉菌来试验比较，看哪一种的糖化酵素力量最强，产酒精最多。最后找到了三种比较好的，但是跟当时厂里用的相差并不大。有一天，苏国进同志在苏联的《微生物学杂志》上看到一段消息，说苏联已经采用液体制曲了，就是让霉菌在液体里繁殖。他就想到厂里煮白薯干，采用了苏联的先进经验，加水的分量增加了一倍，结果很好。制曲为什么不可以学习苏联呢？液体制曲要有机械设备，目前还做不到，但是，除了这一点，难道就没有别的经验可以学习吗？他就到处搜寻苏联制造酒精的技术资料。但是在书店里，讲酒精工业的书几乎没有，找了好久，才找到一本原文本的苏联克里蒙夫斯基所著的《酒精制造工艺学》。

这时候，苏国进同志自修俄文没有多久，还看不懂原文本的书。他想，等学好了俄文再看，怎么来得及呢？生产任务这样紧，一定要想办法把书看懂。他就拿了本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查，把一句话里的生字全查出来了，然后揣摩全句的意思。这样看书当然很吃力，但是他相信在这本书里一定可以找到提高生产的方法，无论如何要硬着头皮把霉菌这一章好好看下去。他一天也不间断，一页一页地往下看，终

于找到了获得优良霉菌的方向。书上说，用黑霉菌制曲比用黄霉菌好。黑霉菌的糖化酵素能耐热耐酸，力量也强。苏国进同志像发现了宝藏似的，连忙把讲黑霉菌的一段全部查明白、读清楚，还从别的书和杂志上找到了一些关于黑霉菌的资料。经过了仔细的研究，他要求领导让他做实验试一试。领导支持了他的要求。

厂的领导写信给北京的科学院菌种保藏委员会，要来了黑霉菌。他先做小型试验。黑霉菌也曾经有人用过，但是不曾交流过经验，找不到黑霉菌制曲的记录。苏国进同志只有从头做起，暗中摸索。一连两次都失败了，不知道为什么黑霉菌制曲老是长不好。这时候正是新年，苏国进同志也顾不得玩了，埋着头在家里查看有关的资料，跟两次失败的记录作比较。他发现他用了培养黄霉菌麸曲的方法培养黑霉菌麸曲，忽略了黑霉菌的特性。黑霉菌在生长的时候，需要的温度和湿度都比黄霉菌高。过了新年，他又开始实验，提高了温度，又加多了水分。这样一来，黑霉菌果然在麸皮上长得很好。他就用这黑霉菌跟黄霉菌做比较试验，结果是用黑霉菌曲比用黄霉菌曲，发酵含酒量一般要高千分之三到四。接着又做了五次试验，成绩都不错，有一次提高了百分之十。

一九五五年，济南酒精厂的生产任务很重，上级不但要求这个厂完成国家计划，还要求在不增加原料的条件下增产酒精一百五十吨。开头两个月，厂里的生产情况不很好，都没有完成计划。全厂人人都着急。因此，领导上更重视苏国进同志的研究，见他的试验初步成功了，马上作出决定，要求全厂支持他试验制曲，还给他研究的时间和必要的设备，拨

给他一间房间。在普通房间里制曲，跟在玻璃瓶里种曲培养，情形又大不相同。在玻璃瓶里种曲室里，温度容易控制，室湿度不大会改变，空气里的杂菌也不容易进去。在房间里，不但温度难以保持，水分也容易蒸发，空气里的杂菌更没法提防。苏国进同志没有考虑到这些，以为在玻璃瓶里种曲室里试验已经成功，再不会有什么困难了。不料试做了四次，一次也没有成功。做出来的曲好像死面块，很结实，只在表面上有一点儿白色的菌丝，心子里全都发了灰。有人就说："小量试验还没有把握，大量生产的时候更加不容易控制了。还不如照旧用黄霉菌来得好！"

苏国进同志很苦闷，他怕将来大量生产，困难会更多，会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失。加上他一连紧张了十几天，精神很疲倦，信心不免有点儿动摇。但是一转念间，他觉得决不能辜负领导和群众对他的期望，给他的鼓励。黑板报正在督促他呢："苏国进同志，大家等待你最后成功！"他的青年助手张秉齐给他谈山东新华制药厂王志强研究搪玻璃的经过，说："王志强失败了二百多次才得到成功。咱们只失败了四次，算得什么？"厂长派了几个有经验的工人帮助他。党委书记还找他谈话，鼓励他坚持试验，说："碰到困难，更要拿出勇气来。你可以跟工人同志商量商量。"这句话把苏国进同志提醒了，"对啊，我只管一个人埋头钻研，为什么不找大家商量商量呢？问题很明显，还在温度和湿度上。我得跟大家商量商量，用什么方法来保持温度，提高湿度。"

苏国进同志就主动地找有经验的工人和有关技术员商量。黑霉菌需要的水分多，水分少了，繁殖就慢。繁殖一慢，

生长一不旺盛，室内的温度很容易下降。于是打开暖气管来提高温度。但是暖气管一开，温度一提高，室内更加干燥了，黑霉菌更加长不好了。工人张秉齐向苏国进同志提出建议，在制曲之前，麸皮里加水的分量还要多。当时苏国进同志已经给每斤麸皮加十一两水，张秉齐说不妨试一试，每斤麸皮加十二两水，看结果怎么样。苏国进同志采纳了这个建议。室内温度下降的时候，他们就把蒸汽直接喷进去，不开暖气管加温。他们又在墙上喷水，地上洒水，充分保持空间的湿度。在这样的安排下，试验居然成功了，做出来的曲又松又软，简直像鸡蛋糕似的，里里外外都发黑，表明黑霉菌在麸皮上长得非常好。于是在发酵车间工人的配合下做了三次四百斤原料的酒精发酵试验。三次试验的结果，淀粉产酒率达到百分之五十四点四(以白薯干和麸曲所含的淀粉来计算)，不但比用黄霉菌产量高，而且超过了国家计划指标。

用黑霉菌制曲终于试验成功了，领导上马上决定大量生产。这时候已经是五月底，天气很热，空气干燥。苏国进同志采纳工人张乐林的建议，在曲上喷水，保持湿度，曲照样做得很好。六月四日，发酵车间开始正式用黑曲生产，四天以后，第一缸酒精做出来了，每一百斤淀粉产酒精五十三点一九斤，超过厂里的增产节约计划指标一点一六斤。苏国进同志这才松了一口气。从前年11月到这时候，从用小试管培养黑霉菌到产出第一缸酒精，他一共忙了七个多月，大大小小的制曲和酒精发酵的试验一共做了四十八次。他回想这七个多月间，有好几次几乎放弃了试验，幸亏党和领导经常教育他，支持他，群众不断鼓励他，帮助他，他才坚持下来，得

到成功。但是用黑霉菌制曲酿造酒精还只是开始，经验还不够，把握还不大，许多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他想，只要听党的话，在工程师指导之下，虚心学习，时常跟工人和技术人员共同研究，时常得到科学院菌种保藏委员会的帮助，这些问题一定能够一个一个解决的。

济南酒精厂用黑霉菌酿造酒精，仅仅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四个半月里，除保证国家计划的完成外，还在不增加原料的条件下增产酒精一百五十三吨半，节约白薯干四十六万多公斤，为国家创造财富二十万五千多元。现在全国有许多酒精厂也采用了黑曲，虽然黑曲的质量还比不上济南酒精厂，但是比较用黄曲的时候，淀粉产酒率都提高了不少。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二日作

也要说说乐趣

向科学进军！这个号召提出以后，我们听见过好多回讲说，看见过好多篇文章，鼓励大家奋勇前进。

多数的讲说和文章往往说些大道理。个人跟国家的关系怎么样，科学工作跟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怎么样，必须充实自己才能对祖国有所贡献，诸如此类。还有呢，恐怕预备进军的人遇见困难立刻低头，先对他们说些不要怕困难啊，没有一门科学是容易的啊，惟有能够战胜困难的人才会成功啊，诸如此类的话，让他们有个精神准备，积蓄些战胜困难的勇气。

大道理诚然要讲，讲了才能叫人家明了科学工作的目的和任务。搞科学工作诚然不容易，谁要是认为向科学进军跟公园里去散一回步一样稀松平常，他就非马上向后转不可，预先给提明一声也确有必要。可是，我以为光说这些个还有点儿不够似的。

为什么不说一说搞科学工作的乐趣呢？大至天体，小至原子核，物质的运动和分合，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各有一定不移的规律。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跟自然界各方面一样，也各有一定不移的规律。这些规律，已经发见的当然很多，还待人们去发见的也还不少。谁能够发见这些规律里的一条两条，固然了不起，即使发见不了，只要能够掌握这些

规律，也是很高很大的乐趣。掌握了这些规律，就是真正懂得了这些事物，这种乐趣岂是寻常所谓趣味所能比的？从掌握了这些规律再进一步,就可以利用这些规律为人类造福。驱遣万事万物，可是绝不为一己的私欲，这种乐趣可以说是最高最大的了。在能够掌握规律以前，要做许多研究工作，研究的阶段不会没有困惑，可是，每逢打破一重困惑，同时就享受到一种乐趣。一批材料找到了，一条思路想通了，一个设计拟定了，一种假设证实了……这些时候都会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乐趣。这种乐趣引起继续前进的勇气，明知还有新的困惑挡在前边，可决不想回头。搞科学工作的乐趣，可以说的太多了，既然鼓励大家向科学进军，为什么不说一说呢？

也许是“趣味主义”这个名儿的影响吧，只怕说了些乐趣啊什么的话，就会取得一项“趣味主义”的帽子。诚然，讲乐趣也可以说就是讲趣味，可是讲趣味也该分别开来看。不管目的和任务，眼光只注在趣味上，这是“趣味主义”。不领略某一事物本身所有的趣味，只是浮光掠影地检一些不相干的东西，认为大有趣味的“噱头”，这也是“趣味主义”，而且是庸俗透顶的“趣味主义”。如果情形跟前边说的都不同，那就不该戴“趣味主义”的帽子，谁拿这帽子戴上来，尽可以原璧奉还。

不妨看看学校里教学科学基础知识的情形，也不妨看看通俗书刊传布科学基础知识的情形。这两方面差不多是一样的，如果离开了科学知识本身，外加一些“噱头”，希图来点儿趣味，那对于学生或读者毫无益处，并且有害处——因为

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如果把科学知识讲得很呆板，也就是通常所谓公式化，应讲尽讲，可是缺少那股劲儿，缺少想象力和逻辑，那也会使学生或读者松懈下来，或者还要懒懒地想，原来科学是这么乏味的东西！必须依据科学知识的系统，作恰如其分的启发，使学生或读者随时有所领会，又随时觉得非立刻进一步追求不可，那才是善于利用科学本身固有的趣味，那才能给学生或读者永远的鼓舞。对于最后一种情形，我们说，这才做好了教学工作或编辑工作。

宣传向科学进军，如果能就科学工作本身，深入浅出地，亲切生动地，多说些搞它的乐趣，对于预备进军的人将是极强的劝诱。前边有这么个美妙的境界在，就是不为什么也要去，何况上前去有伟大的目的和任务。前边有这么个美妙的境界在，一路上有些困难就算不了什么，要上前去自然得战胜所有的困难。预备进军的人这么想的时候，他们就勇气百倍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作

一定要回答这个挑战

苏伊士运河回到埃及人民手里以后，三个月来，航运毫无阻碍。此刻听到广播消息说，苏伊士运河航运中断了。是谁阻碍了运河的航运？是英、法两国政府。

几年以来，中东一带和平空气越来越浓厚，这对全世界人民都有好处。此刻炸弹落在平静的地中海岸边，战火燃烧起来了。是谁破坏了中东的和平？是英、法两国政府。

过去法西斯国家发动侵略，还得强词夺理，找个借口。现在英、法两国对埃及的武装进攻，连强词夺理的"强词"也没有。它们的行动老老实实告诉全世界：它们甘愿跟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敌。全世界的人民讲道理，要和平，它们可不讲道理，破坏和平。它们像侵入人家家屋的强盗一样，只为要劫掠，它们就侵略埃及。

这是对全世界人民的挑战，全世界人民一定要回答这个挑战。首先是尽力制止英、法两国对埃及的武装进攻。要是英、法两国执迷不悟，就让它们在正义和事实面前上更严重的一课，体会到强盗行径的后果到底怎么样。

正义在埃及方面。全世界人民在埃及方面。胜利必然在埃及方面。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作

“以 文 会 友”

——记亚洲作家会议

许多国家的作家聚在一块儿开会，正像我国古话所说的“以文会友”，这种事从来不曾有过，这回亚洲作家会议是历史上头一回。

好些人在报告里或是发言里都说，亚洲作家会议召开，不说别的，这件事本身就有极重大的意义。这是人人都感觉到的，所以说出来不约而同。

派出代表的是亚洲十五个国家。这十五个国家共有多少人口呢？一十二亿。代表们的肤色、语言、见解、信仰各各不同，可有个共同之点，他们都乐于跟到会的朋友切磋琢磨，使自己的心和手更为高妙，更能传达出同胞的心声——他们的欢乐、哀愁和愿望。

不仅如此。欧洲、澳洲、北美、南美也都有观察员参加这个会议（苏联亚洲部分的共和国派出代表，欧洲部分就派观察员，西蒙诺夫是观察员之一）。虽说是亚洲作家会议，“以文会友”的范围也不限于亚洲。作家们见了面，语言未必相通，有时一道翻译不济事，要翻两道，然而彼此都感觉非常亲切，像遇见了老朋友。一个说他写小说，另一个说他写戏剧，或者一个说他写诗，另一个说他也写诗，这时候，对工作的庄

严感和责任感集中在同一焦点，彼此的心团结在一起了。作家们的团结必然加强人民的团结，意义岂不重大？

会议里又常有人提起“亚洲的觉醒”的话，这可以说明为什么没有别洲的作家会议而首先有这个亚洲作家会议。几世纪以来，亚洲的许多民族许多国家遭到相同的命运，让外来的势力压制住了。到现在，大家都摆脱了这种压制，用我国习用的话说，就是大家站起来了。所谓觉醒，不是说以前一直沉迷不醒，要把它认作站起来的同义词才恰当。要是以前真个沉迷不醒，怎么忽然间都会站起来呢？站起来了，百端待理，其中就有文学一项。这儿说的“理”不仅是整理，更重要的是让它发荣滋长。文学曾经是站起来的一种因素，今后要站得稳定，站得坚强，尤其需要这种因素。大家抱着让文学发荣滋长的愿望，自然感觉“以文会友”是非常切要的事了。

在会议里，各国代表都报告他国内或是他那种语言的文学的现况。此外是四个专题——亚洲的传统，作家和自由，作家和他的事业，文化交流，由代表们分成四个小组讨论。会议的目的既然在“以文会友”，各自谈谈文学的现况是必要的。过去由于语言隔阂和人为的种种阻障，彼此不相了解。现在谈出来，听的人都觉得新鲜，增长了知识。一种语言的印度代表谈他那种语言的文学，别种语言的印度代表也有说是闻所未闻的。在这一国和那一国之间，当然更有这样的情形。互相了解之后，才能够谈到切磋琢磨，互学所长。专题里边有文化交流一项，也是为的增进互相了解，达到互相吸收。

这个会议里谈到亚洲的传统，是极容易理解的。站起来了，当然要估计估计自己的家业，看它的价值有多大，它对

于今后的新生活将起多少作用。有人用比喻的说法说道，以往我们的窗户光朝西方开，现在也得朝东方开。朝东方开窗户，就是注重亚洲的传统的意思。矫枉过正的想法也有人谈出来，以为窗户就只要朝东方开，我们亚洲的传统全都是宝贝，必须完全恢复那些传统才行。这种"思古之幽情"应该得到人家的谅解，然而并不切合实际。多数人的见解是，我们懂得珍爱亚洲的传统，它的精华的部分，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让它跟新生活结合起来。对于西方的传统，也就是这么个态度。总而言之，不能让传统成为拘束我们的东西，我们为要创造更好的东西，所以要从各种传统里吸取养料。

自由和作家，这是大家非常关切的一个题目。作家有没有自由？作家为什么而写作才是自由，为什么而写作就是不自由？作家该怎么样争取自由？该争取什么样的自由？由于对自由的认识并不一致，大家对这些问题各有各的看法。这是当然的。可是我在这儿有一种预感，作家们多多接触，彼此增进了解以后，也不必定出什么共同纲领或是共同原则，自然而然会走上大致相同的道路。什么样的道路呢？就是创作务求以人民的生活为源泉，真实地写出人民的欢乐、哀愁和愿望。作家本是人民中间的一个，只要他跟人民同其呼吸，自己的心声也就是人民的心声，写出人民的也就是写出自己的，这岂不是极大的自由？同时他将深切地感觉到，如果拘守什么传统、教条或是纯粹的形式，那就是极度的不自由，因为这跟人民的生活不大有关系或者毫无关系。

我怎么会有前边说的那种预感呢？我从大家聚在一块儿开会这件事上得到那种预感。"以文会友"，存其异而求其同，

势所必至会同在我所说的那条道路上。

这一篇只是简略的叙述和个人的感想。会议讨论的结论，缓日再来报道。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作

收集本地的文物

四月上旬来杭州，看见浙江博物馆内展览海宁钱镜塘先生捐献的有关海宁的文物，就进去参观。钱先生捐献的东西极多，博物馆只辟了两室来陈列，是选取一部分的精华。书画卷轴上盖着钱先生的收藏章，“卅年精力所聚”，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钱先生用心多么专，用力多么勤。我对古物考证和书画鉴赏一类事儿完全外行，可是在两间展览室里看了大约两个钟头，自己觉得颇有所获。一则是我在我认为好的那些书画前边站这么三五分钟，眼里舒服，心里愉快。二则呢，我没到过海宁，只有几位海宁朋友，现在看了这些展览品，加深了我过去对于海宁的印象。

收集本地的文物，用心跟钱先生一样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可是，我以为在现在这时代，这件事应该普遍地做，就是说，最好各县都做。有价值的文物各县都有，不引起注意，该保存的毁掉了。一毁掉就再没有这件东西，所以收集保存越早越好。既然要普遍地做，这件事应该由团体或是机关担负起来，不能光靠个人，尤其不能等待可称为“有心人”的个人。海宁有钱先生固然好，某一个县里没有钱先生那样的人，要等待钱先生那样的人出来才做，等到什么时候呢？团体或是机关是个集体组织，是常存的，只要把收集本地文物

定为一项工作，认真地做，总会有成绩。团体或是机关里人员不多，管这项工作的也许只有一个人，而且是兼管，这个人未必能懂得包括在文物范围内的许多事儿，也可能各方面都不大了然。然而不妨，只要这个人看重这项工作，肯虚心请教，本地和外地可以请教的人是很多的。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上穿条绳子汇个总，事情就办起来了。

近来很有人提起，以往修志书的事应该继续做，这项意见值得重视。只要在取材的范围、编辑的体例各方面多作研究，编出志书来，既可使各地的一切方面将来有文献足征，又可不犯以往有些志书那样的泛滥无归、繁而寡要的毛病，这样的志书确实需要。现在说的收集本地文物，意义跟修志书相近。这可以说是志书的一部分，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无论就参考价值和教育价值说，都比光有文字记载的志书来得大。

收集本地文物的工作如果开展起来，做法当然不能跟过去的收藏家完全相同。器物不必务求其古，书画不一定要大名家，凡是能够增长对本乡本土的认识的，能够激起对本乡本土的感情的，都可以择要收集。现在有些城市有专辟馆室陈列革命史料的。要是地方上没有专辟馆室的条件，那么有关革命的文物应当尽量收集，在不怎么广大的一间两间陈列室里，跟古器物、好书画一块儿陈列。各地往往有些好学的人，终身研究某种学问，写成著作，或者长于词章，文稿诗词有好几卷，人去世了，稿子留下来，子孙或许不知道爱惜先世的心血，很容易随便糟蹋了。这类稿子应当特别注意收集。如果价值比较高的，自然要设法把它出版。其中价值不

太高，可是并非毫无意义的，就该保存在地方上，让地方上人看见这些稿本，知道本地有这么些人在学术艺文方面下过工夫，动过脑筋。其他有关经济史料的，如比较老旧的账簿，行会组织和水利兴修的碑记文类，字写得很不好，撰文的人绝非知名之士，可是也有收集的价值。

我曾经在浙江博物馆门前站住大约一刻多钟，其时博物馆开放时间还没到，从售票处小窗前起，排着一长串等待买票的人，极大多数是来杭州游春的农民，挂着“朝山进香”的黄布袋的乡间老太太。看见这个景象，我心里很感动。各地农民能来杭州游春的，乡间老太太能来杭州烧香的，究竟是少数，换句话说，能在浙江博物馆门前买张票跑进去看看的，究竟是少数。那大多数抱着看看的欲望可是不能跑来看看的，应该让他们得到起码的满足。不一定要给他们看商周的鼎彝，四王的真迹，首先让他们看一些本乡本土的东西，这使他们感到特别亲切。因此，我写下这篇短文，希望各地都来收集本地的文物，成立个规模很小的陈列馆或是仅有一间两间的陈列室。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八日作

公文写得含糊草率的现象应当改变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今天我只说一个意思，希望机关团体注意所发的各类公文。公文不一定要好文章，可是必须写得一清二楚，十分明确，句稳词妥，文体通顺，让人家不折不扣地了解你说的是什么。

我常觉得有不少的公文不能做到这一点。插一句，我说的是不少的公文，不是所有的公文。那些公文写得含糊草率，人家能大致了解它说的是什么，可是不能不折不扣地了解，还得自己去揣摩。

不妨想一想所以要发公文的用意。发一件指示，说的如果是方针政策，那就是要看指示的人了解这个方针政策。发一份通知，说的如果是具体办法，那就是要看通知的人知道如何照这个办法去实施。此外如写请示报告工作总结之类，无非要叙明主要的情况，从中归纳出一些经验教训，商量或确定以后工作的途径和方法。这些公文能含糊草率吗？一含糊，一草率，人家就可能这样了解，也可能那样了解。换句话说，一含糊，一草率，就伏下了错误了解的根。可是方针政策绝对不能让人家错误了解，具体办法也不能让人家错误了解，错误了解的后果总是实际工作上的损失，而且决非小

损失。因此，明确通顺是极端必要的。

要做到明确通顺，必须把意思想清楚。没想清楚，即使是文章大家也做不到明确通顺。想清楚了，公文的组织结构自然就是意思本身的组织结构，这才能做到有条有理。想清楚了，哪一段哪一句该怎么样说，该用怎么样的语气和词儿说，自然都有数了，这才能做到造句遣词各得其当，这样明确通顺的公文，才能让人家不折不扣地了解。

我说有不少的公文不能做到明确通顺，很抱歉，我没法在这儿举实例，多举太麻烦，举少了又挂一漏万。我只能说一说那些公文的一般情形。那些公文大都条理很乱，思路纷歧，前后不连贯。换句话说，那些公文逻辑性很差，不像算式那样，一步顶一步推演下去，毫不含糊。应该在头里说的，放到中段去说了。前边说过了的，后边又说了，而且说法跟前边有些出入了。完全不需要说的，也无根无据地说进去了。前边明明交代分三项来说，说到后边，却只剩两项了，而且两项的次序颠倒了。诸如此类的情形都是条理方面的缺点。其次，那些公文大都把意思随便纳入已成熟套的语句形式，不肯努力找出表达这个那个意思最恰当的语句形式。这样办，省事固然省事，却损害了意思，形成公式化。造句造词是极度地自由，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考虑适当不适当，用得上用不上。指的是同一对象，在一件公文里竟用上好几个不同的名称。虚词，条件词语，形容词语，用得非常慷慨，以多为胜。有时候却又非常吝啬，一个非用不可的“的”字或“了”字也舍不得用。诸如此类的情形使公文的语句违背了语法修辞逻辑的规律。

这样的公文算不得好文章是当然的。算不得好文章，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想到方针政策的贯彻，具体办法的实施……关系就大了。人家看了这样的公文，要是了解得不透彻，甚或得到错误的了解，那是多么严重的事啊！

就表面看，公文不能做到明确通顺，似乎只是能力问题，笔下不济事，自然写不好。其实这里头还伏着个认识问题，就是说，对于公文的作用和要求，看法不怎么妥当。那种看法认为只要头脑里想得差不多就成，至于怎么样表达出来，把它固定在公文上，不妨随便。不知道无论你头脑里想得怎么样，在没有说出来或写下来的时候，人家绝对没办法了解。人家除了当面听你口说而外，只有凭借你写在公文上的书面语言，才能了解你头脑里想的是什么。写在公文上的书面语言好比一道桥梁，而且是唯一的桥梁。公文的作用既然如此，对于公文的要求就不能不严格，必须确切地表达出头脑里所想的，不折不扣，恰如其分。那种看法刚刚相反，不看重公文的桥梁作用，对于表达不作严格的要求，以为不妨随便，我说它不怎么妥当，原由就在此。听说有少数几位同志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怎么写都成，没关系，下边总能够体会咱们的意思。"这就是那种看法的实例。

由于看法不怎么妥当，从起稿到定稿就有如下的情形。按理说，一件公文，应该在考虑到成熟的时候起稿，应该由了解得最透彻想得清楚的人执笔。在那样的时候由那样的人执笔，形式跟内容大致能够相符，再加上些斟酌损益的工夫，很容易达到相当完善的地步。可是有不少的公文，还没到那样的时候就起稿，执笔的并不是那样的人。他们了解不够，

想不清楚，只因任务交了下来，不能不硬着头皮执笔。稿子起好之后，当然要经过好几回讨论和修改。可是初稿已经把格局规定了，如果格局不怎么像样，尽你加工也很难使它完善，还不如另起炉灶。另起炉灶不免麻烦，为了省事，还是在初稿的基础上加点儿工，将就过去。这是一种情形。还有，公文稿在传阅研究的时候，有的人在上边签点意见，有的人就动手修改，加上几句，删掉几句，改动几个字，或者把原文勾来勾去。要是个个人都有全面观点，在一处地方提意见或在一处地方改动，都能照顾到全篇，照顾到别人的意见或改动，那当然没问题。可是能够这样做的人并不多，多数是只顾局部，忽略全篇，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最后整理的人可苦了，他要把这个人那个人的意见或改动都容纳进去，至少要尽量照顾到，真比缝一件百衲衣还难。这又是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形，公文稿经过好些人提意见或改动之后，不再仔细整理，只把可以采纳的意见吸收了进去，就此缮印发出。在以上三种情形之下定稿的公文，质量不会怎么高是注定的。

要提高公文的质量，首先要解决发公文的人的认识问题。解决认识问题也不难，只要记住一句话：人家了解你的方针政策具体办法之类全凭写在公文上的书面语言，所以书面语言马虎不得。其次，公文从起稿到定稿的过程应该注意。要在考虑到成熟的时候由最适当的人执笔，好些人参加斟酌损益，人人要就全篇着想。又其次，凡是触及公文稿的人要在语法修辞逻辑各方面用点儿功，不光是看些书本，尤其要注重实践。这也是写好公文的必要条件。

公文在实际工作中既然是非要不可的东西，就得把它写

好。要求把公文写好决非文牍主义，随随便便写公文发公文才是文牍主义。说到发公文，我以为应该按照通常应用的“可×可不×，不×”的公式办事，可不发的就不发。如果可不发的也发，非但徒乱人意，而且妨碍实际工作。文牍主义被认为不好的主义，这是原因之一。

随时随地为别人着想，是新社会的一个道德条目。要求把公文写好，是为工作着想，也是为看公文的人着想。这本来是分不开的，必须让看公文的人了解得清楚透彻，工作上才会有好处。说到为看公文的人着想，还有些小节目可以说的。譬如，为了节省看公文的人的精力和时间，公文就该尽可能写得简而得要。一层意思可以用两种说法表达，一种明快，一种晦涩，就该采用明快的一种。考虑到繁复的句子形式可能引起人家的麻烦，就该把它化开，化成并不损害原意的几句。考虑到哲学书籍上的那些词语，仅仅流行在小范围内的那些“行话”，人家不太熟悉吧，人家可能发生误解吧，就该尽量少用，到非用不可的时候才用。诸如此类的做法，对于看公文的人有好处，对于工作当然也有好处。

到这儿，我的意思说完了，敬恳各位代表指教。如果各位代表认为有些中肯，就请大家来鼓吹和实践，注意有关的机关团体所发的各类公文。

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发表

记金华的两个岩洞

今年四月十四日，我在浙江金华，游北山的两个岩洞，双龙洞和冰壶洞。洞有三个，最高的一个叫朝真洞，洞中泉流跟冰壶、双龙上下相贯通，我因为足力不济，没有到。

出金华城大约五公里到罗店。那里的农业社兼种花，种的是茉莉、白兰、珠兰之类，跟我们苏州虎丘一带相类，但是种花的规模不及虎丘大。又种佛手，那是虎丘所没有的。据说佛手要那里的土培植，要双龙泉水灌溉，才长得好，如果移到别处，结成的佛手就象拳头那么一个，没有长长的指头，不成其为“手”了。

过了罗店就渐渐入山。公路盘曲而上，工人正在填石培土，为巩固路面加工。山上几乎开满映山红，比较盆栽的杜鹃，无论花朵和叶子，都显得特别有精神。油桐也正开花，这儿一丛，那儿一簇，很不少。我起初以为是梨花，后来认叶子，才知道不是。从山之中有几脉，山上砂土作粉红色，在他处似乎没有见过。粉红色的山，各色的映山红，再加上或深或淡的新绿，眼前一片明艳。

一路迎着溪流。随着山势，溪流时而宽、时而窄，时而缓，时而急，溪声也时时变换调子。入山大约五公里就到双龙洞口，那溪流就是从洞里出来的。

在洞口抬头望，山相当高，突兀森郁，很有气势。洞口像桥洞似地作穹形，很宽。走进去，仿佛到了个大会堂，周围是石壁，头上是高高的石顶，在那里聚集一千或是八百人开个会，一定不觉得拥挤。泉水常着洞口的右边往外流。这是外洞，因为那边还有个洞口，洞中光线明亮。

在外洞找泉水的来路，原来从靠左边的石壁下方的孔隙流出。虽说是孔隙，可也容得下一只小船进出。怎样小的小船呢？两个人并排仰卧，刚合适，再没法容第三个人，是这样小的小船。船两头都系着绳子，管理处的工友先进内洞，在里边拉绳子，船就进去，在外洞的工友拉另一头的绳子，船就出来。我怀着好奇的心情独个儿仰卧在小船里，遵照人家的嘱咐，自以为从后脑到肩背，到臀部，到脚跟，没一处不贴着船底了，才说一声“行了”，船就慢慢移动。眼前昏暗了，可是还能感觉左右和上方的山石似乎都在朝我挤压过来。我又感觉要是把头稍微抬起一点儿，准会撞破了额角，擦伤了鼻子。大约行了二三丈的水程吧（实在也说不准确），就登陆了，那就到了内洞。要不是工友提着汽油灯，内洞真是一团漆黑，什么都看不见。即使有了汽油灯，还只能照见小小的一搭地方，馀外全是昏暗，不知道有多么宽广。工友以导游者的身分，高高举起汽油灯，逐一指点内洞的景物。首先当然是蜿蜒在洞顶的双龙，一条黄龙，一条青龙。我顺着他的指点看，有点儿像。其次是些石钟乳和石笋，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大都依据形状想象成仙家、动物以及宫室、器用，名目有四十多。这是各处岩洞的通例，凡是岩洞都有相类的名目。我不感兴趣，虽然听了，一个也没有记住。

有岩洞的山大多是石灰岩。石灰岩经地下水长时期的浸蚀，形成岩洞。地下水含有碳酸，石灰岩是碳酸钙，碳酸钙遇着水里的碳酸，就成酸性碳酸钙。酸性碳酸钙是溶解于水的，这是岩洞形成和逐渐扩大的缘故。水渐渐干的时候，其中碳酸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气跑走，剩下的又是固体的碳酸钙。从洞顶下垂，凝成固体的，就是石钟乳，点滴积累，凝结在洞底的，就是石笋，道理是一样的。惟其如此，凝成的形状变化多端，再加上颜色各异，即使不比做什么什么，也就值得观赏。

在洞里走了一转，觉得内洞比外洞大得多，大概有十来进房子那么大。泉水靠着右边缓缓地流，声音轻轻的。上源在深黑的石洞里。

查《徐霞客游记》，霞客在崇祯九年(一六三六)十月初十日游三洞。郁达夫也到过，查他的游记，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达夫游记说内洞石壁上"唐宋人的题名石刻很多，我所见到的，以庆历四年的刻石为最古。……清人题壁，则自乾隆以后绝对没有了，盖因这里洞，自那时候起，为泥沙淤塞了的缘故"。达夫去的时候，北山才经整理，旧洞新辟。到现在又是二十多年了，最近北山再经整理，公路修起来了，休憩茶饭的所在布置起来了，外洞内洞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去的那一天是星期日，游人很不少，工人、农民、干部、学生都有，外洞内洞闹哄哄的，要上小船得排队等候好一会儿。这种景象，莫说徐霞客，假如达夫还在人世，也一定会说二十年前决想不到。

我排队等候，又仰卧在小船里，出了洞。在外洞前边休

息了一会儿，就往冰壶洞。根据刚才的经验，知道洞里潮湿，穿布鞋非但容易湿透，而且把不稳脚。我就买一双草鞋，套在布鞋上。

从双龙洞到冰壶洞有石级。平时没有锻炼，爬了三五十级就气呼呼的，两条腿一步重一步了，两旁的树木山石也无心看了。爬爬歇歇直到冰壶洞口，也没有数一共多少级，大概有三四百级吧。洞口不过小县城的城门那么大，进了洞就得往下走。沿着石壁凿成石级，一边架设木栏杆以防跌下去，跌下去可真不是玩儿的。工友提着汽油灯在前边引导，我留心脚下，踩稳一脚再挪动一脚，觉得往下走也不比向上爬轻松。

忽然听见水声了，再往下没有多少步，声音就非常大，好像整个洞里充满了轰轰的声音，真有逼人的气势。就看见一挂瀑布从石隙吐出来，吐出来的地方石势突出，所以瀑布全部悬空，上狭下宽，高大约十丈。身在一个不知道多么大的岩洞里，凭汽油灯的光平视这飞珠溅玉的形象，耳朵里只听见它的轰轰，脸上手上一阵阵地沾着飞来的细水滴，这是平生从未经历的境界，当时的感受实在难以描述。

再往下走几十级，瀑布就在我们上头，要抬头看了。这时候看见一幅奇景，好像天蒙蒙亮的晨光正下急雨，千万枝银箭直射而下，天边还留着几点残星。这个比拟是工友说给我听的，听了他说的，抬头看瀑布，越看越有意味。这个比拟比较把石钟乳比做狮子和象之类，意境高得多了。

在那个位置上仰望，瀑布正承着洞口射进来的光，所以不须照灯，通体雪亮。所谓残星，其实是白色石钟乳的反

光。

这个瀑布不像一般瀑布，底下没有潭，落到洞底就成伏流，是双龙洞泉水的上源。

现在把徐霞客记冰壶洞的文句抄在这里，以供参证。“洞门仰如张吻。先投杖垂炬而下，滚滚不见其底。乃攀隙倚空入。忽闻水声轰轰，秉炬从之，则洞之中央，一瀑从空下坠，冰花玉屑，从黑暗处耀成洁彩。水穴石中，莫稔所去。乃依炬四穷，其深陷逾朝真，而屈曲少逊。”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作

祝贺新年

祝贺新年的话不必多说，但是不可不说。一九五八，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国内人民亲身参加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亲眼看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绩，都精神百倍，信心十足，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里更多地贡献自己的心力。侨胞住在国外，各干各的事业，未必都能跟五年计划直接发生联系。但是由于对祖国的热爱，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侨胞的期望和欢欣一定跟国内人民一样地殷切和强烈。让我们互祝健康吧——祝彼此身体的健康，祝彼此心的健康！身体和心的健康是从事一切事业的基础！

在国内，每天看报听广播是很大的快乐。某省农业生产提高多少了，某省水利工程增加多少了，某地又发现大量矿源了，某处又产生先进经验了，什么厂开始兴工建设了，什么厂已经投入生产了，诸如此类的消息，一点不夸张，可以说每天都有。如果到各处去跑跑，那更是很大的快乐。原来荒瘠的原野变为农田了，往日渺无人烟的地区出现工业城市了，当年的童山换上葱绿的新装了，新开的沟渠水库在田野丘陵间闪闪发亮了，诸如此类的景象使你禁不住一阵嚷嚷："全变了，全变了，变得那么快，看一回换一个样儿！"快乐就

从这儿来。政府领导和规划，全国人民都拿出力量来，才八年工夫已经有这样的成绩，再来八年，十年，二十年……成绩一定比想象得到的还要伟大，岂不是快乐？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哪一朝哪一代曾经为国家为人民全面地动过脑筋，花过力气？唯有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人民当了家，才能齐心协力，互相配合，有条有理，有计有谋，把旧社会改变过来，把新社会建立起来，最后达到繁荣富强，人人幸福的境地。可以这样说，以往几千年是人民受历史支配的时代，自从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起，才是人民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能够自觉地创造历史的时代。自觉地创造历史，为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创造历史，这是前代人不能想象的自由，是最高最大的自由，我们手里就掌握着这种自由，岂不是快乐？

我的话说得又简单又抽象，但是我想，也许国外侨胞听了，已经会发生同感。国外侨胞如果是经常看到国内的各种报纸的，经常收听国内的广播的，或者有机会回国来看看的，或者有亲属朋友在国内参加各种事业的，那一定早就有同感，而且比我感得更深。

以上是就各项建设方面说，还可以谈谈国内人民思想意识方面的进步。建设的目的和规划，进展和成就，全是有根有据，显然可见的事物不能不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上反映出来。依我看，国内人民的思想意识方面，尤其是最近一年间，进步是很大的。怎见得进步很大呢？大体说来，绝大多数人看一件事情，都能就全局考虑，知道自己是六亿人民中间的一个，而六亿人民是息息相关的，因此，考虑任何问题必须从六亿人民出发，不能单从一个人出发。换

句话说，为公的思想意识大大加强了，历代遗传下来的一切唯私的思想意识大大減弱了。这不是很大的进步吗？举一件事情来说说，譬如节约粮食。各地人民都考虑粮食的消费量，每个月能节约多少就节约多少。在考虑的时候，想到的方面是很广的。首先，由于农业合作化和农业技术改进，历年来农业生产有所提高，这是肯定的。在生产提高，分配合理的条件之下，人民消费粮食的情况逐步有所改善，这也是肯定的。但是，农业生产还待继续发展，在目前，所产的粮食只能说够用而不能说富裕。为防备水旱灾荒，供应其他不时之需，当然该有所储备。大家精打细算，把可以节约的节约下来，就充实了这一份储备。想到的方面大致有以上说的种种。这样想的时候，自然而然会衷心乐意，毫不勉强地作出节约粮食的计划。一个人尽可能，每个月节约一斤两斤粮食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人人都注意这很小的事情，就能保证任何地区的人任何时候都有粮食吃，那就是很大的事情了。节约粮食收到很大的成效，是国内人民思想意识进步很大的证据之一。

建设一切，而且把一切建设好，主要在乎人。人人为公，从公的方面着想，向公的方面出力。人人去私，逐步努力，逐步改造，终于把私去得干干净净。这是国内人民思想意识方面最基本最伟大的趋势。这样的人来从事建设，来自觉地创造历史，哪有得不到成功的？何况以往几年的成功已经显示出确切的证据了。

勤俭建国，勤俭办学，勤俭办企业，勤俭办社，勤俭持家，诸如此类的语句传说在人们的口头，记住在人们的心里，

贯彻在人们的实践里。这些语句里的"勤俭"，跟我们老祖父老祖母所说的"勤俭"似乎相同，可是意义深广得多。那也是完全从全局出发的。各方各面竭尽可能的力量，是勤；节约可省的资料，是俭。这样的勤和俭，目的在实现六亿人民共同的最大的幸福。我们的老祖父老祖母在他们的时代是没法体会到这些的。

我只能写短文，谈了这么些，不再谈旁的了。要是其中有几句能承国外侨胞首肯，那就是我的荣幸。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为香港《大公报》作

悼 剑 三

上月三十日傍晚，人民日报社的同志打电话给我，说王统照先生病故了，我听了异常怅惘。今年人代大会开第四次会议，剑三（我们一班朋友习惯称王先生的字）一到北京就旧病复发，入北京医院治疗。他托人送来一本题字的册子，要好些老朋友在上面写些什么，留作纪念。我写了一首旧作的诗，就把册子转给振铎先生。当时老想去探望他，始终没去成，现在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将近四十年的交情，虽然叙首的时候不多，可是彼此相知以心。好几年不见一回面，不通一回信，都无所谓，只是相互相信，你也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也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尽够了。待见面或者通信的时候，谈这么两三个钟头，写这么两三张信笺，又证实了彼此的相信，于是欢喜超乎寻常，各自以为尝到了友情的最好的味道。是这样的一位朋友，现在他去了，永远不回来了，再不能跟他通消息了，哪得不异常怅惘？

用抽象的词语说，剑三朴实，诚挚，向往光明，严明爱憎，解放以后热爱新社会，尽力他所担任的工作，个己方面无所求，所求的只在群众的福利和社会的繁荣。我不说他改造已经到了家，达到了脱胎换骨的境界，只说他从旧教养中

得来的积极因素保持得相当多，为己为私的习染非常少，六十岁的年纪也不算大，要是体质强健些，能够多活十年八年，那末他是不难达到新社会所要求于知识分子的标准的。一九五四年的秋季，我在上海遇见他，他到上海为的是华东戏剧会演，几乎是抱病而往。看戏，参加讨论，他都不肯放松。看他气嘘嘘的，走十几级扶梯也觉得吃力，劝他多多休息，他可说会演的事儿很重要，既然来上海，就不能随便。即此一端，可以推见其他。他在山东担任好些工作，工作情况我不详细，我想山东的朋友一定有好些可以说的。

抗战以前，他到苏州看我，一块儿去游太湖里的洞庭东山洞庭西山。一九五五年深秋，我又到太湖，东西两山完全变了样。果农渔民绝大多数参加了合作社，果农不但高高兴兴称说合作对于果树业的种种好处，还提出提高产量改良品种的要求和办法。渔民向来是以舟为家，没有陆居的份儿的，现在可有了几年内全部登陆的打算。我当时想，要是跟剑三一块儿来，共同谈谈今昔的不同，那多有意思啊！这个期望，现在是永远不能实现了，我异常怅惘！

剑三写成长篇小说《山雨》，我读他的原稿，又为他料理出版方面的工作。近年来他对我说，他还想从事创作，想就近几十年的历史事件取题材。我当然怂恿他，我说在今天看近几十年的历史事件，总会跟前一二十年那时候看有所不同，总会比那时候看得正确些，而今天的青少年也确实需要知道近几十年的历史事件。他说只望身体好些，就抽空动笔。现在他永远不会动笔了，我异常怅惘！

今年他不能出席人代大会会议，还勉力在病床上写成书

面发言稿，分发给全体代表。发言稿中有以下的话："八年来我在山东可说几乎天天与党员同志们接触，开会，办事，研究问题，互提意见，自信这其间并无什么隔阂，而且我也学习了不少东西。我对同志们亦不敷衍，对付，该说的说，该作的作，只要为了群众的利益，工作上的改进，这里何须客气，又何有党内外的分别。"话虽简略，已够见出他的朴实和诚挚，他的爱党爱人民的精神。我们悼念逝者，一方面也在激励生者，我把剑三的话抄在这里，无非要让大家知道剑三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日作

《愚公移山》小论

《列子》的作者设想愚公移山的故事，表示一个高明的意思：只要世世相承，锲而不舍，无论怎样艰巨的事业都办得成。

按照故事的说法，愚公要把太行王屋二山挪开，到后来太行王屋二山果然给挪开了。但是，这个任务并不是由愚公的子子孙孙完成的，却是天帝感念愚公有那么一番诚意，派大力的神“夸蛾氏二子”背起二山，把一座放在朔东，一座放在雍南的。

从这里可见作者虽然有那个高明的意思，却还有想不通处。山上的土石，挑开一担少一担，连续不断地把土石挑开，二山总有铲平的一天：按情理说，这是完全可靠的。但是，愚公的后代假如历世单传，人丁不兴旺，完成任务就遥遥无期。或者人丁很兴旺，可是他们觉得老祖宗愚公提出的任务太愚了，他那遗志不继承它也罢，那就二山永远不会挪开。大概作者想到了这些，没法解决，而就创作意图说，总得让愚公的大愿能够实现，怎么办呢？惟有采用一般传说故事通常采用的办法，由天帝出面帮个忙。天帝一出面，愚公的大愿实现了，美好的故事完成了，作者的高明的意思总算表示出来了。

咱们不妨设想，要是古来真有那么一个愚公，太行王屋二山真的挡在他家门前，他的子子孙孙居然能继承他的遗志，一代代挑土担石，从不间断，天帝和“夸蛾氏二子”都在无何有之乡，当然不会给他们帮忙，他们的成绩是挑开一担是一担。在那样情形之下，恐怕直到今天，他们还在淌汗喘气，忙得没完没了吧。这就是说，愚公移山的故事虽然好，现实意义可不怎么大。这不能怪作者，任何作者没法彻底摆脱时代的限制。

咱们还可以就另一方面想，为什么作者说愚公移山，却不说愚公兴水利，愚公除四害？

我想，兴水利和除四害跟移山不一样，这两个题目是作者所不敢触及的。什么道理呢？移山是挑开一担是一担，只会减少，不会加多，兴水利和除四害却必须全面一齐来，不能一家子搞。假如愚公要兴一家范围内的水利，要除一家范围内的四害，必然会碰到是不是兴得起来，是不是除得干净的问题。水是流动的，老鼠是会到处窜的，麻雀、苍蝇、蚊子是会到处飞的，你兴了，人家不兴，你除了，人家不除，随你世代相承，锲而不舍，还不是白费多少辈子的气力？愚公号召移山，他从家族观点出发，说得出一套子子孙孙的理论，如果他号召兴水利，除四害，根据他当时的生活实践和思想水平，是说不出一套鼓动人家一齐来的理论的。愚公说不出，其实就是作者说不出。作者说不出，还能编什么故事呢？

《列子》的作者所不敢触及的题目，咱们现在却在实做了。全国一亿以上的人手齐来兴水利，全国城市乡村都在除四害，天帝和“夸蛾氏二子”完全用不着，咱们自己就是天帝和“夸

蛾氏二子"。

愚公的精神诚然可贵，但是在《列子》里，愚公移山只能是一个故事，一个现实意义不怎么大的故事。惟有在今天，在社会主义的时代，人人能真正做愚公，山可移，水利可兴，四害可除，其他任何艰巨的事业全都办得成。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作

对古今的厚薄

纪念"五四"，谈谈对古今的厚薄。

厚，就是看重，就是认为了不起。薄，就是看轻，就是不放在心上。

假如我这个最浅近的解释不算错，那么，以前的农民似乎是厚古薄今的惯家。

有人说，农民的哲学可以归结成一句简单的话：向来这样，就不能那样。所谓"向来"，不是"古"吗？不相信这样可以改变成那样，来适应当前的情况，所谓"当前"，不是"今"吗？大家看农民的确如此，于是得到个共同的信念：农民是厚古薄今的，是最保守的人。

但是这个信念并不靠得住。解放以后已经打破了好些，到最近就彻底打破了。请看，向来缺水的地方要变成水浇地，向来不种水稻的地方要种水稻，向来很沉重的体力劳动要创造种种工具来代劳……不仅是心里要，而且全都由实际行动做出来了。农民的哲学果真是"向来这样，就不能那样"吗？农民果真是厚古薄今的惯家吗？

推究的结果，以前的农民是让社会制度束缚住，所以只能拘拘于"向来"，而不能就当前的情况作有利的变革。如果说他们厚古薄今，那只是出于不得已。现在经过土改，又经过

合作化，在全民整风中，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更大大提高。他们知道凭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是可以改变那个“向来”的，是可以有所创新的，因而振奋人心的成绩天天见于报纸。他们惟求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全国人民，同时有利于自己而已，管什么向来不向来！如果说他们是厚今厚到了家的人，一点儿也算不得夸张。

现在说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跟农民一样，同是新中国的公民，要是拘守向来，不顾当前，这不是厚古薄今的倾向吗？问题在哪儿，很值得深思。

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作

登 赐 儿 山

赐儿山距离张家口市区三里光景。据市文化局所编的《名胜古迹》，这座山海拔一千零五公尺，山上有云泉寺，始建于明朝洪武二十六年（公元一三九三年）。随着山势，高高低低建筑好些殿宇，都不怎么大，石级小道曲折可通。多数殿宇里供奉道教的神像，如果按《封神榜》来指认，该说得清谁是谁。最高的一座殿宇是玉皇殿，就高度说，大约已经超过半山腰。佛教的殿宇，有一座里佛像最多。小小的三间，有塑像，有壁上的画像，三世如来和地藏菩萨在正中，韦驮站在左边，面朝内。我们几个人戏言，他们大概是厉行精简节约，故而大家挤在一块儿。

赐儿山有水洞冰洞，在半山腰石崖下。两个洞真可以说相距咫尺，可是洞里的情形完全不一样。水洞里泉水下滴，积在洞底，据说有两公尺深，寒冬也不冻结。冰洞里泉水结成冰，上面盖着灰沙，望进去好像铺一块平石板，据说炎夏也不融化。相距那么近，而温凉互异，这是什么道理，可惜没有人给我们作解释。两个洞的前边有两棵大柳树，水洞左上方的石隙中伸出一棵大榆树，相传是元榆明柳。树身那么大，历年那么久，毫无衰老意味，枝叶繁茂，叶色葱绿，给人一种青春盛年的印象。那棵大榆树生根在石隙中，得不到多少土，

而能欣欣向荣，尤其奇妙。或许是得到泉水的滋润之故吧。坐在柳阴下，喝水洞里的水沏的茶，其味甘美。张家口市的居民逢到休假的日子，常到这里或是距离市区七里光景的水母宫玩儿。

水洞冰洞果然奇，古老的榆树柳树也值得欣赏，但是在这赐儿山上眺望，还有一种景色叫你欢喜赞叹，想得很远很远。张家口市东北西三面全是山，峰峦重叠，山色越远越淡。我们站在半山腰，远望那些峰峦，全都染上绿色。那绿色是草吗？不是，是近几年来尤其是今年大跃进中新栽的树。照原来的计划，全都绿化那些峰峦需要三十多年。照今年大跃进的规模，可只要三年，就是说，再加两年功夫，就可以做到全部绿化了。某一座山归某机关负责，某一座山归某学校包下来，全都有了着落。眼前已经是山山有绿意，试想两年以后，不将像江南的山一样地郁郁葱葱吗？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事，是破天荒的事。那些峰峦耸起在那里，也说不清经历了多少年，在那么悠久的时间里，哪曾跟树木有过缘分？也不必想到远古的人，只从修筑了长城那时候想起，戍守长城的兵士，进出长城的行旅，历代以来不知有多少人，他们中间谁曾见过那些峰峦上染上绿色，像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说真的，我感动极了，不待思索，作成如下一首诗：

叠岭重峰自古然，长城亦复二千年。
望中景色空前史，绿树新栽遍万山。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作

涿鹿的劈山大渠

我们动身以前，听说涿鹿正在修劈山大渠。怎么样劈山修渠呢？我的意想中总得不到个明晰的印象。后来到了涿鹿，参观了修渠的工地，又参观了张家口市黑石坝大渠的工地（那也是一条劈山渠），才懂得劈山修渠是怎么回事。

原来劈山渠是把渠道修在山腰里，让河水通过，好像把公路修在山腰里，让车辆和行人通过一样。在山腰里修公路，如果山岩挡住了路线，就得劈山，如果路线要经过山沟，就得把山沟填平。修劈山渠也是这样。只有一点不同，公路不妨随山势高低，渠道可得保持水平。

为什么要把渠道修在山腰里呢？因为河身低，旱地高，得不到河水的灌溉。要使河水灌溉高地，一个办法是靠机械的力量，把水引上来。另外一个办法，修一条渠道，从河道的上游引水，需要灌溉的高地多少高，选定的上游引水地点也多少高，水就从渠道里流过来。劈山渠采取的就是这个办法。

涿鹿的劈山大渠在县境的西北部，引的是桑干河的水，把水位抬高八十五米。渠道从西向东向东北，曲曲折折沿着黄羊山而去，全长八十里。需要劈开山崖二十二座，其中高达十米以上的七座。凤凰山的工程最艰巨，要把山崖打穿，让

水从渡槽里通过，渡槽高四米，宽二米，长四十米，需要填平较大的山沟五十道，其中深达二十三米的两道。李家疙瘩西沟的工程最艰巨，填土高二十三米，底部宽八十四米，上面宽四十米，长八十米。全部工程需要开凿爆破的石方，需要挖填的土方沙方，共计一百一十万方。大渠修成之后，黄羊山山坡上三十三个村子的三万五千亩旱地就变为常年得到灌溉的水田。那些地一向干渴，一旦喝够了水，会发挥巨大的潜在力量。

开渠引水，灌溉旱地，早已是这个地区群众的愿望。远在三十年前，就有郭全举、宋万金二人倡议开渠，得到许多贫苦农民的支持，可是得不到反动统治者丝毫的帮助。还有个恶霸出来阻挠，就把千万人的美好愿望给摧毁了。解放以后，郭宋二人联络了当地农民，自动地勘察渠线四次，向政府上了万言书，要求开渠。党和政府曾在一九五一年派人勘察渠线，认为当时农民还是个体经营着土地，要兴建那么巨大的工程，各种力量还有困难，因此，几年间只帮助农民兴建了一些中小型的水渠，利用山洪浇地。虽然如此，作用已经不小。去年涿鹿的灾情相当严重，黄羊山山坡上三十三个村子三十三个农业社，却有二十八个是馀粮社，两个能够自给自足，这就是明显的证据。

利用山洪浇地，须靠下雨，要是天旱不下雨，就不能保种保收。因此，农民仍然切盼兴修劈山大渠。去年秋季，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大力兴修水利的指示，群众就再度提出开渠的要求。县委和县人委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兴修这条大渠确是一项重要建设，在农业合作化了的今天，集体农民已

经有力量兴修这条大渠，就决定领导群众开渠。勘察渠线的测量队去年十二月间出发，郭全举闻讯，带着粮票和盘费，自动地给测量队带路。他们在严寒中辛勤劳动，经过六十三天，反复测量十次，才把渠线肯定下来。动工兴修是今年三月十六日。

我们在五月二十九日到那里参观，参观的是李家疙瘩西沟的工地。工地上群众敲锣打鼓，拍手欢呼，表示欢迎。握手交谈的许多人中有三位老人，其一就是郭全举。他今年六十三岁，个子不高，看来身体还健朗，衣袖上佩着红袖章，他是指挥部委员会的成员，并担任检查主任。我们先曾听说他几十年来切盼开渠的经过，又听说今年开工以后，他的勤恳的劳动和真切的宣传，给了青年们极大的鼓舞。现在面对着他的身影，一时间我想得很多，可又说不清究竟想些什么。仿佛是这么个意思：几十年来的志愿今天实现，他的欢快是无可比拟的，就凭这份欢快，自然而然，他非当个老积极分子不可。

还有两位是刘存满、刘存桂弟兄俩，哥哥六十七岁，弟弟六十三岁。他们会做许多手艺，尤其擅长石工的活儿。大渠开工的时候，他们就要求参加，但是农业社因为他们播种的技术好，要他们留在社里。后来大渠工段上的青年们砍石头遇到困难，怕不能如期完成任务，就去请两位老将出马。哥儿俩来了，立即打开了局面，两个人刨的石头可以供十几个人挑。他们又是鼓舞青年的能手，工作抢在先，总愿意自己多做，帮助别人不遗余力，又根据自己的体会，给青年们说新社会的好处，青年们唱歌，他们也尽情地唱。握着他们

的手，真叫你感动。十个手指头全部肿了，发硬，纵横的纹路深深陷下去，像裂了缝的老树干。那是前些时在寒冷的天气里刨石头搞成这样的。人家劝他们歇歇，把手治一治，他们总不肯。

我们遇见的模范人物，听见的英勇事迹，还有很多，这里不再细说。

山坡上山沟里歌声四起，劳动的人们暂时停了手，开个露天大会。郭老的话表达了我们人人心里的激动。他说："我们来这儿，拜你们为师。我们拿笔杆的人，要好好学习你们的干劲儿，使笔杆像你们的铁锹一样，发挥更大的力量。"会开得很简短，可是大家觉得挺有意思，只要看大家脸上兴奋的神色就可以知道。

山坡上的人们挖土挑土，土往下边倒。很多人不只挑两筐，一头两筐，挑一回就是四筐。山沟里的人们夯土，几个人一组，提起大圆石椎，一下一下地夯。土已经很平了，像个运动场，为的要它结实，还得夯。抬起头来望，在几层楼房高的空中横着几条铁丝，铁丝上系着红布条儿。人们指着红布条儿说，填土齐到红布条儿那儿，才是渠道的底呢。

人们又告诉我们，目前在全线工地上劳动的有二千多人，来自四十七个村子。其中十四个村子是受不到大渠的好处的，可是社员们也来参加劳动，干劲儿跟三十三个受益村子的社员一样地足。我听了就想，在今天人们对于各种劳动，从一方面说，全都看作义务劳动了，从另一方面说，也知道惟有尽量参加各种义务劳动，才真正是为我的劳动。在今天，群和我，我和群，不是起了混合作用，而是起了化合作用了。那

十四个村子的社员踊跃参加修渠，就是从这样的体会来的。

参观了涿鹿的劈山大渠工地，我写了四首绝句：

来访涿鹿不怀古，劈山大渠自古无。
将见桑干上山腰，也走社会主义路。

出工之村四十七、受益之村三十三。
你受益即我受益，此义今人已熟谙。

老见开渠郭全举，渠成才因杨光荣。
刘家二老擅刨石，张雨鼓舞众英雄。

如许英雄干劲足，渠成当在预期先，
久渴之坡得沾润，从今岁岁是丰年。

这儿还得说明一下。杨光荣是个女青年，某村农业社的副主任。大渠开工，她立即向社委会要求参加，带领了二十名青年来到工地。刘家二老就是她找来的。她担任第一大队第二总队的副队长，领导方法能走群众路线，大家都拥护她。后来施工指挥部闻知她怀孕已有五个月，问到她，她死不承认，社里的同志两次要来替她，她坚决不回去。她说："多会儿大渠流下水来，我才回去哪！"张雨是一位转业军人，来到工地之后，被选为大队长。他把部队里的战斗性和纪律性带到工地上来，他那个大队行动很迅速，纪律性很强。他一方面担任大队长的工作，一方面积极劳动，总是挑最重的活儿，哪

儿有困难就赶到哪儿，表现了军人的英雄气概。

以上的稿子是昨天写完的。今天早上看报，看见甘肃省引洮河上山的消息，工程已经在本月初开工。一千多公里长的一条劈山大渠，要穿过两千米高的崇山峻岭，要把两千万亩旱地变为水田，真是惊心动魄的消息。我看了涿鹿劈山大渠的工地，甘肃那条大渠怎么个情形也能想象得之。在这儿不适用小巫大巫的比喻，虽然规模有大小，工作有难易，但是，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已经作了自然的主人。涿鹿和甘肃是一样的。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作

坝 上 一 天

六月五日七点一刻，我们分乘吉普车五辆从张家口市出发。出市区往北，山路蟠曲，渐升渐高，大约走了一点二十分钟，到狼窝沟，这里海拔一千八百公尺。我们在苏蒙联军烈士塔前下车，致敬并瞻仰。

狼窝沟是华北通内蒙古的咽喉，形势险要。一九三六年日寇侵占了张北县，连年在狼窝沟修筑工事。我同民工受到种种虐待，死亡很多，还有三千多名技术工人被送往安固淖集体屠杀，为的是他们亲手修筑工事，知道军事秘密。修成的交通沟沿着山势回环沟通，长达六百多里，大型小型的钢骨水泥碉堡有二百多座。日寇妄图以此为兵站基地，控制华北和内蒙古。

一九四五年八月上旬，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对日宣战，苏蒙联军在苏联普烈耶夫上将指挥下，跟我军配合，包围狼窝沟。经过两天的激战，摧毁了那些永久性的工事，歼灭了日寇的主力。这一战役对我军迅速解放张家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苏蒙联军在这一战役里英勇牺牲的有六十人，他们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永垂不朽，他们用他们的鲜血在中苏蒙友谊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因此，张家口地区的人民修建这座苏蒙联军烈士塔来纪念他们。

底层是塔厅，大理石壁上刻着六十位烈士的名字，苏联官兵五十四人，蒙古兵士六人。还有聂荣臻、谢觉哉、乌兰夫、张苏诸位同志的题词。塔厅上耸起方柱形的塔身，正面题着七个贴金大字，“苏蒙联军烈士塔”。塔身上又矗起长圆椎形的塔顶，顶端缀着三颗鲜艳的大红星。塔高二十九公尺有馀，在明蓝的天空映衬之下，显得异常庄严。

我们登车再走，渐渐觉得眼中景象全新。四望宽广，而且那么平，天似乎更高了，比北京秋天的晴空还要蓝，这明蓝的大圆幕笼罩着平旷的地面。除了路旁的树苗和一部分庄稼而外，大部分地面长的是草，高约四五寸，其间开着些野花。马牛羊群随处可见。这里已是草原地带，张家口地区管这一片草原地带叫坝上，也就是蒙古高原的边缘，海拔一千四百五十公尺左右。听说草长高的时候有二尺光景，我就连带想到，这里大概还见不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

我们到达张北县委会，听县委同志谈张北概况。解放以前，坝上是很穷苦的地方。风沙大，土地瘠薄，气候寒冷，一年间无霜期仅有九十天到一百天左右，人民生活非常困苦。解放以后，党和政府采取种种措施，人民发挥积极性，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基础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并不影响群众力争上游的决心。只要看墙上的那些图表，光是张北一县，兴修水利，积蓄肥料，扩大耕地，培植林木，繁殖牲畜，改良畜种，举办工业，诸如此类已经办将要办的事项，就数量说表现了“多”，就进程说表现了“快”。我们这一回参观访问，常常听见“塞上江南”的说法，常常看见“塞上江南”的字样。我想，坝上各县很快赶上江南，当然不成问题，但是江南并

非一成不变的，明天的江南必然胜过今天的江南，这所谓"塞上江南"的"江南"，该是包括今天明天的江南在内的。

下午两点，我们又登车，目的是访问一个牧业队。途中望见一个"淖"，其水反映碧色。张北境内有好些个"淖"，水或淡或咸。淡水当然可以利用于耕种，咸水也将设法利用。坝上人向不吃鱼，三年前在淡水淖里投下鱼秧，今年开始捞鱼，鲫鱼有一斤光景，方才午餐就吃到鲫鱼。咸水淖里也尝试养鱼，结果证明可以养，已经投下了鱼秧。

牧业队所在地叫蒙古营。这个队属于民安乡红旗农业社，全社分十三个农业队，一个牧业队。全队男女队员热烈地欢迎我们，二三十个小孩也跟着拍手。进一所房子坐定，蒙古妇女给我们喝奶茶，说这是蒙古人的习俗，表示敬意，如果喝不惯，还备有普通的茶。奶茶其实很好喝，听她们这样说，深深感到牧业队体贴客人的厚意。队长杜哥儿札布同志为我们谈社中概况。汉人耕种，蒙人牧畜，团结互相非常好。所畜马牛羊都择良种，注意配种工作，使畜种尽量向好的方面发展。牲畜的饲养和使用，草原的管理和轮牧，都定有切实可行而且有效的制度。出售驹子和羊毛，是社中一宗不小的收益。

队长让我们看看畜群。走出房子，大队的牛羊被带到门前，一时间此鸣彼应，冲前转后，也不知道多少数目，只觉得眼前景象全新。公的种畜特别庞大。新生的幼畜偎在母畜身旁，看来挺娇健，可又透着稚气。马带来并不多，身子不算高。两个队员各跨上一匹，缰绳一提，小走几步，一会儿就划开，跑着跑着，人和马的身影显得很小了。

我们辞别了牧业队，车行大约二十多分钟，到了海流图水库的工地。几千名男女民工在那里紧张地劳动，掘土的，挑土的，打夯的，背石头的，从坡上往下望，完全在目。就人数而言，比十三陵水库的工地上少得多，可是那埋头苦干的气魄，那全部活跃的场面，我觉得跟十三陵水库的工地上一模一样。

这一带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修成了三十一里长的民安渠，是一九五二年的事。就在当年，受益地区普遍增产，平均亩产二百十三斤，比解放以前提高了四倍多。一九五五年扩展民安渠，浇地面积达到一万四千亩。听说还要苦战三年，征服十大河流，把全县的地上水都积蓄起来。正在修建的海流图水库，拦截的是三台河的水。三台河从南往北又西斜，流入安固淖，水库修成之后，面积约有二千六百五十亩。从水库引出两条干渠，东干渠长三十七里，可以浇地四万到五万亩，西干渠长十五里，可以浇地七千亩。加上民安渠的一万四千亩，就有六七万亩地得到灌溉之利，还计划建立一座小型发电站。东西两干渠都要绿化。

我们在指挥部里会见了十几位修建水库的英雄，大多数是妇女，年纪大的将近六十，年纪小的二十还不到。这里爱用“铁”字来称颂模范人物，有“铁汉”“铁姑娘”“铁老太太”之类的名号。意志坚强，什么困难都不怕，一到工地就坚持下去，不修成水库决不罢手，这差不多是模范人物的共同点；用上个“铁”字，他们的精神全表现出来了。铁汉安占元以能背四百斤大石头得名。铁姑娘刘步兰、高玉莲、郭玉娥在河水解冻的时候，每天往返蹚两回河，冰水激骨，毫不在意。铁

老太太李友，五十七了，一双小脚，看来很瘦弱，可是她从阴历正月初五（二月二十二日）上了工，到现在一百多天未停过工。她那句形象化的话"用针尖我也得把水库挖成"，成为普遍传说的名言。

跟英雄们道别，离开工地已经五点过了。归途中天气像上午中午一样晴朗，忽然望见有点异样，天空变得昏黄。我正在想这是什么缘故，大风就袭来了，呼啸声似乎充满空际。早晨动身的时候，我听了同志们的嘱咐，里面穿了两件毛线衣，一条毛线裤，后来越来越热，脱了一件较厚的毛线衣，还是出汗，只因怕麻烦没再脱。这会儿大风袭来，赶紧穿上较厚的毛线衣远不济事，张雷同志让我穿上他的雨衣，又拥着地委带来的皮大衣，才觉得刚合适。据说，在草原上，这样的大风算是寻常的。

在车中作成绝句一首：

耕牧兼营固汉蒙，尽多水库铁英雄；
流连不觉归车晚，驰骋高原赏大风。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

略叙"文学研究会"

"五四"时期，我国期刊的出版空前繁荣。

当时的知识分子看到国内的现实和国际的形势，知道我国非变不可。怎么样变，走什么道路，大家都不甚明白，可是《新青年》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是得到多数人赞同的两个目标。根据这两个目标，大家向各个方面探索，政治，经济，道德，学术，文艺，劳工问题，妇女问题，家庭问题，什么都触及到。探索一阵之后自然有所见，有所见自然要写下来贡献给社会，于是期刊和副刊纷纷创刊，种数之多，读者之广，远远超过清朝戊戌政变时期。这许多刊物里，《新青年》从一九二零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就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他各种，大部分有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倾向。

这许多刊物里，没有专门关于文学的，按当时的情况，很有办这么一种刊物的需要。

文学革命的口号是《新青年》提出的，主要反对以文学为宣传封建主义思想的工具。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上，震动了当时的思想界。鲁迅的实践使文学直接为反封建主义的思想斗争服务，叫人明确地认识到文学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一九一九年，鲁迅又发表《孔

乙己》和《药》，一九二零年，发表《风波》，都在《新青年》上。同时的好些期刊和副刊也都登载创作小说，虽然质量有高有低，创作的态度可大半是严肃的。就是说，大半不把创作看作无聊消遣，玩弄笔墨，而是认认真真地把作者探索得来的东西写下来，希望对思想界有点儿贡献，起点儿作用的。还有新诗和剧本，情形跟小说一样。这些作品全都用白话写，没有用文言的。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也是文学革命的内容之一。当时各种刊物还登载好些翻译作品，俄国的居多，弱小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的也不少，此外英美德法等国的都有。总括地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无论作者或读者，对于文学的观点都有所改变，研究文学和享受文学逐渐成为多数人的欲望。于是，期刊和副刊用少量的篇幅登载些作品和有关文学的文章，就觉得不能满足需要了，要有一种专门关于文学的刊物才好。

文学研究会就因为要办一种文学杂志而组织起来的。

文学研究会的第一份会务报告里记载发起的经过，大要如下：一九二零年十一月间，北京的几个朋友相信文学的重要，想办一种文学杂志，“以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跟上海的出版家接洽出版，没有得到成议。于是有人提议，不如先办一个文学会，杂志由文学会办，基础可以稳固些，跟出版家接洽也容易些。这个提议得到大家的赞成。隔了不久，沈雁冰从上海寄信到北京，说商务印书馆请他担任《小说月报》的编辑，并约大家加入月报社，月报内容可以彻底改革，名称还仍其旧。北京同人经过商议，决定发起组织文学会，以《小说月报》为文学杂

志的代用刊物，大家以个人名义给《小说月报》撰稿。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文学研究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开成立会，到会者二十一人。

《文学研究会宣言》登载在《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和《新青年》第八卷第五号（都是一九二一年一月出版），北京的好几种日报和杂志也登载。宣言说了发起这个会的三点意思。第一点是联络感情，第二点是增进知识，第三点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这第三点意思很可以注意。用"著作工会"这个名词，非常特别，所说的意思很新鲜。"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这虽然是将来的事，但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希望。"要不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宣言里决不会用"著作工会"这个名词。要不是把文学工作看成关系群众的共同事业而不仅是个人的劳动，宣言里也不会提到什么"著作同业的联合"和"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说第三点意思很可以注意，理由在此。

在宣言和会章后面署名为发起人的有十二人。到现在，永远离开我们的有六位，他们是朱希祖，蒋百里，许地山，耿济之，王统照，郑振铎。其中郑振铎是最初的发起人，各方面联络接洽，他费力最多，成立会上，他当选为书记干事，以后一直由他经管会务。这位爽直，慷慨，热情，乐观，坚持正义，爱憎分明的可敬的朋友，去年十月间忽然传来噩耗，因

为遇到恶劣的气候，在出国飞航的途中丧了命！怀念他追悼他的不限于国人，国外的文化界也表示深切的悼念。

文学研究会既然以《小说月报》为文学杂志的代用刊物，这里该约略谈一谈《小说月报》。月报的革新从第十二卷开始，第一号登载《改革宣言》，提出创作、批评、介绍并重的方针，说革新文学的目的在创造中国的新文艺，文艺是国民性的反映，惟有能表见国民性的文艺才有真价值。第二号里有沈雁冰给郑振铎的信的摘录。“发表创作，宜取极端的严格主义，差不多非可为人模范者不登，这才可以表见我们创作一栏的精神。一面，我们要辟一栏‘国内新作汇观’批评别人的创作，则自己所登的创作更不可以随便。朋友中我们相识的，乃至极熟的，大家开诚相见，批评批评，弟敢信都是互助的精神。批评和艺术的进步，相激励相攻错而成。苟其完全脱离感情作用而用文学批评的眼光来批评的，虽其评为失当，我们亦应认其有价值，极愿闻之。所以弟意对于创作，应经三四人之商量推敲，而后决定其发表与否……如此办法，自然麻烦，但弟以为如欲求创作之真为创作，并为发挥我们会里的真精神起见，应得如此办。”从这里，可以见到当时文学研究会对于文学工作的设想，可以想见沈雁冰主编月报对于发表创作的认真。在今天，熟悉编辑部的情况的人都知道，一篇稿子的选用与否，没有不经过多数同志的共同审读和反复讨论的，而沈雁冰在前此三十八年就那么认真，他的忠于文学工作的精神，叫人感佩无已。

第十二卷月报出到第四号，就登载一篇《春季创作坛漫评》，实现了“辟一栏‘国内新作汇观’”的预期。从各报各杂志

上搜罗了短篇小说六十七篇，长篇小说两篇，剧本八篇，逐篇看过，加以研究批评。在这些作品里，认为思想不深入，表现手段也低，可是有读一读的价值的，计有二十四篇。作者给个总评说："我对于上面的二十四位作家，表示非常的敬意，因为他们著作中的呼声都是表示对于罪恶的反抗和对于被损害者的同情。虽然他们的作品不怎样完全，这是不关紧要的。"作者认为比较好的，计有二十篇，对这二十篇分别提出了意见，或详或略地指明优点和缺点。此外搁下不提的三十三篇，属于以下两类。一类是，写小说的人把小说当作私人的礼物，一己的留声机，如什么《订婚日记》之类，作者不承认这样的人有创作的资格。又一类是，把西洋通俗杂志上的无聊小说改头换面写成的，作者认为这也失掉了创作的资格。从这一篇《春季创作坛漫评》，可以见到当时文学研究会同人评衡作品所取的标准和《小说月报》推进创作提高创作的愿望。

文学研究会同人又在上海《时事新报》附出一种《文学旬刊》。这个旬刊登作品也登论文和短小精悍的随笔。现在没有资料可查，约略记得当时一些论文和随笔大多是反对复古派和鸳鸯蝴蝶派的。复古派在南京出一种杂志叫《学衡》，反对新文学运动，引了好些西洋的文艺理论来做护身符。曾经出一期《诗学专号》，登载些无病呻吟的徒具形式的旧体诗，仿佛想对提倡新诗的人给点儿颜色看似的。《文学旬刊》就严正地攻击他们，关于诗的论争连续了好几个月。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在上海，他们以游戏的态度对待文艺，迎合当时社会的低级趣味，写些消遣性的东西。要是写有关爱情的小说或

是诗，就免不了“鸳鸯”呀“蝴蝶”呀来上一大套，“鸳鸯蝴蝶派”这个名称就是这样来的。《小说月报》一改革，他们感到自己的危机来临了，就在他们势力所及的范围里，纷纷写些不体面的冷嘲热讽的文章来对付《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给他们强烈的反击，可不跟他们一般见识，用现在的话来说，采取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

《文学旬刊》的编辑、发稿、往报馆校对排样，经常由郑振铎担任。每期旬刊出版，报馆把添印的若干份交来，一批朋友就聚在一起，一张一张折起来，插进大家分担写好了订阅人姓名和地址的信封里，然后扎成几捆，送往邮局。这时候，大家感到共同劳动的愉快，同时感到仿佛跟订阅人心连心了。

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就作出版丛书的计划，这也应该提及。丛书以翻译外国作品为主。五四时期，各种刊物翻译外国作品很不少，别的团体翻译外国作品出版的也有。但是拟目所收之广，实际出版种数之多，要数文学研究会丛书，即使说不上系统地介绍外国文学，总可以说在这方面开了个端。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六日作

参观苏北水利工程

这一回出门二十五天，主要是参观苏北的水利工程。大运河的整治，淮沭新河的开拓，各处节制闸和船闸的布置，以前听人谈及往往感觉搞不清楚，现在亲眼看见，总算有了个具体的印象。

我们看了洪泽湖东岸的三个闸。一个叫二河闸，去年六月间修成。湖水通过这个闸，流入淮沭新河，这就使淮河北调，跟山东的沂河相通，可以互相调剂。又一个叫高良涧闸，现在正在动工扩建。湖水通过这个闸，流经灌溉总渠入海。第三个叫三河闸。一九五三年七月间修成，六十三孔，长三分之一公里。这个闸调节高、宝诸湖的水，通到大江。在淮阴西北的杨庄，我们看了即将完工的三个节制闸中的两个，淮阴闸和淮涟闸。淮阴闸跨在淮沭新河上。淮涟闸就在淮阴闸旁边，分一部分水供给灌溉。

在泗阳县境，我们看了六塘河地下涵洞工程。新开的淮沭新河大体上是南北方向，水位比较高，因此，东西方向的淮泗河和包河势必在淮沭新河底下通过，这惟有修建涵洞一法。这个涵洞并排十二孔，每孔三公尺四见方，进出口相距五百公尺。在沭阳，我们看了沭阳闸的修建工程。沭阳闸也跨在淮沭新河上。闸下又有地下涵洞，通过柴米河的水。这

个涵洞并排二十二孔，每孔三公尺见方，进出口相距三百五十七公尺。我们去得正巧，看见了这两个地下涵洞的内部构造，不久涵洞就将完工，一完工就永远埋在地下，只能看见进出口了。

再说大运河的整治工程。从界首到高邮，已经修成新河道，可以通行二千吨的船只。目前施工的，是界首以北一段和高邮以南一段，共计三十七公里，发动民工共十六万人。工程是把运河的西堤西移，修筑得特别牢固，使能抵御湖上的大风浪。在邵伯，我们看了一号船闸的修建工程。邵伯原来有个船闸，很小，不能适应当前的发展情况，所以需要修建大的。这个一号船闸底宽二十公尺，长二百五十公尺，电力启闭，十分钟就可以开一次。今后还将修建二号三号船闸，在三个船闸的西边，将修建一个大控制闸，长一千零七十八公尺，一百三十五孔，每孔宽六公尺。这个大控制闸的作用是排洪蓄水，需要蓄水的时候，把水蓄在高邮湖和邵伯湖里。

水道的来龙去脉、水闸的节制调剂和水流的综合利用的情形，语言文字很难叙述得一清二楚，叫人宛同目睹。因此，我们建议把苏北整个水利工程摄制一部大型纪录片，片中有活动的示意图，有各项建筑物逐步完成的形象，也有群众集体劳动的伟大场面，这样的纪录片将会有永久的教育意义。也许还可以不同的角度摄制好几部，不仅一部而已。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作

心心相通

——寄到日本去的信

岸信介集团使用法西斯暴力在日本国会强使众议院“通过”了侵略性的日美军事同盟条约，向正被全世界坚持正义爱好和平的人民严厉谴责的执行强盗政策的美帝国主义献媚，全不顾日本人民的利益。这是岸信介集团在日本人民面前犯下的弥天大罪。日本人民为了反对岸信介卖国集团，统一行动已经进行到第十七次，一次比一次壮大。在岸信介集团的心目中只有他们的主子美帝国主义，没有什么日本人民。最近以来，日本人民的愤怒好像大海上的波涛，汹涌澎湃。对于这样一个集团，他们要把全国人民赶上战争和灭亡的道路，他们不怕犯危害全国人民和别国人民的严重罪行，日本人民怎能不感到极度的愤怒呢？怎能不拿出所有的力量来惩治他们的罪行，消除因他们的罪行而将会招致的危害呢？报上登载的消息，二十日东京有十万人集会，宣布“通过”的条约无效。可以料想，今后日本各地必然会举行同样盛大的集会，必然会作同样明确的宣布。人民是决定的因素，团结就是力量，这些道理在反动统治集团是不会懂得的，而在觉悟了的人民却极端相信是确实可靠的真理。你不懂，我相信，较量较量吧，胜利必然属于相信真理的日本人民这一边。

我参加了五月九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首都各界人民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大会。那天到会的一百多万人跟坚持斗争的日本人民虽然远隔海洋，可真有声气相应心心相通的实感。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带给我国人民的灾难是无比深重的，是我国人民永远忘不了的。单就我个人说，我在上海闸北的寓所中挨过日本的炮弹，房子塌了一半。我在四川乐山的寓所中挨过日本飞机投下来的烧夷弹，房子烧起来了，前门已经让火封住，一家老小慌忙地从后门逃出。在中国人民中间，受害比我深重得多的更是无法计算。再说我们国家所受物质方面的创伤，我国人民所受精神方面的损害，算也算不清，数也数不尽。日本人民所受的灾难也不轻，不说别的，单说两颗美国原子弹的惨祸就够怵目惊心了。而现在，就是这个投原子弹的美帝国主义，牵引着它的傀儡岸信介，要使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要利用日美军事同盟条约来实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决不能容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这是我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从火山血海中得来的深刻的教训。必须制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要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根刨得一干二净，这是我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共同的坚强的意愿。我国人民所以坚决支援日本人民，所以感到跟日本人民声气相应，心心相通，理由就在这里。我相信，日本人民一定会作更广泛更坚决的斗争，直到推翻岸信介集团，战胜美帝国主义为止。我国人民当然更广泛更坚决地支援日本人民，直到日本军国主义根柢尽绝，美帝国主义滚出日本，滚出我国的领土台湾为止。岂仅我国人民，全世界坚持正义爱好和平的人民全都热烈支援日本人民。毛主席说："日本人民是很有希望的。"我

引用毛主席这句话，祝日本人民在斗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日发表

听评弹小记

我幼年常听书，历十几年之久。当时的名家，现在记得的有王效松、叶声扬、谢品泉、谢少泉、王绶卿、魏钰卿、朱耀庭、朱耀笙、醉筱卿等人。二十岁以后就不听了，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多年，近几年到南方去，偶尔听几场而已。这一回上海市人民评弹团来京，我连听了三场，很感满意，随笔写些零星感想，顺便向来京的全体演员致意。

《礼拜天》编得好，可以说是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赵开生、石之磊两位表演得好，能曲折地描摹人物的心情和神态，叫人听罢不仅笑乐而已，而且受到鼓舞，精神振奋。我不知道类此的写新人新事的节目已经有多少，我以为这方面可以大大发展，尽多地创作或改编，增加新节目。现在听书不比从前，谁也没有闲工夫天天到书场去听长篇的书。我没听过中篇，只知道中篇所以产生就是为此。而中篇又不如短篇，短篇一回即了，让人带着馀味走出书场，是最适合于今天的一种形式。我希望多创作短篇。创作之外，还可以从各种文艺刊物上采取。文艺刊物上优秀的短篇小说经常出现，只要随时留意，可以拿来改编的一定不少。创作或改编短篇，不一定是弹词，也可以是评话。前几年在南方听过一个短篇，好像叫《特别快车》，很不错，那就是评话。

《新木兰辞》依据《木兰辞》而有所增删。我以为删去“朝辞爷娘去……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几句，删去“雄兔脚扑朔”几句，都很有意思。删去“朝辞爷娘去……”，不提木兰依恋父母之情，跟木兰慷慨从军的气概吻合。删去末了四句，不强调木兰的女扮男装，见得木兰志在代父从军，女扮男装只是个手段而已，并不认为怎么了不起。徐丽仙唱《新木兰辞》，能以轻重徐疾抑扬表达辞情，大可欣赏。

《王魁负桂英》和《长生殿》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编的，我幼年没听谁弹唱过。《王魁负桂英》大概依据《焚香记》传奇。徐丽仙所唱《阳告》、《情探》两段，敫桂英愤激之切，哀怨之深，充分传出，极为动人。《情探》中《离魂》一节，七字句用上三下四的句式，以前没听过，觉得很新鲜。戏剧曲艺唱句的句式不拘守旧样，也是推陈出新。创出新句式，而唱调又能跟新句式适应，当然就丰富了表现的手段。周云瑞在《情探》中表现王魁冷酷无情，利禄薰心，而绝无火气，可谓当行出色。《长生殿》大概依据《长生殿》传奇。杨氏兄弟弹唱《絮阁》一段，细腻工稳，唱和白得力于昆曲。

这一回来京的演员十一人，而说评话的只有张效声一人。我不知道整个评弹界里头，评话演员所占的成数是否也是这样少。如果确然少，我以为应该注意培养。评话的传统节目很多，新编节目适于评话的也不会少，必须多培养评话演员，才能继承传统，开拓新途。张效声的伯父张鸿声，我没听过他的书，张鸿声的师傅叶声扬，我听他的《英烈》不止一遍，这一回听张效声的《英烈》，颇有叶声扬的风格。又听两段《林海雪原》，扬子荣打虎，杨子荣威虎厅杀胡彪，神采奕奕，令人

兴奋。

还有一句简单的话。我希望演员更注意字音，念准四声，使听众听起来不含胡，更顺耳。

听过之后记忆不全，仅能写这样浅近的几句，良为惭愧。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九日作

樱 花 精 神

最近读了四位老友的文章，巴金和刘白羽的登在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冰心和叶君健的登在《人民文学》六月号。他们都是往日本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的，写的是旅中的事。读过几遍，获益不少，欣然命笔，写这一篇“读后感”式的短文。

巴金的《我们永远站在一起》是怀人之作。怀人之作，我国从前的书翰和诗词里相当多。或者追忆旧游，或者叹惜久别，也有以道义文章相砥砺的。但是涉想的范围大多限于个人，一方是作者自己，另一方是所怀念的那个人。巴金的这一篇可不然。他涉想所及不限于他自己，他的笔下闪耀着中国作家、中国人民的心灵的光辉。文章里称名道姓叙述到的日本朋友共有十三人。然而所怀念的岂止这十三人呢？共同的事业，美好的未来，联系着中日双方，如水长流，如山永固，这样的思想交织在字里行间，叫人读过之后，不但引起共鸣，而且跃然振奋，愿意在共同的事业中间投入自己的力量。我想这么说，这篇文章给怀人之作开辟了新的境界，大概不算过誉吧。

我非常羡慕巴金的文笔，那么熟练自如，炉火纯青，并非容易达到的。看来像是随便想起一点儿写一点儿，其实完

全不是。作者自己道出了秘密。他说："我并不是一口气写成这篇短文。我只是在思念最深的时刻写下一点怀友的感情。""思念最深的时刻"七个字大可注意。这时刻，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消散了，隐没了，涌现在心头的，尽是些最为精要的活龙活现的东西；把它写下来，当然扎实，当然深至。从这儿可以知道，所谓取材决非纯属于技术性的事儿，或许竟是不属于技术性的事儿。作者写了两位日本朋友和他自己的眼泪，这眼泪中闪耀着光明美丽的未来的远景，不同于寻常的眼泪。作者写了一位一向寡言笑的日本学者，他谈起中日人民的友谊来却滔滔不绝，他赶来赶去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惟恐少享一分"有朋自远方来"之乐。作者写了两位过去是所谓没有倾向的日本作家，近年来他们觉得有许多话要告诉世人，留给后人，就有所为地奋笔写作品，见得日本知识分子跑出象牙塔，跟人民融合在一起，已经是大势所趋，汇为巨流。好了，我不再举例了。总之，写下来的全是"思念最深的时刻"涌现出来的最为精要的东西。思念的波澜化为文章的波澜，那么自然，那么优美，洋溢着中日人民间的深情厚意。

白羽的文章题作《樱花漫记》，可不是纯写樱花。可以这么说吧，他这篇文章谈日本人民的今天和明天，而以樱花为象征。原以为樱花就要开放，不料来一场挺大的雨雪，"但真正的春天永远属于人民，樱花，这绯红的云霞，便永远属于人民。"雨雪一过去，日本人民陶醉在樱花的海洋里了。樱花那种一发而不可制的活力，迎春风而怒放的精神，跟日本人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热情仿佛有相通之点，这个里头蕴蓄着那个，那个里头蕴蓄着这个。这些想法，都含有象征的意味。

妙在写樱花跟叙人叙事结合得那么顺适，笔下随处透出卓越的思想和爽朗的感情，叫人亲切地感到烂漫的樱花真是日本人民的骄傲。白羽擅长特写和通讯报道，写得很多，名篇时出，这一篇尤其是这类文章里的白眉。

年青的日本朋友指点着车窗外的“人民广场”和国会大楼，神采奕奕地，情不自禁地，说着去年二十三次行动的斗争情形。国会门前，手执红旗的请愿的人群尽往上冲，穿黑制服的“仿佛是带弹簧的玩具”似的警察正在阻止他们。高楼上垂下一幅法西斯黑卐字旗，电线杆上张贴着红黑二色的“爱国党”的恐吓标语。一边是樱花，一边是雨雪。而真正的日本是樱花，未来的日本将永远属于樱花。

文章里叙及好多位日本人士，叙中野重治和中岛健藏的两段最长，也最为深至。中野重治说：“有些人认为只要是‘新’的东西，只要是外国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这些人又偏偏同日本的保守势力密切地相联系着。那些接受表面上所谓‘新’事物的人却反对本质上的新事物。”作者说：“本质上的新事物纵然一时不被人接受，但是总有一天一定会被接受的。”简单朴素的心心相印的谈话里，透露出多么犀利的眼力，蕴蓄着多么深湛的哲学啊！中野重治临走时候说：“是的，在新的里程上，我们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但是更大的困难，只能激起我们更大的勇敢！”这是不折不扣的樱花精神。中岛健藏热爱生活，工作累了，就跑进布置在家里的小工场去修理各种机械。在业余摄影家中，他是第一个能手。远道客人来了，他乐意抽出半日之闲，陪同客人去观赏公园里的樱花。但是他热爱生活的主要方面是坚韧不拔地站在斗争的前线。在若

于斗争中，他不仅是维护者倡导者，而且身任律师出席法庭，使一切违反真理和正义的东西无地自容。这是不折不扣的樱花精神。作者表达他的印象说："如若说在中野重治那里我感到一个民族的刚强与坚毅，那末，在中岛健藏这里我感到一个民族的深厚与宏大。"这样的民族，会不是丰茂灿烂，岁岁长春的樱花吗？

这是一篇有益的文章，对中日读者都非常有益。

冰心的文章题作《樱花赞》，也不是纯写樱花。她叙入一件跟樱花无关而极有意义的事。出租汽车公司的工人原定在那天早晨八点开始第六次罢工，为了送中国作家代表团上车站，他们开了紧急会议，把八点开始改为九点开始，因此，代表团得以不误预定的活动日程。这可见今天的日本，樱花精神真是无时无地不存在。而司机说的"促进日中人民的友谊，也是斗争的一部分啊！"并不是那司机个人的想法，而是代表所有罢工工人表达了他们的樱花精神。无怪作者会感觉那天早晨在汽车中看见的沿路的樱花是"从未见过的奇丽的樱花"了。樱花总是樱花，感极思深，景因情异，就见得特别"奇丽"了。

代表团的十一辆汽车在花海里飞驰，没有别的车辆。到了市中心，还是没有别的车辆，汽车行大门敞开，门口插着大面的红旗，工人们站在门旁边，微笑着，目送十一辆汽车经过。这些白描的笔法，传出了罢工的气氛和工人的友情，是"妙手偶得之"的好文章。

君健的《日本杂记》是两则见闻录。一则题作《有料路》，说日本有些公路，汽车开过要付"买路钱"。一则题作《国立

公园》，说日本名胜区箱根号称“国立公园”，实则为两个“企业家”所占有，他们想方设法给游客提供“方便”，不仅垄断了箱根，连游客的一切活动也给垄断了。这样的事，说给我国的少年儿童听，一定会不相信。路人人好走，怎么要付“买路钱”呢？既然是“公园”，怎么能让两个“企业家”给垄断呢？这样的事，我们年纪较大的人当然不会不相信，但是觉得很疏远了，倒有点儿“新鲜”了。君健身历其境，大概是感到“新鲜”，才执笔写入他的笔记本吧。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三日作

刺绣和缂丝

最近在苏州参观江苏省工艺美术研究所。敞亮的工作室里，著名的金静芬老太太与好些中年妇女和女青年在那里刺绣，大多是赶制“七一”的献礼品。谁都像忘了自己似的，全神贯注在一上一下的针线上，使参观的人不敢轻轻地咳嗽一声，不敢让脚步有一点儿声音。“绷架”上或是大幅，或是小品，大幅几个人合作，小品一个人独绣。花线渐渐填充双钩的底稿，于是一只有神的眼睛出现了，一张娇艳的嫩叶出现了，层叠的峰峦显出了明暗，烂漫的花朵显出了阴阳。

大凡工艺美术的活儿，要是要求不高，竟可以说人人干得来。譬如刻图章，说容易真容易，阴文只要把字的笔画刻掉，阳文只要把字的笔画留着。有些小学生中学生爱找一块图章石买一把刻刀来玩儿，原由之一就在刻图章这么容易。但是要讲布局，要讲刀法，要讲整个图章的韵味，就连积年的老手也未必个个图章都能踌躇满志。刺绣这活儿，无非拿花线填充底稿而已，只要针针刺在界限上，线跟线不散开也不重叠，就成了，这还不容易？但是要讲选用花线颜色恰到好处，要讲丝毫不露针线痕迹，要讲整幅绣品站得起来，透出生气和活力，就跟画家画一幅惬心之作一样，是不怎么容易的艺术造诣。有些绣品诚然平常，如演员身上穿的戏衣，如

百货店柜台里陈列的椅垫枕套。我看江苏省工艺美术研究所完成的绣品，却几乎幅幅是惬心之作，是不用画笔而用针线画成的好画。在从前，谁绣出这么一两幅，人家就交口赞誉，称为“针神”了。而现在“针神”竟有这么多，静静地坐在那里刺绣的老年中年青年人全都是“针神”！百花齐放的时代啊！她们的成品在好些刺绣车间里是制作的楷模，在展览会和陈列馆里是引人注目的展品，在国际交往间是最受欢迎的礼物，需要那么多，因而经常供不应求。

新创的针法听说有好多种，没仔细打听，说不上来。研究所正在写稿子，总结种种经验，我很盼望早日成书问世。虽然完全隔行，也乐于知其梗概。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说努力的方向在使画面富于立体感。的确，我们看见的旧时的佳绣，工致匀净有馀，生动活泼不足，换句话说，就是缺少立体感。要画面富于立体感，就是说，绣品要超过旧时的佳绣，真够得上称为生动活泼的好画。这个方向定得好，见出革新的精神和追求的勇气。而摆在面前的绣品，几乎幅幅是好画，又可见新针法新经验已经起了作用，所谓富于立体感已经在艺术实践中做到了。刺绣固然不是垂绝之艺，可是一代一代传下来，艺术上的发展不怎么大。现在多数人集体钻研，共同实践，有意识地要它发展，发展果然极大，往后精益求精，前途何可限量。这儿我只是就苏绣而言，此外如湘绣广绣，虽然知道得很少，想必跟苏绣一样，近年来艺术上也有大发展，为历来所不及。从刺绣我又联想到同属工艺美术的木刻水印术，十年来的发展多大啊！十年以前，表现北京荣宝斋最高造诣的是《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到现在，《文苑图》和

《夜宴图》的复制品挂在荣宝斋的橱窗里了。要不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说，很难相信从比较简单的笺谱发展到《文苑图》《夜宴图》那样要印几百次才完成的工笔绢画(《夜宴图》现在才复制一段，五段复制齐全，估计要印一千八百次)，只有十年工夫。总而言之，各种工艺美术像是结伴合伙似的，赶在最近这十年间都来个大大的发展。这儿乎不须列举若干个为什么，套用一句"其故可深长思矣"也就够了。

对于女青年，研究所规定常课，要她们练习绘画。这个措施极有意义。既然要用针线画画，练习用画笔画画自然有很大好处，从这中间通达画理，无论选线运针就都有另外一副眼光了。我知道在那里刺绣的老年中年人，她们年青的时候没受过这种基本训练。她们从小学刺绣，无非练成个手术，贴补些家用而已，精不精并非主要考虑的事，偶尔有几个人用力勤，用心专，天分又比较高些，才成为好手。现在不同于她们年青的时候了，刺绣是工艺美术之一，要学就非精不可，于是注重基本训练，借以保证人人能精。这是现在青年的好运气，也是刺绣艺术的好运气。

研究所里不仅刺绣一门，还有缂丝，象牙雕刻，黄杨浮刻，这几门也是制作兼研究，所以这机关叫做工艺美术研究所。现在光说缂丝。缂丝是始于宋代的一种丝织工艺，宋以来的缂丝佳作，现在在少数几个博物馆里还可以看到。在清代，苏州担负了皇家的织造任务，缂丝就在苏州流传，织工聚集在城北叫陆墓的小镇上，主要织造宫中所用的袍料。近几十年来，干这一行的越来越少了，知道什么叫缂丝的也不太多了，缂丝成为垂绝之艺了。一九五五年初冬我到苏州去，

那时候刺绣合作社刚组织起来(就是研究所的前身),就从陆墓请来几位老艺人,让他们传授这个垂绝之艺,其中一位姓沈,七十多了。这一回没见着沈老,听说他还健康。堪喜的是现在不织什么袍料,而是继承着宋以来佳作的传统,织优秀的画幅了。更堪喜的是老一代培养年青一代,缂丝这一种工艺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将像刺绣一样,老树枝上开出新鲜的花朵。

缂丝是怎么一回事呢?不妨拿刺绣来比较,刺绣是在现成的料子上加工,绣出图画或是文字,缂丝是在织作的时候织出图画或是文字,织料子织花纹一气呵成。缂丝又跟织彩缎文锦不一样。彩缎文锦也是织料子织花纹一气呵成的,因为图案有规则,彩色有限制,依靠纹工的事先安排,各色纬线一梭去一梭来,梭梭都径直穿过。缂丝可不一定织图案,彩色看稿样而定,譬如稿样是一幅花卉,彩色很复杂,每种彩色又有不同程度的深淡,缂丝都得照样织出来。这就不是纹工所能事先安排的了,只能把花卉画的轮廓描在经线上,用小梭子引着深淡不同的各色纬线,看准稿样的彩色一截一截地织,某一梭该三根经线宽就织三根经线,某一梭该五根经线宽就织五根经线。两脚踩着织机的踏板,牵动经线一上一下。一堆小梭子搁在旁边。手里拿个小铁篦挑起几根经线,就捡一个适当的小梭子穿过去,随即用小铁篦轻轻地把织上的纬线贴紧。整幅缂丝就是这样织成的,真是磨细了心思的工作。

我怀着这样一个愿望,把一些工艺美术的制作过程写下来,要写得清楚明白,让不知道的人仿佛亲眼看见了似的。这儿写缂丝,自己觉得未能满足这个愿望。这是了解不透彻,观察不细密的缘故,我很抱愧。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七日作

荒沙的改造

我们出赤峰市区，往西北走十多里，参观当铺地生产大队。远远望见林木葱郁，连成一片，也不知道有多少亩宽广。及至身入林中，高树成行，浓荫蔽日，渠道里的水湲湲流动，静心听可以听到流水的声音。地里的玉米高过人头，高粱又比玉米高得多，全都叶肥实饱，也像是矮矮的树林。这些庄稼地，一大块一大块的，让高高的柳树林杨树林榆树林围住，不留一点空隙。大队书记陈同志在地里抓起一把干泥片，有三四分厚。他说庄稼长得好，主要靠引洪淤灌，这就是今年淤积的。一连淤积几年，就把土质改好了。所谓引洪灌溉，就是在洪水时期引导河水灌地，让它沉积在地里。洪水从上游下来，带来肥水较多，淤灌一回比施一回肥更见功效。这是改造沙地的好办法。

在一九五零年以前，这当铺地只是一片荒沙，没有什么树林，没有什么渠道。大风刮起沙土，天昏地暗，白昼也得点灯。开了门没法走出去，因为刮过来的沙土齐了房檐了。在芒种过后才开始种庄稼，芒种是阴历六月上旬的一个节气。只能种一些六十天内能够成熟的东西，如糜子黍子之类。十年九旱，种了下去看看不成了，再重新播种，一年里头重播三回五回是常事。因此，人民生活困苦，一年里头吃不上三个月饱饭。谁

料想仅仅经过十多年，到现在全队四百一十九户，户户有五百元以上的收入，大部分人家在银行里开了户头存了款呢！

当铺地完全改变自然面貌，就靠围沙、造林、兴修水利、改良土壤这几项工作。当初提出种树，很有些人表示怀疑，沙是活的，涌过来冲过去像是波浪，怎么能在沙的波浪上种树呢！互助组就说试着瞧吧，先栽些沙蒿沙枣之类，让这些东西的根子固住表面的沙，再栽些容易生长的树吧。栽了果然见效，群众的信心就来了。而且觉得风沙不像先前那样放肆了，假如修渠道，不至于一转眼间就让沙掩没了。于是逐年加栽些树，逐年修些渠道，一连几年，树栽得更多，渠道修得更起劲。细列逐年增长的数字，看起来会嫌罗嗦，单说目前的情况吧。护路有林，护渠有林，护河岸有林，还有经济林，用材林，果树林，防风带。全队九千二百多亩地，让树林占着的就有五千八百亩。水利方面呢，干渠两条，一条十八里，一条二十五里，支渠七条，其中三条各长五里，还有五里长的防洪坝，还有个水电站，全大队九千二百多亩地，水浇地就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以说基本上水利化了。

树林和渠道逐渐增多，加上引洪淤灌，气候改变了，土壤也改变了。原先要芒种以后开始播种，如今可以提早五六十天，可以种麦子玉米高粱了。比一比前后的单位面积产量吧，一九四九年才七八十斤，一九五八年升到二百二十斤，十年功夫增多了两倍光景，不是改造自然取得胜利的明效大验吗？

还有三年功夫就改变了自然面貌的呢。通辽市有这么一个地方，原先也是一片荒沙，别无所有，一九五九年修成个

沙坝水库。这回我们去参观，只见地里长着茂盛的庄稼，草地上散布改良种的牛群，荒沙变为绿原了。我写了一首诗，现在抄在这儿：

大坝万米众聚沙，辽河引水一迳斜，
波光云影顿涌现，千渠东出分枝杈。
沙土解渴气沾润，庄稼牧草绿无涯，
沼泽水滋蒲苇盛，清池风动红莲花。
远从长江移鱼种，银鳞塞北新有家，
一尾何止十斤重，烹鲜共叹鱼味佳。
人力胜天岂虚语，党群丰绩良堪夸，
三年全改自然貌，谁信往时荒沙而外更无他。

为什么用沙筑坝呢？这是因地制宜，当地石料土料都缺，多的是沙，那就用沙吧。沙坝成吗？成，略微有点渗水，问题不大。倒是西北风猛烈的时候，波浪冲激，要刷去坝坡的沙不少，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已经研究出来，只要坡度再缓些，让坝高与底线成为一与十二之比，就不至于被冲刷了，而且已经着手加工，现在加到一与六七之比了。我的诗里说“大坝万米”，是就整数而言，实际还不止，是一万一千米。佛经里说聚沙成塔，只是一种幻术。现在亲眼看见聚沙成坝，而且是一万一千米长的一道大坝，长城似的拦在明净如镜的水库东边，怎能不震惊于组织起来的伟大的人力呢？再说荷花，无论红的白的，鱼，无论大的小的，本来都很平常，没有什么稀罕。但是在三年以前还是一片荒沙的这个地

方，看到小池塘里开着红艳艳的复瓣荷花，吃到一盘又一盘的鲜鱼，一种异常复杂的感觉萦绕心头，简直没法描摹。我们谈到这一点，彼此都说真是那样。大概因为感动太深，联想太广，倒成为不能以言语形容了。

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作

林区二日记

八月八日立秋，上午十点过，我们在牙克石登火车，往大兴安岭林区。牙克石在大兴安岭西边，我们要去的甘河在大兴安岭东边，相距三百五十公里。先经过草原地带，各种草开各色花，就像是到处飞舞着嬉春的彩蝶。既而两旁有散立的松树和白桦了，有缓缓起伏的冈陵了，冈陵上松树和白桦成林。下午四点光景到岭顶站，看站名就知道这儿是这条线路的最高处。在站上望岭北，满眼是绿，多宽广的林海啊！于是我得到两句诗，“连山林绿真成海，满地花鲜胜似春。”

一路上逢站停车，停车的时候往往交车。开过来的车全装木材，截得长短如一，叠得整整齐齐。在岭顶站就见一列车蜿蜒而上，出没在林海之中，像一条龙。从前人赞美出山的泉水，因为泉水出了山就要去沾溉大地。这些出山的木材啊，要送到全国各地，支援各方各面的基本建设，同样值得赞美。而木材不会像泉水那样自己跑出去，这就该转而赞美伟大的人力了。听牙克石的萨书记说，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到如今，大兴安岭林区已经输出木材二千万立方米。

身到大兴安岭，才发觉平时的想象错了，同行的人差不多都有这个感觉。从一个“岭”字，就想象到秦岭那样岩峦磅礴、长江三峡那样峰岩重叠，哪里知道完全不对，就是站在岭顶

上，前瞻后顾，也只见缓缓起伏的绿浪而已。别处山上树木杂，长得参差，又兼有一搭没一搭的，就见得山形勾勒分明。大兴安岭的林木，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落叶松，长得整齐，而且略无缺处，远远望去，漫山遍野铺着绿色的绒毯，使群山的线条显得那么柔和，几乎难分界划。我作了这样一首诗：

母林绿暗幼林鲜，嫩绿草原相映妍，
间以桦林挺银干，画家着笔费精研。

我想同样是绿，要分明暗老嫩，这不太容易着笔。而明暗老嫩的界划不甚分明，又加一重难处。至于白桦林，我觉得那些银亮的笔直的线条，掺杂在各各不同而又非常融和的绿色里头，仿佛很调和似的，用画笔来描绘，要是线条生硬一些，选用颜料欠一些斟酌，怕就表现不出那调和的意味，甚至会显得刺目。当然，这只是外行人替画家担忧的想头。

再说落叶松，平时从没想到松里头也有落叶树，总以为松柏联称，凡是松全都是四季青青的。既然落叶，可以想象凉秋而后，整个林区将会变为挺立着亿万株冲天直干的冰雪世界。改换冬装就改得那么彻底。听说落叶松的球果，每颗是三十二个鳞片，每个鳞片有两粒种子。种子长着翅膀，乘风而飞，能达一百米。靠种子的飞翔自然繁殖后代，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岁。可是现在人们采集了种子种在苗圃里，培育成幼苗，再移植到别处去。人工繁殖当然能够称人的心意，环境安排，日常养护，都可以尽往好的方面做，其结果是得到成长较快质量更好的木材。木材用作煤矿的坑木是一大宗，

其他如枕木和电线杆，还有房屋的梁和柱子，也多用落叶松。松树皮可以提炼单宁，在化学工业方面，是一种极重要的原料。

白桦的用处也不小。木材可以制高级的胶合板，中含糖分很多，可以制糖。树皮可以提炼汽油。总之，如果列一张综合利用表，项目要多得多，我弄不明白，只好从阙。那白桦皮非常可爱，像是细银丝编排成的，闪闪发亮。剥去银亮的外层，里层作玉润的象牙色，文理那么匀净细腻，叫你不敢心粗气浮随便把它撕破。无论外层内层，如果取作室内的护壁，我以为比糊上花纸漂亮，雅致。不知道有没有建筑家考虑过。

树木当然不止落叶松、白桦两种，还有榆、柳、青杨、樟子松之类，所占成数不大，只是附庸而已。

火车到达甘河在夜间十二点，我们已经入睡了。第二天清早，林业局十几位同志来相迎，到局中小憩，并进早餐。解放之初，就在林区成立三个林业局，工人仅有两千多。逐步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五个局，三个筹备处，干部工人共有十万二千人。各个局是独立的企业单位，由林业管理局统辖。局在林区分设若干林场，为管理的分支机构。林场又分设若干工段，实做采伐运输培育各项工作。这么多的人深入林区，还有家属，一切生活上的需要都得供应，文化教育上的需要也必须满足，因而一个林业局不仅是一个企业单位，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市镇。跟许多矿区垦区水利工程区一样，从前是渺无人烟，仅有自然景物，如今建设起新的市镇，千千万万人在那里安居乐业，为社会主义事业尽力，想想这情

景，是多么伟大的转变啊！

进早餐的时候，听说有一位鄂伦春族的青年干部，从鄂伦春自治旗来的，我们就拉他过来，请他边吃边谈。他叫泉博胜，中学毕业，身体壮健，面目清秀，穿一身蓝布制服，说汉话挺流畅。他说鄂伦春族从前过部落生活，每个部落七八户，部落长由大家公推。猎获野兽，平均分配，没有争执。向不定居，哪里有野兽就赶到哪里。麻疹和风湿病是可怕的病患，敬撒满神求治，当然没有什么效果。拿猎获的野货跟外间换一些日用品，受尽人家的欺侮和剥削，不忍细说。解放以后才像登了天。鄂伦春自治旗建立起来了，到今年国庆节是十周年，族人聚居在旗里的有一千多，还有定居在别地的。各方面得到政府的特别照顾，健康情况大好，青少年都上学，已经有受高等教育的了。他说族人的特点是勇敢而和气，打猎从小学会，他自己打猎的本领就很不错，并非夸口。又说他已经结婚，爱人是汉族，在从前当然是不可能的。

早餐过后，我们上小火车，要经过五十公里，到一处地方叫库中。小铁路是林业管理局所修，轨距零点七六二米。管理局还修好些公路。所以林区的交通线真可以用蛛网来形容，主要为的运木材，也便利工人上班下班。我们所乘的车，构造和大小，跟哈尔滨儿童铁路的客车相仿，双人板椅坐两个人，左右四个人，中间走道挺宽舒。车开得相当慢，慢却好，使贪看两旁景色的人感到心满意足。车窗外就是树木，树木外边还是树木，你说单调吧，一点儿也不，只觉得在林绿之中穿行异常新鲜，神清气爽。古人栽了几棵梧桐或者芭蕉，作诗就要用上“绿天”，未免夸大。这时候我倒真有“绿天”的实感，

要是搀些想象的成分，竟可以说映人衣袂都绿。既而看见一条河道与铁路平行，一打听知道这就是甘河，水清见底，水草顺着流向徐徐袅动。我又得诗一首：

波梳水草成文理，澄澈甘河天影蓝，
高柳临流蝉绝响：清秋景色宛江南。

我注意到绝未听见蝉声，后来与老舍先生交换看诗稿，不约而同，他也有"蝉声不到兴安岭"之句。究竟是兴安岭上根本没有蝉，还是岭上气候较凉，蝉声早歇，我们二人都不知道。问几位陪我们入林的同志，也没得到确切的回答。

午后十二点半到库中，一下车就往左边的原始林跑去。所谓原始林，就是从没经过采伐的，那些树自生自枯，世代相传，占着这块地方，并且逐渐扩大领土。拿落叶松来说，从幼苗到长足要一百年到一百二十年，看年轮就可以知道。而从长足到枯死，到腐朽，又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年。眼前这些挺得高高的生气蓬勃的落叶松，是开始居留在这里的祖先的第几代后裔呢？脚踏在地上，软软的，陷到脚踝，原来青草和结着浆果的小灌木底下，尽是松针和断枝碎皮，或者已经腐烂，或者将腐未腐，也不知道有多少厚。这些松针和断枝碎皮，是多少世代的生命的残骸呢？边跑边想，总觉想不清楚。

挑定一处地方，在地上铺了几方毡毯，大家坐下来。我学几位同志的样，索性躺下来，伸展四肢，仰面朝天，看明蓝的高天和悠闲的白云。落叶松的树冠并不相互邻接，因而

不至于翳天蔽日，阳光漏下来，照得身上微微发汗。望那些树干，挺极了，好像都不是静止的，棵棵都在往上伸，直欲伸到蓝天。忽然听见枪响，就有人说打中了，是一只乌鸡。谁打的？当然是泉博胜。泉博胜证实了他并非夸口，好几个人背着枪捧着乌鸡照相，分享他的成功的欢快。乌鸡大如鹅，全身乌黑，只翅膀边上有几片白羽。

在原始林中野餐，在原始林中听歌看舞蹈，全是平生所未经，那新鲜意趣实在难写难描。既而工人为我们表演锯树。一个人一条腿跪在地上，手里的锯离地不到一尺，就树干的这边锯，又就树干的那边锯，大约五分钟光景，一棵落叶松就横倒了。数数年轮，八十多岁，还没长足。又改用柴油锯锯另外一棵。柴油锯不须人力推拉，省力气，锯得快，只消两分钟，树就横倒了。听说还有一种电锯，也锯得快，可是电缆横在地上未免碍事，不及柴油锯方便。

锯树总算看到了，但是没看到一个工段多数工人在那里采伐的热闹场面。刚交秋令，还没下雪，无量木材从冰道上滑下去的情景当然无从看到。大家说，到冬季咱们再来吧。因为林区管冬令叫黄金季节，采伐运输最繁忙，看辛勤的人在冰天雪地里活跃，精神上该会得到极大的鼓舞。

在回到甘河的车中，我回味原始林中的印象，又作一首诗：

株株竞上望如伸，原始林中卧碧茵。
倏见乌鸡应声坠，神枪无愧鄂伦春。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作

闽 游 所 得

我曾到福建省参观，时间是十月下旬，十一月上旬。所经沿海平原地区，稻穗沉重低垂，弥望黄云，纯是丰收景象。要不是到处听人述说，谁也不会觉察今年曾经跟特别严重的干旱较量过一番，终于群力胜天，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今年福建省的干旱是相当严重的。从去年秋后到今年夏收将届，一连两百多天没下过一场透雨，有的地区是一连两百八十天。许多地方山泉枯了，溪流断了，水库干了，甚至人畜饮用的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在这样情形之下要抗旱保苗，在旧时代是绝对做不到的，惟有社会主义的时代才能轰轰烈烈地干起来，才能在大旱之年仍然完成全省的粮食生产计划。

抗旱保苗当然要靠物质条件，如溪流和水库，各种排灌机械和器具，都是物质条件。但是尤其重要的是人，必须人人一条心，立下坚定的意志，一定要战胜干旱，才能适当地利用各项物质条件，并且开动脑筋创造出新的物质条件。在抗旱初期，虽有极少数的人信心不足，或者以为人力怎能抗天，但绝大部分的公社社员可不这么想，他们相信人定可以胜天，群力强大无比，自力更生定有办法。在这个场合，政府的领导最关重要。领导不是什么下一道命令的事，而是摆

事实，讲道理，辨利害，使大家彻底想通，真正受到教育的事。经过教育，少数人的错误想法纠正了，绝大部分人的想法凝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于是近乎奇迹的事也干出来了，种种新的物质条件也创造出来了，总之要让庄稼得到灌溉，能多浇一亩就多浇一亩，至于人力，反正有意志坚定的广大人民群众在。领导者不仅对群众进行教育，他们既然坚信抗旱可以取胜，就以身作则，跟群众一起抗旱。如旱情最严重的龙溪专区，省、专区、县、公社的工作队和大队的主要干部共一万多人，参加抗旱劳动的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是“不言之教”，对群众是无可比拟的鼓舞，能够这样，任何艰难都不难克服，当然是抗旱取胜的一项重要保证。

在抗旱斗争中，群众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非常可贵，宁愿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这在旧时代是很难设想的，是历年来社会主义教育的结果。群众真切地体会到个人得利不算得利，大家得利个人必然得利，识见深了，气度也就大了。这儿简略地说一说榜山公社的事。今年春耕时节，漳州的旱情非常严重，有七个公社的将近十万亩稻田没有水溶田，不能插秧。只有一个办法，要堵住九龙江的西溪，使江水改道，才能溶这将近十万亩的稻田。但是江水一改道，紧靠江边的榜山公社就有一千三百亩低田受淹，其中三百多亩种的小麦，已经抽穗，三十多亩是秧田，此外是稻田，全都施了基肥了。简单一句话，江水一改道，榜山公社要吃很大的亏。你猜榜山公社的干部和社员怎么说？他们说：“淹掉我们一千多亩田地，换来将近十万亩的好收成，这是‘舍卒保车’，值得！如果那十万亩插不上秧，我们每块田里都结金子也

补偿不了这个损失。”请想想，这是大伙儿说的话，是比金子还要贵重的话，表现出新社会最高尚的精神。他们不仅同意淹没社里的一千三百亩田地，还抽出劳力和船只来参加堵江截流的斗争，江堵住了，又组织劳力疏通渠道，加快江水的流通，使那几个公社得以赶早溶田，赶早播种，并且抽出抽水机和耕牛来支援他们，使他们耕种得更快。这样一来，那十万亩全插上秧了，“车”是保住了，榜山公社的干部和社员又立下决心，要来一个“保车又不丢卒”。于是奋力排水，赶紧抢种，又是一场紧张的斗争。别的公社也来支援他们，劳力、耕牛、肥料、秧苗，一应齐备。结果一千三百亩受淹的低田全插上了秧，时间还不嫌晚，果真做到“卒”也没丢。听了这样的述说，想想这样的情景，谁能不深受感动，淌出欢喜的泪来？自古以来的人从未达到过的精神境界，如今有这么多的干部和社员行所无事地达到了，怎能不欢喜？

今年遭到干旱的威胁的不只是福建一省，湖南、江西、云南、贵州、广东、广西都有不同程度的干旱。还有好些地区遭到洪涝，最严重的是河北省。从报上的报道和各地朋友的述说，可以知道各地的自然灾害虽然情形不尽相同，可是群众抗灾的精神相同，全都相信人定可以胜天，群力强大无比，自力更生定有办法。还有相同的是大家动脑筋，出力气，千方百计跟自然灾害斗争，自然灾害务欲破坏人们的生产，人们却坚决不让它破坏，结果是农产不至于降低，好些地区还得到丰收。还有相同的是领导者能以身作则，参加到抗灾的最前线，在思想意识和劳动技术上具体地领导，对群众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还有相同的是榜山公社那样的高尚精神，几乎

各地都有所表现，或是个人，或是集体，他们在实际行动中务欲利人，甚至利人而不顾自己，都认为这是尽本分，应该这样做。

我想，在当今的时代，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任何艰难都不足以难倒我们了。自然灾害本是挺坏的事，可是自然灾害使群众从实践中相信人定可以胜天，使群众找到许多抗灾的窍门，练成许多生产的本领，使群众更加团结一气，心心相通，亿万人像一个人，那么自然灾害果真是挺坏的事吗？似乎可以这么说，不遭到自然灾害当然好，遭到了也不坏，因为我们从而得到磨砺，就会变得更坚强，更有力。想到这里，不禁兴奋莫名，愿意把这一点意思写下来，告诉侨居国外的亲爱的同胞。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作

略谈新中国的交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五年间，各方面的改变和进步，一天两天也谈不完。现在只有十来分钟的时间，我只能挑一个方面来谈谈。我准备谈交通方面。交通方面还是个大题目，只能缩小范围，谈谈我亲身的经历。

抗战期间，我在成都住了四年，为了接洽事务，看望朋友，每年总要去重庆一两趟，来回乘公路车，照规定，单程是两天，中途在内江歇夜。可是准两天到达的次数并不多。公路车好像全害着或轻或重的病，一会儿病发了就抛锚。抛了锚，什么时候修好是没有准儿的，这就延误了时间。单程走三天，还算是幸运，有一趟从重庆回成都，足足走了六天。一路上看见成渝铁路的路基躺在那里，河道上矗起高矮不齐的桥墩，心里总要想，“盼了好多年的成渝铁路还是这个样儿！什么时候路基上铺上铁轨，河道上架起桥，就不受这个罪了！”现在成渝铁路早已修成，一九六一年五月间，一天晚上我在成都上车，一觉睡醒，就到了重庆。回忆当年的困顿情形，今昔一对比，心里的欢喜简直没法形容。

说起成渝铁路，自然联想到宝成铁路。宝成铁路翻过秦岭的一段，工程最艰巨。线路在重山叠嶂之间回环盘曲，一会儿钻进隧道，一会儿钻出隧道，我也没数清隧道有多少。到

最高的处所一看，刚才经过的线路和隧道全都陷在底下，不知道有几千丈深，自己虽然是坐在车厢里上来的，仿佛也感到相当吃力。想到规划这段线路的人，想到修筑这段线路的人，他们的智慧和魄力多么值得感佩啊！还有一点必须说的，这段线路，就是从宝鸡到凤州的一段，改为电气化有好几年了。电气机车力量大，拖着列车翻过秦岭，好像挺轻松的。

一九五三年秋天，我从西安到兰州。以前陇海线只到天水，宝鸡到天水一段叫宝天铁路，那是一条烂铁路。路基狭窄，路两旁山壁笔直，线路弯曲的处所半径极小，隧道大多没有加工衬砌，很多该修涵洞的地方没有修，修了涵洞的，直径又太小，不能通畅地排泄流水。总而言之，工程异乎寻常地草率。工程草率，铁路就不管用，土石时常崩塌，路基时常给流水冲毁，当时虽说通了车，实际上通车的日子很少。大陆解放的第二年，就是一九五零年，咱们就改善这条铁路，以前工程上的种种缺点全给改正，同时新修天水到兰州的铁路。不到两年半工夫，工程全部完成，从西安就可以直通兰州了。我到兰州，就在工程全部完成的下一年。在车上听人说，修这条线路，解放军的军工和几个民族的民工，大约有十万人付出了劳力。看全线的工程真不容易，可是修得那么好又那么快，我永远忘不了这十万人的功绩。

兰州往西北，兰新铁路通到乌鲁木齐。兰州往东北，包兰铁路通到包头。这两条路我还没走过。我只从北京乘车到呼和浩特又到包头，虽然行程并不长，已经深切地体会到横穿我国北部的铁路线的伟大意义了。这样的铁路线好比人身上的大动脉，大动脉畅通，供血量充足，身体自然会越来越

壮健。

我又曾经到内蒙古东部的三个盟，呼伦贝尔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还进入大兴安岭林区。车窗外只见老林幼林，浓绿嫩绿，中间点缀着白桦树笔挺的银色树干，一点也不假，真是个“林海”。下了火车又登上林业局的小火车，在密林中间穿行，直到未经开发的原始森林。往外开的火车和小火车，一列一列的，满满地装着木材，叫人看着就兴奋。

至于东南地区，我必得说，现在福建省有了铁路，真是极大的方便。四十年前，我从福州回上海，遇到天气不好，风浪大，一上轮船就躺在铺上，糊里糊涂过了几天，什么东西也没吃，直到轮船进了黄浦口才坐起来。当时我想，再也不敢到福州了。去年我从上海到鹰潭，转鹰厦铁路又转南福铁路，不满二十九个钟头就到达福州。在四十年前，哪能料到会有这样又迅速又安适的旅程呢？从福州坐公路车往南，经过莆田泉州到达厦门，回程走了鹰厦铁路全线。鹰厦铁路大体上是南北走向，在南平的莱洲往东伸出一线，大体上是东西走向，就是南福铁路。再加上支线和公路线，福建全省就贯通一气了。

还有武汉的长江大桥必得说一说。我曾经坐在车厢里经过大桥，又曾经在桥上步行，眺望武汉的形胜，欣赏大江的壮阔。“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我默诵毛主席的词句，觉得这个词句不仅是咏大桥，而且充分表达出中国人民的气魄。长江大桥建成之后，北京广州之间就每天开直达通车。在以前，这是谁也不曾梦想的。

刚才我说过，一九六一年五月间到重庆。在重庆待了几

天，就乘轮船到汉口，这是我第三回走这条水路了。头一回在一九三七年年底，坐的轮船，是上水。第二回在一九四五年年底，坐的木船，是下水，一路上歇风歇雨，耽耽搁搁，走了一个月才到汉口。那两回真不是滋味，混乱，慌张，时时刻刻提心吊胆。好多处山崖上写着大字——某年某月某日，某某轮在此沉没。有些地方，还看见出事的轮船侧躺在那里，不由你不心里一沉。这一回可大不相同了。只见一路上布置着信号杆和导航标志，到夜间，那些浮在江面上的导航标志就一会儿亮一会儿灭，因而无论昼夜，可以安全通船。许多险滩给炸掉了，听说共有百把处，顶有名的险滩滟滪滩，现在没有了。轮船上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你吃饭，休息，靠着栏杆看看三峡的峰峦，坐下来读几页书，全都感到非常之安适。回想以前江轮上海轮上那种乱糟糟的情景，这一回旅程真该说太舒服了。

我谈到这里为止。往后有机会，再谈别的吧。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为香港《大公报》作

老境集



《甪直闲吟图》题记

余到甪直任教于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校，盖应同学兄吴宾若王伯祥之招。时余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所设之尚公学校，二兄书来，谓往时意气相投，共事教育，必所乐愿。余遂辞尚公而就五高，于一九一七年春季开学前与二兄同舟到甪直。宾若任校长，伯祥与余皆任级任教员。二兄在校已几何时，不能详忆，惟至多不逾二年。

一九零七年春，苏州公立中学校（即以后共称为草桥中学者）创办招生，宾若伯祥与余皆考取入学。入学之后又加甄别，其学业较优者为二年级，二兄与焉。迄一九一零年终，二兄毕五年之业，而以实际修业未足五年，不能取得“举人”资格，须留校补修一年乃可。故二兄与余同于一九一一年终毕业，其时清廷已覆，自无所谓“举人”资格矣。一九一二年，宾若任初等小学校校长，其校在阊门附近。伯祥就苏州宪兵营事，类似今之所谓秘书者。余任干将坊言子庙初等小学校级任教员。宾若改任五高校长不记在何年，惟记其到甪直即与伯祥偕。

五高在保圣寺大殿之西南侧，校门前偏左为坍废之天王殿。校之北大殿之西为鲁望祠，与校隔一墙，墙有门，启钥可入。大殿之东北为甪直初等小学校，校舍多于五高，运动

场尤宽广。自天王殿南行数十步为山门，石柱尚在。山门外则市街，又数十步而至香花桥。余记其大概，藉见往时保圣寺占地之广。

五高男子部女子部各有一楼，不相连属。楼皆上下二室，男子部楼为四班之课堂。女子部楼为三班之课堂，余一室。男子部楼逾庭院而东为一敞厅，前不设门窗，两侧为办公室。举行全校大会皆在此敞厅，其时男女学生乃共处一堂。男子部楼与庭院之南有一屋，玻窗北向，五人居之。床皆贴南壁，自西而东，首宾若，次伯祥，次为余，次算学教员孙建平，次体操教员董志尧。书桌临窗，其序与床同。夜间点白瓷罩煤油桌灯二盏，当时已觉颇为明亮矣。

每日散学之后，家居本镇之教员各归其家。外来之五人则为共同生活，业务工作，业余闲遣，三餐一宿，皆聚处而不分。今姑回忆而杂记所谓业余闲遣者。夜谈多在室内，值月朗风清，则各携椅坐庭院中。晚餐时間亦沽酒共酌，发起者作东，佐饮自必闲谈。宾若清谈娓娓，体贴人情入细。夙以善唱歌称，兴到则叠声低唱。伯祥最健谈，多说轶闻掌故。能以扬州方音唱郑板桥《渔樵耕读》道情，又能唱京戏若干出之片段，他人促之不休，则慷慨应承，引吭而歌。由今思之，二兄当时之声容犹宛在耳目间也。至于星期日或其他假日外出游散，则往往三人行，而孙董二君不与焉。吃茶于万象春。其肆虽简陋，而镇上所谓士绅者颇趋之，临河踞座，高谈阔论。饮酒于财源店，店在保圣寺山门外。财源为店主之名，其妻善治馔，鱼虾蔬菜皆可口，而索值不昂。有时至殷家听弹词，有时至某公所听昆曲。殷家者镇上之大族，英文教员殷康伯

亦掌桥同学，其族中常邀苏州说书人之来镇弹唱者每日下午到家说书一回，合族男女共听之。镇上人多嗜昆曲，其闲暇者集于某公所，延曲师教授拍曲，进而至于串演。尝见名曲师沈月泉教演《长生殿·小宴》唐明皇上场时所唱"天淡云闲"一曲，逐字逐句指点，目光宜如何俯仰顾盼，声情宜如何悠扬潇洒，可谓剖析入微。宾若之表兄沈伯安亦镇上士绅，于其老屋中筑小书斋，布置自出心裁，窗明几净，书画盆栽皆有雅致。我三人得暇辄往访，到则无所不谈，而伯安尤好谈美，"赏美""伤美"常挂口头。镇外四五里有张陵山，名为山而无石，灌木自生，高树无多。假日晴明，我三人偶或一往，聊寄游山之意。而各村敬神演草台戏，亦尝往观数次。归来评论所见诸角色，伯祥之兴致最高。

余在中学时尝随同学刻印。以刀雕石，须留者留之，不须留者去之，是固人人所能为，无待求师。及抵甪直，睹某氏所藏之《文三桥印谱》，思欲仿效之，乃于业余时间复事奏刀，凡以印章石来嘱托者无不应。其时伯祥辄在旁谛视，商量于布局之先，评议于终刀之后，且出所有印章石俾余刻之，刻何字何语，作何形何式，多所授意，故为伯祥刻者特多。惜此事历一年即止，以后未复执刀，于治印一道终为门外汉耳。

伯祥家自苏州铁瓶巷迁居甪直约在一九一六或一九一七年，赁镇东陈氏大厅后之楼房上下六间。其处距五高三里许，到校有两途可循，一沿河岸而行，复折而南，一则曲折循田塍行，出畈中径即为保圣寺天王殿前之旷场，此较近捷。伯祥每晨到校恒当住校四人晨餐之时。傍晚放学，学生散尽，事务理毕，乃归其寓。偶然有兴，沽酒共夜饮，半酣而归。而

余总觉视前岁稍稍寂寞矣。

一九一八年之秋宾若受伤逝世，实为极大悲痛事。其受伤在昆山车站。角直周围环水，必假舟楫乃达。自苏城搭航船而往，水程三十六里，需六小时，遇逆风或需八小时。乘火车抵昆山，自昆山搭船，则水程较短，时间较省。其时宾若以事返苏，事毕乘火车抵昆山，下车之时忽身陷月台与火车间，而火车犹未停住，车轮稍一转动，致腰部以下受压极重。嗣载回苏州，入齐门外西人所设医院治疗。其伤内部甚于外部，痛苦万状，其父母二兄及夫人皆至惨恻。其仲兄致觉尝与医师恳商，可否毒而死之，俾免痛楚。医师却之。终于生力消竭而亡。余辈在校中固知宾若是日当来，而未到，疑之，越日乃得消息，如闻迅雷。尝往医院探视，宾若惨白之容颜，其夫人凄然之身影，至今犹能约略忆之。

继宾若任校长者为沈伯安，一切仍旧贯。一九一九年我父见背，我妻墨林育至善已逾周岁，伯安任墨林为女子部级任教员，于是我家于是年暑中迁居角直。伯祥让出所赁屋之楼下三间俾我家居之。到校返寓，时或三人偕行焉。

厥后伯祥辞五高而就厦门集美学校教职，既而应北京大学之招赴北京，其家迁回苏城居因果巷，余今皆不能确记其年月。其家既迁，余家乃全占陈氏楼房之六间。

一九二一年暑假后，余亦辞五高而任教于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初识朱佩弦兄，与共事。公学忽起风潮，余径返角直。是冬佩弦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其校一国文教员不知以何离去，佩弦招余补其缺。然余留杭甚暂，一九二二年二月下旬又到北京，任北京大学预科讲师。余初不欲就，适

郑振铎兄送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到京，乃结伴同行，时则伯祥先在京中矣。寓所在大石作，同舍皆苏州人。吴缉熙兄携眷，照料诸人餐事。顾颉刚兄潘介泉兄皆独居一室。余与伯祥共一室，夜同睡于砖炕。吴潘二兄固初识，颉刚则交谊至深，余不足十岁时塾中之同窗，又小学中学之同学也。然余留京仅月余即请假南归，所任作文课伯祥慨允为代。南归之故为墨林将分娩，余须伴之到苏城就产科医生。四月下旬生至美。至是墨林不复能任教，我家不复须居甪直，遂于秋初迁回苏城，居大太平巷。

今年五月十七日余重访甪直，距一九二二年五十五年。五高男子部之房屋全毁于抗战期间，女子部之楼尚在，老银杏数株亦尚在。鲁望祠原有水阁，前临斗鸭池，池已涸，水阁略无痕迹，惟通水阁之二小石桥尚存。罗汉陈列馆之前门仿寺院山门式。庭中列花木假山石，罗汉存九尊，或全或残缺，皆朝外，不若旧时分居大殿之两侧。旧时殿两侧高且广，塑山崖洞壑为背景，罗汉高下错落处其间。今罗汉位置亦尚高下错落，且保存其贴身之背景，然背景接合处不尽连贯，统观全部，其高与广犹不逮旧时之一壁也。询余所居陈氏之楼，云今为中学之宿舍，各乡学生就学者居之。欲往一观而未果。亦思重循当年到校返寓之途径，重观伯安当年之小书斋今复何若，皆以时促而罢。惟与当年之学生，与今时之小学生，与镇上之负责同志，与同往之吴县文教局诸同志，合影若干帧。当年之学生遇见者六七人，年皆七十以上，皆已退休，惟一人尚不足七十。望而识其貌记其名者三人，曰许倬，曰宋志诚，曰殷之益。

越数日作一诗记此行，录之于此：

五十五年复此程，淞波卅六一轮经。
应真古塑重经眼，同学诸生尚记名。
斗鸭池看残迹在，眠牛泾忆并肩行。
再来再来沸盈耳，无限殷勤送别情。

淞波谓吴淞江，自苏城到甪直经焉。吴淞江抵上海称苏州河，出外白渡桥入黄浦江。

以上略叙甪直之踪迹既毕。回忆平生，友朋中过从最密，相处最久者，莫伯祥若。始则中学五年，继之则甪直数年北京月余如上述。其后同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八年，此八年之大半时期，于永兴路及顺泰里则同屋而居，于仁余里则同里而居。嗣后同在开明书店数年。一九三七年日寇大举进犯，伯祥留沪，余家入川，为别者八年，然来往书札频繁，如打乒乓球，余寄伯祥书编号将达二百焉。一九四六年春余返沪，同在开明又三年。一九四九年三月余来京，既而伯祥亦到，同住东城区，虽工作不在一处，而得暇辄相访，一谈恒半日，园游酒集，往往而偕，盖二十余年皆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上午与满子访伯翁（自伯祥四十左右始，朋辈即称为伯翁），先一日汉华与满子通电话，言其父念余，故亟往。至则从容闲谈如常时，坐二小时辞归，各道"再见"。不意此乃最后一面，迄三十日之夕而伯翁逝世矣。

伯翁于余又有极关重要一事，余与墨林为婚实缘伯翁。一九一一年顷，伯翁识计硕民先生，常共茗叙，余偶亦同坐。硕

民先生归，与其岳母及妻姊胡铮子夫人道及余，谓宜可与其内侄女墨林议婚。家庭间询谋佥同，铮子夫人深爱其侄女，尤表赞可，遂请伯翁来访我父，进媒妁之言，我父允之。议既定，双方交换庚帖及像片，皆由伯翁转送。一九一六年夏结婚之日，余与墨林始觌面焉。苟余不因伯翁识颉民先生，自必议婚他家，于是余之婚后生活及所生子女将全异，而余此时亦未必如此时之余，然则其关系岂非重要也欤。

陈从周君尝绘《草桥读书图》赠余。湜华见之，请从周亦为伯翁绘图以资追念，从周遂作此《角直闲吟图》。湜华广征题咏。余与伯翁交至深，义不容辞，乃回忆往事作此杂记。文殊拙率，莫能达友情之真，不胜愧恧矣。近患目疾，不能作小字，恳陈次园君代书之，附志于此。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四日

“五一”文艺演出剧目好

四月二十七日的《北京日报》登了“五一”节文艺演出剧目，我看过一遍，感到“百花齐放”的气氛更加浓郁了。

好多年没看话剧了。“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时候，没有话剧，只有“喊剧”，谁也不爱看。粉碎了“四人帮”以后，我的视力听力都不行了，没去过剧场。最近从电视里看了《丹心谱》，很受感动。这个戏写得逼真，演得逼真，表达了大家的感情，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听说这样的作品还有好些，正在琢磨锤炼。在演出剧目中看见《丹心谱》，我就想到将会有许多好的话剧陆续上演，跟观众见面。于是我感到浓郁的“百花齐放”的气氛。

演出剧目中有《痛说革命家史》和《打虎上山》，我非常高兴，为的是曾经被“四人帮”霸占的样板戏终于回到了人民手里。还有《秋江》《挡马》《三岔口》《打渔杀家》等，都是人们喜闻乐见而被“四人帮”的专制主义扼杀了的，我看见这些剧目也非常高兴。还有一个芭蕾舞剧目叫《卖火柴的女孩》，大概是根据被“四人帮”排斥的安徒生的童话改编的吧。这许多反映不同生活的作品，在劳动人民的节日一齐在舞台上演出，适应了广大观众接受教育、获得知识、欣赏艺术的多种多样的要求。于是我感到浓郁的“百花齐放”的气氛。

我还注意到不少剧目刊登了演员的名字，这也是好些年没有的事了。"四人帮"摧残演员的个性和才能，硬要他们"一字一腔，一招一式"都按在一个模子里。表演艺术本来是多种多样的，同样一出戏，不同的演员可以创造出不同的风格来。把演员的名字登出来，一可以让观众根据自己的爱好来挑选，二可以促使表演艺术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于是我感到浓郁的"百花齐放"的气氛。

"五一"文艺演出剧目好。凡是好的东西，应该大家来称赞，因此我写下这些感想。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作

祭文·悼词

参加追悼会回来，若有所失。参加的既然是追悼会，当然会若有所失，有什么好说的？我是说明明赶到了八宝山，明明在礼堂里肃立了十来分钟，可是我的哀思好像没有尽情地宣泄，或竟是简直没有得到宣泄，因而若有所失。

于是联想到两篇祭文：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

这两篇祭文都收在《古文观止》里，我小时候读得相当熟，背得出，现在可不成了。书架上有中华书局去年重印的《古文观止》标点本，我兼用眼镜放大镜还看得清，就把这两篇重读一遍。

祭文全是对死者说话，仿佛死者就在身边而且句句听得清似的。韩愈对他的侄子十二郎说得非常恳切。他说咱叔侄两个年纪相差不大，嫂嫂说过，韩家的指望就在咱两个身上。他说当年为谋生各地奔跑，以为将来总能够长久共处。他说自己年纪不满四十，眼力差了，头发灰了，牙齿动摇了，只恐寿命难保，使你十二郎抱恨无穷，谁知道你竟先我而死。真的吗？恶梦吗？传来的噩耗怎么会在乎头呢？以下说料理十二郎的后事；怎样处置他的遗孤，假如力量够得到，准备把他迁葬到祖坟上。接着发一通感慨，说天涯地角，长期分

离。生不得相依，死不得梦见，全是我的不是，还有什么好说。从此我也不再想旁的了，只愿教导你我的儿子，期望他们成长，抚养你我的女儿，准备她们出嫁。话虽说完了，一腔心情可说不完表不尽。“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问十二郎究竟知道不知道，还是仿佛十二郎就在他韩愈身边似的。我想，韩愈写罢这篇祭文，大概在悲痛的同时感到挺舒畅，因为他把哀思尽情地宣泄出来了。

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三次说“呜呼曼卿！”当然是对石曼卿说话。一说他石曼卿必然会有传世的声名。二说他石曼卿该不与万物同腐，可又想到自古圣贤都只剩枯骨和荒坟。三说自己系念跟石曼卿的交情，不能把盛衰之理看透，因而悲怆非常。这一篇是韵文，如果善于念，念起来叮叮当当，铿锵有致，相当好听。可是就祭文而论，未免嫌其泛。换句话说，只要你不管对象，只图自己发一通感慨，那么用来祭无论哪个朋友都成，不限于石曼卿。

单凭两篇祭文当然不能判定韩欧二人文笔和风格的高低。如果给这两篇祭文评分，大概谁都会说韩的得分该比欧多吧。

祭文全是对死者说话，好像是相信有鬼论，不相信神灭论，可能有人要说这是古人的局限性。我倒要为古人辩护，人类可能永远难免局限性，古文这点儿局限性又算得了什么？

读完两篇祭文，再想如今的追悼会。追悼会不用什么祭文而用悼词，悼词不是对死者说话，全是对在场的参加者说话，可以这么说，在这一点上，咱们逾越了古人的局限性了。

毛主席不是说过吗？“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

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按毛主席的意思，悼词自然是对在场的参加者说的，惟有充分表达大伙儿的哀思，才能使大伙儿深深感动，更加团结。悼词中历叙死者的经历和工作，表扬死者的业绩，勉励大伙儿化悲痛为力量，学习死者的所有优长，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必须表达大伙儿的哀思。因此我想，悼词和祭文虽然不是一回事，也该写得《祭十二郎文》那样恳切，不宜写得《祭石曼卿文》那样泛。

悼词的话全是对在场的参加者说的，却有例外。某些悼词的末了一句话是对死者说的，就是"某某同志，安息吧！"

读者同志假如不嫌罗索，请容许我谈谈这个"某某同志，安息吧！"

据我的未必可靠的记忆，前些年在悼词的末了用这个话作结的相当普遍。一九七三年七月中旬，首都举行章士钊先生追悼会，郭老致悼词，却没有说这个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从此以后，或用或不用，好像不用的比较多，不过不敢说定，最近还听见过两次呢。

我一向反对这个"某某同志，安息吧！"每听见一回，总感到异常不舒服，难以描摹。为什么不舒服，大概有四点：

通篇悼词全是对在场的参加者说，惟有这一句是对死者说，文体见得不纯。这是一。

感情太激动了，有时把死者当成活人，跟他唠唠叨叨说

一通，也是有的。但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末了这么做，未免犯了跟韩愈欧阳修同样的局限性，总之不怎么好。这是二。

对死者说“安息吧”是从哪儿来的？原来是天主教里的规矩。天主教徒念完了为死者祈祷的经文，就在死者身上浇圣水，同时念“Requiescat in Pace!”（据说是“安息吧！”的拉丁文）。并非天主教徒为什么要仿效天主教的殡仪呢？这是三。

死者死了，嘱咐他“安息吧！”有时还要加重语气说“永远安息吧！”这里头包含着多少为死者庆幸，替死者安慰的意味啊！这个意味的反面，不就是为人在世究竟没有多大意思，活一辈子，无非辛辛苦苦，劳劳碌碌，如今好了，你可以享受安息的幸福了吗？这个意味，对死者毫无关系，因为究竟活好死好他再也没法考虑了，可是对活人却大有关系。这是四。

我老是在希望，“某某同志，安息吧！”这句话“永远安息吧！”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四日作

俞曲园先生和曲园

俞曲园先生是清代末叶的著名学者。他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继承了高邮王氏父子这一学派，用音韵训诂来解释古书，这方面的著作有《群经评议》和《诸子评议》。他的诗、文自成一家，文从辞顺，并不模仿古人，故而在文学方面很有创新的意味。他在小说、戏曲、通俗文学等方面也有不少著述，但是不甚受人注意。他的全部著述汇编成集，叫做《春在堂全书》，共五百卷。

曲园先生的原籍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幼年即住在杭州府仁和县的临平镇，所以他说话带临平口音，杭州可以说是他的故乡。但是更确切地说，曲园先生的一生，跟苏州的关系最为密切。

早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前，他从河南罢官之后直到晚年，住在苏州的时间最长久。开始住在庚戌状元石韫玉（琢堂）的旧屋五柳园中。马医科巷住宅建于光绪初年。所谓"曲园"在住房西侧春在堂的北面，因为地面是㔾形，跟篆文𠙹（曲）字相似，故名"曲园"。其中开了个凹形的小池塘，又跟另一个篆文𠀉（曲）字相似。曲水亭三面临水。对面有回峰阁。南侧的假山有两条小径，上有平台可以憩坐。北侧也有山石。牡丹台面对达斋。全园占地不大，可是布置极佳。

解放以后，曲园由曲园老人的曾孙俞平伯先生捐献给国家，现在年久失修，而且成了好些人家聚居的杂院。像曲园老人这样一位学者，咱们应该纪念他。而要纪念他，保存并修缮曲园是最好的办法。曲园的面积并不大，修缮并不费事，不用花大笔的钱，而对于发展旅游事业，尤其是增进中日友谊，却能起很好的作用。

曲园老人的著作，日本朋友购置的很多。日本学术界一向仰慕曲园老人，有不少日本学者专程来华，拜他为师。他又编选过日本人的中文诗，名为《东海投桃集》，收入《春在堂全书》。

曲园先生罢官以后，长期任杭州诂经精舍的山长。诂经精舍是个书院，书院是专门培养学术人才的学校，跟当时的科举制度并不相干，山长相当于校长。曲园老人虽在杭州任山长，在西湖边还有他的俞楼，可是他一直喜欢住苏州，只在春秋两季去杭州讲学，这样情形连续了三十一年。直到戊戌年他的孙子，平伯先生的父亲阶青（陛云）先生中了探花，他才不再两地往返，专住苏州，逝世之后才移灵杭州安葬。他的《春在堂全书》五百卷，大部分是在苏州著作的。苏州很多游览胜地都能见到他的墨迹，其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是寒山寺的唐人张继《枫桥夜泊》诗碑。这块碑原来是文徵明写的，后来遗失了，曲园老人重写此诗，刻碑留在寺里。日本人一向敬重曲园老人，到苏州游览的，几乎人人要购买这块碑的拓片带回去。

修缮曲园，既是保存古迹，又可以促进国际交往，发展旅游事业。最近看见报载苏州成立园林建筑公司，修缮又很

方便，我想，我的建议将会引起苏州市园林局直至中央文物局、旅游总局以及各界人士的注意和考虑。

一九八零年一月八日作

纪念“语文学习讲座”

“文化大革命”前，北京中华函授学校举办过一个“语文学习讲座”，编印过一种讲义性质的刊物，名称就叫《语文学习讲座》，一共出版了三十八期。现在这套《语文学习讲座丛书》就是从那三十八期刊物中选辑出来的。我重新翻阅这些文章，不禁深切怀念已故的张知辛先生和周文耕先生。他们两位是中华函授学校的校长和副校长，为举办“语文学习讲座”尽了不知多少心力。这样两位兢兢业业的业余教育家竟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而“罪名”之一就是举办和主持了“语文学习讲座”。

记得一九六二年夏天，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负责人孙起孟先生、王艮仲先生和张周两位先生邀集了我和十多位搞语文教育的朋友，说要办这么一个业馀性质的讲座，因为社会上有这样的需要，学员以在职干部和中小学教师为主，目的是向学员介绍自学语文的方法，提供学习语文的材料，有计划地帮助他们提高语文水平。举办讲座的理由很充分，计划又挺周详，我们这些朋友怎么能不一口承应，尽力支持呢？于是讲座就办起来了。最初只打算招收五百名学员，这个限额没多久就被突破了，一周年的时候就增加到四千五百多人；到一九六六年讲座被迫停办之前，正式报名的学员竟有八千

六百多人。学员中除了在职干部和中小学教师，还有部队的官兵，工矿的干部，待业的青年；就地区说，除了西藏，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但是直接听讲的只有一千五百多人，其余的人即使在北京也只能采用函授的办法，请他们阅读编印成册的《语文学习讲座》。每次讲课又都录了音，录音带辗转複录，分传各地。因此，各地的学员不仅阅读刊物，而且听到录音，跟在北京直接听讲一模一样。

讲课的地点先借用长安大戏院，后来借用民族文化宫礼堂。每回讲课之前，场子里就坐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一个空位子，也没有一个迟到的人。听讲的人固然青年居多，可是也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大家聚精会神，一边听一边记笔记，间或发出一阵轻微的会心的笑声。结束的时候不等主持人示意，全场早就掌声雷动了。讲课的人心里明白，他们受到如此真诚的谢意，并非由于自己讲得多么好，这热烈的掌声实在是反映了学员们迫切求知的心情。他们知道学员们的这种心情，因而严格地要求自己，讲课之前尽可能作好充分的准备。有时讲得不怎么完善，或者有比较大的缺点，他们就感到十分歉然，觉得对不起学员。他们都希望每讲完一次课，能看到学员们带着满足的笑容离去。

这个讲座所以办得好，是跟广大学员的支持分不开的。单就北京说，几千名学员虽然分散在许多机关、企业、部队、学校里，他们都按人数的多少，有的编成了班，有的编成了小组，他们不但推出班长或组长，还推出学员代表参加学员代表会。有了班和小组，学员们在听课之前组织预习，在听课之后组织讨论；写了习作，相互商量评改；对讲座的组织

和安排有什么意见，对讲课的人有什么要求和质疑，都由学员代表带到学员代表会上去。讲课的人也轮流跟学校负责人一起参加学员代表会，直接听取学员们的意见，跟学员代表共同商讨教学方面的问题。学校的工作人员很少，遇到有紧迫的事，如寄发刊物、布置活动之类，学员们得到信息，就主动推出代表来帮忙。办学的人、教学的人和就学的人相互的关系如此融洽，彼此的感情如此深厚，可以说超过了一般的正规学校，这正是民主办学的必然结果。一九六四年七八月间，在中央教育部主持的"语文学习讲座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总结和推广了中华函授学校举办这个讲座的经验。

当时讲课的内容大体分三项。一是选读一些文章，其中有现代的，有古代的，有普通文章，也有文学作品。二是评改一些文章，有的是报刊上的，有的是学员的习作。三是传授一些学习语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同时讲一些应当坚持的态度。在这三项里，主要是前两项，因为末了一项往往是可以结合前两项一起讲的。这样的安排在这套《语文学习讲座丛书》中还看得出来。举办讲座的目的在于提高学员读和写的能力，而能力总得在实践中锻炼才能增长，此外别无捷径。所以在讲座上讲的不过是"一隅"而已，重要的还在于学员能够"以三隅反"，把学到的应用到读和写的实践中去，读的时候仔细揣摩，求得透彻的理解，写的时候反覆斟酌，做到正确的表达。这些意思，当时我曾经反复向学员说过，现在还愿意贡献给这套丛书的读者。

当时在讲座讲课的，除了我，有王力、王瑶、王子野、王泗原、左煜如、冯钟芸、史振晔、老舍、吕叔湘、朱德熙、向

锦江、张健、张志公、张寿康、张雪森、纪希晨、陈白尘、吴组缃、严家炎、周振甫、林涛、林曦、卓如、郑志、赵朴初、赵树理、徐仲华、徐世荣、隋树森、曹先擢、高森、崔奇、谢冰心、蒋仲仁、楼适夷、谭旌樵三十多位先生，这样的盛况也是值得纪念的。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日作

我钦新凤霞

新凤霞演得一手好评剧，我早就知道；她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到去年才知道。

听孩子们说新凤霞有一篇文章写得挺好，发表在一本刊物上，就叫他们找来念给我听。原来是记齐白石老先生的。齐老先生的遗闻逸事也常听人说起，可是都没有新凤霞写的那么真。她不加虚饰，不落俗套，写的就是她心目中的齐老先生。我闭着眼睛听孩子念下去，仿佛看见了一位性情、习惯都符合他的出身、年龄、地位的老画家，同时也认识了一位敏慧的善于揣摩、体贴别人的心思而笔下绝不做作的新凤霞。于是叫孩子们去翻检报刊，检到新凤霞的东西再给我念，我又听了好几篇，都满意。

去年九月间，在一个招待会上遇见祖光。我问了新凤霞的健康情况，就说她写的东西好，希望她多写。祖光说她写了不少了，已经编成集子交给香港三联书店，还说既然我喜欢，出版之后就给我送去。没隔多久，祖光果然把《新凤霞回忆录》送来了，两指厚的一册，装帧挺惹人喜爱，收入几十幅照片，还有丁聪和黄黑蛮的插图。这本图文并茂的集子一到我们家，大大小小都争着看，看了不算，还要在饭桌上议论。我只好凑他们的空，挑一两篇让他们给我念。有时候

等不及，就装进老花镜，拿起放大镜，看它三页五页。好在看新凤霞的东西就像听她聊天，眼睛倦了，闭上休息一会儿也无妨。

新凤霞为什么能写得这样好，成了我家在饭桌上讨论的题目。她是祖光的夫人，得到老舍先生的鼓励，得到许多好朋友的支持，这些当然都是条件。但是有了这些好条件准能写出好东西来，恰也未必。主要的还在她的生活经历丰富。小时候受苦深，学艺不容易，解放以后在政治上翻了身，却又遭到不少波折……她写的不就是这些吗？她写老一辈艺人的苦难，旧班子旧剧场的黑幕；她写新时代评剧的改革，演员的新生；她写十年的浩劫，许多朋友遭到了厄运。要不是亲身经历过来，她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了。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想，跟她同辈的演员，经历大多跟她相仿，也有写回忆录的，像她这样畅达而深刻的似乎不多。这又为什么呢？

写东西当然得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可是把经历写下来，要写得像个样儿，还得有一套本领。新凤霞就有这套本领，她能揣摩各种人物随时随地的内心世界，真够得上说体贴入微了。这套本领很可能是她从小学艺的时候练成的。她拜过几位师傅，几位师傅都没有认真教过她，她只好"看戏偷戏"——在戏院里偷着学。演龙套的时候在台上看戏，不上台的时候躲在后台看戏，她一边看一边揣摩，角儿在台上为什么这么唱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唱这么做才符合剧中人的身份和年龄，表出剧中人的性格和心情。她不但看评剧，还看京剧、梆子、曲艺、话剧，都一边看一边揣摩。这功夫可下得深哪。先就人家唱的做的揣摩剧中人，进一步又就剧中人的身份、年龄、

性格、心情揣摩自己上台去该怎么唱怎么做才更合式，新的角色就这么创造出来了，为评剧的革新作出了贡献。

是否可以这样说，新凤霞在舞台上取得成功，就因为她从小养成了观察和揣摩的习惯。观察和揣摩本来是生活的需要，作事的需要，同时也是写东西的先决条件，而在她已经成了习惯，难怪她能写得这样好，让人读着就像看她演戏一样受她的吸引。

祖光要我写几句话鼓励鼓动新凤霞。我只能说她这本回忆录给了我极好的享受，我非常感谢。能说的话确也有几句，只是意思平常，不敢藏拙，就写成这篇短文。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作

追怀调孚

调孚谢世一个多月了。刚得到消息的时候，很想找个朋友谈谈，共叙追怀，可惜熟悉他的老朋友已经不多了。他一辈子在出版界工作，知道他的人不很多，我不免代他感到寂寞。这种寂寞，调孚生前可能并没有感到。“人不知而不愠”本来是编辑工作者应有的胸怀。

我是进了商务印书馆才跟调孚相识的。将近六十年前的事，想不太清楚了，总之文学研究会刚成立，办起了《文学旬刊》，许多朋友都挺起劲，调孚就是其中的一个。后来振铎接替雁冰主编《小说月报》，邀调孚当他的助手。记得当时的《小说月报》有个特色，每期有一张精美的彩色插页，或是西方的名画，或是外国文学名著的插图。调孚大概就在那个时候学到了有关制版和彩印方面的许多知识。其时振铎正在编写《文学大纲》。这部巨著还没有完成，大革命失败了，为了暂避蒋介石屠杀革命者的凶焰，振铎往欧洲旅行去了，把剩下的工作托付给调孚。这四大厚册的插图本《文学大纲》的出版，调孚是花了不少气力的。

振铎旅欧期间，我代他编《小说月报》，当时算是四个人，实际做工作的是我和调孚。处理排印方面的问题，调孚比我精明得多。在那个时期，《小说月报》刊登了不少新作者的作

品，好几位作者后来成了名。因此近年来常有人提起，说这是我的功劳，我以为这样说并不切当。首先是时代使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冲激了人们的思想，自然会有许多新的作者和新的作品出现，自然也改变了我这样的编辑者的眼光。另外一点是，《小说月报》的工作是调孚和我共同做的，有许多好作品正是调孚在成堆的来稿里发现的。那时给《小说月报》投稿的作者可能还记得，他们收到的覆信有些正是调孚写的。

后来我和调孚又在开明书店共事。开明书店创办在大革命之前，彼此是熟朋友，调孚为开明出了不少主意。《世界少年文学丛书》就是他和均正共同编辑的，他自己还译过几本。他正式进开明在"一·二八"之后，负责出版部的工作，其实他什么都管。开明的机构很简单，没有明确的分工。跟制版厂、排字房、印刷所、装订作打交道，当然是出版部的事，还有版式设计和装帧设计，出版部也要管；此外还要管发稿计划和出书计划。调孚管得更宽，许多作者本来是他的熟朋友，就由他出面联系。当时开明出版了不少文学作品，稿件大多是他约来的。工作的方面这样广，事情这样烦琐，也亏他有一副好精力才能应付。他对工作丝毫不肯放松。尤其是插页和封面付印，即使下了班，他一定要印刷所把样张送到他家里，让他过了目签了字才算数。

"八·一三"上海战事开始，我从苏州到了四川，许多亲友留在上海。我和他们通信，大多寄给伯祥或者调孚，请他们转致。在上海的几位朋友以开明的名义办起了一种刊物叫《文学集林》，调孚参加了编辑工作。这种刊物像桥梁一样，

使留在上海的和分散在内地的文艺界朋友得到了精神上的沟通，在当时很受欢迎。可是后来上海的环境越来越恶劣，《文学集林》出了几辑就停办了。那八个年头，留在上海的亲友都受尽苦难，调孚当然不是例外，可是他给我的信里没诉过一句苦。

抗战胜利之后，开明从内地迁回上海，亲友们都团聚了。从外表看，大家老了，可是心情都容易激动，似乎反倒年轻了。曙光已经在望，对黑暗自然更加深恶痛绝。当时在上海群众的反独裁争民主的宣言书上，几乎都可以见到调孚的签名。《闻一多全集》准备交开明出版，调孚也是竭力主张接受的一个，在排校过程中，他也尽了不少力。还有一种《开明文学新刊》，抗战前已经开始编了，停顿了八年，调孚重新把它编起来，在计划中加进了不少抗战期间的作品。此外，他还为好几位剧作家编了专集。现在看来，仿佛他有意要为解放以前的新文艺作个总结似的。

一九四九年初，我离开上海到解放区，从此离开了开明。新中国成立之后，调孚随开明迁到北京。不久，开明和青年出版社合并，调孚调到了古籍出版社工作，后来古籍又并入中华书局。我和调孚虽然同在北京，见面的时间却不多了。早晚相处的往时固然值得怀念，可是不常见面正表明彼此都忙着，只要听说身体都安好，就可以互相放心。到了一九六六年，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老朋友没有不互相牵挂的，却又无由相见。听说调孚并未受到冲击，可是也不得不离开北京，夫妇俩去外地跟孩子住在一起。后来中华书局承印的《柳文指要》重新"上马"，著者章行严先生写信给周总理说：他非常

满意原来负责编校的徐先生，一定要请徐先生来完成这项工作。调孚于是又来到北京，住在中华书局的办公楼里。《柳文指要》排校完毕，章老先生又写信给周总理，说徐先生是一位难得的编辑，建议把他留在北京工作。可是调孚在北京没有家了，即使把夫人接了来，老夫妇俩跟前没有幼辈照顾，实在难以生活，结果他还是决定离开北京。

调孚直到临走才来看我。他也忒小心了，只怕早通知我会引起什么无法预料的麻烦。这最后一次见面没有说多少话，好像能见到彼此都活着，已经是莫大的安慰了。过了不久，他的夫人去世了。我接到他一封简单的信，语气很平静。这使我感到奇怪，他们夫妇之间感情之好，是朋友们经常称赞的。后来，朋友们给他去信，他大多不复；有时候突然收到他一封短信，可是再去信又得不到回覆了，叫人摸不透是怎么回事；听说他脑筋还是挺清楚的。

调孚早年翻译的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现在还在印行。还有一部《中国文学名著讲话》，是解放前写的，曾在《中学生》上连载，听说他在最后的岁月里作了整理，不久可能出版。署他自己的名字的出版物，大概只剩下这两部了。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三日作

子恺的画

推算起来大概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那时子恺在立达学园教西洋绘画，住在江湾。那一天振铎和愈之拉我到他家里去看他新画的画。

画都没有装裱，用图钉别在墙壁上，一幅挨一幅的，布满了客堂的三面墙壁。这是个相当简陋而又非常丰富的个人画展。

有许多幅，画题是一句诗或者一句词，像《卧看牵牛织女星》，《翠拂行人首》，《无言独上西楼》等等。有两幅，我至今还如在眼前。一幅是《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画面上有梧桐，有站在树下的人，耐人寻味的是斜拖在地上的长长的影子。另一幅是《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画的是廊下栏杆旁的一张桌子，桌子上凌乱地放着茶壶茶杯。帘子卷着，天上只有一弯新月。夜深了，夜气凉了，乘凉聊天的人散了——画面表现的正是这些画不出来的情景。

此外的许多幅都是从现实生活中取材的，画孩子的特别多。记得有一幅《阿宝赤膊》，两条胳膊交叉护在胸前，只这么几笔，就把小女孩的不必要的娇羞表现出来了。还有一幅《花生米不满足》，后来佩弦谈起过，说看了那孩子争多嫌少的神气，使他想起了"惫赖的儿时"。其实描写出内心的"不满足"的，

也只是眼睛眉毛寥寥的几笔。

此外还有些什么，我记不清了；当时看画的还有谁，也记不清了。大家看着墙壁上的画说各自的看法，有时也发生一些争辩。子恺谢世后我写过一首怀念他的诗，有一句"漫画初探招共酌"，记的就是那一天的事。"共酌"是共同斟酌研讨，并不是说在子恺家里喝了酒。总之，大家都赞赏子恺的画，并且怂恿他选出一部分来印一册画集，那就是一九二五年底出版的《子恺漫画》。

那一天的欢愉是永远值得怀念的。子恺的画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给了我一种不曾有过的乐趣。这种乐趣超越了形似和神似的鉴赏，而达到相与会心的感受。就拿以诗句为题材的画来说吧，以前读这首诗这阕词的时候，心中也曾泛起过一个朦胧的意境，正是子恺的画笔所抓住的。而在他，不是什么朦胧的了，他已经用极其简练的笔墨，把那个意境表现在他的画幅上了。

从现实生活中取材的那些画，同样引起我的共鸣。有些事物我也曾注意过，可是转眼就忘记了；有些想法我也曾产生过，可是一会儿就丢开，不再去揣摩了。子恺却有非凡的能力把瞬间的感受抓住，经过提炼深化，把它永远保留在画幅上，使我看了不得不引起深思。

隔了一年多，子恺的第二本画集出版了，书名直截了当，就叫《子恺画集》。记得这第二本全都从现实生活取材，不再有诗句词句的题材了。当时我想过，这样也好。诗词是古代人写的，画得再好，终究是古代人的思想感情。"旧瓶"固然可以"装新酒"，那可不是容易的事，弄得不好就会落入旧的

窠臼。现实生活中可画的题材多得很，尤其是子恺，他非常善于抓住瞬间的感受，正该从这方面舒展他的才能。

佩弦的意见跟我差不多，他在《子恺画集》的跋文中说："本集索性专载生活的速写，却觉精彩更多。"他称赞的《瞻瞻的车》和《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这几幅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还有佩弦提到的《东洋和西洋》和《教育》，我也认为非常有意思。《东洋和西洋》画一个大出丧的行列，开路的扛着"肃静"、"回避"的行牌，来到十字路口，让指挥交通的印度巡捕给拦住，横路上正有汽车开过——东方的和西方的，封建的和殖民地的，在十字路口碰头了，真是耐人深思的一瞬间啊！《教育》画的是一个工匠在做泥人，他板着脸，把一团一团泥使劲往模子里按，按出来的是一式一样的泥人。是不是还有人在认真地做这个工匠那样的工作呢？直到现在，还值得我们深刻反省。

第二本画集里还有好些幅工整的钢笔画。其中的《挑荠菜》、《断线鹞》、《卖花女》，曾经引起当时在北京的佩弦对江南的怀念。我想，要是我再看这些幅画，一定会像佩弦一样怀念起江南、怀念起儿时来。扉页上还有一幅钢笔画，画一个蜘蛛网，粘着许多花瓣儿，中央却坐着一个人。扉页背面印上了两句古人的词："檐外蛛丝网落花，也要留春住。"这样看来，蜘蛛网中央的人就是子恺自己了。他大概要说明，他画这些画，无非为了留住一些刹那间的感受。我连带想到，近来受了各方面的督促，常常要写些回忆老朋友的诗文，这就有点儿像子恺画在蜘蛛网中央的那个人了。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作

杨贤江同志逝世五十周年

今天咱们在这里开会，纪念杨贤江同志。贤江同志离开咱们已经有半个世纪，为他开隆重的纪念会这还是第一次。

记得一九四九年的八月九日——八月九日是贤江同志一九三一年逝世的日子，朋友们为了纪念贤江同志，在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和上海的日报上发表文章，篇数相当多。各篇的内容当然各不相同，可是朋友们的心情可以说是大体一致的，无非是值此人民革命的胜利已经成为定局的时刻，自然而然地想起我们的曾经为这个伟大的胜利勤奋工作以致损坏了健康的贤江同志，非得说几句话来抒发对他的敬爱和怀念不可。今天咱们在这里开会纪念贤江同志，跟三十二年前朋友们写文章作纪念有所不同。今天，贤江同志在青年运动方面所做的工作，在教育理论方面所做的工作，尤其是他对革命的坚定的信念和行动，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肯定。作这样的肯定非常重要，因为这不仅是贤江同志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大家、关系到将来的事，能使现在的人和后来的人知道从贤江同志那里应该学习什么，继承什么。三十二年前，有的朋友在文章中说："今天的青年很少知道贤江同志的名字了。"现在看来，发这样的感慨大可不必。为人民为革命做过事出过力的人，人们是不会忘了他的。今天咱们在一起开会纪念贤江同志，不

是个最好的证明吗？

贤江同志是一位极端认真的实干家，从日常生活到从事工作，他都讲求踏实力行，丝毫不肯马虎。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起床，体操，读书，工作，休息，他都给自己规定了时间表，严格照办。当时他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学生杂志》，在会客室里跟青年谈话的时候相当多，在编辑室里，埋头在读者的来信堆里的时候也相当多。他根据来访者和来信者提供的材料和提出的问题，写成"通讯"刊登在《学生杂志》上，每期八九篇十来篇，有一期多到二十篇。这些"通讯"有的反映青年学生的生活情况和思想情况，有的讨论学校里的问题和社会上的问题，全都是牵系在青年们心上的事。在《中国青年》创刊之前，联系知识青年这样密切的刊物就只有《学生杂志》一种。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革命斗争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一期登载十来篇"通讯"，贤江同志还嫌不够，于是开辟了"问答"一栏，简明扼要地回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在三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由贤江同志回答的问题共有七百四十二个，单看这个数目，他的工作量就大得叫人吃惊了。《学生杂志》不是共产党的刊物，贤江同志又不是《学生杂志》的主编。当时是军阀统治时期，要在此时此刻宣传革命真够费劲的了，一方面要抓住各种切当的时机，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尽最大的可能去影响青年学生，一方面要妥善地应付恶劣的环境，处好种种复杂的关系。因此贤江同志的工作看起来好像挺平常，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在大革命之前的两三年里，贤江同志除了编辑《学生杂志》，还帮助恽代英同志编辑《中国青年》，同时为好些进步

报刊撰稿。他还亲自到工人和学生中间去作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这是我后来听说的。一九二六年年底他离开了商务印书馆，离开了上海。不久，大革命失败了，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遭到杀害。朋友们正在为他担心，他却从武汉秘密地回到上海来了。那年冬天，他秘密地东渡日本，从此只能靠卖稿子过日子。他翻译马列主义著作，还写了不少介绍苏联的教育状况和批评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文章。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他既不焦躁又不悲观，一方面力求充实自己，一方面宣传新的教育思想。他就像打夯工人一样，一下又一下地，一心为争取革命的胜利和迎接胜利后的建设，打下扎扎实实的基础。一九二九年夏天，他从日本回到上海，仍旧躲在寓所里研究问题写文章。谁也没想到他这样好的身体会染上结核菌，结核菌侵入了他的肾脏。一九三一年夏天，朋友们送他往日本去治疗。最初传来消息说手术很顺利，朋友们正在为他高兴，突然传来噩耗，贤江同志跟我们永别了。

贤江同志最后的著作是《新教育大纲》，一九三零年用笔名“李浩吾”在上海南强书局出版；一九六一年经过整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出版，这一回不用再隐姓埋名了，封面上印着“杨贤江著”四个字。贤江同志在这部书的序言中对读者说：“这是本通俗的教育书，但决不是充塞着腐词滥调的教育书；这儿，至少有些未经中国人道过的新说，未经中国人指摘过的事实；你若已在或有志于在教育阵地上工作的青年，你便可从这儿得到一点武器；即使你并不一定志愿在教育阵地上工作的青年，你也可以由此得到不少新见解。”这一段话说明他写这部书的态度。要求有新的材料，新的论点；要求

有所批判，有所阐发；要求让读者能得到切实的好处：这样认真负责的态度，不是著书立说的人应该而且必须坚持的吗？再看他在这部书中批判的各种论点，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教育独立说，还有教育万能说，教育救国论，先教育后革命说，这些论点各各不同，同样把教育说得那样美妙和神奇，或者是从善意愿望出发的幻想，或者是别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胡说。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些论点都曾经在社会上流行，使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受到迷惑，甚而至于自我陶醉。有些朋友也发觉这些论点是虚假的，跟实际不相符合的，或者竟是荒谬的，但是很少人作过比较深入的研讨。贤江同志可不肯放过，一定要追根究底，一个一个把它考察清楚。正因为这样认真，他才能够以一个普通的教员和普通的编辑者的身份，进入了先进的革命者的行列。

想说的话就是以上这些。最后，我要在这个大会上向贤江同志的夫人姚韵漪大姐致恳切的慰问。在贤江同志生前，姚大姐是贤江同志生活上和工作上的支持者。贤江同志谢世以后，姚大姐不但把孩子们培育成为革命者，还认真坚持教育工作直到退休。她应该受到大家的尊敬。咱们共同祝她健康长寿。

一九八一年八月九日

我　呼　吁

中国青年杂志社特地把今年第二十期《中国青年》寄给我，要我对这一期上的调查摘要《来自中学生的呼声》发表些意见。

我要家里人念给我听。念的人声音越来越哽咽，我越听越气闷难受。

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造成的不良影响我不是不知道，但是没想到影响竟这样严重。

请各级教育行政当局都认真读一读这篇调查摘要，听听中学生的呼声，看看他们——岂止他们，连同他们的刚进小学的弟弟妹妹——身受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的严重摧残的情况。

教育部的领导同志们，我们教育部曾经说过，不要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又曾经说过，某些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的做法必须停止，看来收效都不大。我们教育部能不能再说说话呢？能不能采取比说话更为有效的措施呢？我想，对中学生这样恳切的呼声，谁也不会无动于衷的。

各省、市、自治区的教育局的领导同志们，你们那里有没有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的问题呢？你们那里的中学生有没有同样的呼声呢？假如没有，那是好极了，我为你们那里的中

学生庆幸，我代他们向你们致谢致敬，感激你们对他们的爱护。假如有，那么请恕我直说，你们切不要回避问题，摧残学生的身心来换取本地区的虚誉决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请赶快设法把局面扭转来，解除中学生身上的压力，让他们得到复苏。你们这样做了，我也为你们那里的中学生庆幸，也代他们向你们致谢致敬。

请大专院校的领导同志和教职员同志也看一看这篇调查摘要，看一看那些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中学怎样在给学生"催肥"。你们要招收的决不是那些"死记硬背的东西太多，缺乏独立思考和丰富的想象"的学生。你们要不要对中学教学提出你们的要求呢？你们要不要对他们在教学方面的那些不正确的做法提出建设性的批评呢？

请小学的领导同志和教职员同志也看一看这篇调查摘要，看一看片面追求升学率在中学里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你们千万不要在小学生身上就施加影响了。如果从小学起就一天到晚给学生灌输惟有考大学是一条出路，临到考大学的时候再给他们讲"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十寒一曝，能起什么作用呢？后果虽然在若干年之后，你们是爱护孩子的，一定会为他们的将来认真着想。

请中学的领导同志把这篇调查摘要反复细读。在这个问题上，你们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如果上级领导要你们片面追求升学率，你们要顶住，为的是爱护学生。如果社会舆论从片面追求升学率出发来指摘你们，你们要顶住，为的是爱护学生。如果家长为了子弟考不上大学找上门来，你们要向他们恳切劝说；怎么劝说用不着我说，因为这些道理凡是办

教育的人都懂得。你们切不要向学生施加压力，更重要的是切不要向老师施加压力。“剃光头”就“剃光头”好了，只要按党的教育方针办事就没有错。升学率大小不是教育办得好不好的唯一标准。我们要培养的是全面发展的人，社会主义国家合格的公民，四化建设各个方面的人才；其中少数的一部分要由大学培养，极大部分可不然。实际情形是这样，“剃光头”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凡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种种做法，如分设“快班”“慢班”，给毕业班指派“把关”老师并规定“指标”，尽量多发复习资料，无休无歇的种种考试，尽量提早准备高考的时间，等等，奉劝你们一律停止，为的是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

请中学的教职员同志也把这篇调查摘要反复细读。如果你们没有片面追求升学率，你们的学生有福了，我代他们向你们致谢致敬。如果你们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不得不那样做，那么今后能不能顶一顶，当然要用说理的办法顶。你们跟同学朝夕相处，经常听到他们的呼声，最能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还是比较大的孩子，难道不应该玩一玩松一松吗？难道不需要体育活动吗？难道不需要文化生活吗？你们是爱他们的，一定能处处为他们着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

请学生的家长们也读一读这篇调查摘要。像这样的出自内心的呼声，你们过去听见过吗？你们都希望孩子成才，这是当然的。进大学是成才的一条道路，可不是唯一的道路。再说，进了大学还得看自己肯不肯学，会不会学。从这一点来说，进不进大学一个样。不进大学，要是自己肯学，自己会学，同样可以成才。所谓成才，就咱们这个社会的标准来说，

就是成为一个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能进大学固然好，不进大学，通过其他种种道路，同样能够达到这个目标。高中毕业生只有一小部分能进大学，这个情况在本世纪内大概不会有多大改变。所以孩子进不了大学，千万不要责备他们，把孩子逼坏了，甚至逼死了，那就成为毕生的遗憾了。

我还要请各种报刊的编辑同志看看这篇调查摘要。请你们不要在你们的报刊上鼓吹哪个学校升学率高，哪个地区考分高；不要在你们的报刊上介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方法和经验；不要在你们的报刊上宣传高考成绩优秀的学生，因为考进大学只表明下一个学习阶段将要开始，他能不能学好还是个未知数；不要在你们的报刊上刊载试题和考卷，因为这些都将成为下一届毕业生的沉重负担。

我还要请各个出版社的编辑同志看看这篇调查摘要。请你们不要再印行历届高考试题解答之类的书，不要再印行供准备高考之用的各科问答。这些书轻则加重学生的负担，重则助长某些学生的侥幸心理。附带说一声，请你们不要再印行什么假期作业，因为这将侵占学生应得的休息权利。

爱护后代就是爱护祖国的未来。中学生在高考的重压下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解救他们已经是当前急不容缓的事，恳请大家切勿等闲视之。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一日作

还 要 呼 吁

——在教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天，我还要向大家呼吁，对于单纯追求升学率的问题，我们能不能大家都来关心，从各个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教育部一个部门能解决得了的，要各个方面共同努力，花上若干年的时间，才能把这种不好的社会风气真正转变过来。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说两点意见。一点是端正教育思想。我们的教育方针很明确，从教育方针作推论，无论如何总推不出如下的观点，以为学生受了普通教育，往后唯有去考大学这一条路子可走。所以这个观点是很不恰当的。可是好些人怀有这种观点，已经成为风气。要根本转变这种风气，就需要各个方面都来端正教育思想，认清学生为什么要受教育，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仅是教育部门的同志和学校里的领导和教师，还有学生和学生的家长，还有社会上各方面的人，大家都认清了教育究竟是何事，风气才会转变过来。

再一点是改进教学方法。现在学生的学习负担很重，老师备课教课，随时督促，批改大量作业，负担也很重，彼此都苦不堪言。要减轻双方的沉重负担，就需要改进现行的若干教学方法。去掉那些徒劳而少功的，采取那些不至于过劳

而确乎有实效的，逐渐达到老师从容不迫，学生身心双健的境界，再也听不到《中国青年》刊载的中学生发出的那种呼声。

我希望教育行政方面大力提倡改进，鼓励试验，按调查、研究、检查、督促四个步骤切切实实地倡导，那么教育界的积极性必将蓬勃发扬，负担减轻而收效更好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六日

我和商务印书馆

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我当过教员，又当过编辑，当编辑的年月比当教员多得多。现在眼睛坏了，连笔划也分辨不清了，有时候免不了还要改一些短稿，自己没法看，只能听别人念。

做编辑工作是进了商务印书馆才学的。记得第一次校对，我把校样读了一遍，不曾对原稿，校样上漏了一大段，我竟没有发现。一位专职校对看出来了，他用红笔在校样上批了几个字退回给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才知道编辑不好当，丝毫马虎不得，必须认认真真一边干一边学。

我进商务是一九二三年春天，朱经农先生介绍的。朱先生当时在编译所当国文部和史地部的主任。我在国文部，跟顾颉刚兄一同编《新学制中学国文课本》。这套课本的第一册是另外几位编的，其中有周予同兄。我参与了那时候颁发的"新学制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拟订工作。

一九二七年六月，郑振铎兄去欧洲游历，我代他编《小说月报》，跟徐调孚兄合作。商务办了十几种杂志，除了大型的综合性的《东方杂志》人比较多，有十好几位，其余的每种杂志只有四位。《小说月报》除了调孚兄和我，还有两位管杂务的先生。他们偶尔也看看校样，但是不能让人放心。

那时正是大革命之后，时代的激荡当然会在文学的领域里反映出来。那两年里，《小说月报》上出现了许多有新意的作品，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名字，最惹人注意的是茅盾、巴金和丁玲。当时大家不知道茅盾就是沈雁冰兄。他过去不写小说，只介绍国外的作品和理论。巴金和丁玲两位都不相识，是以后才见面的。

等振铎兄从欧洲回来，休息了一些日子，我就把《小说月报》的工作交回给他，回到国文部编《学生国学丛书》，时间记不太准，总在一九二九年上半年。到第二年下半年，我又去编《妇女杂志》，跟金仲华兄合作。一九三一年初，开明书店创办《中学生》杂志，过了不久，夏丏尊先生章锡琛先生要我去帮忙，我就离开了商务。我在商务当编辑一共八个年头。

商务创办于一八九八年，老板是几位印《圣经》发家的工人；两年以后，维新派的知识分子参加进去，成立了编译所，一个编译、印刷、发行三者联合的文化企业就初具规模了。后来业务逐渐发展，就编译和出版的书籍杂志来说，文史哲理工医音体美，无所不包；有专门的，有通俗的，甚至有特地供家庭妇女和学前儿童阅读的。此外还贩卖国外的书刊、贩卖各种文具和体育器械，还制造仪器标本和教学用品供应各级学校，甚至还摄制影片，包括科教片和故事片。业务方面之广和服务对象之广，现在的任何一家出版社都不能和商务相比。商务的这个特点，现在不大有人说起了。

商务的编译所是知识分子汇集的地方，人员最多的时候有三百多位。早期留美回来的任鸿隽、竺可桢、朱经农、吴致觉诸先生，留日回来的郑贞文、周昌寿、李石岑、何公敢

诸先生，都在商务的编译所工作过。稍后创办的几家出版业如中华、世界、大东、开明，骨干大多是从商务出来的；还有许多印刷厂装订厂，情形也大多相同。可以这样说，商务为我国的出版事业，从各方面培养了大批技术力量。

有趣的是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成立，政务院有个管出版事业的直属机构叫出版总署，胡愈老任署长，周建老和我任副署长，二十多年前在商务编译所共事的老朋友又聚在一起了。后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我兼任社长。一九五四年九月，出版总署撤销，这一摊工作并入文化部。胡愈老调到文化部，出版工作仍旧由他主管；我调到教育部，主要还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做编辑工作。这一二十年来，老朋友过世的不少，周建老、胡愈老和我还健在。有人说，做出版工作的人就是长寿。

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作

多活几年　多做些事

近两年来，我耳失其聪，目失其明。过去讲“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说七十岁不稀奇。不管哪种说法，七十即使不能算老，但是总到了退休的年龄。前年有一个杂志叫《长寿》，让我写几个字。人老了做什么？当“老寿星”，人矮而胖，形体没有什么健康美，还要两个童子陪在旁边，当这样的“老寿星”没有意思。我给那家杂志写了八个字：“多活几年，多做些事。”人生不过如此，多活几年就要多做些事。做什么样的事情？事情无论大小，只要脚踏实地，不说空话，或者尽可能少说空话，对于咱们社会，对于咱们新中国总有点好处。多活几年，多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摆起架子，说我要培养人才，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好像太严重了；能否降低一点儿说，就是给几个人有点儿好的影响。到了古稀之年，总要对于一两个或更多的人，给他们好的影响。影响并不是一定要他像我，我是说经过我的影响，尽可以超过我，胜过我，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假使大家都这样做，算起总帐来就很有意义。假如一个人到了古稀之年，能给一个人一点好的影响，算起总帐来不亏本，假如使两个人超过我，胜过我，就有盈利。假如更多的人受我的影响，盈利就大得很了。到了古稀之年的人，大家都作这样打算，我看是要得的。我愿意

用这样浅薄的话自勉，也与诸位同志共勉。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发表

及时佳作　中日共鉴

《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将在中国和日本同时上映，这是一件很值得庆贺的大事。

值得庆贺的第一点：这部电影是中日两国电影艺术家第一次合作的产品，而且是成功之作。电影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人们看了自然会明白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中，中日两国人民都遭受了极大的苦难，因而双方都明白，要保卫各自的和平生活就必须相互紧密团结，警惕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值得庆贺的第二点：这部电影上映的日子正赶上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的十周年纪念日。大家不会忘记日本政府在联合声明中的郑重表态：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反省"。这部电影在今天上映，正好提醒日本当局对军国主义的罪行再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如果自食其言，把自己应负的责任扔到脑后，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值得庆贺的第三点：这部电影的上映，正好用历史的真实来揭穿日本文部省歪曲历史，企图对中小学生进行欺骗教育的拙劣伎俩。让日本的中小学生都来看一看这部电影，让他们知道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中所说的"进入"到底是怎么一

回事，这样的“进入”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祸害。也让中国的中小学生都来看一看这部电影，让他们明白日本人民是我们的朋友，但是不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希望中日两国的文学艺术界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创作出像《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这样的好作品，为巩固和发展中日两国的邦交，使中日两国人民能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作出卓越的贡献。

一九八二年八月七日作

一部博大精深的“书”

我旁听了党的十二大，好像读了一部大的“书”。这部“书”真大，书名叫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部大书的内容称得上“博大精深”。开头有“序言”，就是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提出了今后二十年有三大任务，要完成四件大事。这篇“序言”并非随便写的，而是把这部大书的内容提纲挈领地写出来了。

“序言”下面是正文，正文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胡耀邦同志的报告，从物质到精神，从内政到外交，各方面都谈到了，既有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第二个部分是新党章。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新党章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我对新党章佩服得五体投地。新党章特别强调了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老实说，以前咱们吃了一些亏，就是这两句话没有做到。现在接受了历史经验教训，知道了这两句话非提出来不可，非见诸行动不可。

接下去是两位老同志的讲话。叶剑英老同志说的话很有教育意义。他说，后来者居上，年轻的会超过年老的，这是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规律。像我这样年纪大的人听了，是绝对相信的。咱们不能卖老，老有什么了不起？他

还说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穷无尽的，而个人的智慧才能却是有限的，要善于学习。正因为个人的智慧才能是有限的，所以就要永远学习，永远要求进步，直到老死为止。这个意思由叶剑英同志这样年高德劭的人来说，是很有分量的。还有陈云同志的讲话。他说，许多老同志表示要退出领导岗位，说明我们的老干部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退出领导岗位并不是革命到了头，对中青年同志要传，要帮、要带，使后继者超过自己。只有这样，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承先启后，延续不断地发展。

最后是李先念同志的闭幕词。它是这部大书的"跋文"。他说，制定一部好的党章还是比较容易的，严格地在全党贯彻，要全体党员都能按党章办事，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些话真是语重心长。我猜想，他说"不那么容易"，意思是要全体党员都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合格的党员？一个人的表现无非是言和行这两个方面。你是个党员，你就得想一想："我的言怎么样？行怎么样？是不是能按照党章所说的话去做？"我在党外，可总也常常在会上发言，我也应该想一想：我说的是不是心里话？是不是自己真的要这样做？是不是在说漂亮话骗人？大家都应该郑重地想一想。共产党员作表率不是自封的，不但要从言的方面，尤其要从行的方面，能够得到群众的承认。大家都看你做得对，心甘情愿地跟着你一起干，你才是真正的表率。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就要体现在全体党员身上。

十二大还选举了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当顾问，作参谋，作助手，可以承先启后。中

纪委这次由代表大会选出，就是接受全体党员的委托，因而责任更重大了。闭幕词强调今后五年要做到三个根本好转，我以为党风根本好转是最重要的。党员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只有无限的责任，那就是一辈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为你入党是自觉自愿的，面对党旗庄严宣过誓的。现在党员有三千九百万，算他四千万吧，中国十亿人口，那就是在二十五个人中就有一个党员。我说这就够了，如果这个党员是合格的，他用自己平常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自然而然地会影响他周围的二十四个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如果每个党员都能这样，咱们的事业绝对不会做不好。我恳切希望五年以后党风能够根本好转。

要读通这部大书得花许多功夫，而且书读了是要实践的，要用实际行动来读通它。我们如果能够从这部大书中得到真正的教益，就一定可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四日发表

革命的出版活动

今天隆重集会，为的是纪念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新知书店革命出版活动五十周年。我跟这三家书店的同志或是老朋友，或是在解放以后共过事，在这个值得纪念而且应当纪念的日子，我愿意写几句由衷的话，向老朋友老同事敬致祝贺。

解放之前在国统区的朋友都记得这三家书店出版了不少好书，受到读者欢迎，那时出好书不容易，要被禁，要遭到查封，人还要被抓去。记得聂绀弩同志写过一篇小说，篇名是《韩康的药店》。人们需要真药，韩康卖的是真药，所以生意兴隆。西门庆专卖假药，他把韩康看作死对头，使尽手段要把韩康的药店搞垮了才甘心。当时大家都知道，韩康的遭遇就是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写照。在国民党法西斯高压之下，三家书店的工作人员，包括主持者和从业者，团结一致，不辞辛苦，不避艰险，只知道认真做好出版工作，为推进革命事业服务。这种精神很了不起，应该在出版界得到继承和发扬。

一九四八年年底，这三家书店为了迎接解放，合并为三联书店，为解放以后的人民出版事业做好了输送干部的准备。所以咱们应该看到，这三家书店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不仅出

版了人民需要的许多好书，还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培养了很多人材，他们在管理方面、编辑方面、出版方面、印刷方面、发行方面都是骨干力量。

任何纪念活动都为了策励将来，今天这个纪念会自非例外。我祝愿现在在各个岗位上的三家书店的老朋友，同时祝愿出版界的全体同志，为开创出版事业的新局面，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继续作出新的贡献。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发表

知识分子何以自处？

——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常会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咱们学习胡耀邦同志的报告，学习新党章。现在人大五次会议、政协五次会议闭幕了，咱们又要学习人大通过的新宪法和赵紫阳总理的报告，学习政协通过的新章程。这些文件精神一贯，相辅相成，描绘出咱们中国四化建设的光辉前景，并且明确地指出通向这个光辉前景的具体步骤。我常听人说："咱们中国是大有希望的。"看报也常看见这句话，听广播也常听见这句话。"大有希望"，这个话当然没有说错，可是我总嫌它不够贴切。我以为咱们中国当前的新局面不是有没有希望的问题，简直是如宋朝的理学家张横渠所说的"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开端。张横渠这句话真好，但是只是个表达主观愿望的口号而已。咱们现在有领导，有宗旨，有规划，有步骤，那是切切实实的行动纲领，它的必然成功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认为光说"大有希望"是不够贴切的。以上是第一点。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在以上提到的许多文件里都着重地说到知识分子，着重地提到教育事业，这两点跟咱们民进关系极其密切。咱们民进的会员全都是知识分子，而且绝大多数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所以我说关系极其密切。这些文件从

各方面说明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几乎达到不厌其烦的程度。而且决不是在文件上写写罢了，实际上已经在那里做了。两三年来，知识分子的地位确然有所提高，往后还要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确然有所改善，往后还要改善；知识分子政策大体上已经落实，可是落实的工作并未停止，没有落实的还要认真落实。在这样情形之下，咱们知识分子有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摆在面前，就是咱们将何以自处。过去的事儿反正已经过去了，跟光辉的前景一对比，任何不愉快的往事还值得牢牢记在心里吗？何况知识分子被看得那么重要，是社会主义事业三股依靠力量之一。又何况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心心相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四句话你也说，我也说，成为共同的盟誓。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以为何以自处的问题非但值得考虑，而且非考虑不可。

何以自处？笼统说起来，“充实自己”四个大字就够了。随时随地多想多问，一切实事求是，决不随声附和，就能够正确了解新情况，正确解决新问题。但是实际上一切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现在通行说因什么制宜，往往说上好些个，归纳起来就是“因X制宜”。所以实际上只能各个人“因X制宜”来充实自己，谁也不能代替谁提出具体办法。请相信我并非说俏皮话。

咱们民进的同志大多数担任教育工作，此外有从事出版工作的，有从事文艺工作的。就广义说，出版工作、文艺工作也是教育工作。我一向以为在教育工作的领域里，习惯势力极其顽固，很不容易进行有效的改革，因此之故，不容易

提高质量，不容易作出显著的成绩。有些人甚至只知道因循照旧，按老规矩办事，并不想一想自己究竟在干什么，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干。所以我时常想，凡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无论哪一级的行政领导和哪一所学校的教职员工，都应该时常想一想，问一问：为什么要办教育？教育究竟是干什么的？教育这个词儿究竟包含哪些内容？这一类问题好像问得太愚笨了，其实都是带根本性的问题，非认清楚辨明白不可。如果你回答说，办教育为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才，好，你的回答对了。但是还可以问：你把升学率的高低作为评判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准，又是什么理由呢？只怕你要"王顾左右而言他"了。既然如此，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办法、以及光看不甚可靠的分数来衡量学生的办法，光要学生按照书上写的老师讲的来回答的办法等等，难道还不需要改一改吗？所以我刚才提出的几个好像极其愚笨的问题，大家非认真思考得到正确的回答不可。正确的回答就是决心改革的强大动力。改革当然不能随便来，必须经过试验，既然是试验，道路当然不止是一条。只要有根据，有办法，认定务须对学生有好处，尽不妨你试你的，我试我的，试它一年两年看效果究竟怎么样。上海育才中学的试验，全国政协的教育组、教育工会和民进中央的文教委员会最近去作了调查，认为育才的改革是有成效的，调查报告已经印发，我不多说了。除了育才，上海和其他地方都有若干学校正在试验，企图改革。对于这些学校，我衷心敬佩，因为这些学校适应开创新局面的时代脉搏。我非常赞同教育部张文松同志的话，他说他赞成各种各样的改革试验，惟有一种除外，那

就是为追求升学率而进行的试验和改革。总之，咱们的教育非改革不可，不改革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就是改革的目的，决不能是别的目的。新宪法总纲的第十九条和第二十四条对于教育提出了周密的严格的要求，咱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会注意到的。

末了一点，我想说说我的浅薄的认识，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的差别只是劳动方式的差别，并非阶级的差别。知识分子可以是工人，也可以是农民；反过来说，工人和农民也可以是知识分子。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工人和农民中间知识分子比较少罢了。新宪法的《序言》中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三股依靠力量，是符合实际的。可是为将来设想，总会有那么一天，工人农民的绝大部分甚至全体工人农民全都成为知识分子。到了那时候，劳动方式上的差别越来越缩小，就没有单把某一群人称为知识分子的必要了。这样的境界是值得咱们向往的。而要达到这个境界，全国人民的精神文明和科学技术都必须极大的提高，所以我想，这样的境界应该是咱们教育工作者的最高目标。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

作文和做人

品德教育重在实做，不在于能说会道。

譬如去年高考的作文题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是有一位考生写得头头是道，有理论，有发挥，准能得高分数。但是他离开考场，挤上公共汽车，就抢着靠窗坐下，明明有一位白发老太太提着菜筐挤在他膝前，他只当没瞧见，你说这位考生的作文卷子该不该得高分数？依我说，莫说高分数，我一分也不给。他连给老太太让个座的起码的好习惯都没有养成，还有资格谈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吗？

也许有人说，你太认真了，那是作文，那是考试。对，是考试，在公共汽车上给不给老太太让座，这才是真正的考试，他一分也得不到。

文当然要作的，但是要紧的在乎做人。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作

记我编《小说月报》

一九二七年五月，郑振铎兄赴欧洲游学，托我代替他编《小说月报》。在那年六月份出版的《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六号上，振铎兄刊载启事说："我于五月二十一日乘Athos II赴马赛。此次欧行，为时至促，亲友处多未及通知告辞，万乞原谅！……关于《文学研究会丛书》事，已托胡愈之、徐调孚二君负责；关于《小说月报》事，乞直接与'《小说月报》社'接洽；但我虽在请假期内，仍当视力之所及为《丛书》及《月报》负一点责任。"

振铎兄是五月下旬动身的，我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国文部调到"《小说月报》社"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期刊的编辑者是跑在时间前头的。振铎兄动身之前已经把第六号编定了，还给以后几期准备了一部分稿子。所以从第七号起虽然由我接编，格局跟以前并没有明显的不同。振铎兄实践了他的诺言，在欧游途中时常写信回来，给《小说月报》出主意，寄稿子——他自己经常写，还拉朋友的稿子。他对《小说月报》的系念和关切，只能用不得已远离家乡的父亲对他子女的心情来比拟，不但使我感动，还感染了我。

振铎兄去欧洲不满两年，等他回到上海把劳顿休息过来，把杂事安顿停当了，我把《小说月报》交还给他，已经是一九

二九年五月间了，所以二十卷的第六号大概还是我编定的。我说"大概"，因为第六号跟前一期第五号也看不出明显的不同。所以只能粗略地计算，从十八卷第七号到二十卷第六号，我代振铎兄编了两年，一共二十四期。

现在经常有人说那两年的《小说月报》上出现了许多新作者，说我如何能发现人才。现在那两年的《小说月报》影印出来了，大家翻一下目录就会发现，在那二十四期中，新出现的作者并不少，可是人们经常提起的就只有那几位。他们的名字能在读者的心里生根，由于他们开始就认真，以后又不懈地努力，怎么能归功于我呢？我只是仔细阅读来稿，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或取或舍而已。如果稿子可取，又感到有些可以弥补的不足之处，就坦率地提出来跟作者商量。这些是所有的编辑员都能做到的。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那两年的编辑工作是徐调孚兄跟我一同做的。从一九二四年起，调孚兄就协助振铎兄编辑《小说月报》，他比我熟练得多。直到一九三一年年底《小说月报》停刊，他才离开商务印书馆，到开明书店工作，解放以后仍然干编辑这一行。他勤勤恳恳为读者服务了一辈子，我是永远忘不了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作

追念金仲华兄

最近接端苓的来信说："时间过得真快，仲华哥被迫害致死即将十五周年。朋友们提起他都感到十分痛惜，在一九七八年为他召开的平反昭雪大会前后，曾有多位生前友好写过一些纪念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您是仲华哥最早共事的老同志和老朋友，也是他生前十分尊敬和爱戴的长者，能否请您在百忙中抽空给他写一篇纪念文章，我想您是会同意的。"

在十年动乱期间，几乎人人都居住在孤岛，邮电局明明开在那里，可是得不到什么消息，偶尔有些风闻，不便打听，也无从打听。仲华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从哪里传来，现在已经想不清了，当时将信将疑，只巴望是个谣传。直到一九七五年十月间端苓偕同她的爱人刘火子同志来看我，我才知道仲华确已逝世还没有平反昭雪的详情。我听了唯有怅恨，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过了几天，我作绝句四首赠与端苓，现在抄录三首在这里。

忽承临况特相寻，执手互呼感不禁，
怀想莫通将十载，今朝始获晤谈深。

备闻所叙一汍澜，岂意斯人出此端！

长忆高楼联席日，衡文校稿共铅丹。

陶母风仪永不忘，高龄康健住桐乡。
敢烦一棹归宁候，祝愿代申百岁长。
（母夫人生于一八八一年）

第二首中我说“岂意斯人出此端”，绝无责备仲华不够坚强的意思。我想，死是多么严肃的事，被迫害而出于一死，必然有深恶痛绝，再也不愿与共天地的理由在，我怎么敢责备他呢？我对老舍也作这么想。我在家里常对至善满子说，十年“人祸”，相识的朋友致死的有一百左右；其中交情最深的二位，一位是仲华，一位是老舍。我每当想到他们二位，总要感叹“斯人也而有斯死也！”

第二首中所说的高楼指东方图书馆的第四层楼，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社就在那里。商务印书馆编译人员多，彼此不尽相识，我调到妇女杂志社工作，才与仲华相识。一见如故，协作得很好，情谊宛如亲弟兄。那是二十年代末了的事。后来又在开明书店共事，《中学生》归他负专责，我辅助他做些编校工作。他通英语，博览兼收，长于分析综合，谈国内国际形势变化都中肯，为这方面的专家之一。因此之故，在解放前后，他在香港和上海都曾主持新闻工作。他紧张而不忙乱，能从纷繁中理出头绪而抓其要项。我曾经想，这样的能力我是丝毫也没有的。当然，不经过长期历练，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呢？

第三首用陶母比喻仲华和端苓的母夫人，我自以为比得

挺适当，因为老太太乐于并且善于款待客人，在我们朋友中间交口称说，传为美谈。她年纪虽大，事必躬亲；熟悉仲华的各个朋友，跟谁都谈得来，可不是寻常的敷衍应对；政局和社会情况也颇了然。我有时想，仲华应该有这样一位母亲，有时又想，不如说老太太应该有仲华这样的儿子。可是我不知道，当她儿子永远离开她的时候，她是怎样忍受下来的，此后几年间心头的伤痛是怎样熬过来的。端苓没有给我说，可能是她不忍说，只说母亲身子还佳健，回到桐乡去住了。我又能说什么呢？说些不相干的安慰话，徒然勾引老太太的伤痛，自然不相宜，只能依常例祝她长寿了。后来知道老太太于一九七七年逝世，终年九十八岁，可称高寿，但是没有等到知道她的儿子得到平反昭雪。

端苓要我作文纪念仲华，我依据赠与端苓的诗写了以上的话。可以说的当然还有，而且并不少，要待静心回忆和翻看日记，只得将来再谈了。

一九八三年三月九日作

从《扬州园林》说起

一九五六年，同济大学建筑系印行陈从周教授编撰的《苏州园林》。我汇去五块钱购得一册，随时翻看，非常喜爱。苏州园林多，这许多摄在相片里的园林，大部分我没到过，可是最好最著名的几个，全是我幼年时经常去玩的。拙政园，沧浪亭，怡园，留园，网师园，几乎可以说每棵树，每道廊，每座假山，每个亭子我都背得出来。看了这几个园的相片，仿佛回到了幼年，遇见了旧友，所以我喜爱。相片中照的虽是旧游之地，又好像从前没有见过这一景，于此可见照相艺术的高妙，所以我喜爱。每张相片之下题着古人的词句，读了词句再来看相片，更觉得这一景确乎是美的境界，所以我喜爱。可惜的是词句之下没有标明是谁的词句，什么调。再则相片之外还有测绘精确的各个园的平面图，各处亭台楼阁的平面图或立面图，以及窗槅、花墙之类的精细图案，这些是我国古建筑史的珍贵资料，虽是外行也懂得，所以我喜爱。还有一点，这本图册不是陈从周教授个人的著作，是他带领建筑系的同学出外实习的产物。这样的实习是最好的教学方法，最合于教育的道理，所以我喜爱。

过了十八年，我跟从周开始通信。这才知道他善于绘画。承他画了好多幅梅兰松竹赠我，我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间回

敬他一阕《洞仙歌》，现在抄在这儿。

> 园林佳辑，已多年珍玩。拙政诸图寄深眷。想童时常与窗侣好游，踪迹遍山径楼廊汀岸。　今秋通尺札，投赠瑶琮，妙绘频贻抱惭看。古趣写朱梅，兰石清妍，更风篁幽禽为伴。盼把晤沧浪虎丘间，践雅约兼聆造形精鉴。

到现在十年了，十年间虽然晤谈好多回，同游沧浪亭和虎丘的愿望可没有实现。

去年，《苏州园林》在日本重印了。新加坡周颖南先生从日本买了，寄一册赠与我。内容跟旧本全同，装订比旧本好。经过了将近三十年，旧本大概很难找到了，把它重印是必要的，因为它是有用的书，不是泛泛的书。

最近突然接到从周寄赠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扬州园林》，在我可以说又惊又喜。为什么惊？因为他又编成了《扬州园林》，今年可以出版，一个字也没跟我提起过，突然来了这样一本《苏州园林》的姐妹篇，印刷装订都挺精美，还有十几张相片彩色精印，是《苏州园林》所没有的，怎么能叫我不惊呢？

我第一次游扬州在二十年代，最初的好印象就是诗词中常用的“绿杨城郭”四个字。那么柔和茂密的葱绿的垂杨柳在春风中轻轻翻动，从来没见过，感到没法说清楚的美。后来又到过扬州三四次，都跟第一次同样匆匆，所以除了瘦西湖中及其周围的若干必游处所，扬州的名园一个也没到过。现

在有了这本《扬州园林》，我可以从从容容“卧游”了，因此越发感激从周寄赠此册的厚意。

《扬州园林》中有从周撰写的一篇概说，小字密排，两万多字。我视力极度衰退，没法看，想让孙辈念给我听，他们不得空闲，所以至今还没听见这篇概说。可是从周的《说园》五篇却是我自己看的，每天看十来页，持之以恒，居然看完了。因为那是《同济大学学报》的抽印本，大字楷书，我还能对付，把它看清。这五篇《说园》是从周对造园艺术的全部思想的表述，他的哲学、美学、建筑学的观点全都包容在里面。如今在全国范围内，不是正在整理名胜，修复古建筑吗？他写这五篇《说园》的用意，就在使主其事的人懂行，知道为什么要整理和修复，该怎样去整理和修复，庶几不至于弄巧成拙，把好事办成坏事。因此，我以为这五篇《说园》是有心人的话，并非偶然兴到的漫笔。至于看得见的具体例子，则有《苏州园林》《扬州园林》两本图册在。图册跟《说园》交相为用，彼此参看，对整理和修复必然更有益处。因此我想向关心整理和修复的人进言，你们既然爱看苏州、扬州两本图册，请同时阅览从周的五篇《说园》。

我久已想向从周贡献些意思，因为头绪多，不容易想清楚，整理得有条有理，至今还没写出来。现在我想，等待完全想清楚，整理成条理，不知将在何年何月。不如把想到的随手写些出来，写错了将来再改，写乱了将来再调整，岂不是好。因此，下文就写这些不成条理的想头。

扼要总说一句其实也不难，难在分疏细说，说得明畅透彻。姑且先扼要总说一句：我恳切盼望从周在拍摄、测绘古

园林，为整理和修复古园林尽力之外，凭他的哲学、美学、建筑学的观点，为大众造园；所谓大众，包括各地的居民和来自国内国外的旅游者。

我想，如苏州、扬州的那些名园，原先都是私家所有，不是为大众修造的，当然不为大众考虑。因此，那些园只宜于私家享受。大众去游览，要感到娱目赏心，得到美的享受，就未必做得到，大多只能做到"到此一游"而已。

私家造园，当然只须为私人着想。宾朋雅集，举家游赏，估计一百人大概差不多了。游人少，园小也见得宽舒。在宽舒的环境里，站在适当的地点，凭审美的眼光观看，就能发见这儿有佳景，那儿也有佳景。从周两本图册里的那些相片所以特别难能可贵，就在于在那些园林全归公有，其中几个名园的游人成千上万的，近三十年间，竟能够像独个儿游园似的，从从容容地凭他的审美观点，随处发见佳景，随时对准镜头，摄成那么多的精美相片。我料想多数游人未必能够如此。在挤挤攘攘之中，预防碰撞照顾同伴还来不及，即使有审美的素养也顾不到审美了。带了照相机的人也难办。一则在扰攘之中无从审美。二则即使能在意想排除其他游人，发现美景，实际上又怎么能排除呢?照不成好相片也无关紧要，紧要的是游园而没有得到应得的享受。——以上是我以为古名园不甚适宜于大众游览的一层意思。

再就古名园不甚宜于大众游览加说几句。古名园的亭台楼阁、厅堂庭院以及假山回廊、九曲桥之类不宜于大众的挤，厅堂里的那些椅子凳子不适于也不够供大众的坐。无论厅堂的面积多么大，川流不息的人群在里面流过，谁也不容停一停

步，挤进去了就挤出来，这有什么意思？厅堂里的那些椅子凳子全是上好木材，精巧工致．大多标明“请勿坐”，有的园不标明，由谁去坐呢？我一向有个感觉，古人制造那些讲究坐具，抱的是“为坐具而坐具”的观点、讲究的是构图的繁简，雕琢的精粗之类，坐上去身体舒泰不舒泰，那是不考虑的。说得明白些，那些讲究坐具坐上去并不舒泰，不如现今的藤椅和沙发。

以下再说一层意思。古名园往往要求“万物皆备于我”。“万物皆备于我”，就一方面说，是挺高妙的一种思想境界；就另一方面说，却是私有欲的表现，私家园林之所以为私家园林，富绅豪商和皇帝的私家园林都如此。为了要求“万物皆备于我”，往往出现不配称的布局。厅堂前面或后面堆起一座假山，不怎么大的荷花池旁边来一艘旱船，就是例子。厅堂和假山，荷花池和旱船，拆开来看都不错，合起来看就见得不呼应，不谐和。这对于如今的游览大众是不甚相宜的。有的人看了以为这样布局就挺美，有的人看了不免怅然，心里在摇头；这在供应大众以又适当又充分的美的享受以及逐步提高全社会的精神文明这两点上，都不免有所欠缺。

关于假山，在这儿我想说几句。现在为大众造园，只须因地制宜，不要求“万物皆备于我”，没有真山就不用堆假山。莫说堆假山的好手不容易找，假如有，在整理和修复古名园的工作中就大有好手用武之地。

外行话说得不少了，应该就此打住了。我恳切盼望从周为大众造园，想到两个具体的项目，现在就写出来，其实也不可能不是外行话。

一个项目是，以太湖周围为范围，在不征用或尽少征用

农田的前提下，挑选若干地点，兴建游览区，供大众享受。一切利用自然而加以斟酌修正，务求有益于大众的身心。如果在游览区修建旅舍，应该显示出当地建筑的特色；而饮食起居和供应服务各方面务必专心致志为游览的大众着想，使他们心里真个满意。千万不要修建火柴匣式的高楼，那是大城市不得已的产物，我不知道住在里边是什么滋味。我从相片或电视中看，无论单座高楼或多座高楼，总之感到这是大城市异常的丑。咱们太湖周围的游览区不能学它。

再一个项目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成若干类型，按类型为各地农村绘制两种设计图案，一是住房的设计图案，二是屋前屋后园圃的设计图案，以供广大农民采用。如今各地农民逐渐走上富裕的道路，他们不但要求有足够的房子住，还要求住得舒服，生活上精神上更感到愉快。为了这一点为农民服务，设计制图，真可谓无量功德。至于屋前屋后的布置，经过专家的考虑，可能做到更经济更美，也不是无关重要的细事。这个项目好像不是造园，其实是广义的造园。

以上说的两个项目，当然要由从周带领同济大学的同学们共同去做。那么，这样做是最高明的教学方法，同时又是最踏实的教育实践。

从周精力充沛，不怕多事，学力和经验两扎实，看了我提出的两个项目，想必会有跃跃欲试的意思。可惜我说得不透彻，欠具体，通篇看来，更见得杂乱无章。用这样的拙作来报答从周寄赠《扬州园林》的厚意，就从周方面说，与拙词《洞仙歌》里的句子正相反背，可谓"投琼招毽"了。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二日作

“反正是那么一回事”

近几年来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反正是那么一回事”。

你说这件事真好，应该提倡。他说：“反正是那么一回事。”话只有一句，意思可深沉得很。反正是那么一回事嘛，分什么好和坏！你偏要说好，偏要提倡，岂不多此一举。

你说那件事太坏，必须反对。他还是来这么一句：“反正是那么一回事。”你说坏就坏了？不一定。就算你说得对，你反对得了吗？何必这样咬牙切齿的，反正是那么一回事嘛。

“反正是那么一回事”，这句话好像不偏不倚，心平气和，实质上不但提倡马虎，反对认真，而且模糊了是非美丑的界线，扼杀了好的，容忍了坏的，至少是污染精神的一种病毒。

使人感到可怕的是有些青年嘴上也挂着这句话，他们好像饱经沧桑，把什么都看穿了似的。我希望他们醒悟过来，认清这句话的害处，否则他们就无法抵制各种精神污染了。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作

略述我的健康情况

平生作文不少，可是从来没写过有关自己健康情况的文篇。现在《中国老年》编辑部嘱我写些什么，我想就这方面写一篇应命。我绝无摄生的好方法，锻炼的好经验，只不过把有关身体的若干方面简略地叙写，一备自己查考，二供读者阅览而已。

年逾"古稀"的长辈

我祖母和我父亲都是七十二岁。我外祖母八十六岁。我母亲九十六岁，年龄最高，一九六一年逝世。若干地方都有"老不入川"的说法，我母亲却在七十四岁时入川，八十二岁时出川，而且都在车船拥挤，交通秩序极端混乱的时候。解放以后，卫生部门听说我母亲高年，曾经来打听过。我只能说我母亲忠厚寡言，勤劳家务，似乎从不考虑什么养生之道。来打听的同志不免失望而去。

我母亲是我父亲的第二位续弦，生我的那一年，我母亲三十岁，我父亲四十七了。我生后第三年又生了个妹妹，再过四年生了第二个妹妹。大妹妹十三岁时病故。二妹妹小于我八岁，健康情况比我差，可是饮食起居还如常。

我绝无有关遗传的学问。按常识想，寿命短长大概决定

于不容易计算的种种因素，有属于父系母系历代的遗传的，有属于本身现实生活的必然原由和偶然原由的。现在我活到八十九岁，我父系母系两代长辈中有四位超过"古稀"，或许是若干因素之一，也未可知。

从小就不甚健壮

据说我幼年时不爱吃食，多方设法引诱，才勉强吃几口粥饭。豆腐青菜都不爱吃，绝不吃肥肉，各种鱼都爱吃。十三岁上寄宿高等小学，才开始吃豆腐青菜。饭量一向很小，吃了一碗再添是少有的事。记得只有一回，那是在中学时代了，为了跟厨房头子为难，同学们相约多吃，把饭桶里的饭吃光，让厨房头子向外边面馆里叫"阳春面"来吃。我响应号召，居然吃了三碗。这可以说是平生的最高纪录了。

进食不多，身体当然不会怎么健壮。自从十二岁上为了报名考高小照生平第一张相片起，直到如今存有很多相片，没有一张够得上用"壮"字"健"字形容的。有些相片还觉得清秀，有些却非常憔悴，尤其是抗战期间照的。

喝酒和吸烟

我从八九岁时就开始喝绍兴酒。当时我父亲每天傍晚到玄妙观前街老万全酒店喝酒，我从书塾里放学出来常常跟着去。他规定喝十二两，我喝四两，合起来是一斤。十三岁上进了高小，教修身课的是可敬的章伯寅先生，他讲喝酒有种种害处，我极信服，星期六回家向我父亲说喝酒有害处，我不喝了。我父亲不以为然。下一年考进了中学，不在学校寄

宿了，有时跟着我父亲到老万全，又陪他喝四两了。戒酒只坚持了一年，真可谓没志气。中学同学也有能喝酒的，有时一块儿往酒店喝酒，我的量就不止于四两，达到了一斤的程度了。中学毕业之后当小学教师，先在苏州，继之在上海，又继之在苏州的近镇角直，同事和朋友之间能喝酒的不少，因此，虽不能说每天必喝，喝酒的日子实在不少。一九一九年我父亲逝世，暑假中全家老幼移住角直，我开始每晚喝例酒（害病的日子当然除外），直到如今。当时每晚饮量并不多，只喝十两或十二两。喝罢酒，吃过饭，然后看学生的作业或者写答复朋友的信，撰写准备投寄的文稿。一九二三年我家迁居上海，相识的朋友多了，其中善饮的很不少，福州路上几家出名的绍酒店是我们常到的处所。每人的饮量一斤半或二斤，彼此超过二斤喝得酩酊大醉的晚上也间或有。

八年抗战期间生活较为艰苦，酒依然常喝。绍兴酒不常买得到，就喝重庆或眉山的"仿绍"，以及四川各地出产的大曲，还有贵州的"茅台"，广西的"三花"，都曾经喝过。一九四九年初在香港住了一个多月，开始喝白兰地。三月中旬到达北京住下来，一连十五年以上都喝白兰地。——到这里暂且停一停，不说喝酒说吸烟。

我吸纸烟开始于一九二三年迁居上海之后。一则因为坐在马桶上大便可以消解臭气。二呢，作文构思的时候吸一支烟，似乎可以使心思灵活些。我的"烟量"不及酒量，一罐五十支装的纸烟可以吸三四天。在四川的时候还曾经买过烟叶子，自己卷着吸。又曾经买过烟斗和板烟，不久就丢开了。一九六七年我患心肌梗塞，住反帝医院（原来是协和医院，"文

革”时期改称反帝医院，现在是首都医院）七个星期，出院时主治大夫黄席珍女士给我指点注意事项。我请教她对于烟酒两项嗜好该怎样。她知道我不愿意两项都放弃，就说，“戒了吸烟吧。”我恭敬地回答她说，“一定听从您！”至今十五年了，我没吸过一支纸烟。

那回出院之后还是喝白兰地。直到一九七八年因割除胆结石再次住院，出院之后不久试喝酒，开始觉得白兰地力量大，受不了，于是改喝葡萄酒，每次三四小杯。葡萄酒我最欣赏通化的产品，可惜不容易买到。最近买到芜湖出产的镜黄酒，跟普通绍兴酒相仿，味道还正，我就改喝镜黄酒了。

我说喝酒说得相当多，绝不是宣传喝酒，喝酒总是不良的嗜好。我只为了两点。一点是生平请教大夫也说不清有多少回，没有一回说我的毛病跟喝酒有关联的，这有点怪。再一点是我喝酒喝了八十多年，可称为长久了。

运动和操练

幼年坐在书塾里念书，绝对无所谓运动。进了高小开始学跳绳，如今五六岁的孩子就能跳的各种花样，我在十三岁上才学会。还有拍皮球，开始拿到皮球也在那时候。高小的院子里搭起凉棚，阳光强烈时就展开卷着的芦席遮阳光。凉棚的支柱是四竿粗竹子，立在院子的四角。那四竿竹子成了十来个同学的运动工具，我也在内。只要双手握住竹子，身子往上一耸，两腿往上一提，夹住竹子，这样重复四五回，就可以爬上屋面了。上了屋面，谨慎小心地在瓦楞上走，从邻家楼房的窗户里窥看室内的情形，或者在屋脊上坐下，谈一阵天，

乘一回凉，觉得样样新鲜，其味无穷。有一天傍晚，上屋的同学全下去了，只我一个落后，距离屋檐还有三四尺，忽然间管斋务的龚赓禹先生来了。他见我在屋上显得很惊慌，于是和婉地轻声说，“好好下来。”待我下来之后，他只说往后别再上屋了，没说别的。后来我想，龚先生在这一刹那间，考虑得相当复杂，决定得颇为妥当，要是大声呵斥，很可能发生极坏的后果。龚先生也是一位可敬的老师。

踢足球我也参加过，可是腿力弱，踢不高，踢不远，无论担任哪个角色，只是备员而已。有时强力的来球中在我当胸，或者中在我面颊上，那种压迫疼痛之感非常难受，因而对足球并无好感。下一年进了中学，校内操场上铺了小石块还没铺上土，就在场上踢足球。有一天我在踢球时跌了一交，左膝盖跟小石块磨擦最重，皮肉破了一大块，流血不少，在家里躺了一个星期才能起床到校。从此我见足球就害怕，再也不敢参加踢球了。

中学操场上有浪木，有木马，有单杠。三样之中，我跟单杠稍稍有缘。能翻一个筋斗，能用脚背钩住单杠，全身笔直倒垂，能用右手抓住单杠，全身蜷成一团，叫做“挂秤砣”。

此外还有一项运动我也试过，可不是学校里的事，那是骑马。进了中学的第二年，我们同学沾染了当时其他学校的习气，借端闹风潮。短时期间，各事都没有了秩序，同学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有十几个同学想去骑马，我也参加在内。马是租的，一小时一毛钱，一个马夫管着。距学校不远有个广场叫“王废基”，是张士诚故宫的废墟，正是练骑马的好所在。

开头是由马夫牵着马走，过几天不用马夫牵了，各自执着缰绳操纵着马走。随后身子能摆稳了，两条腿夹得住马背，好像跟马合成一体了，于是通过缰绳指挥马，要它"小走"或是"跑开"。"小走"舒爽，"跑开"豪放，十几骑一连串在广场上驰骋，真可谓快意事儿。在一次"跑开"的时候，我腿劲一松，突然往左边摔下来，立即昏过去了。幸而在左边，没给后面的马踩着。同学们把我抬到宿舍里，过了三小时光景醒来，居然没有什么痛苦感觉。回到家里，当然不敢向父母吭一声——大约经过个把月，风潮平息了，学校秩序恢复了，同学们都不再骑马了。

以下说操练的事。

高小一年和中学第一年的体操是徒手操和器械操，中学第二年到第五年全是兵操。器械操用木哑铃、铁哑铃、棍棒、长干双木球棒（两个木球装在棒的两端）之类。兵操各人有一支一响后膛枪，一条皮带，皮带上附有两个子弹匣，一把刺刀挂在左边。辛亥年（一九一一）秋间苏州光复，同学们组织学团保卫地方治安，领到了五响毛瑟枪，并且每人有一排子弹（五颗），那真是非常开心的事。

教兵操的是魏旭东先生，现在我记不得他是湖南还是湖北人，军界出身，什么级别我也说不清，苏州人几乎全都知道他，课程中有兵操的学校都请他，大伙儿称他"魏教习"。他教我们从"托枪""枪放下"开始，直到"预备放""跪倒预备放""卧倒预备放"，要求相当严格。有时候他要检查枪管，看我们擦枪的功夫怎么样。有好些同学真肯下功夫，把枪管里擦得乌蓝发亮，来复线清清楚楚。我擦枪挺随便，用通条带着布条

插进去擦几下就了事，从没有受到魏先生的赞许。再说那一排子弹，既然拿到手，总要把它消费了才称心，于是选定一天去打靶。打靶的结果，五枪全中的占极少数，中一两枪的居多数，我可一枪也没打中。

开始时班级少，只能操小队教练。后来班级多了，人数够了，就操中队教练。我在本班里年纪最小，身子又不高，无论小队教练中队教练，我总是排尾。一响后膛枪已经高过我的肩膀，如果上了一尺有馀的刺刀就高过头顶不少，自己想想也好笑，而且感到分量重。虽然如此，我还是认为兵操挺有兴味。队形有多种变化，步子有正有快有跑，上刺刀，下刺刀，举枪敬礼，散兵线，野外搜索，上了刺刀喊着"杀"冲锋，冲上高墩算是占领了敌人营地（当时苏州砖瓦泥土堆很多，叫做"高墩"，高的与楼房相等，是太平天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全都觉得可乐。一九一零年全校到南京去旅行，参观南洋劝业会，到南京下了火车，成四行扛着枪开着正步初次踏上南京的街道，同学们都有不可一世的自豪感。

前边说的运动和操练只是高小一年中学五年间的事。从一九一二年起，可以说的只有一件了，就是我也曾经练习骑自行车。那是一九一五年我在上海尚公学校任教的时候。好几位同事对此有兴趣，我就跟着尝试。自行车向车行里租，租费跟租马一样，也是一小时一毛钱。起先由同事或学生扶着，在校内操场上来回行动，身子总摆不稳，扶的人一放手，车就偏侧停住了。过了三四天，不知道怎么一来，觉得自己有主意了，赶忙叫扶着的人放手，两只脚着力地蹬，居然在操场上转了好几圈。后来熟练了，能够转折自如，两脚停蹬也

能前进一大段了。可是我只敢在操场上骑，在马路上从来没骑过。

先是当教员，后是当编辑，当编辑有时兼当教员，而当编辑的时间超过当教员很多。职业规定我积年累月伏案工作，养成了习惯，竟至于想不到站起来散散步，伸伸腰。一九四九年春到了北京，不久就参加工作。在机关里，在出版社里，上下午都规定有工间操的时间。可是没有人来要我去做工间操，我也就不去参加。直到如今，常有人问我，“练气功吗？”“打太极拳吗？”“经常散散步吗？”“每天在院子里兜几圈吗？”诸如此类，我听了非常惭愧，只回答个“不”字。我自己知道，这样的习惯很不好，可是习惯已深，自制力差，无由改变了。要是有人在旁监督我，强制我，非定时活动不可，我也会活动活动的。可惜我没有这样的人。

两 次 重 病

我身体虽然不怎么健壮，害病的时候可不算多。伤风咳嗽每年总要犯几回，此外则每逢春夏之交，江南所谓黄梅季节，往往要感到困倦，头脑昏沉发胀，饮食乏味。看中医，总说这是“湿阻”。待天气晴正了，夏令气候来了，这些不舒适就消除了。西医没有“湿阻”的说法，只开些药水药片让我服下，过些时照样痊愈了。

解放前从未住过医院。一九四九年春到北京，至今三十五年间，住过五次医院，北京医院两次，首都医院三次。在这五次里头，我只想说严重的两次。

到了北京，我在附近的澡堂子洗澡，每周一次，常去的是

松竹园，偶尔也坐四站电车到宝泉堂。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早上，由第三个孙子永和陪往宝泉堂。在澡盆里洗了一会儿，突然感到胸口异常不舒服，难以描摹，这种感觉以前也曾有过，而那一天特别利害，就急忙出澡盆躺着。躺了大约半小时，那种感觉消失了，急忙回家休卧。既而这种感觉又来了，比在澡盆里的时候更利害，而且不仅是胸口，胃部和背部也作剧痛，前后夹攻，于是头部大出汗。午餐晚餐都没吃。夜间梦魂颠倒，梦境好像极复杂，可是全都记不得。第二天仍然作痛，背部的痛更强烈。几次量体温，从三十七度六升到三十八度四。晚上稍醒再入睡，一连睡了十小时。全家人都着急，认为再不能坚持硬熬、不请教大夫了，第三天就坐三轮车到附近的地段门诊部求诊。大夫说恐怕是心绞痛，须往大医院作心电图检验。于是决定明天往反帝医院。二十四日早上，至善满子陪我到反帝医院。大夫听了陈述，就量血压，血压相当低。大夫面有忧色，让我坐了轮椅去作心电图检验。他看过检验的记录带，断言必须住院，就叫把我推往病房。病房是地下室，九个床位，床与床之间大概距离两尺光景，我就躺上唯一的空床位。遵照大夫的嘱咐，只容躺着，不准活动，饮食要由他人喂，大小便也不容下地，这就必须有人在旁陪伴。至善满子各陪了我一宿，移一条长凳贴着我病床的右侧，就在上边蜷着。至善曾经跟大夫商量，能不能换入比较安静的病房，因为按病情有此需要，大夫说难办。

史晓风同志在二十五日上午来看望我，回到教育部告知刘皑风同志。这天下午，出乎我意料，刘皑风段洛夫二位还有一位张同志一同来了。他们了解了病况就去找大夫商谈换病

房的事，谈得相当久，似乎没有结果。下一天上午张同志再来接洽，我才得迁入跟我级别相称的双人病房。当时不清楚所以然，后来才知道关键在于教育部的四个“革命组织”共同给我出了一封证明信，证明“此人目前尚未定为走资派”。这封证明信至今还保留在我的病历里。反帝医院的“革命派”曾经有过逐出“走资派”病人的事，我“尚未定为走资派”，他们当然认为可以收容了。

我这回病，病历上的记载称为“急性前壁心肌梗塞”，至今没犯过第二次。可是以后每次作心电图检验，记录带上总划出明显的痕迹。七个星期里量血压在二十次以上，在先高压低压都偏低，到出院时高压一百二十几，低压七十，跟平时差不多了。

治疗这种病似乎不怎么繁复。一则躺着不动，按时服镇定剂，多睡眠。再则服一种药片，我不记得名称，作用在抵制血液的凝固。用量先由少而多，后来由多而少，以服用六个星期为度。每日服用的确切片数需看验血的结果，所以每天或间天抽血检验。

到第六个星期的后半，我试着在床上坐起来，并且自己进餐，不要他人喂。下一天试着下床走几步，脚力软得出乎意料，要他人扶着才行。第一次望见窗外的树木感到特别可爱。再过一星期多，一切跟病前一样了，就听了黄席珍大夫的指点，向她郑重道谢，随即出院。

再一次重病在一九七八年，住院时间长得多，一百零四天，可以说的也多得多。

那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我和至善同上火车，参加政协组

织的参观团往四川。那天下午忽然感觉腹中作痛，先在左肋部位，后来移到肚脐上方，疼痛越来越利害。我只恐引起同行的朋友和医护人员的紧张，连至善也没有告知。晚餐只吃了一点儿，吃罢就睡，居然一睡就着。下一天五点醒来，痛的感觉消失了，甚为高兴。可是到了成都之后，参观访问以及座谈，我的兴致总不及以前几回的结伴出访。到了重庆亦然。看电影和各种表演，常常懒得去。进餐总是吃得很少。到六月十九日，开始有伤风的感觉。二十日晚上早睡，入睡一小时光景醒来，大出汗，数次往厕所，再也睡不着。既而觉得腹痛，似乎上下阻隔了，往上打不成呃，往下放不出屁，憋闷得慌。朦朦胧胧地挨到五点半起身，其时腹痛已经停止，可是仍然感到不怎么舒爽。到二十二日，已经在江轮上了，这是我第五次经过三峡，稍稍看了一会儿就回房舱。午睡起来量体温，比平时高一度以上。就跟至善商量（他早已知道我的情况了），再不能保密了，只得告知同行的女大夫。她给我注射庆大霉素和柴胡注射剂，嘱我卧休。二十三日下午到了汉口才起身，住武昌东湖边的听涛宾馆，到了宾馆仍然卧休。直到二十六日下午回到北京，这四天里注射了好多次庆大霉素，服了好多次其他药剂。回到家就上床。那天夜间忽然腹痛大发作，身子翻来覆去总没法减轻一些儿。按电铃把至善和满子唤醒，他们非常着急，也没有什么办法。二十七日早上跟首都医院通电话，医院派救护车把我接去，从此开始一百多天的住院生活。

到医院经过诸位大夫的检査和研究，断定毛病在于胆，全身皮肤和两眼的眼白都发黄就是明证，胆里有结石。他们看我

年纪大，八十三岁了，想用打针和服中药的办法让胆里的结石排出来。打了好几回针，服了几剂中药，抽血检查，黄胆指数还是逐日增高。他们又开会郑重讨论，认为这样下去势必影响到肝，进而危及生命，马上作手术是唯一办法，目前病人的体力还能对付。他们只恐我不同意，就嘱咐至善向我试探。我绝不是自以为胆子大，了不起，如今回想当时听了至善说的，确乎没有惧怕的心思，而且还有点儿兴奋，开刀破肚皮，究竟什么滋味，试它一试也挺好。这就算决定了。至善去写照例要写的家属同意作手术的证明书，只十二个字，却写错了四个。

手术以前的种种准备不必说。七月七日八点，我进了手术室。室内穿白衣服戴白帽子的人说不清有多少，只知道其中的四位：外科主任曾宪九大夫，外科张建希大夫，内科黄席珍大夫，还有一位是北京医院的吴蔚然大夫，他是手术的主导者，由他动手切开我的肚皮的。先是注射麻醉剂，只是局部麻醉，所以我的耳目仍然能起作用。照射在身上的灯光太强了，我闭上了眼。既而觉得肚皮上有一丝儿凉意，知道肚皮已经切开了。随后只听见仅有一个两个音的传语声，金属东西跟盘子杯子接触声，都非常之轻，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时间长短的感觉已经消失了，只知道我被推回病房里了，至善他们告知我快十二点了，又告知我取出了一颗胆结石，体积比黄豆大。我对他们说“没感到什么痛苦，现在只想睡觉”。但是神经正处于兴奋阶段，睡不着。又感到渴得很，想痛痛快快喝一杯水。大夫却特别告诫我，在这个时刻，一不宜服安眠药，二不宜喝多量的水，只能用棉花蘸点儿水润

润唇。我听了大为失望。到下午六点光景，才感觉伤口有些疼痛，注射了一针止痛剂。其时血压相当低，体温高于平时一度左右。

在作手术之前，护士就给我"输液"了，一为加强体力，二为消炎。输入的加强体力的营养料有特地从上海运来的"人体白蛋白"，还有其他。消炎药品有好几种，不细说了。作手术之后，输液更频繁了，目的还是那两个。此外还输血，跟输液一样，也是从静脉管缓慢地输送到全身去。我的血是"A乙亚型"，据说是比较少见的。在盛血的瓶子外面都记明献血人的姓名，待装入"输液"的瓶子里，就无从知道瓶子里的"A乙亚型"的血是谁的了。我永远感激这些勇于献身救人的好人，他们的血输入了我的血管，我才得以活到如今。输血的分量是先多后少，在先的几次，每次四百C.C.，总共输入了多少C.C.，要查病历了。输液或输血成了常课。粗大的针轮流插入左右手背左右脚背的静脉管，橡皮膏把针固定住，于是那只手或脚最好一动也不动。盛着葡萄糖或血的瓶子挂在床侧的架子上，我常常睁开眼看瓶子，瓶子里的液体好像永远不会降下来似的，就又闭上了眼。实则一天总不止输一瓶。早上八点光景，瓶子就挂上了，输完了一瓶再来一瓶。有几天要到晚上八九点才停止，我把它叫做"解放"。

当时诸位大夫最深切注意的有两项。一项是胆管的畅通，再一项是发烧的退净。到七月十八日，也就是作手术之后的第十一天，手术时安装在伤口的"引流"管子里流出黄水来了，这表示胆管通畅了，诸位大夫以及诸位护士都深喜。皮肤上和眼白上的黄色从此逐渐消退了。至于发烧，入院之前

就烧了，作过手术之后发几天烧也不足怪，长期不退烧可不好。在手术的第二天,就用蒸汽喷雾让我把肺里的痰咳出来，因为老年人长期卧床，很可能引起肺炎,那是挺可虑的。可是烧总不见退。医院里内外中西诸位大夫举行了几次会诊，还作了若干种检验，认为原因不在胆，还得着眼于肺。于是除服药和注射外，每天上下午各喷雾一次，尽可能排痰。到九月三日，开始发现痰里带血丝、下一天夜八点过后就大吐血。连续吐了七次，前三次都在一百C.C.左右，逐渐减少,到五日晚上才停止，是吞了大量的云南白药，注射了安洛血、仙鹤草、止血敏等止血剂，才把血压住的。吐血的原由是我咳痰用力过猛，致使小血管破裂。这回大吐血，在诸位大夫和护士，在我的家属和听到消息的朋友，都是突然袭击，莫大的惊恐。可是不久之后，老不肯退的烧却退了。

前面说了输液和输血，还有一项必须说的是"鼻饲"，就是使用"输液泵"，把营养料通过鼻管和咽喉压到胃里去。作过手术之后，我的吃喝功能特别差，粥用勺碾成糊，送到嘴里还不容易咽，喝水得用玻璃管慢慢地吸。输液虽然带入营养料，大夫们认为还不够，于是要用鼻饲。黄席珍大夫把鼻饲的方法告诉我，说用的硅胶管日本产，又细又软，吞下去极为容易。我听了心里矛盾，硅胶管老插在胃里恐怕不太好受，同时又想，这样新鲜事儿尝试一下也不错。结果我同意了。从七月二十九日开始，到十月二日才停止，只在吐血时停止了几天。硅胶管通过鼻管和咽喉插到胃里,就昼夜插着，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过了几天，好像没有插什么了。压进去的营养料，在先是美国产的Vivonex，后来是日本产

的氨基酸，据说宇航员航天时吃的就是这类东西。我对来医院看望我的朋友说，我的食物现代化了。

作手术之后，张建希大夫几乎天天解开重重捆着我腹部的布条，仔细检查缝合的伤口，给刷上药水。到七月下旬，分两次把伤口的缝合线拆除。到八月二十三日，又把引流管拔掉，封上伤口，让它自然愈合。这条切开的痕迹从肚脐上方向右侧往下倾斜，长十八厘米半，齐整平贴，绝无疙瘩。以后每逢检查体格，检查的大夫总说这是顶好的成绩。

到这儿，手术和吐血的大略情形差不多都说了。在叙述逐渐恢复之前，我想先说一说在我病床周围的所有的人，他们全是我永远感激，永远忘不了的。

几位主治大夫简直把我看成自己的亲人，时时来看一看，问几句，细密的动作和体贴的语气全都透露出真诚。每天上午好几位大夫和护士来查病房，郑重，严肃，问得简要，记得迅速，俨然是个结合成一体的小分队。平时往往有一位或两位大夫进房来看一看，问几句。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在旁的家属问明了，我也记不住，可是我同样感激他们的热诚关切。

其次说护士。我要说我这回住院，遇到的护士全都是尽职的热诚的好人。输液，输血，压营养料，都做得精细又周到。那时是热天，几乎天天给我擦身，全身都擦遍，到末了端一盆水来给我洗脚。随时把我翻身，朝左边躺一阵之后，就好不容易地把我翻过来朝右边躺。也说不尽许多，总之我永远忘不了她们。以后好多次往医院取药或是检查身体，遇见当时熟识的几位护士，还是殷勤交谈，像遇见了老朋友那

其次说家属。我害病的消息一传出，在南京的至诚和姚澄，在汉中的孙儿永和，都请假来京了。大家一商量，就决定来病房陪我的班次。每天上午是至美，下午是孙媳姚兀真，她们也向所在单位说明，请了假。晚上是至善至诚永和还有至诚的朋友薛明四个人轮替值班，每晚二人，谁跟谁不一定，总之一个陪前半夜，一个陪后半夜，不陪的一个在休息室在沙发上休息。在前一段时期，我浑身酸痛，不容易入睡，陪我的一个就为我按摩，按摩了一处再换别处。我吐血的那一夜和以后的几夜，人人惊慌，不值班的一个也没去休息室睡觉。白天的事比夜间多，跟大夫接洽，跟来访的客人交谈，还做跟护士相同的事，给我翻身擦身，料理大小便，还坐在旁边为我催眠，抽空写简要的病房记录。这一切至美和兀真始终坚持下来，现在回想，真不容易。

现在说特地到医院来看望我的朋友。他们有的来一次，有的来好多次，有的问得极仔细，有的只坐在旁边殷切地端相我，一会儿就走了。有几位通信已久，从未见面，有机会来京当然要见见面，哪知道我正躺在病床上。至善陪他们来到医院，初次见面，只说了两三句话，就怅然走了。还有一位朋友从未来医院，却几乎天天到我寓所，遇见谁就向谁打听最近消息，听完就走了。我在这儿不必记载他们的姓名，可是他们的深情厚爱，我永不敢忘，也永不会忘。不过有一位朋友必须记载他的姓名，就是张纪元同志。纪元先于我入首都医院，住在另一座楼的病房里，也是要去掉胆结石。他本人和大夫先是犹豫不定，后来决定准备作手术。至善曾经

到他病房里闲谈过一次。我作手术那天下午四点光景，纪元从他那座楼来到我这座楼，见我似乎昏昏欲睡，就把一张字条交给了护士回去了。字条上写得不多，“至善同志：闻叶老手术后平稳，甚慰。祝早日恢复健康！”这张字条可以见到他加强了准备作手术的信心。此后我想起纪元就问至善或跟纪元相熟的来访的朋友。他们的回答一致，都说已经作过手术了，经过情形很好。往后屡次问，屡次的回答全是“很好。”直到我出院之后大约十天光景，至善才悄悄地告诉我，纪元死了，日子是八月四号 他一向有红血球过多的毛病，当时他自己和大夫对手术踌躇就为此。头脑清明感情热烈的纪元同志，我永远怀念他。

以下说住院后期我的病体逐渐恢复的情形。吐血之后到十月九日出院，总共一个月光景。这段时期里，简要地说，无非两项事，一项是继续加强营养，再一项是重新学习日常生活，把不会了的恢复到会。加强营养靠鼻饲和勉力吃东西，此外还注射加强抵抗力的针剂。从手术之后就开始的“吸氧”还继续吸，不过不像以前那样经常吸了。至于恢复日常生活，可以说的挺多，这里只能简略地说说。

先说吃东西。病了这么些日子，装上上下颚两块假牙试吃东西，不会咀嚼了。喉咙口也作梗，咽下去很不容易，并且感觉不舒服。硬着头皮练习了几天，这才重新会吃东西了。我的食量向来不大，这时候当然吃了一点儿就算了，常常引起至美、兀真和护士们的不满，她们老是说“怎么吃了这么一点儿就不吃了！”

其次说活动。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十天，翻个身也得依靠

别人，当然说不上完全能自由活动了。张建希大夫早就考虑到这一层，把一条长带子系在脚边的床栏上，叫我双手抓住带子的这一头，使自己的身子坐起来。我试了好几回不成功，后来居然成功了。坐了起来脑袋耷拉着，身子摆不稳，挺不直，只好赶紧躺下。这样练习了好几天，居然能在床上坐定了，于是吃饭的时候端一个矮几来放在床上，练习自己吃饭，不再要他人喂。

其次说练习下地，那真是很难的历程。坐在床上还不太难，把两条腿垂下来坐在床边可难了，仿佛马上要摔倒似的。两只脚踩着地站起来更难了，虽然旁边扶着的不只一个人，可是地板和我的脚底好像都变了，变得凹凸不平了，因而站不稳了。练了好多回，能站稳了，然后练移步。一个人搬动左腿，另一个人搬动右腿，这样移了三四步，累了，赶紧扶回床去躺下。后来练到不用搬腿，只要扶着，能到窗边的椅子坐下，我和扶我的人都认为大告成功，异常高兴。出院前的十来天，每天早上在窗前进早餐，坐半小时，那真是十分愉快的享受了。

其次说睡眠和大便的逐渐恢复常态。作过手术之后，绝大部分日子是入睡的时间多，即使不入睡，也老是昏昏沉沉的。到了恢复时期，上午不入睡了，开了收音机听广播节目，跟至美谈各种事儿。午餐过后才入睡，睡一两小时就醒了，于是跟兀真闲谈，听她念些书报，由她照料我进晚餐，直到值夜班的来了，我才准备入睡。这样，可以说睡眠恢复到平时情况了。至于大便，一进医院就乱了套，大多是接连几天便不出，于是服麻仁滋脾丸，还是不济事，只好请护士戴上

手套掏。有时又老是想便，折腾了一阵，洗擦铺陈刚完毕，我又嚷着赶快拿便盆来了。到了恢复时期，总算比较正常了，每天一次或两次，时间也较有定准，不过还是在床上便的时候居多，因为先得塞入一种叫做“开塞露”的润肠剂去引导，还是在床上方便。

到这里，各方面的恢复情况大致说了。经过检查，说可以出院了，我和家属多么高兴，可想而知，不必多说。到十月九日上午，我辞别了当时在院的有关的诸位大夫和护士离开了首都医院。我永远记住他们，永远感激他们。

附带记一笔，出院时体重一百零四斤，这一场病减轻了二十二斤。

近年来视力听力的衰退

长久伏案工作，长久昼夜使用眼睛，到中年看书写字就要戴老光镜了。眼睛底部曾经出过血，结了个疤，眼病是白内障青光眼兼而有之，那还是近年来才由大夫告知的事。偶然发见墙上挂着的镜框子歪了，不是长方形了，而且左眼看去这样歪，右眼看去又那样歪。再看门窗的边沿，房梁的线条，直的不直了，平的不平了。曾经往眼镜铺要求配眼镜，希望把换了几次的老光镜换一副更深一点的。配光技师拿各号配光镜片给我试，屡次问“这一片怎么样？”我觉得没有一片能使我看得更清楚些的。结果那位技师对我说，“我看您不用换了，就把原有的一副对付着使就可以了”。我佩服他的坦率，就道了谢走出眼镜铺。跟眼镜搭配的还有放大镜，我用过放大两倍的，再买一个，放大三倍。好几位关心我的朋友

知道了，从本市，从香港，从美国，买了放大镜来赠我，形式或简单或复杂，有两个还装有小电灯照明，可是也不过三倍，对我并不见得更好些。戴起老光镜，拿着放大镜，老五号新五号字都毫无希望，四号字也不成，要三号字才可以看看，还要油墨浓些，印刷功夫地道些。既然如此，只好跟书报杂志绝缘了。必需看的时候，由他人念给我听。家里可以念给我听的有好几个，可惜他们闲暇的时间不多。至于写字，毛笔字写不来了。落笔看不准，或则不着纸，或则涂了个墨团。蘸了墨再写，就跟上一个字接不上气。因此，只能用钢笔、圆珠笔、水彩笔来写。看不准，"中"字的一直不偏左就偏右，"国"字"冏"字往往不成方形，自己看了觉得可笑。——以上说的是最近三年间的情形。

前年（一九八一）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位朋友嘱我看他刚完篇的稿子，并且要我给他提意见。稿子字细行密，我戴起眼镜，拿着放大镜，靠窗在阳光中看，看了二小时才完。第二天觉得左眼胀痛很利害，午餐吃不下，傍晚大呕吐。立即请首都医院的大夫来检查，说该是眼压太高之故。三十日一早住进医院，在医院里过了年。住了八宿，眼压如常了，就出院回家。还得经常点药水，以防眼压升高。两眼情形不一样，所用药水也不一样，两眼还得点一种消炎的药水。因此，每天要点三种药水共四五回，至今从未间断。

我的眼睛坏到如此地步，跟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交来的鲁迅著作"征求意见本"多少有些关系，这种本子我看了十本光景。当时的风气，编辑什么书籍都要"由各地工农兵理论队伍和各大学革命师生"担任，那一部鲁迅著作也是这

么编成的。"征求意见本"注释特别多，字小，行间密，油墨淡，对于我的视力不甚相宜。但是我除了每篇的"题解"声明不看(因为我不赞同每篇有那样的题解)，所有的注释全都仔细看过，而且提了不少意见。直到视力实在吃不消了，才停止不看。现在新的《鲁迅全集》已经出版，却不是从"征求意见本"整理而成的本子，我有一部，可惜我不能看了。

以下说听力衰退。

我听觉不甚灵敏从七十年代初开始。那时也不过听人说话有些部分感到模糊，有时不得不问一声"你说什么?"有时听错了意思当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那时朋友中使用助听器的有好几位，看他们有时拿在手里，有时放在上衣的口袋里，好像听得很清楚似的。我说让我试着听听，果然觉得朋友的话音响些清楚些。我就买了一个，是天津的产品。一九七八年割除胆结石之后，又买了一个日本产的，体积比天津产的小得多，听起来似乎更清楚些。可是不论天津产的还是日本产的，在我只便于几个人在一块儿说话，还要坐得近些。到会场里就不成。发言者的话通过扩音机传来，绝大部分我只听见声音而辨不清意义。又听说同仁医院可以定做一种助听器，用塑料在耳朵里按个模型，主要部件嵌在模型里，只要装上一个挺小的"纽扣式电池"就可以使用。我想这样很方便，效用可能比原有的助听器好，就去定做了一个，在右耳按了模型。今年一月八日取得，装在右耳里试听别人说话，好像更清楚些，就带回来了。带到会场里，却也是闻声而不辨意的时候居多。从此两种助听器轮替着用，在家用先前买的，出外用新买的，取其方便。假如会场里装有助听器，我还

是愿意用会场里的。但是也未必完全听得清，还得看条件。第一是会场里管理助听总机的同志要随时留意调节。第二是说话的同志要体谅他人，始终对准话筒，坐准距离说。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我在会场里该能够完全听清了。

还有一种情况也不妨说说。最近期间我在家里用助听器听家里人说话，好像个个害了感冒，全都带鼻音，而且全是高音。有时四五个人同时说话，我只听见男高音女高音还有刺耳的童音一齐袭来，非常难受，他们在说些什么却一点也不懂。我只好把助听器关上，于是所有的声音全渺茫了，可是我虽然跟他们在一起，实际是一个人独坐在那里了。

日常情况杂叙

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有公费医疗制度，才有定期的体检。我除了定期体检，有时往医院取药，乘便挂个号请大夫作简单的体检。我的血压总受到大夫的赞许，高压低压距离适当，而且与年龄适合。透视，验耳朵挤出的血，作心电图，都说没问题。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近十几年间，除开大小几场病和伤风感冒期间，我的循环系统和消化系统都不错。按脉搏，总在六十七八到七十三四之间。每天早上试一回体温，总在三十六度到三十六度二三之间。每天大便二次，一次在早餐之后，一次在午后，算是馀波，这是抗战以前早就养成的老习惯了。以前无所谓午睡，一九四九年到了北京开始午睡，于是午睡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第二次大便。每天小便六次，白天三次（包括与大便同时的两次），夜间三次，增多一次的日子也有，但是不多。出去参加什么会，往往坐上两三个钟头，

我绝不去厕所。

每天服用三回的药品有五种，从心肌梗塞那回出院之后直到如今。那五种药品是潘生丁、烟酸肌醇酯片、维他命B、维他命C、鱼肝油丸。抗感片和感冒冲剂也是常备药，有些儿感冒的感觉就服用，有时压住了，有时压不住。

每天七点半早餐，十二点午餐，六点过后晚餐，习以为常。近几年来，全家人一致嫌我吃得太少，说每餐主食只吃一两，不够营养。我说多装下去就觉得饱胀，不舒服，何况各种菜肴同样有营养。其实我毫无关于营养的知识，怕肚子饱胀是真的。

至于睡眠，大有可说。一般是睡眠时间极长，夜八点半睡，下一天早上五点半光景醒，扣除起来小便的时间，入睡总在八小时以上，再加上一小时的午睡，不就是九小时以上吗？但是要心中无事才这样，如果心中有事，如明天要去参加什么会，或者考虑写一篇文，或者想未完的文明天怎么写下去，或者推敲已经写成的文，那就睡不宁贴了。那时候心思像藤蔓似的尽量爬开来，越爬越繁，越爬越远，神经兴奋异常，有时竟至于一夜没睡着。青年时期中年时期虽然也有类似的情形，可没有近几年间那么利害。因此，近几年间有一种矛盾的心情，对于自己想写愿意写的东西，乐于写又怕写。就像这篇自叙健康情况的东西，虽然由于编辑同志的嘱托，题材却是我自己选定的，是我愿意写的，可是每天写一点儿，写到今天是第二十一天了，其间有好几夜醒了再不能入睡，想得相当烦恼，竟至于想就此停笔。有时我想，要是能在太阳穴安装一个开关，关上开关就能不想，那就好了。可

惜还没有人发明这种开关。

我行动还可以，能走一条胡同，只要支着手杖，左边有人扶一把就能走得快些。上台阶下台阶却非有人扶不可，只恐脚偶尔踩不稳，摔一交。在书桌边上下午坐五六小时没问题，只觉脊骨末梢部分有些发痠，我的肌肉太消瘦了。

我自己觉察，近年来性子比先前更急了，这跟健康情况有没有关系，我断不定。写了一封信，要马上投入邮筒，盼望邮递员马上收回去盖戳封发，盼望收信人毫不耽搁尽快看到我这封信，而且马上给我写回信。有一位朋友约定下午三点来，到两点半我就在窗边踱步，频频朝外望了，望了好多回，抬头看挂着的钟才两点四十，我就嫌它走得太慢了。去年九月间，中共举行十二大，李先念同志致闭幕词，结末说到要在五年内做到三个根本好转（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党风根本好转，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我听了佩服极了，兴奋极了，按我的急性子，巴望所说的五年过去得像五个月那样快。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四日写毕

《读书》创刊五周年随笔

视力极度衰退，有些情况是以前没有料到的。比如参加什么集会，在入场和散会的时候，常恐得罪了朋友，怪我对人没有礼貌，见了面理也不理。又如邮递员送来了印刷品一大堆，我连看清楚书名刊名都相当困难，可是寄赠这些印刷品的朋友或单位都希望我仔细阅览是可想而知的，其时的负疚心情也很不好受。重配眼镜吧，眼科大夫和眼镜铺的验光技师都说不必了，没有更适合的眼镜片了。放大镜也无济于事，除了自己买的两个，还有好心的朋友赠送的八九个，产地各异，装置的形式和精粗各异，放大都不过两三倍，都不能与眼镜相辅相成，使我看清楚仿宋体字模排版的讲稿和文件，书刊日报当然不必说了。眼镜放大镜不济事，却还得对付着用，尽力使劲辨认，仿宋体的讲稿之类总算还看得清。可是看了两三页就不成了，尽管使劲，纸面一片模糊，勉力究竟是有限度的。会落到这样地步，以前哪里料得到。

如今我知道新闻时事光靠中央台的早晚两次联播节目。听力衰退不亚于视力，好在收音机就在书桌上。午餐晚餐是全家人聚集的时间，我就说收到的报刊上有什么论文或记载，简要地说给我听听，或者问本月份的某杂志来了没有。杂志非常多，名称也记不清，我挂念的不过三四种，《读书》是其

中之一。如果回答说某杂志昨天来了，我就叫孙辈抽空把目录念给我听，好从其中选听几篇。单说《读书》，每期总要听它三四篇或五六篇，从而感到欣慰，一则受到了不少教益，二则总算没有跟知识界出版界完全隔绝。

听孙辈念书刊有两年光景了，他们读音和语调还不差，听下去挺顺当。可是，文章中如果引用几句古文辞，或者大段地引用，我听着疙瘩就多了。常常要问"某字之下是什么字？""这个字怎么写？"待问明白了，大段的再听一遍，我才说"念下去"。我提到这一点并不是反对文章中引用古文辞，必须引用的当然要引用。我只是要表明，我虽然学过古文辞，还没达到一听全懂的程度，这是近来经过现场考验才知道的。书面语和口头语同源而不尽同，原是人所共知。或许那些古文辞本来只供"目治"，不准备叫人听的，也未可知。"《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庄子当时的老乡未必听得清吧。"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孟子当时的老乡未必听得清吧。好在庄孟二位的书本来不是为他们的老乡写的。

除了选听几种杂志的文章，最近几个月内我还听两册书，陈原同志的《社会语言学》，吕叔湘先生的《语文论集》，前者已经听了五分之三，后者还没听到四分之一。孙辈的空闲时间有限，我只能耐着性子慢慢听。我不想学时髦，投票选举这两册为一九八三年最佳书，可是我认为这两册是值得《读书》编辑部特约适当的作者撰写评介的书。陶渊明说"奇文共欣赏"，我说，好书要让爱好这一类书的人不至于错过，原是

《读书》出版宗旨之一。沈从文先生积年累月，废寝忘食，在那里研究古代的服装和织品，我早已知道了，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已经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却是《读书》刊载了黄裳同志的介绍文章才知道的。不久我就托人找到这精印的巨册，文字不能看，叫孙辈念太费事，收入的各种图片看了两遍，虽然不能看清楚细部，却自以为得到了不少历史知识和艺术享受。

《读书》编辑部嘱我作文纪念创刊五周年，我信笔写成这一篇，不甚切题，非常惭愧。

一九八四年一月五日作

《辞书研究》创刊五周年随笔

时光如驶，《辞书研究》创刊快到五周年了。我喜爱这种杂志。它作者群广，选辑相当谨严，这是一点。再一点是我对辞书颇有兴趣而缺乏素养，《辞书研究》每期寄来，我从中选看若干篇，知所未知，闻所未闻，受益的乐趣难以描摹。可是前年和去年的《辞书研究》我都没有看，因为视力极度衰退，老花镜放大镜并用也不济事，只好割爱不看。近两年我常叫孙辈给我念书刊，得到的经验是某些文篇宜于听人念，如创作小说、翻译小说、通俗论文、时事报道之类；某些文篇可不宜于听人念，稍带专门性质的，引用古文辞稍多的，就属于这一类，而《辞书研究》文篇的大部分正是这一类，既不能看，又不便听，辜负了《辞书研究》编辑部寄赠的厚意，真是没法自赎的歉疚。

《辞书研究》编辑部只有几位同志，我料想，在如今年代，大概是人数最少的编辑部了。人数最少，却能编成这样好的杂志，几位同志善于通力协作，相辅相成，以及各自胸有成竹，因而不至于把杂志编成"杂"志，也就可想而知。我知道如今有若干杂志通行分组包干的编辑方法，把一册分成若干部分，每一部分各占若干面，由某某几位同志组成的小组负责，到期各小组把负担的稿件如数交出来，全册杂志就编齐

了。我想这样做只恐不是个好办法，几个小组各自为政，然后凑到一起，就会有编成"杂"志的可能。曾经把这层意思向少数几位熟朋友说过，也许只是我的杞忧而已。

最近五六年间，出版事业的繁荣兴旺跟其他各业一样，前所未有。单看辞书一类的编辑和出版，以前哪里有过如今的盛况。《大百科全书》已经出了九卷。《辞海》修订本早已出版。分四次出版的《辞源》修订本最近已经出齐。规模巨大编者众多的《汉语大辞典》将近完稿，只待通读后最后审订。此外各种大型的、小型的、专门的、通用的辞典、词典以及外国语的字典、辞典，我不能逐一说出它们的名称，可是我知道这几年间出版数量之多也大大超过从前。两个社会主义文明需要不断推进，出版事业自该不断发展，出版物中的辞书一类决不会嫌其太多，这是当然之理，不用多说的。

书刊的发行数量因书刊的性质而不同。单就辞书一类而言，各种辞书的发行数量当然有多有少。譬如《辞海》修订本，我不曾打听从出版到去年年底发行了多少部。假定一个数目——十万部，不知道估量得多了还是少了。十万，总不能说是个小数目吧。可是我国的人口总数是十亿，十万只是十亿的万分之一，就不能说是个大数目了。万分之一的实际意义就是平均每一万个享有一部《辞海》，而《辞海》这样的辞书却是具有中等以上教育文化水平的人适于使用的。从这一层想起，可以想到很多方面。别的且不说，单说中等学校，除了规模特大的少数重点学校就没有购买像《辞海》这样工具书的钱，教师自己购买当然也不容易。《辞海》既不备，其他工具书和参考书也无力购买，这对教学工作是非常不利的。我

恳切地期望各级教育部为推进教育事业着想，尽可能多拨一些经费，让学校逐渐购置必须的图书仪器。我想教育界的同志必然与我同有此愿。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作

恳请各工厂给中小学生出力

我向教育工会提出一个想法，请考虑是否可行，并请本刊的广大读者共同考虑，看这个想法对于推进中小学的教育工作是否有帮助。

我的想法是：由教育工会跟大中型的各种工厂的工会组织联系协商，请工厂抽出适当的一部分物力和人力，帮助中小学有关学科的教学工作。这一句话好比一个提案的案由，以下就这个案由加以说明。

中小学里有好些学科，老师单凭一册课本来讲授，学生单凭一册课本来学习，是很不够的。教的学的全是实实在在的事物，可是教室里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事物，事物都写在课本上，这样“空对空”的办法怎能使学生得到真切的认识和理解呢？

去年我写过一篇《读书和受教育》，其中有一小段与此有关，现在抄在这里。“四十年前，一位同事编小学课本，要说明蒸汽机能带动列车是怎么一回事。他写得很辛苦，一改再改，总不满意。他把稿子给我看，我看过后说，小学生念了这篇课文，恐怕对蒸汽机还是不甚了了。要是学校里有个蒸汽机的模型，酒精灯一点燃，活塞一推动，孩子们看了就大致懂得蒸汽机了，这篇课文也就不用写了。要是当地有火

车站，火车站的站长容许孩子们爬上机车去看一看，那就懂得更清楚了。"

照前面所引一段话的意思接着说下去，那就是教学像蒸汽机之类的事物，有个活动的模型看就好，能看真的蒸汽机怎样活动更好，唯有凭空讲凭空听不好。

因此，按理说，中小学应该有一个仪器实验室，或者叫直观教育室，让学生在室中上常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功课。于是学生不但听老师空口讲授，还能眼见种种实在的事物，还能动脑动手使事物发生变化，这当然是对学生极为有益的措施。这并非新鲜的事儿，七十七年前，我初当中学生，我那中学里就有个相当充实的实验仪器材料室，室外就是台阶式的教室，一级一级高上去，记得有十来级。我也知道如今有些重点学校有很不错的实验教室，每几个学生合用一套设备和仪器，合用一份实验需用的各种材料。可是我没有出外作过调查，也没有向各级教育机关打听，因而不知道就全国范围的中小学来说，该凭直观学习的功课得到直观的占百分之几，缩小范围来说，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区、县又各占百分之几。假如所占的百分比不大，甚至很小，那就是教育工作方面颇为可虑的事了。

我怀着杞人忧天的心情，只恐所占的百分比不怎么大，因而提出我的想法，请教育工会考虑，请本刊的广大读者考虑。

以下把我的想法具体地说说。各种工厂改革更新，总有若干机器和设备淘汰下来。辟一个专室，把那些淘汰下来的东西适当地陈列在里面。这就是我所说的"物力"。同时动员工厂里的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在不妨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

自愿地担任讲解员。这就是我所说的"人力"。于是跟本地中小学商定来厂参观的具体办法，最好能普遍轮到。我这个设想并不繁复，没有什么花费，在大中型的工厂是轻而易举的。

试以印刷厂为例。在大中型的印刷厂，圆盘机、脚踏架之类不用了，如果还有留存，却正是很适用的展览品。铅字取一架，排成的铅字版留一盘，打纸型的时候多打一两张，都作为展览品。还有，铅印和胶印的印张并列，印成的整张和折成书页的未成品并列，用各种方法装订的书册并列，木版书本和现代化印本并列，都便于讲解员的讲解，便于参观者的领会。我说不尽许多，实际布置的同志一定能本着为教育尽力为学生服务的真心诚意，把展览室布置得非常完善，足以使学生受到实益。

试想中小学生由老师陪同来参观这个展览室。他们一边看，一边听，必然感到新鲜有味，原来自己天天接触的课本以及课外书是经过那么复杂的工作造成的，并且，不是向来就是那样的，是经过好多世代的人劳心劳力，逐步进展而来的。如果讲解员不限于讲解，还能指着展览品引导学生们辨一辨，想一想，或者让学生们试一试脚踏架印出几张单页来，或者比一比铅印胶印的印刷品有什么不同，这种装订法和那种装订法的异同和优劣，学生们更将感到眼界大开，其乐无穷。

参观过展览室，讲解员然后陪同参观者进厂房。在排字车间里，可以看工人怎样检铅字，怎样装成书版。如果厂里有电子照排机的设备，就可以看到工人怎样凭电光检字排版，一回手续就能排成校样。在印刷车间里，可以看工人怎样在

印刷机旁操作。他们在印刷机的这一边装上去一大堆纸，开动机器，那一边就送出来一张张印上书版的纸，一大堆纸印完了，再装上去一大堆。在卷筒机旁边呢，工人只要把大捆的卷筒纸装上去，机器一开动，那边就把印上书版折成书页的一帖帖纸极迅速地吐出来了。当然，随时注意机器的运动，是工人的主要任务，假如发生什么故障，必得立刻把它排除。在装订车间里，可以看工人们怎样把折成书页的若干帖按页数的次序集合成一册书。还可以看装订的各种方法，或用机器，或凭手工，此外如封面是怎样装上去的，书的三边是怎样切齐的，也都值得一看。我说得非常粗略，优秀的讲解员必须知道得比我精而且多，学生们听过他们的讲解，受到他们的启发，毫不夸张地说，必然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提高，因为他们受到的是极可珍贵的直观教育。

前面以印刷厂为例，说明我希望工厂为教育事业贡献些助力的想法。当地没有像样的工厂，当然不必说。如果有，不论属于重工业还是轻工业，由于业务各异，一切自然不相同，但是都可以因厂制宜，布置各自的展览室，指导学生们参观展览室和车间。学生们在工厂里听讲解员讲解，看工人们操作，并非像在课堂里一样，分别地受到有关物理、化学、数理等方面的知识，而是综合地得到这些方面的感性认识。此外，学生们看到一道工序紧接着一道工序，丝毫不能延缓和马虎，如果一道工序脱节，就影响到整个生产过程，该会悟到在集体中间，每个成员非尽职尽分不可吧。学生们在展览室里看到旧的生产原料、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又在车间里看到新原料、新机器和新方法，该会悟到如今时代，工业在不断

地飞速地发展，当前见到的种种事物，在不远的将来又会被更进步的事物代替吧。诸如此类的领悟，就不仅是某些功课方面综合的感性认识，而且是现代人应有的世界观了。我说到这里为止，请教育工会和本刊广大读者考虑和指教。

还要附带说几句。让学生学习有关动物的知识，带他们往动物园去参观是好办法，能让他们有商有量饲养些动物是更好的办法。让学生学习有关植物的知识，带他们到田间、林间、草地、湖边或植物园去游观是好办法，能引导他们试种些花草树木或庄稼是更好的办法。唯有老师讲课本，学生听老师讲课本，“空对空”，决不是个办法。还要据此来考学生，你能记住课本上的语句，照样回答出来，可以得到好分数。你记不住，或者答得并不错可是跟课本上的语句不一样，就要扣你的分数。这样办法跟教育绝不相干，我希望它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干净，越快越好。

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作

新发行的拙政园邮票

苏州园林极多，我幼时常去玩儿的有五六处，去得最多的是拙政园。并非是有什么审美观点和艺术素养，只觉得一进拙政园，眼面前样样色色挺舒服挺有味，其乐无比。大概同学们也是这么个情形，所以每逢假日，几个同学一碰头，彼此心照不宣，就往拙政园玩儿去了。

拙政园创建于十六世纪前半期，到如今已经四百多年了。全园的面积东西宽而南北较窄。我幼年时只开放中部，可以买票游览。东部和西部都是私家住所，当然不纳游客。直到解放之后，东部西部与中部打通，游人才得以看到拙政园的全貌。

现在知道我国邮电部将在今年六月间发行一套拙政园的邮票，计共四张，我已经见过设计图样，心里异常高兴。我国从古到今，各种各类的艺术品非常丰富，园林是造型艺术中一大部门，苏州园林又是这一大部门中的重要项目，确乎有画上邮票，供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共同观赏的资格。这是我高兴的一点。再一点是这四张邮票设计得挺好，就在后边说。

这四张邮票不用照相，不采取照相式的透视画法，而用我国传统的描画山水和亭台楼阁的鸟瞰式的画法，这是颇为

高明的。照相机照成相片，其原理是透视法，好比一个人站定在一个立足点，用一只眼睛看前面的景物。画家也有用透视法的，虽然用两只眼睛看，不过使视域开阔些罢了，总之与照相相仿，近处宽大而远处窄小。鸟瞰式的画法可不然，那是处在与景物平齐的位置上看景物，而且立足点并不固定，看近景与近景平齐，看远景与远景平齐。要在一幅绘画上描绘许多景物，正确表明各个景物的位置和彼此的距离，用透视法无济于事，唯有用鸟瞰法才办得到。这四张邮票的绘制，用的正是鸟瞰法，所以我说这是颇为高明的。

邮票上没有文字说明，我大略说几句，让有兴趣的人把我的简单说明与邮票同看，更增加些兴趣。这四张邮票描绘的，三张是拙政园中部的景物，另一张是西部。

七角票下方靠左是远香堂，从堂的东侧朝西望过去。远香堂是拙政园中部的主要建筑，极敞亮。画幅下方靠右是夏天观赏荷花的凉台，朝北望去，宽广的池塘全给荷叶荷花掩盖了，真是洋洋大观。画幅上方靠左的建筑是香洲，游人都叫它旱船，结构和陈设确实像从前苏州的游船。苏州园林里有旱船的不止拙政园一处。

一角票画的是远香堂西面和偏北面的景物。画幅上方靠右的亭子，题额是“荷风四面”。夏天亭子围在荷叶荷花之中，这四个字抓住了要点，而且挺有风趣。上方靠左那座楼叫“见山楼”，在楼上可以望见苏州西郊的群山。我国造园艺术中有所谓借景法，取园外的景物为我所用，这座见山楼正是个好例子。

八分票有两张，先说左下方有亭子的一张。这个亭子叫

"绣绮亭"，这个所在叫枇杷园，在远香堂的东南面。那里多种枇杷树，花开时候甜香满园，果熟时候红果累累，使游人舍不得离开。

另外一张八分票画的是我幼年没到过的西部，近三十多年间才游过好几回。那条回廊原是中部与西部的分界线。廊的地面时有升高降低，在那里行走别有趣致。画幅最上方的楼房，下层叫"拜文揖沈之斋"，上层叫"倒影楼"。文与沈都是明朝的苏州人，文名徵明，极有名的书法家，沈名周，书画都擅长。至于楼名"倒影"，自然是取楼影映在池塘中的意思。

末了附带说两句：我记忆力和视力都极其衰退，因此这一篇写得非常简略，还可能有错误。读者如有询问，务恳投函中国集邮出版社，让社中的同志代答。

一九八四年三月四日作

邵力子先生和开明书店

邵力子先生曾经是开明书店的董事长，知道这件事的人现在已经不多了。

开明书店是章锡琛先生和章锡珊先生在一九二六年开头办起来的，听说资金只有两千来块钱，是他们弟兄俩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十多年的积蓄和离职时领得的"退俸金"。开明的业务稍有开展，两千来块钱就不够调度了，弟兄俩于是拉朋友们入股，少的五块十块，多的也只有几十上百块。朋友大多是文化界中人，入股不是为获利，而是支持这个颇有朝气的书店。邵力子先生入股，想来也是这样。一九二八年，章氏弟兄经营的开明书店正式改为股份有限公司组织。

那时候，蒋介石已经背叛革命，成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开始他的法西斯统治。开明书店既要谋生存，又不愿意投靠国民党，朋友们商量就推举邵力子先生担任董事长。邵先生主编过《民国日报》，反对旧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态度是鲜明的，还担任过上海大学的副校长，在知识界有影响。他在国民党内左右不了那些权势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他毕竟是位"元老"，开明书店请他当董事长，无疑地能起保护色的作用。至于作用到底有多大，我说不清楚，只记得有时候遇到了麻烦，夏丏尊先生就赶到南京去找邵先生。

邵先生一直很关心开明，每次路过上海总要到开明看看丏尊先生、锡琛先生等几位老朋友。

建国以后，开明书店迁到北京，在出版总署的指导下，跟青年出版社开始洽谈合并的事宜。可是不久，总经理范洗人先生患癌症逝世了，经理部门只剩下了王伯祥先生，其余的负责人在上海解放前后已经离开了开明。王先生是研究文史的学者，不是管理人才。朋友们于是商量请邵力子先生暂时管一下，他在开明还挂着董事长的衔头，是名正言顺的。邵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当时担任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并不是很空闲的人，但是既然答应了，他就踏踏实实干，每天上午到开明坐半天班，处理日常事务。这时候正赶上"三反五反"，开明书店是私营企业，当然得按照"五反"的五条进行清查。这样的群众运动，邵先生是第一次遭遇，难免有些言语使他不大愉快；清查结果开明是"基本守法户"，在领到证书那天，邵先生才释然于怀。运动结束，邵先生作为开明书店的私方首席代表跟青年出版社达成了合并的协议，成立了公私合营的中国青年出版社。那是一九五三年四月的事。

在私营出版业中，开明书店是最先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邵力子先生推动和完成了这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作

开明书店创办六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请允许我代表开明的同人，向纪念会的主办单位，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致谢，向今天来参加纪念会的诸位先生、诸位同志致谢。

提到开明，大家都说这个书店办得还不错，而且总要提到我，好像办得不错都是我的功劳。其实不是这样。我进开明是一九三一年的事，那时，开明书店已经创办五年了。创办人是章锡琛先生和章锡珊先生，是夏丏尊先生，还有吴觉农先生和别的几位先生。周建人先生和胡愈之先生虽然没有参加开明，在创建时期也出过不少力气，我当时只能算作一个赞助人。后来看他们干得不错，我才参加进去，前后干了将近二十年。跟我先后在一起工作的，除了夏先生和两位章先生，还有杜海生先生、范寿康先生、范洗人先生、朱达君先生、王伯祥先生、周予同先生、金仲华先生、丰子恺先生、徐调孚先生、傅彬然先生、宋云彬先生、顾均正先生、索非先生、丁晓先先生、张沛霖先生、贾祖璋先生、唐锡光先生、卢芷芬先生、周振甫先生，还有别的许多位先生。开明书店还能给读者留下一点儿印象，是这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其

中有我的一小份，只是一小份而已。

开明书店能给读者留下一点儿印象，同人的团结和努力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得到了许多朋友的支持。许多作者愿意把自己的作品交给开明出版。在经营管理上，在印刷技术上，开明也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还有许多朋友热心地给开明出主意，他们之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有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党员，有几位是知道的，当时也没考虑他们是不是党员。只因为他们的主张对，说得有道理，我们觉得应该这样做，很自然地就照着他们说的去做了。后来回想起来才体会到，原来在解放以前，我们不知不觉地在接受着党的领导。

开明是一个私营的书店，当然要赚钱的，现在叫做讲求经济效益。不赚钱而蚀了本，书店就办不下去，就要关门，还谈得上什么发展。但是开明不光为赚钱。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出书出刊物，一定要考虑如何有益于读者；有所不为，明知对读者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东西，我们一定不出。这样做，现在叫做考虑到社会效益。我们决不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我们决不肯辜负读者。开明书店的读者主要是青年和少年，因而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是教育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做的工作就是老师们的工作。我们跟老师一样，待人接物都得以身作则，我们要诚恳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的读者，给他们必要的条件，让他们成长为有益于社会的人。我们当时的确是用这样的准则来勉励我们自己的。

开纪念会不是向后看，而是为了向前看，怀念过去，为

广开拓将来。有人建议恢复开明书店，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时代不同了，过去的东西回想起来似乎很有味儿，如果再现的话，往往只能使人扫兴。我就我想到的，零零散散说了这一些，对开拓将来恐怕没有什么好处。花了大家很多时间，真对不起。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九日作

悼念愈之兄

作文悼念愈之兄，在我是第二回了。四十年前作过一回，那是抗战胜利前不久，忽然传来消息，说他在南洋某地病故了。朋友们都异常怅惘，不肯相信，可是据说消息十有八九是可靠的。在这样的心情的支配下，雁冰、彬然、云彬、伯韩、子婴和我，都作了悼念文字，由我编成特辑，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因为愈之兄也是《中学生》的老朋友。悼念文字虽然写了，而且发表了，大家还希望消息是误传。我的那篇文字就是这样说的：如果我们有幸得与他重新相见，这特辑便是“一死一生，乃见交情”的凭证。

这一回是千真万确的了。同在一个医院里，我住在一楼，听说愈之兄进院了，住在四楼。我向医务人员打听，回答说他感到有点儿不舒服，所以进院来检查，没查出什么问题，过几天就可以出院的。没想到几天之后，他的病情突然恶化。我听说了就让儿子至善上楼去探望，医生已经在进行抢救。我想亲自上楼去看看，让医务人员给劝阻了。听着抢救的措施逐步升级，我知道要再见一面是没有希望了。都这么大年纪了，总会有这样一天的，听到他去了，我并不十分悲伤，只觉得又异常怅惘。我想起四十年前《中学生》上的那个特辑，六篇悼念文字的作者，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了。又想起那六篇

文字，我的一篇写在最后，却放在头里作为特辑的序言，为的说明发表这样一个特辑是让读者学习愈之兄的长处，所以题目就用的《胡愈之先生的长处》。

那篇文字我着重说了愈之兄在四个方面的长处。一是他的自学精神。他中学没毕业就考上了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从此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几种外国文字，还有世界语，他能运用自如。他是熟练的新闻工作者、编辑工作者，出版工作者。他兴趣广泛，博而且通，对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语言文字，都有独到的见解。《中学生》当时标榜自学，愈之兄就是一个最可凭信的自学成才的实例。二是他的组织能力。愈之兄创建过许多团体，计划过许多报刊和丛书，他能鼓动朋友们跟他一起干。他善于发现朋友们的长处，并且能使朋友们发挥各自的长处。等到团体和报刊丛书初具规模，他往往让朋友们继续干下去，自己又开始新的建设。他有这样非凡的组织能力，所以建树事业之多，能比得上他的似乎少见。三是他的博爱精神。我说的博爱指的是爱人民大众。既然有所爱，就不能不有所憎，尤其在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里。愈之兄坚持正义，坚持进步，反对法西斯和帝国主义，在紧要关头，冒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可是事过之后，他就不再提起，不愿让别人知道。他不为名不为利，所以坚持做去，只是出于对人民大众的爱，觉得有责任非做不可而已。四是他的友爱情谊。愈之兄关心朋友甚于关心自己。他经常为朋友出主意，帮助朋友解决困难，却没见他为自己出过什么主意，也没听他诉说过自己的困难。所以他的朋友决无泛泛之交，都愿意接受他的意见，乐于跟他共事。

那个纪念特辑发表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出版的《中学生》上。过了不久，日本投降了，又过了不久，南洋有信来了。朋友们都喜出望外，愈之兄历尽艰辛，居然健在，而且打算尽快回国，迎接新中国诞生。旧友在解放了的北平重逢，都有说不尽的高兴，何况时代已经变了，美妙的前景已经展现在大家面前。

从那时起，我有幸又跟愈之兄相聚了三十几个年头，还经过许多次合作共事，有时甚至朝夕相处。这样的日子，今后不可能再有了。现在悼念愈之兄，我仍旧要说他的长处，说这四个方面；因为都是做人的根本，都是咱们应该向愈之兄学习的。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一日作

悼 丁 玲

丁玲也去了，老朋友又少了一位。她跟我相识快六十年了，可是离多聚少，不通音信的日子倒占了一大半。一九二七年，我代振铎兄编《小说月报》，她是投稿人，住在北平，先通信往来；第二年到了上海，我才见到她，跟胡也频几乎形影不离。他们有时到我家里来，有时在朋友们的聚会上见面，那年秋天还一同去海宁观潮。一九三一年一月，胡也频被捕，丁玲到开明书店找我和朋友们设法营救。大家都同情这一对青年人，想了些办法，都没有效，胡也频不久就被反动派杀害了。两年以后，一九三三年五月，丁玲被捕了，我和朋友们又设法营救，可是杳无消息，大家以为她跟胡也频一样，也遭到了残害。到抗日战争后期，我才听说丁玲在延安，真个喜出望外。

再见面是一九四九年，我到北平以后。相隔十六个年头，她还是老样子，热情，健谈，只是服装改了，穿的灰布解放装，先前在上海，经常穿的西式裙子。建国之初大家都忙，几乎只能在会场上相见，互通消息得靠报纸。我知道她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了奖，知道她办文学讲习所很卖力气。没想到一九五七年夏天，所有的日报都以头版头条刊出了那则吓人的新闻，"反党"哩，罪名可不小，紧接着是连篇累牍的

揭发批判文章。丁玲是那样一个人吗？她为什么要那样干呢？读着报纸，我不由得心里发愣。从那以后，足足又二十二个年头，我没见着丁玲。

再相见是一九七九年夏天，她从山西迁回北京之后。那一天，她跟陈明一同来看我。突然见到她，我真个又惊又喜。人当然老了，鬓边有了白发，还是热情，健谈。二十二年的往事，记不清是从哪儿说起的，拉拉杂杂，没有个头绪，总之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留下的正在解决。忽然她说：当初要不是我发表了她的小说，她可能不会走上文学这条道路。我不同意这句话，走上文学道路是她自己的选择，也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可是我理解，她并无埋怨的意思，只是表明她虽然经受了非同寻常的折磨，却毫不反悔，而且打算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近几年来我身体不好，经常住医院，丁玲探望过我好几回，每回都带了花来。年前听说她病了，进了另一家医院，我没法去探望她，想不到就此永别了。她跟我说过想写《桑干河上》的续集。此外总还有什么别的计划吧？要是让她多活几年，或者在过去，就让她多写个十来年，那该多好呀。——我这样想。

一九八七年三月六日作

来自故乡的礼品

我因肝病住医院已经一年多了，至今没有痊愈。在此期间，视听衰退得利害。亲戚朋友听说我病了，有的写信来慰问，有的来医院探望，也有给我送花的，送食物的、送补品的、还有送他们自己的新著的，关怀之深之切，教我感激不尽。信我是没法读了，因为左眼已经失明，右眼也只能辨认朦胧的形象，总是儿子至善给我念了，由他代覆。书当然没法看，只好让孙媳兀真在我右耳边慢慢地响亮地念给我听（盛情来访的亲友的谈话，也得由她同样地转述给我听），每天听一段两段，那位朋友好像就在对面，跟我娓娓而谈，慰我寂寞。

今年年初，民进开六届三中全会，谢孝思老同志从苏州来参加，苏州市刺绣研究所恳请他带来一幅我的肖像，是特地绣了送给我的。大家看了都说绣得非常之像，不但形似，而且传神；针法疏朗，色彩淡雅，像钢笔素描，又像蚀铜版画，可是线条保持着针绣的韵味。听大家这样说，我想这幅绣像该称得上曲园先生赞美沈寿之作的所谓“神品”了。可惜我只能看到个模糊的轮廓，只能认出来绣的的确是我。至于大家说的色彩，针法，韵味，我只能想象得之了。

至善告诉我，一年以前苏州市刺绣研究所来要我的照片，说要给我绣肖像，他说刺绣的工程太大，代我再三辞谢，又

感到盛情难却，终于把照片寄去了。刺绣研究所的来信上说，底稿是画师余克危同志的手笔，工艺师任嘒闲同志绣了四个月才完工。还打听到余克危同志是画西洋画的，年纪四十出头；任嘒闲同志是位年逾古稀的老太太，她绣我的肖像用了一种新的针法，叫做“虚实乱针绣”。

继承苏绣的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探索各种绘画的表现手法，把握其特色为我所用，不断地丰富刺绣艺术，开拓刺绣艺术的新领域，都表明苏州市刺绣研究所名副其实在研究，决非一个普通的刺绣工场。记得五十年代我第一次去参观，就看到了绒线绣。作品的色彩浓重而厚实，与油画相仿；材料用绒线，底子是亚麻布，都是苏绣从未用过的；可是按画稿的色彩捻成颜色和深浅各不相同的绒线，用紧密齐整的针脚布满在底子上，可又是苏绣的传统手法。当时正在绣制几幅大尺寸的出国展品，我想国际友人看了，也会赞叹不置的。

过几年再去参观，就看到了乱针绣。色彩明亮淡雅，说是水彩画吧，明明有线条，说是粉笔画吧，粉笔画的线条没有光彩，也没有这样细而直的。用的丝线也是按画稿上的色彩捻成的；针脚大多一寸来长，长于传统针脚的两三倍。最大的特点自然是乱，底子是缎子，布满了横七竖八的针脚，而传统的刺绣是一针挨着一针，排比得紧密而齐整的。可别以为乱就是乱来，无数横七竖八的针脚组成一幅画，这还不算，要像，又要传神，怎么可以乱来呢？每一针下去，走向，长短，都得比照着画稿反覆端详，郑重又郑重。针法虽又是创新，认真细致的传统可没有改变。

苏州市刺绣研究所不但有经验丰富的老工艺师，还有好

几位画师，有专长临摹的，有专长写生的。工艺师不断地有所创造，得力于跟画师的合作和互相切磋。培养年轻人则绘画与刺绣并重，临摹与写生并重，继承与创新并重，这样的教学方法，我非常赞成。每次回苏州，我总要去刺绣研究所看看，好像探望老朋友一个样，看看他们又有了什么新进展新作品，分享他们创造的乐趣。

虚实乱针绣，毫无疑问是乱针绣的一个创新，乱针绣上加"虚实"二字，一定跟满幅的乱针绣有所不同。我辨不清差别在哪儿，就问至善。至善告诉我说，以前看到的乱针绣，画面布满了针脚，这幅绣像可不一样。不同层次的明暗用针脚的或疏或密来表现，因而有钢笔速写的味道。最明亮的部分留空，完全露出白色的缎子底子。如左半边脸的下方正好受光，这部分就留空，也不是绣一条细线来勾出脸的轮廓，而用绣在背景上的针脚把受光的部分衬托出来，看着更加自然。针脚密，横七竖八叠在一起，有针把稍有差次还可以掩饰过去；这幅绣在高50cm宽40cm的白缎子上的肖像，针脚那么少，那是一丝半缕也马虎不得的，怪不得大家看了都赞叹不绝口。

前边说过，至善说他感到苏州市刺绣研究所的盛情难却，还是把我的照片寄去了。现在绣像捎来了，我当然异常激动，感谢无量。我感谢苏州市刺绣研究所，感谢画底稿的余克危同志，特别感谢辛劳了四个月的任嘒闲老工艺师，也感谢不嫌累赘，把这幅绣像带到北京的谢孝思老同志。

绣在画面上的固然是我的形象与姿态，可是，绣得这样妙肖，全由于工艺师的艺术修养与熟练技能。这样想来，这

幅绣像能否完全属于我呢？还是那句话，由于盛情难却，我必得敬受，暂且保存。在最近的将来，一定要归回苏州市刺绣研究所珍藏。

一九八六年三月作

纪念雁冰兄

雁冰兄五十初度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字，谈他的文学工作。现在纪念他诞生九十周年，我在病中，心思迟钝，想不出什么新的话，只好重述那篇文字中的两点意思。

第一点，雁冰兄是自学成功的人。二十年代初，他在商务印书馆任事，编辑工作不仅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磨练自己的课程。他专心阅读外国文艺书刊，注意思潮和流派，选择内容和风格都有特点的作品翻译出来，后来编成的《雪人》《桃园》等集子，大家都认为是最好的选集。他把许多书堆在床头，还有纸和笔，半夜醒来想起什么，就捻亮电灯阅读，如有所得赶紧用笔记在纸片上，惟恐遗忘。当时我听说他有这样的习惯，非常钦服，我从来没有这样勤奋过。

第二点，雁冰兄作小说，一向先定计划，决不信笔直书，写到哪里算哪里。计划不只藏在他的胸中，还要写在纸上，而且不是个简单的纲要，竟是细磨细琢的详尽的记录。我有这么个印象，他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搞创作和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的。对于那些自认为创作全凭才气的人们来说，我想，雁冰兄的创作态度很值得供他们作比照。

纪念老朋友，无非把旧话重说一遍。但愿这两点意思不是毫无用处的废话。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匡互生先生墓碑记

匡互生先生生于湖南宗庆东乡长沙村，其时是一八九一年十一月一日。青年时期肄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的第一天，爱国群众为了惩罚卖国贼，举火焚烧赵家楼，领先点火的就是匡先生。

一九一九年匡先生毕业于高师之后，先后在湖南浙江任教，这是他后来在上海江湾创办立达学园的预备期。匡先生提出“立己立人、达已达人”的宗旨，把中学改称学园，教学生注重自我修养，从事生产劳动。这些主张引起许多朋友的共鸣，愿与匡先生一同走上教育改革的新路。立达毕业的学生在各方面有成就的很多，无不感激当年所受的教育，无不深切追念匡先生。

匡先生为立达学园艰辛工作了八年，积劳成疾，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逝世。经过五十三年，从上海迁葬在这里。墓前立这个碑作纪念。

叶圣陶敬记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

祝中华诗词学会成立

我只能在家里遥祝中华诗词学会成立。

记得有个“旧瓶装新酒”的比喻：诗词虽然是旧形式，跟“五四”以来提倡的新诗一个样，也能反映咱们这个时代的生活。所以我想，瓶子无论新旧，咱们总希望瓶子里装的酒又香又醇，总希望咱们的诗人都能用精粹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各自的好诗来。

在咱们这个伟大的时代里，可以酿成好酒的材料比比皆是。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学会，大家共同努力，互相切磋，丰收是完全可以预卜的。

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祝中国韬奋基金会成立

韬奋先生一生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求进步。尽管环境险阻，痛病缠身，他追求真理，绝不退缩。所以大家都尊敬他。

韬奋先生全心全意为社会服务，为群众服务；还善于团结同人，关心同人，跟他们一同身体力行。所以大家都尊敬他。

祝愿中国韬奋基金会继承韬奋先生的追求真理的精神，为社会为群众服务的精神，不断地发扬光大，为振兴中华作出贡献。

一九八七年六月

附　录：

《叶圣陶散文乙集》编后琐记

叶至善　叶至诚

我们弟兄俩编父亲的散文集，是一九八一年夏天开的头。先选编建国以前的，当年年底就完工了，交给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就是去年年底跟读者见面的那本《叶圣陶散文甲集》。我们用"甲集"这两个字向读者预告，后面还有《乙集》《丙集》，我们按着写作时间的先后，还在逐年往下编哩。今年三月下旬，父亲感到身体不舒服，进医院检查，发现胆囊又出了问题，四月十七日再次作手术，把胆囊割除了，彻底去掉了这个隐患。医疗的经过很顺利，可是父亲究竟年纪大了，体质和精神的恢复都比较缓慢，医生再三叮嘱出院之后还得好好休养，把写文章的事暂时抛开，再动笔至少得在半年之后。我们就借此告一段落，把已经选定的一百八十九篇编成《散文乙集》。《乙集》跨的年代比《甲集》长，从建国开始到今年春季，前后共三十四年半，中间却有十三个年头是空白，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父亲的散文连一篇也没有找着。我们就以这段空白作为界线，把《乙集》分为上下两辑，好让读者注意到这么回事。至于这段空白是怎样出现的呢？先是"三年困难"，纸张跟别的物资一样，也短缺得利害，许多报刊只好

停刊，剩下的少数大多缩减了篇幅。记得从一九六二年起，就不大有人上门来约稿，后来几乎绝迹了；父亲即使自己有兴趣写，也未必有地方发表。等到国民经济稍见好转，"十年浩劫"就跟着来了，大家有话没法说，也没处说，父亲不能例外。这十三年的空白倒从反面说明了一个道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两者都是繁荣创作以至发展文化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乙集》的选编准则还是先前的两条：一是尽可能做到"不缺不滥"，凡涉及的方面都不要遗漏，又要选得精一点儿；二是尽可能"避免重见"，语文课本和别的集子已经选过的，最好不要再选。原则虽然没有变动，我们在执行中不免放宽了点儿。父亲的视力近两年越来越坏，写东西越来越困难，戴着深度的老花镜还看不清笔尖在纸上究竟怎么移动。父亲写字才真叫"默写"：他左手拿一把尺子按在稿子上，右手拿着笔，手腕靠着尺子，完全凭熟习和记忆，把字一个挨一个画在尺子的上方，笔画曲里拐弯，有时候还两个字叠在一起。每写完一句，放下笔拿起放大镜，把稿纸凑近电灯仔细读一遍，读到不顺心的地方就放下放大镜，拿起笔来修改——除了修改文辞标点，还要修改那些教人看不清楚的字；改完一句，还得拿起放大镜来逐字检查。写成一篇东西多不容易，教我们怎么能随便舍弃呢？因而很可能选得"滥"了点儿。至于"重见"，有位先生持不同意见，认为不该避免。他特地给我们来信，说他既不是语文教员，又不研究创作，语文课本、《语文教育论集》、《论创作》，他都不曾翻过，因而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重见"的问题；还说像他那样的读者一定不少，有些

篇散文因为"避免重见"而不选进散文集里，会使他们感到遗憾。这位先生说的也有道理，对于"重见"，我们就稍稍放宽了点儿。尤其是父亲为几位过世的老朋友的集子写的序和跋，虽然都收进了新近出版的《序跋集》，我们还不忍舍弃。"一死一生，乃见交情。"可能有的读者受了这一句古代的民谣的影响，很想读一读那样的散文，有的即使读过了，再读一遍也不至于厌烦。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还陆续收集到父亲在建国以前写的四十来篇散文。我们选出了二十六篇，作为《甲集》的"补遗"附在《乙集》后面。这样做法有个好处，让没有见到《甲集》的读者可以窥豹一斑，有兴趣的话，还可以跟《乙集》作个比较，看看在建国前的各个时期写的，跟建国以后写的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可是加上"补遗"，《乙集》的篇幅就超过了《甲集》，未免厚了点，读起来可能不太方便，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了。

我们祝愿父亲健康长寿，几年之后又能积攒下许多篇散文，我们就可以接下去编《丙集》了。从《甲集》和《乙集》看，父亲写散文至少有一半是应报刊的约稿，要不是编辑同志鼓动，其中有些篇就不一定写了。命题作文是桩苦差使，我们弟兄俩都有亲身体会：有时候碰僵了，实在想不出什么新的意思，眼睁睁地对着题目硬是无话可说，真是苦不堪言。我们并不反对约稿，因为对作者来说，约稿不失为一种推动力。只是希望题目出得宽一点儿，或者只大致划个范围，让作者在构思的时候有回旋的余地。限期要尽量放宽，最好能允许作者哪一天写得就哪一天交。有的编辑同志挺有本事，他们

把作者的心思完全摸透了，知道作者对哪个问题有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他们决不强作者所难，决不把自己的意图硬塞给作者；他们用不着纠缠，用不着催逼，而约稿往往能得到成功。我们祝愿父亲今后遇到的都是非常善于约稿的编辑同志。

我们能够把父亲几十年来写的散文收集起来，主要靠朋友的帮助，商金林同志花的工夫尤其多，我们由衷地感谢他们。我们把《乙集》交给三联书店出版，因为三联就在北京，离我们家又近，想到什么要商量，骑上自行车十分钟就能到，免得书信往返，有时候教人等得心焦。

一九八四年五月

劇本兩種



恳　亲　会

登场人物：

黄隶青　小学校长。

邵柳村　园艺家，穿西服。

毕　宜　女教师。

秦佩瑜　教师。

朱信卿　老商人。

布景：

小学校的休息室。后方的门通到会堂。左面全是玻璃窗，窗外有浓绿的树木，初夏的阳光，繁喧的鸟声。右面有门通向新开辟的农场。室中陈设简单而雅致，足以娱心。正是开儿童家属恳亲会的时候，毕和秦靠着室中的一张长方桌坐着。

秦：（放下手中的报纸，取出怀表来看）时候到了，还不见一个人来。

毕：前天我到各家去邀请，他们都答应来的。

秦：他们不好意思当面回绝你。

毕：（不信）停一会儿都会来的。守时刻的习惯大家没有养成，这不能怪他们。

秦：我想，今天来的家属一定不会多。他们和我们已经成了

仇敌，只差不曾打架。

毕：这是彼此之间有了隔膜的缘故。在今天这个会上，我们希望能打破这一层隔膜。

秦：(摇头)难！难！

毕：为什么？

秦：他们不赞成我们迁移人家的坟墓，更不赞成我们教儿童在农场里工作。这隔膜恐怕只会愈结愈厚。

毕：但是他们没有正当的理由，缺乏深远的眼光。

秦：他们自有他们的理由。他们有的是祖先崇拜，把坟墓里面埋藏着的骸骨看得比什么都郑重。如今我们开辟农场，要迁去那些坟墓，他们以为惊扰坟墓里的骸骨是最难忍受的事。所以不单是那些骸骨的子孙，几乎是全乡的人都来反对我们。

毕：他们怎么不想一想，这片空地本来是我们学校的，他们在这里营造坟墓是一种侵占行为。

秦：他们以为我们的行为才蛮横无理到极点。他们不说我们“迁移”，而是说“发掘”；相形之下，他们的侵占行为就轻微到极点，几乎不成为问题。

毕：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们终究战胜了他们。

秦：然而外间的话很不好听啊！他们说：“黄隶青贪图自己舒服，发掘了人家的祖坟，在学校里造起花园来，专供教员们享乐，我们也得去发掘他的祖坟！”这不是……

毕：(感慨)像黄先生这样的人竟被全乡的人民看做公敌！他和人家从来不曾有过什么纠葛，对人总是很真诚的，很和善的，得到的酬报却是怨毒和讥嘲。

秦：我喜欢直爽地说，黄先生自有取得怨毒和讥嘲的原因。

毕：（惊异）他不见得有什么隐秘的坏处吧？

秦：（急于辩白）不！决不！他不到茶馆，不到酒馆，不常同外边的一般人接触。他到人家去应酬，从不肯因主人的劝请碰四圈马将，打一局"扑克"。人家就认为他太骄傲，鄙夷一切。渐渐地同他疏远，直到明显地反对他。其实处世本来不应该这样的。像我踱在街上，不论谁喊住我，（效市井声气）"秦先生，喝一碗去！"我就买些熏田鸡酱莴苣，同他在酱园里的缸盖上一起喝黄汤。有时坐在茶馆里，人家对我说，（发声略低）"我们三缺一，你也入局吧。"我就答应了他们，偶尔消遣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我就很少人反对。总之，一个人的行为过于清高，是决不会得到快乐的。

毕：（沉思有顷）黄先生陪那位邵先生去看农场，怎么还不回来。

秦：（很感兴味）我们这个农场若照我的想法办，一定可以弄得非常之好。

毕：你倒说说看。

秦：我先说照我们现在的计划，十分之六七是办不好的。儿童的能力何等微小，我们大家又缺乏种植的经验，这样玩儿不当正经，哪里会有好结果！

毕：照你的计划怎么样？

秦：我以为可以招募一家专种菜蔬的人来这里承种。要种什么由我们支配，收成全归他们。平常只要有一亩地，一家男女老少勤勤俭俭地工作，拔了这样种那样，就可以

够一家的吃用。我们这里有五亩地，我想乐于应招的一定不少，可以由我们严密地挑选。这样一来，我们的农场不是可以四季长青，很好看了么？

毕：（默然有顷）儿童没有弄过园艺，开头当然不能有很好的成绩。但是他们一定很喜欢弄，那就很容易见到成效。他们用自己的劳力，栽培出许多鲜美的花卉和甘甜的蔬果供自己享受，开辟出一个优美的境界供自己游息，（兴奋的笑）他们的心灵要飞升……飞升……超出于地球了！若是招募别人来承种，他们就退居于旁观的玩赏家的地位，同样的一朵花一棵菜，就没有他们自己种出来的那么香美甘甜了。所以我的意思，我们创办这个农场，还是着眼在教育上的价值。

秦：（起立，靠窗外望）那自然不错。倘若单为我们那片地着想，我的办法倒是可行的。（躁急）外面还静悄悄地，没有人到来。我猜今天的来客至多不过一二十人，虽然有二百多个学生，一百三十几家儿童的家长。（走入会堂）

（毕取出预备着的演说稿）审慎地一边看一边轻轻诵读。约半分钟后，黄和邵从农场回来）

邵：（非常得意）这个地方好极了，出于我的意料。

黄：（兴奋而热忱的笑）请你给我画出来，我急于要看你胸中的图样。（和邵一同坐下，随手取一张报纸授给邵）就画在这空白的地方吧。（向毕）他说照我们的规划是非常可惜的，他胸中已经有了更好的艺术的图样了。我们看他画罢。

毕：（将演说稿藏好，起立，表显热望的神情）更好的，艺术

的，这是我们的希望啊！

邵：好极了，好极了。（从衣袋里取出一支铅笔）先不忙画，让我说明一下为什么照你们的规划有点儿可惜。

黄：当然要请你说明。

（毕重又坐下）

邵：你们开辟这个农场，不是一方面教儿童学习农作，一方面要他们享受美感么？照场地上所画的石灰线看，知道你们的规划是以农田的式样为依据的。要知道现在的农田不是艺术化的东西。（用铅笔在报纸上随意地划）一方一方的田畦，呆板得好像作文本上的格子，纵横交叉的田岸，只容得下一个人行走，这不过都市的集中和扩大的标志罢了。农人们在物质上受尽了压迫，还要受精神上的损害，连享受美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这未免太不公平。所以我们若是从事农业，不单要改良种植的方法，还要改良规划的图案。尤其是学校里的农场，必定要双方都注意到才好。我们要着眼于将来啊！所以我不赞成你们的农场采取现在的农田的式样。

黄：我们应当改良，确然应当改良！

邵：你们这片平地有天然的美景，三面都是水。西北一角河面最宽阔，河水活活地流着，我们应该把这一好处完全表显出来。但是对岸的那些坟墓怎么办呢？这样错杂而密集，充满着死灭和散乱的气象，破坏了农场的整体精神。

黄：那是乡人公认的丛葬的地方。贫苦人家都到那里造坟、弄得没有一点儿空隙，甚至扩充到我们的空地上来了。

邵：（忽有所悟，在纸上画）这是对岸的坟墓。（毕立起俯视．黄亦注视）我们替他们沿河种这么几行树，总不至于招到反对吧？

黄：不但不反对，而且一定乐意，虽然嘴上不说。

邵：那就好了。树长成之后，从这一岸望过去，就只见深深的树林，不见累累的坟墓了。（随画随说）这是一条河。（修改）这里没有这么阔。我们农场的大门在这里，不是么？

毕：似乎还要偏左些。

邵：应当是这里了。从大门起，可以铺一条宽阔的沙子路，沿着北面的河滨，折转来，沿着西面的，南面的，这个农场享有的天然的帮助就是水，我们须得会利用水。现在沿河筑路，就可以总揽三面是水的情趣，路的两旁都种法国梧桐。三年之后，（神情洒然）在绿荫中散步，多么有趣。

黄：（笑）有趣！

邵：沿着沙子路，（画好后更画并行线）可以做花坛或是菜圃。这里安置凉椅，坐在花丛中眺望远景和夕阳，真是最适宜不过了。两棵大银杏树不是在全场的中心么？树下留一亩作草地，要修理得整齐而洁净。南面的河水比较狭，对岸又是些参差错乱的民房，更远便是那狭小可憎的市集，实在是农场的一个缺点。但是不妨，我们可以在那里栽种果树作修补。（又画并行线，画罢，将铅笔击桌）这就行了，非常简单，却非常优美。

黄：这个图样比我们的好得多了。我早知道我们的规划难以

通过你的眼光。但是我们乐于接受你的批驳和修正。现在我们的农场是更进一步了。（取图稿欲细看）

邵：（按住图稿将铅笔指点）现在河岸一带犬牙错落，是天然激荡的痕迹，要一律做成斜滩，和垂直线成四十五度角，上面也要铺盖草皮，才整齐而不恶俗。

半：照邵先生的规划，并不要多费钱，只须加以人力。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就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艺术的农场。（坐下悠然遐想）

黄：力量，我们有的是。——我们原是准备花力气的。（取图稿细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看着河水不息地流动，草木生生不已，没有一刻没有新机，小鸟会唱出微妙的曲调，轻云会构成美丽的画图，就可以知道环绕我们的事事物物无不活动，无不快乐，无不优美。

邵：这是你的哲学。

黄：独有环绕我们的人却绝然相反，从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心灵，只看到忧郁，怨恨，讪笑，诽谤，疑猜，怠惰，丑恶，衰弱，腐朽，死灭，……说也说不尽。他们固然自认为人，我只认为他们是那些表象的集合体。我非常可怜他们，当然也可怜我自己，——我和他们，他们和我，终究是互相依傍的伴侣啊！他们沉沉酣睡，我怕他们起晚了耽误了工作，就有唤醒他们的责任；但是要尽这个责任是很困难的，我耽心会处处受到阻碍。这样说来，人生真是乏味极了，不但可怜，而且值得咒诅了。然而我不愿意咒诅，我还要努力。我们的力量能为我们祝福。我们一天一天地生活，别的且不说，总希望享受一些快

乐。我们的努力，无非想用自己的力量尝一尝快乐的滋味。我只是奇怪，他们竟不想享受这样的快乐。

毕：这是你主观的见解。在他们，也乐其所乐。

黄：确然如此。

邵：（激励）隶青，你既有这样的决心，你就照着你的意愿做去。我相信凡是你做的一切，都会为你祝福。

黄：我打定主意这样干。今天开这个恳亲会，就因为学童的家长不赞成我们教他们的儿女去农作。他们说："我们只要子女读书，并不要他们种田。"有几家竟不让子女到这里来，改入别的学校去了。他们不理解我，硬要反对我，所以我把他们请来，指点给他们看，真诚地告诉他们农作是什么意思。我相信人和人之间大体是相同的，只要打破了隔膜，就可以互相融合成为一体的。我相信等到大家觉醒了，一齐来努力，前途是没有限量的。先觉醒的只有拖着未觉醒的向前面跑，那怕他们不愿意，一路乱骂。蜗牛生来爬得慢，叫他一点钟跑一百里，无论如何办不到。只有把他提上火车，一点钟之后，他虽然没有动，但终究前进了一百里。

（邵和毕都笑。）

邵：蜗牛乘火车，奇想！诗人听见了，也许可以写成一首好诗。

黄：（忽有所思，取出怀表来看，作静听状）三点三十五分，开会的时刻已经过了半点多钟了，外面还是寂静的！

毕：（走到会堂门首，开门向外望）只来了一位老先生。（走出门去）

黄：（感触）今天的来客不会多了。一样的一腔真诚，一样的一番说话，我们总希望多来一个人，增多一分效力。

邵：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你校长的邀请呢？

黄：他们有一种特性，把教育子女的事看得最无关紧要，从来不问一问儿女的身心是不是逐渐发育，问一问子女的行动习惯是不是趋于良善。年岁到了，就把子女送进学校——什么学校都一样——便是他们唯一的经心。至于这个学校的教师怎么样，功课怎么样，设备怎么样，他们认为都用不着过问——从来不曾在他们的脑子里涌现过。

邵：可是你们开辟农场，教儿童农作，他们却又起劲地反对了？

黄：他们有的是列代传下来的老例，有的是阅历得来的成见！凡是老例和成见以为不必过问的，他们再也不去多事。倘若有一件事与老例和成见相反，他们就要拚命地力争，比什么都起劲。

邵：他们当然要反对你了。

黄：但是我这样想：处在今日的社会，今日中国的社会，本当准备接受加倍的困难，——也许只能得到极其微小的成功。虽然微小，逐渐积累起来，可以成为巨大。他们今天反对我，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乃至百年之后，终究会成为我的知心的伴侣。但是我要把年限缩短，从一百年减到九十年，八十年，乃至二十年，最好是两年，一年。如果办不到，这才是我真正的忧虑。

邵：尽你的力量去做吧，用不着忧虑。

（秦自会堂上场）

黄：（示秦以图稿）我们的农场有了个新的规划了，是邵先生的作品。你看，多有趣。

秦：刚才看见今天的《乡报》，又是一支暗地里伤人的冷箭。

黄：（惊讶）什么？

秦：他们讥诮我们今天的恳亲会，说了许多不相干的话。我们一定要写信去纠正他们的误会。我去拿来给你看。（走出去）

黄：（怜悯和不快的神情）又是有所为而为的！

邵："天下老鸦一般黑"，也许是一句极其通达世情的比喻。我看各处城镇的小报，他们的规模越小，态度越是不光明！

黄：（感叹）"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秦：（持着《乡报》，朗诵着上场）"教师的俱乐部……昔日的墓场，今日的花园，……小农奴受役的恳亲会！"这样的小标题，真是岂有此理！

（置报桌上，坐下）

（黄和邵看报纸）

黄：这是他们的机会。然而也仅止于此了，不能加甚了。

秦：我们写信去纠正。（忿激）太岂有此理了！

黄：（非快乐的笑）这明明是乘机报复。我们何必同他们理论，再给他们造成机会呢？

秦：（领悟）那个当编辑的屡次跑来告诉我们，说接到了谁谁谁的反对我们的稿件，怎样地中伤，怎样地不堪，他都留置不登。原来就是他的一种暗示。

邵：那自然。

黄：后来他要我们帮助他的经费，分明是"敲竹杠"。我们回绝了他，他就乘今天的机会报复。黑暗，满天的黑暗！揭不完的黑暗！

邵：堕落极了！堕落极了！

秦：但是他的报复非常有效。你们看，开会时间已过了半点多钟，还只来了一位家长，开布店的朱老先生。别的家长看来不会来了。他们本来就不高兴来，又受了《乡报》的蛊惑。李先生张先生也是这么说。他们在招待室里陪着那位老先生，还不见第二个人来。

黄：（忧愁）太可怕了，或者不至于吧。

邵：（慰黄）或者不至于。

秦：也说不定。

黄：（毅然）我们请他们来，就如恳求他们，我们只有耐心等候。（望窗外，两手上伸以振精神）今天的阳光这么可爱，树叶深处的小鸟在那里鼓励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谈谈快乐的事？（将《乡报》推远些）我们也真可怜，谈到话总是感喟和指斥。还是谈谈我们的农场吧。佩瑜，你看这个新规划如何？

秦：好极了。只怕费用太大，不容易办到。

邵：其实用不着增加费用，只要你们教师和学生一同工作。

黄：工作，我们必须工作，必须赶快工作。这是我们新鲜而快乐的生命的泉源，唯一的泉源。我们以前是不幸的，生活在暗昧之中，几乎近于死灭。只有努力工作，我们才可以得到新生。即使环境依旧是先前的模样，我们也无所恐惧，因为我们的"新生"已在慢慢地萌芽了。我们那

些小朋友，虽然被他们的父母拖住了，不让他们奔向光明。但是我们总要尽一切可能，使他们沐浴在这新生命的泉源里。他们是我们最深情最有希望的伴侣啊！

邵：（感动）我祝福你，但愿你和你的伴侣，你们新生命的芽，都蓬蓬勃勃地长成起来。这里是一个乡镇，不比都会那样複杂散漫，二十年，至多二十年，决不会落空，必然应了我的祝福。

黄：（诚恳）但愿如此！

（毕自会堂入）

毕：依旧只是一位家长。（坐）竟没有一个女的到来。

黄：毕先生，等一会儿开会，你一定要演说。你的话比较容易被家属接受。

毕：演说稿准备好了，只怕意思还不周密，不能使他们明白过来，不能打破彼此之间的隔膜。

黄：主要不在意思，而在于真诚；有了十分的真诚，就能使人感动到十分。我知道，你是非常真诚的。（向邵）你也得演说，我们的农场有什么价值，农作有什么兴趣，就把你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要用艺术化的言语，描绘我们的农场将会怎样优美。为着我的小朋友们的幸福，我恳求你。

邵：（承应）我愿意尽力。

黄：我们还要请家长们参观我们农场，给他们看看你作的规划。先前的划的石灰线必须抹去，我们去画新的。（起立）

邵：（起劲的样子，轻捷地站起来）我们就去。

（黄和郜一同从右边下场）

秦：黄先生的精神真教我佩服。但是破坏的神偏偏老跟在他的后面，现实他理想的一天还远得很呢。若是我，全乡的人都这么毫无理由地反对我，我可要下马了，抱消极态度了。

毕：为什么？

秦：（略底声）昨天我在外间还听见说，有些人在那里运动儿童的家长，叫他们不要把子女送到这里来。有几家已经这么做了。据说有十多家也答应了，但还没实行。我猜今年暑假之后，来校的儿童一定非常之少。

毕：（皱眉）这确是一件可忧的事。

秦：（笑，起立，背靠窗栏，伸臂以舒体倦）依他们的心理，可知他们喜欢怎样的一个学校！我是颇知道他们的心理的。他们只须注重国文、英文、珠算三科：国文预备写信记账，英文预备发洋财，珠算预备习商，总之将来可靠此吃饭，所以看得非常重要。你能从早到晚，直到天黑才放学，专教这三科，你便是顶好的学校。什么体操，什么唱歌，什么手工图画，他们不但不要，并且厌恨。我们在这里教，他们在那里骂，当了学童的面骂；若是学童喜欢修习那几种功课，他们就骂得更凶，要有好成绩，更难乎其难了。我们却在那几科之外，还加上演戏，奏乐，农作等等，尤其是农作，他们更深恶痛绝。——他们里面固然也有农人，但是总希望儿子能做个商人，以为做商人比做农人有出息得多。结果怎么样？他们自然把子女送进别的学校去了。在他们看来，子女一辈子不

读书也不要紧，只是不愿意让子女学那些事务。

毕：确是如此。距离实在太远了，真是教育前途的忧虑。总得想办法慢慢地接近起来才好。

秦：我们说，那是"训练"，那是"陶冶"，再要紧不过的了。由他们看来全是废话，连听都不要听。

毕：如果经常举行恳亲会，总可以略微接近些。可是他们又不肯来。前儿回开恳亲会还来了十分之二三，今天只来了一个，这怎么办？

秦：刚在迁坟风潮之后，今天来的当然更要少些。我猜得很准：我们几个人分别到各家去邀请他们，才返身走出来，他们讥笑我们毁谤我们的谈论就开场了。那种谈论，他们本来说得有点厌烦了，或者将要归于沉寂。我们这一去，等于特地给他们送去一些新的资料，他们又感到了兴趣，讥诮和毁谤又像潮水一般地涌过来了。现在我们在这里恭候他们，他们正安坐在家里拿我们做谈资，消遣他们的无聊的光阴呢。

黄：（上场，神情不安）又来了几位家长没有？（走入会堂去，一会儿就回来，非常焦虑）还只有那位朱先生。我们真对不起他。他来了多时，开会的时间早过了，还不能开会！（室中踱来踱去）

秦：我刚才说过，他们不是没有空闲，只是没有赴会的念头。如果愿意来，像朱老先生一个样，早就来了。

毕：（起立，至窗前）我们总得想想办法。

黄：我们不能就此作罢。

毕：那几个被父母硬拖出去的儿童，我真有点想念他们。

秦：我也舍不得他们呢。这里是他们的快乐所在。

黄：（站定）我们要帮助还没被拖出去的，使他们不至于走上不幸的道路，而能享受到真正的乐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趣味？前几天我在农场里相度地形，儿童们跟着我，供给我他们自己的意见：那里可以凿池塘，那里可以种竹子，那里可以搭瓜棚，那里可以造房子。虽然不见什么匠心，然而可喜，因为是他们心灵的波动。最可爱的是周诗那个女孩子，她牵住我的衣服向我说，“大豆发芽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我们从来没有留心过。让我在农场里种一畦大豆吧。”听了她的话，我感受到一种不可言状的激动，是她可爱还是农夫可爱，我竟分别不出来。当时我说不出话来，只有握住了她的手，笑着答应了她。我想，这一握手，这一笑，应该是我们独享的趣味和骄傲。（精神焕发，才一会儿又露出愁态）可怜这些儿童们，偏偏有名为宝爱他们而实际却阻遏他们的父母。他们喜欢农作，父母不许他们做；他们舍不得这里，父母不放他们来。不相识的路人尚且要互相帮助，抵御危难，何况我们和他们心心相通，纠结在一起难解难分呢。唉！我的心，我的脑筋，都乱极了！

秦：（安慰他）你且不要懊恼。家长们今天不来，我们还会有别的机会。

毕：（理智地）我们还没有到无所作为的地步，我们还掌握着权柄。已经出去的儿童不过八九个，不曾出去的还在我们的手里。有他们在，我们总有办法。（热情）此后我们

加倍奋发为他们尽力。他们的父母曾经反对过我们，拒绝过我们，我们一概不记在心上。我们要成为一块大磁石，让那些儿童都感受到极强的磁性，他们的父母自然也会间接感受磁性。不成问题，最后的胜利终竟属于我们。

黄：（怅惘）我们还掌握着权柄？还有？

毕："大权在握"。

黄：我疑惑。

毕：毫无疑惑。等到这里的儿童都像周诗一个样，我们的胜利就来临了。而周诗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儿童。

邵：（自右边上场，双手插在衣袋中）隶青，我都指点给工人了，教他们照样画线。

黄：（憬悟）我们还有新生命的泉源，——也是我们的权柄，——也是……

邵：会开了么？

秦：只有一位来宾。

（朱自会堂门口向内窥探）。

黄：（延朱入。感受深烈的感动，语音转沉着）我感激您老先生……

朱：（自然的笑）黄先生。

黄：我对不起您老先生，等了这么久……

朱：我反正没有事儿，譬如到这里来看看。

黄：您笑得这样自然，这样和蔼而可亲。你必定识察我们的心，了解我们的心，（热泪涌出，语音愈真挚）你有你的三位令孙，我们有我们的子女，他们也有他们的子女。你

的，我们的，他们的，都是未来的开创者，未来的主宰。他们有独享的骄傲，使人家为他们服役，而我们正是为他们服役的——只为他们……（泪滴不止）。

（朱注视黄，点头，很深地感动。华凝视而立，若有深思。秦露出怅惘而怜悯的神色。邢环视诸人状态，同情的情绪形于颜面，非常强烈。如是约半分钟，幕始徐徐而下）

一九二一年七月十日发表

艺术的生活

第一幕

一九二零年七月间的午后，阵雨刚过，虽然晴朗，但很凉爽，在中国南方某个城里一个人家的休息室里。休息室的陈设都用西式的器具，门窗墙壁也参些西式。

靠右一扇门，门外是通到外边的长廊。

两个人对坐在靠左摆着的椅子上。——一个约有三十多岁，面貌自然，显出对人很热心的神态，是任君，这一家的主人。——一个是康君，年纪在四十以上，额发秃了，可以见他是很操心思的。

任：（取一枝烟授康）吸支烟吧。（康受烟，燃着徐吸，任取表看）三点三十分了，我约她四点钟来。

康：她对于幼稚教育，想来能胜任愉快。

任：这个我倒深知的。她出了师范学校，还专门研究过四年幼稚教育。

康：我办了幼稚园多年，遇见几位女教师，她们并不真有献身教育的志愿，是由命运支配着，学了保姆，自然只好做保姆。到后来有的出嫁了，有的对于她的事业觉得烦闷了，就毫不留恋的辞职去了！（很惋惜的样子）

任：（弹去烟灰）她决不是那样人！（康表示兴奋）她去学师范，

研究幼稚教育，有个坚强的意志做原动力，就是希望她自己有一种终身的职业，做个真正独立不倚的人。（康微微颔头）所以她做的工夫非常切实，不像那些专讲求形式和名词的人。

康：形式和名词实在是女子的毒菌，然而她们偏偏爱那些，把那些当作糖一般甜！她们自以为是新女子，其实何尝脱出了女子的旧方式？像刘女士这样，才算得是个新女子哩。

任：这是的确的。她在《时事评论》当编辑，我们常常看见她的文字，很鼓吹艺术的思想：以为人生种种，须要艺术化了，方才有活力，有真味。这岂是寻常的见解？（凝思）不知道她为什么总不愿意做这新闻事业；写信给我，总说她的生活乏味，所以，辞了职回来了。

康：（有些疑惑，少停）既然她先前立志要做教育事业，今朝请她到我那里任事，她一定很欢迎了。

任：我也是这个意思，所以约了她来，介绍给你。（两个人都弃烟头于唾盂，任起立，两腕叉于胸，踱步室中）

仆：（从长廊走至门口）刘女士请见。

任：请她到这里来。（仆退）

刘：（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子，姿态灵活，可见富于感情，但是也表现出意志坚强。她的衣着朴质而淡雅，手执一柄白羽扇。走进室内）任先生，我这时候来，还好没有失约。

任：刚四点哩。（指康示刘）这位是康先生。（指刘示康）这位是刘女士。

刘：康先生。

康：（起立）刘女士。（刘便坐在靠窗一只椅子上，任康二人，坐在原位上）

任：（向刘）你从上海回来的那天，天气热的厉害，你不觉得劳顿么？

刘：倒还好。我做的那件事实在乏味，教人耽不下去，所以就赶了回来。

康：《时事评论》销行很广，女士的文章又着实受人欢迎，正好施展抱负，女士为什么说乏味呢？

任：我也这样想。你前两次信来都这么说，我总是想不明白。

刘：从外表看，这个报纸固然不恶，但是揭他的内幕，就丑恶不堪了。那些股东和编辑都是拜金主义者。什么文化运动，什么见解理想，他们休说没想起过，简直做梦也没有梦见过。

任：他们也随着别人唱些时髦的论调，讲些新鲜的主义，不必说，为着生意，他们不得不借那些做幌子。

刘：不错。然而还不止此。果真有论调，有主义，好好儿主张，虽然追随别人，也可以有相当的几分效率。可恨他们一边主张，一边又在那里批驳，正负相消，就什么都等于零了！试看他们的文章，都隐隐约约有这样一种倾向。

康：（微叹）这就是所谓作者态度了。作者没有诚意，便多方掩饰，终于露了真面目。我平日还不觉得，经女士一说破，对于《时事评论》的信用就减去了一大半了。

刘：我初到他们社里，也一点儿不觉得。每月受他们四十块

钱，约定每天供给他们一千字光景的稿子。我想好在不限制文字的范围，就每天写些关于艺术的稿子付印。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这个问题比什么都紧要。

任：（兴奋）你那篇《生活的艺术化》写得真好，把哲学的最精思想，艺术的最高手段，熔于一炉了。

刘：不见得吧。我总觉意识是个球体，而文字只是一条直线，用直线描绘球体，哪里能谈得真切。（少停）过了几个月，渐渐发觉了他们的弱点。我为了尊重言论的神圣，向他们进了好几次言，哪知他们除了拜金，没有主义！（愤激）我很明白的知道，这个报纸是并不好的，是个庸愚的集合体，而我却依附在他们的集合体里，傻子似的努力做真诚的文章，希望可以安慰读者，这是何等难堪的事！（更愤激）我和他们的关系没有别的，只不过他们给我四十块钱，我每天供给文字罢了！我拿了这四十块钱，就同负了债似的，不得不给他们一些货！原来文字是最自由的人生表现，是无价的，现在却等于货物，可以用钱买，我的生活就像机械一个样，岂不是大大的懊丧！想到这里，我烦闷极了，我的思想无从开展，情绪没有着落，意志不得自由，再不辞了职回来，真个无法忍受了。自从那一天到了家里，我才回复了自由，环绕我的一切，依旧亲切有味了。（回复安闲的态度，轻轻摇着白羽扇。任康听得出神，静默半分钟。）

任：你这样的态度真是令人敬服。

康：精神快乐确是最紧要，然而一般人偏偏教精神去迁就物质！像女士这样，真可谓是精神的崇爱者了。

任：我约你今天到这里来，就为了想介绍你担任教育的事务。

刘：（喜悦）这是我十年前就立下的志愿。果是我能够做的，我没有不应允你的。（刘催促）快告诉我，是哪一等的学校？

任：（指康）康先生，他是经营商业的，但是他识见高超，热心公益，远远超过他的商业经验。他在家乡独力办了一个很完备的幼稚园，已经八年了，现在缺一位保姆。我想你对幼稚教育很有研究，所以今天把你介绍给他。

刘：（极乐）康先生，你真有见识。现在大家只知道普及小学教育，把幼稚教育似乎看得无关紧要。哪知没有幼稚教育，小学教育就少了最吃重的基础。（康颠头，赞同刘的话）先生，乡下一共有多少人家？

康：五百来家吧。来园的幼孩经常在一百内外，由六位保姆陪伴他们。现在缺着一位，任君介绍女士担任这一席。（诚恳）我刚才领略了女士的言论，从而窥见了女士的心神，敬代园里的幼孩们为女士劝驾！

刘：（诚恳沉着的）我答应任这一席了！（微笑，露出希望的神态）先生，那里是乡下，乡下……乡下的风景如何？

康：我乡有座朝霞山，拦住西边的天际。山色刻刻变幻，早上和晚上，春朝和秋夕，都显出美丽出尘的姿态。南面有个月湖，周围足有二十里。我们都有小的划子船，到湖里荡桨去。东北两面都是田野和林木。（得意）我乡有这些自然景物，倒是个很好的去处呢。

刘：（乐不可支）这真"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我最爱自然的

景物，它们的外形，组织，意义，都能教人引起精妙的美感，浪漫的诗思。（向任）住在上海那种地方，也局促沉闷的够了。两边都是高大的阴沉沉的房子，中间一条街道仿佛是阴沟。看那些匆匆往来的人，面目之间竟没有丝毫活气，真同无数机械在那里搬动。我的寓所对面是一家工厂，机器的转动发出单调可厌的声音，会使人脑筋发木。我没法耽在这样的地方作文，所以常常走到西郊的田野里，遇见一个可爱的池塘，几棵有意思的小树，就立定了想我的文字的结构，想妥当了才慢慢地回去，不拘何时，写了出来就是了。（娇笑）我还在这些地方对景写生，作了许多小画幅，隔一天我给你们看。

康：女士还能作画哩。

任：康先生的乡下，我曾去过，真是个好去处（向刘）到了那里，你一定能使你的艺术益发长进。一座朝霞山，就可以供给你无穷的画稿了。

刘：这当然是快活不过的，但是最快活的还不在此。我今后的生活，真个全部艺术化了。（精神焕发）

任：怎么讲？

刘：做儿童的伴侣，和他们游戏，工作，谈话，启发他们的心灵睿智，这就是一种最高的艺术。我是喜欢这样做而做的，是无所为而为的。看他们一天比一天的聪慧，壮实，就可以使我的灵魂得十二分的安慰，因为他们都是我的艺术品。（少停）又有优美的山，湖，田野，林木，使我默契自然的呼吸，开浚我艺术思想的泉源。我真愿意答应这一席！我真“得其所哉”！（起立，倚窗，徐掠额发）

康：（满意的笑容）女士应允了，我真代园里的幼孩们欢喜到十二分。到我那里，有十二里的水程，隔几天我放船来迎接女士。

刘：可以。

康：我今天还要回去，船此刻就要开了。（起立）任君，你有空同刘女士一起来么？隔几天湖上有了新月，我们可以荡桨乘凉，继续听女士的艺术谈哩。（走出去）

任：（跟着走出门）。这几天我没有什么事，很愿意同刘女士一同到你那边去。

刘：任先生肯一同去更好。但是我的艺术谈，须得预备一下才行呢。（微笑，跟着任也送康出门）

第二幕

六月间一个闷热的下午，在康先生办的幼稚园里一休息室里。刘女士正在理书桌的抽屉，桌上堆些旧报纸，预备包东西的。她理了一回，将无用的字纸弃在字纸簏里。要的东西包了起来。门开在书桌的对面。墙壁上挂着刘女士自己的作品，并不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却布置得非常得宜。她自己的一幅小像，挂在靠右的墙角里。

明：（明华是个六七岁的女孩子。她的面貌清秀而丰满，梳着两股发辫。她的眼睛很流利有神，可以知她是很聪颖的。她走进来，有一种怅然若失的神情，但不失其天真烂漫）先生，你今天要走了么？（走近刘身边，牵住她的衣裳。刘放下手中的东西，抚她的肩）你不要走吧！

刘：我不走，我只是收拾一下东西罢了。

明：（希望）你永久不走了么。

刘：我明天走。（理明的额发）明天……

明：（恳求）明天也不要走！永久不要……

刘：（执明的手）明天不能不走了，船也叫好了。（很不高兴）

明：（皱着眉，很可怜的样子）那么几时来呢？你昨天说，这里的幼稚园不开了，那么几时再开呢？

刘：永不开了。

明：（忽有所悟）不开也不要紧，你可以住到我们家里去。（牵衣欲走）今天就去。

刘：（坐着不动，说不出什么）

明：我要和你在一起！不愿意和你分开！你到我们家去吧。

刘：我明天要到自己的家里去呢。（勉强）隔几天，我就来和你在一起。

明：（端相着刘）隔几天？

刘：十天光景。

明：三天吧。

刘：这说不定。（放了明的手）你今天在这里畅畅快快的玩半天吧。

明：（仍牵着衣）答应我，三天吧。

刘：（无可奈何）三天——就依你。

明：要来得早点儿，我在楼上靠窗望你的船来。

刘：晓得了。（继续整理东西）

明：（拍拍小手，露出很喜欢的样子，靠着桌子看刘整理东西）你真欢喜我。

刘：（在抽屉里检出一幅画稿，看了一看，授给明）这一张送给你吧，是我画的。

明：（接在手里）画的一只小船，和我们家的一个样，就是我们家的那一只么？

刘：是的。

明：（嘻笑）我带回去给爸爸妈妈看。过三天你来了，再给我画一棵门前的大柳树，好么？

刘：（东西都整理好包好了，关上抽屉，用手巾擦了擦手，然后取了羽扇扇着）我可以给你画。

明：我也送你一幅画，好么？

刘：一幅什么画？

明：你猜我画的什么？（活泼地）

刘：湖里的船么？湖对岸的树么？朝霞山么？……

明：告诉你吧。前天我家里供了几朵红荷花，我看着很好玩，就用蜡笔画了一朵。藏在抽屉里，没给人看呢。

刘：你肯送给我，我很感谢。

明：（转身欲走）我就去拿来。

刘：何必就去？在这里畅畅快快的玩半天再说。

明：你明天要走了。我去拿了就来，快 得 很。（赶紧奔出了门）

刘：（站起来望着她）慢慢儿走，不要汗湿了衣服。

康：（从门外进来，精神不很好，但不失他的风度）刘女士，你闲着没事吧？

刘：刚才收拾了些东西，预备明天回去。明华这孩子真可爱，她特地来望我，还留住我不让我走。（非常感激）

康：她才走？

刘：她去拿自己的画送给我呢。（少停）康先生请坐吧。（康坐在靠窗的藤椅上，刘坐在原处。）

康：真教人伤心！（微叹）这里的孩子，哪一个不像明华一般可爱！如今骤然使他们失去了他们的乐园，离开他们最亲爱的伴侣。都是我一个人对不起他们，也是我这一回失败里边最痛心的！

刘：（安慰他）这一回失败，完全在意料之外，全不是先生的过错。他们银行家不重信用，只图非分，一朝倒闭，却连累了先生。这是他们的罪恶！这是他们的罪恶！

康：我也这样想，所以虽然贫穷了，虽然失掉了商业上的地位，我一点儿不心疼。（恬然微笑）况且我要顾全我自己的生活，实在是很容易的事，值不得放在心上。（少停）刘女士，从这一回失败里，我却得到一个经验，请你听着，究竟对不对。

刘：什么？

康：我从前的计划实在错了！我把我的资本和劳力都放在商业上，以为就可以确立我的事业的根基。哪知商业究竟是虚空的，有个不可知的命运在那里操纵着，我们只有听它的命令，没有自主的权力。我用同样的资本和劳力，倘若弄了农业，谁还能牵累我。

刘：确实这样。

康：所以我这两天定下了以后的计划。我用低廉价钱买几亩沿湖的田，合着一家的人力，在那里种些园蔬，就足够一家人的吃用了。（坚决）我决计这样做，不再作别的盘

算了！（怨愤）只是幼稚园不能继续办下去，使已经开了的花半途枯萎，真教我梦魂难安！

刘：先生的愁虑也是我的愁虑，但不是先生和我的过错！（激动）这个过错另有应该承当的人去承当。

康：（沉思）唔。

刘：我来这里一年了，真快乐到十二分，我的灵魂都陶醉了。田野的生活，儿童的天真，都使我忘了现在是什么世界。我只游心于艺术，艺术也渗透了我的肌体。山巅湖里，阴晴霁雨，就是我的诗情画稿；孩子们的一歌一笑，就是我的安慰愉悦。我已经得到了我的最高的生活境界。我怎么愿意这个境界会突然失去呢？（激动）然而幼稚园从今停办了！

康：（被她感动，说不出什么）

刘：刚才明华牵住我的衣服，留住我不让我走，她的神态使我受深切的感动，内心格外悲痛。他们的亲爱的伴侣并不愿意抛弃他们，偏偏骤然要离开他们！我最愿意做的事业，情愿终身以之的，偏偏骤然使我不能继续下去！这是他们的不幸！但是这个过错，总有应该承当的人去承当。

康：女士这句话确实是个问题。有许多人明明有深造的天才，却做了人家的书记，就这样度过一生；心心想望做某种事业，以为是最合宜于自己的，却抱了缺憾到坟墓里去。为什么大家都不能如愿以偿呢？果能大家都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业，世界一定会换一个面目。岂不是好？

刘：这竟成了个公式，也由命运执掌，谁都只好顺从它。我偶然违背了这个公式，命运知道了，就肆着它的威权，把

我拨了回去。它全不思虑，全不费力，不当作一回事，我却受到了剧烈的悲痛！

康：（安慰她）你喜欢做教育事业，我想这个还容易，可以尽力，有趣味的地方，究竟还多。也许过了暑天，你仍旧可以违背了公式，和命运做第二次抗争。（刘沉思不语）

明：（拿着自己的画从门外走进来）先生，我把画拿来了。（见康，很亲切的叫）康先生。（康很和善的答应了）

刘：（接过画审视，把画授给康）你看她这朵红荷花，画得很像，亏她有这本领。（明靠着书桌旁，侧着头）

康：（接过画细看，向明）你画的真好。（把画给刘）

刘：（拍明的肩）你这幅画我将永远保存着，因为它是你和我要好的标识。（郑重放在一个包里）

明：（很急促，起劲的样子）我在路上遇见了邻家的几个哥哥弟弟姊姊妹妹。我说我要把这幅画送给你。我说你明天要回去了。我说你三天后就来。他们都说也要送些东西让你带回去。他们都拿了他们的东西和我一起来了。……

刘：他们为什么不进来？

明：他们在游戏室里呢。他们叫我来请你，要每人唱一个歌，才送给你一件东西。大家要和你痛痛快快玩半天，做最有趣的游戏。（拖着刘的手要走）我们还要你唱几个好听的歌。

康：（默默地）只有孩子！

刘：（露出绝无忧虑的神情）我的艺术生活还可以延续半天，我为什么不去！正好让命运知道我有违抗的意志！康先

生，你也去看看。幼孩们究竟不比花草，他们是有心灵的，多少可以使你得到几分安慰。

康：（也露出绝无忧虑的神情）我相信你这一句话。我们去看他们吧。（起立，出门）

刘：（起立，向门走，自语）我为什么不去！

明：先生来了，我们多快活！（跳跃着，随刘康出门。）

第　三　幕

十月里一个阴晦的下午，在刘的画室里。靠右放着一口橱，里面陈列些颜料；橱的式样很旧了。橱左是个门。橱的前面是画桌，桌上堆着许多画具，画片。刘正伏在桌上作画。她的面容略瘦损，眼睛也不似先前有神了。左角的短窗开着，窗外愁惨的天容，衬出三株衰柳。更远便是一望无际的荒野。靠窗摆着一几两椅。任坐在上首的椅子上，撑着头，很不乐意。墙上错落地张挂着刘自己的作品和照片。

任：你这样的生活……

刘：我的生活又走上了先前的轨道，依旧是最乏味的生活！我的思想又无从开展，情绪又没有着落，意志又不得自由，当初的我，不知哪里去了。

任：我想比以前在《时事评论》的时候，你总较为自由些，宁静些。你和他们的宗旨不同，是精神上最大的痛苦，住的地方不好，不是烦闷的原因。如今你只顾作画就是了，况且不在家里。

刘：你还不清楚我现在的生活。等我讲给你听了，你就不这样

说了。(停止工作)现在这个公司就仿佛以前那个报馆，虽然营业不同，所抱的主义却如出一辙。出品好不好，不是他们的着眼点，他们只打算怎样可以得到更多的金钱。我真不幸，脱离了那个，又逢着了这个，两个竟完全一样。

任：总有不同的地方吧。从前你的论文刊登在无聊的报纸上，固然贬损了价值，减弱了功效。如今你的画，一幅一幅都是独立的。你发挥你的技术，精妙到极点，就一幅有一幅的价值。虽然由没有艺术眼光的公司出版，又何伤于你呢？

刘：(摇首)他们何尝要你精心作画！又何尝许你精心作画！他们别的都不论，只和你谈每月出几张画——必定要出几张画。作画的事可以这样限时急就的么？然而已经和他们约定了，材料没有也只得画，心绪不好也只得画，结构未就也只得画，哪里能画出好画来呢？

任：你的画，总有你的好处潜藏在里面，虽然成了草草。

刘：是这样吗？我把画看作是自由的创作，心灵的表现；如今却天天拘囚在青黄红白之间，做了他们公司的雇佣，一天到晚，没有一刻馀暇；画出来的作品大半是勉强结构，不惬我的心意。你想这不是最无趣味的生活么？

任：(沉思)我想有不知多少画家，正和你过着同样的生活呢。咳！艺术……

刘：对一般的画家来说，我可以断言，他们决不会感到生活的乏味，只要看他们作画的技术和踌躇满志的态度就可以想见了。他们平日里留心搜集货物的广告、市售的明

信片，陈旧的月份牌，破外国书的一页一角，凡是上面有画的，他们都当作宝贝。等到作画了，他们全不讲意义，结构，调子、光线，……在这一张上搬一棵树，偷一块石头，那一张上临一所房屋，描一个人，就完成了他们的新品了。他们的作品也有两个特色：一是满，花草树木人物种种东西，一件一件的堆砌在上面，以满纸为度。一是艳：红的，绿的，青的，黄的，一大片一大片的涂在上面，刺激目光的力量愈强愈妙……

任：（颠首）真有这样的情形。

刘：我却始终相信作画须有哲理诗情做他的基本，而表现出来，又必须先有艺术的修养，宁静的神思。由我来看，作画虽不是难事，却也不容易，可以随随便便敷衍了事的。规定每月要画出多少张画来，我以为是侮辱艺术、侮辱画家的规约！至于我所说的那些画家，他们何尝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正在急急忙忙的抄袭拼凑，只求出品多多益善哩。

任：（冷笑）实在可笑。

刘：（厌倦）我看自己近来的作品，只觉得可厌，只觉得惭愧。（指桌上画稿）便是这一幅，也不过是增人烦闷的东西罢了。我空的时候常常独自默想：便是绘画，充分发挥我的能量，可以贡献于人们的应当比现在多上三四倍。为什么竟打了这样大的折扣？为什么只有现在只能……

任：就因为有公司的规约在，受着酬金的压力。换句话说，就是为着你的生活。

刘：我得到的也是这个结论。生活呀！你不应当逼迫我，使

我的艺术得不到发展。你这样对待我，真值得诅咒！（窗外作大风声，柳枝摇曳不止）

任：值得诅咒！诅咒的声音现在就像这风一般，到处都能听见了。

刘：我小时候就立志要做一个独立不倚的人，不愿意和旁的女子走同一条路，所以刻苦学习技能，得了一些经验。到如今世味也尝够了，生活的面目也认识了，才知道世间没有一个真正的独立不倚的人。我还是和旁的女子在同一条路上，和所有的人们在同一条路上！

任：既然这样诅咒，还是和大伙儿一起，只顾走下去么？

刘：（毅然）不！决不！我有我的新目标，人们里也必然有同我一样的，已经有了新的目标的人。这个目标就在前面，已经望见了，而且很真切了，只剩下一重障碍，——一重障碍——所以还不能大踏步前进。

任：（兴奋）我真愿意听到这句话。

刘：我知道即将来临的，是个空前的大爆炸。（起立）爆炸过后，什么障碍都成了灰烬，人们能望见的就只有那个新的目标。大家放开步子，大胆地向前走去，没有一些儿惊扰，差不多在乐园里嬉游一个样，每前进一步，便是一个新的愉快。（她举起两手，头仰起，表示希望的神情）空前的大爆炸！我愿你赶快来吧！艺术的生活！我要和你拥抱！（两臂紧紧抱住，露出坚信的表情。任瞪视着她。窗外大风又作，柳枝如狂的舞动）

（全剧完）

一九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写毕

编 后 记

第七卷收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散文和早年写的剧本。

散文分为两集："文化大革命"前写的编为一集，取名《融合集》，因为其中有一篇的篇名是《融合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后写的编为一集，取名《老境集》，因作者写过一首五律《老境》，那首诗的头两句是"居然臻老境，差喜未颓唐"。

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后写的散文，曾选出一百八十九篇，编成《叶圣陶散文乙集》，由三联书店出版。现在这两集收入的文篇，从范围和篇数看，都跟"散文乙集"大不相同。把"散文乙集"的《编后琐记》作为附录，为的是便于读者比照。

剧本共两种，编成一集，就取名《剧本两种》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